



贺彪

纪念文集

JiNianWenji

张自宽 张冰浣 主编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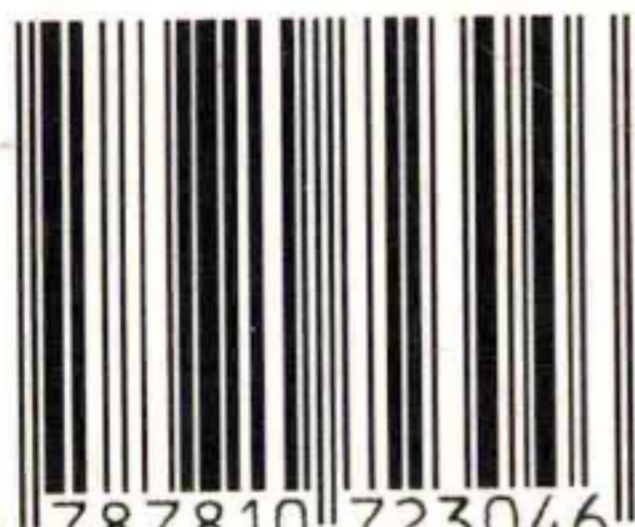
这是一首由众多人合写的对医界哲人贺彪的赞美诗，是饱含深情的怀念，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和净化，感人肺腑。同时又以她独特的作者群使之具有弥足珍贵的珍藏价值和史料价值。

她以内容情真意切，形式丰富多彩而颇具艺术性、文学性和真实性，值得细细品味和感悟，从而汲取人文正气的营养，升华人格品位。

封面设计：姜旭

封面摄影：谭晚春

ISBN 7-81072-304-9



9 787810 723046 >

ISBN 7-81072-304-9/R·299

定价：28.00元

贺彪纪念文集

张自宽 张冰浣 主编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贺彪纪念文集/张自宽 张冰浣主编. -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2.5

ISBN 7 - 81072 - 304 - 9

I. 贺… II. ①张… ②张… III. 贺彪 - 纪念文集
IV. 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9499 号

贺彪纪念文集

主 编: 张自宽 张冰浣
特约编辑: 郝秀兰
责任编辑: 谢 阳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378)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丽源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25
彩 图: 4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28.00 元

ISBN 7 - 81072 - 304 - 9/R·299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光荣的共产党员
有功的红军战士
医德医风的模范
救死扶伤的英雄

贺彪同志千古
廖汉生
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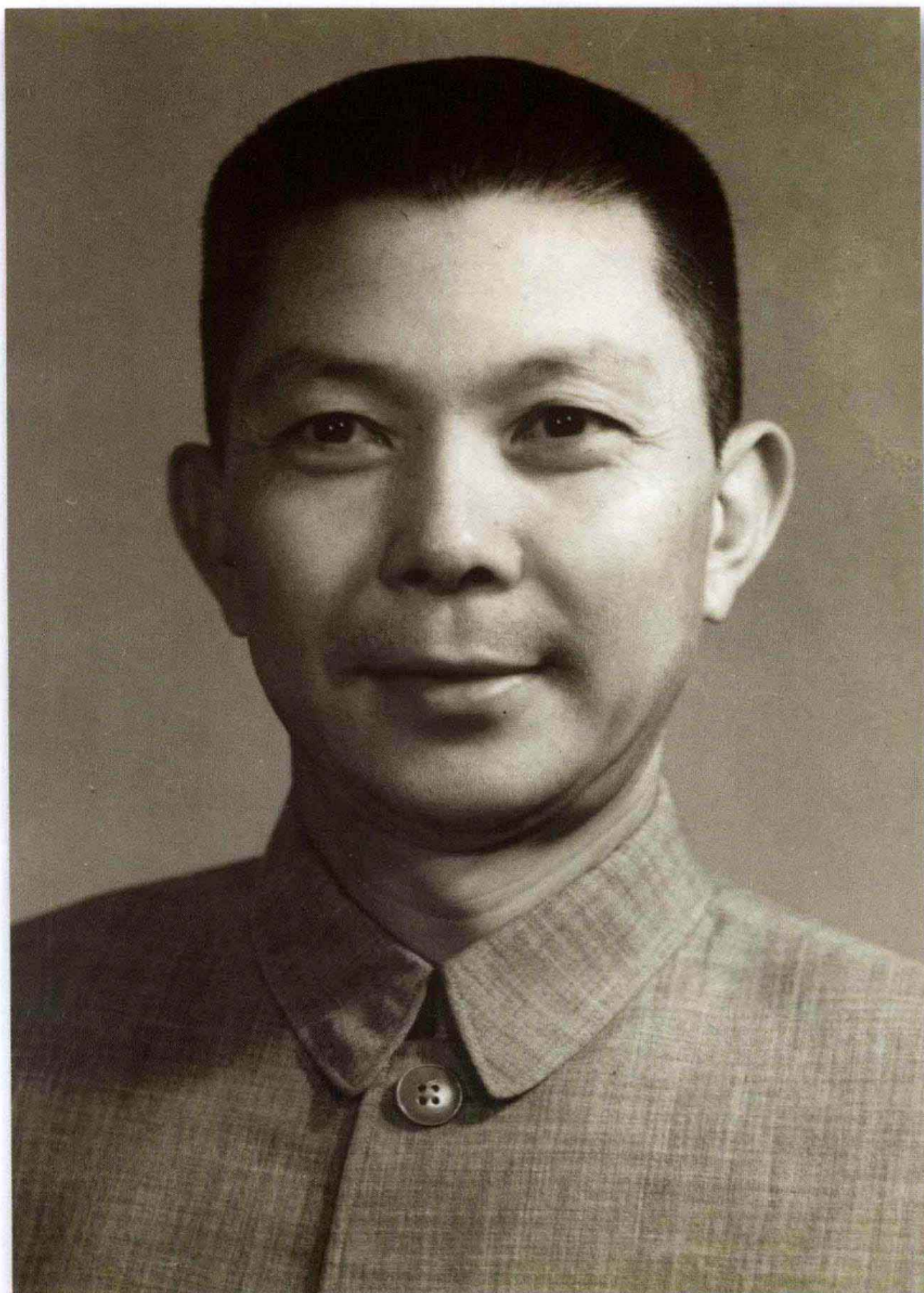
祝贺《贺彪纪念文集》出版

献身卫生事业
人民忠实公仆

二〇〇二年十月

吴阶平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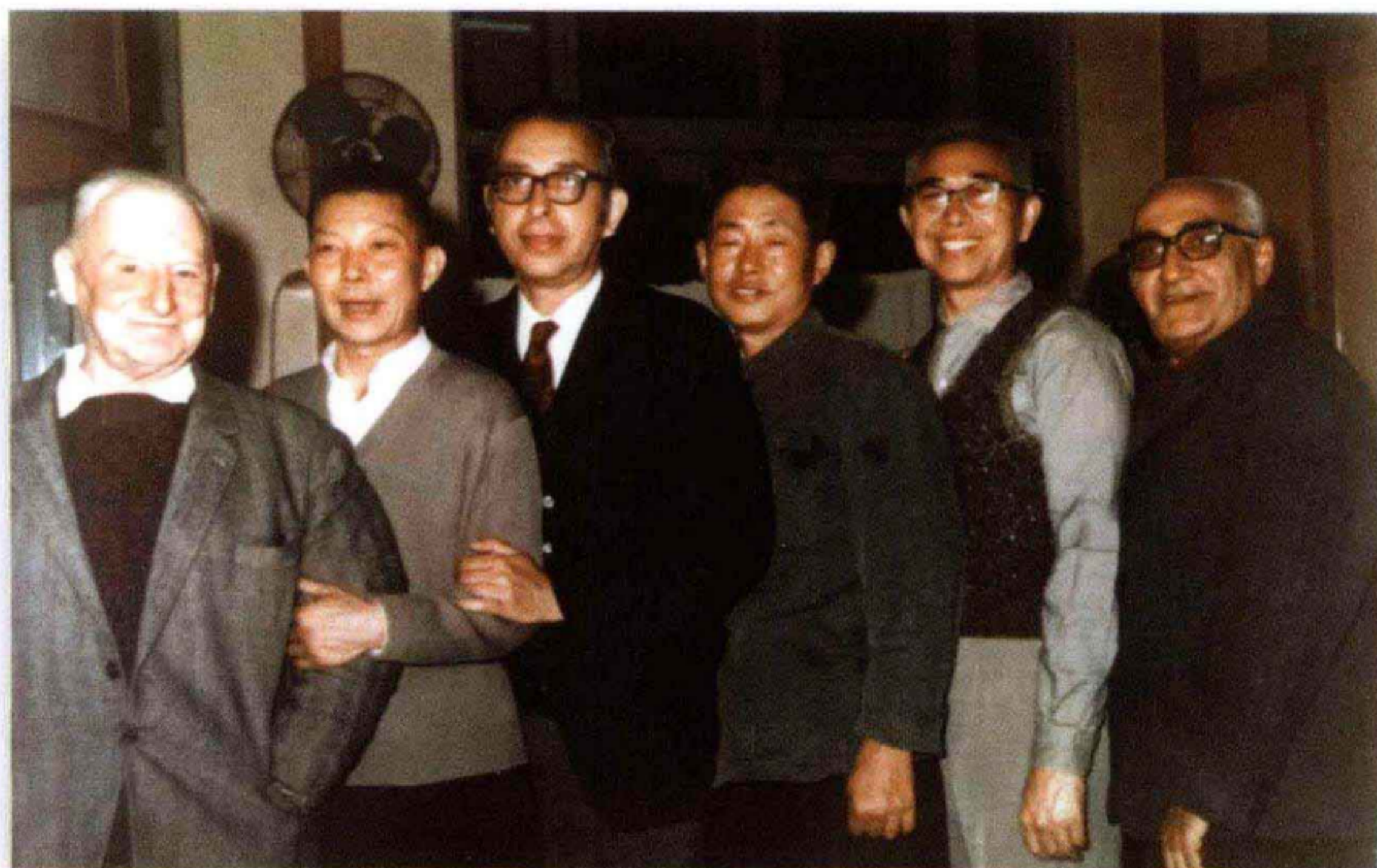




贺彪 1956 年在国家卫生部



贺彪 1997年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



贺彪与国际友人在一起
左起：路易·艾黎、贺彪、米勒、郑律成、黎雪、马海德



1998年，九十寿辰与家人和廖汉生、白林夫妇在一起



贺彪夫妇与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张自宽



贺彪于 1992 年夏



贺彪 1949年于西安

加个
团
日
志
志
于
党
志
于
人
民

为
我
军
人
同
时
生
事
出
必
出

志
出
立
献

张震

二〇〇二年十月

《贺彪纪念文集》编委会名单

顾 问：吴阶平 张文康 白书忠
主任委员：张自宽
副主任委员：张冰浣
委 员：陈仲武 董炳琨 朱 预
 江 冰 王 健 王万水
 杨宣春 何鸿明 宋文义
 赵一平 梁泽民 吴在德

特 约 编 辑：郝秀兰

序

贺彪同志是我党我军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第十三、十四、十五次代表大会特约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等职。

贺彪同志自 1926 年参加革命以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我军卫生领域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以自己崇高的革命觉悟、卓越的领导才能、求实的工作作风，创造性地领导了我军的卫生事业，出色地完成了卫生保障任务，救治了我军无数高级将领和伤病员，为我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红军时期，红二军团的指战员们传播着这样的情结：只要有贺彪在，战士们便杀敌更勇敢，冲锋更踊跃，官兵们都对他的医德和医术无比折服，从而成为战斗中鼓舞士气的巨大动力。长征途中，他曾亲自救治了身患重病和身负重伤的红军高级将领贺龙、贺炳炎、郭鹏、杨秀山以及无可计数的官兵。他还从艰苦的战争环境的实际出发，制定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各级卫生组织，创办医务人员培训机构和医院、诊所，筹集药品和医疗器

械，胜利完成了战争时期的卫生保障任务，多次受到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帅的赞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彪同志历任西北军区卫生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卫生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先后分管计划财务、医政、药政、妇幼卫生、援外等工作。他提出的应当坚持“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建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卫生部长会议上，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他工作作风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经常深入城乡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出建议。在他亲自主持下，制定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并亲自动手解决卫生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他工作勤奋、作风民主、处事公道，对同志满腔热忱；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勤于学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高尚情操和品格，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广泛而高度的赞誉，他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贺彪同志是我国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一位人杰。已经站起来走向小康的中国人民为有贺彪同志这样为她的解放和福祉艰苦奋斗七十余年的儿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贺彪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为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的道德风尚，为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从中汲取人文正气的营养，升华其人格品位，为发展先进的医药卫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002年是贺彪同志逝世三周年，为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励后人奋发向上，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我们组成了以张自宽、张冰浣同志为主编的《贺彪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并请吴阶平、张文康、白书忠同志任顾问，广泛征集了曾与贺彪同志一起生活、工作、战斗过的老战友、老同志、老部下、老朋友以及亲属撰写的80余篇文稿，这些文稿溢满了对贺彪同志的深厚爱戴，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之情，读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除了具有感人肺腑的纪念意义之外，还因地特殊的作者群而使之具有难得的珍藏价值。该书的作者中，许多是功名不菲，战功卓著的我军高级将领和卫生事业的创建者、领导者，有些已是年过八旬的老红军，还有些作者是贺彪同志的至爱亲朋，所言之事具有可靠的真实性，为进一步修好我国医药卫生史，提供了信实的史料，这些史料弥足珍贵。

此外，这本书内容情真意切，形式丰富多彩，颇具有艺术性，很值得珍藏和细细品味，从而更深地感受贺彪同志的博大精神，学习他的崇高品德。

贺彪纪念文集编委会

2002年3月

贺彪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贺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3月31日6时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0岁。

贺彪同志1909年8月30日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沙岗镇。1926年参加革命，任少年先锋队队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中共江陵县委地下交通员。同年秋至翌年初，参加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任中共鄂西特委和工农革命武装侦察员。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出色地完成了机要交通和作战侦察任务。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7月起，历任红二军团医疗队队长、看护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红三军医务所所长、军医处处长，参加了开辟湘鄂西、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组织指挥了根据地反“围剿”作战中的战场救护和苏区军民的医疗卫生工作。1934年10月，任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兼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卫生部部长，参加了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5年10月，参加了长征。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部长。长征途中，他亲自救治了身患重病和负重伤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贺龙、贺炳炎、郭鹏以及无可计数的官兵，为他们实施手术，挽救了一批红军高级干部的生命。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卫生系统的领导人，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

境和条件下，从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战争的实际出发，制定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各级卫生组织，创办医务人员培训机构和医院、诊所，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胜利完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卫生保障任务，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贺彪同志任八路军第120师三五八旅卫生队长、卫生部部长。1938年起先后入延安卫生学校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起历任第120师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军区卫生部长，参加了百团大战等战役和巩固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在日军疯狂军事进攻和顽固派封锁造成的极端困难时期，他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主持创办了卫生学校和多所医院、诊所、卫生实验所、制药厂，首创生产合作社，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卫生干部，生产了大批药品和器材，有力地保证了晋绥地区抗日武装斗争，支援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贺彪同志历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长、西北野战军卫生部长、第一野战军卫生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参加了保卫延安、青化砭、蟠龙、宜川、太原等战役。他提出“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精心谋划，科学组织，加强管理，出色完成了战役战斗中的战场救护和大批伤病员的收治任务，多次受到彭德怀、贺龙等的赞扬。

1948年，西北部分地区发生鼠疫，贺彪同志亲自组织指挥防疫队开赴疫区，坚持预防为主，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展，保障了解放区军民的健康。他提出的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原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卫

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正气凛然。在晚年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关心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充分体现了—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

贺彪同志作风正派，刚直不阿，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性格坚强，坚持原则，从不向邪恶势力让步；他工作勤奋，作风民主，处事公道，求真务实，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处处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团结同志，居功不傲，不计名利；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的高尚情操和品格，赢得了广泛赞誉和尊敬，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他的崇高品德和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

贺彪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高尚品德，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目 录

贺彪同志生平..... (1)

纪念文章

功业垂青史 风范驻人间

——深切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张文康 (1)
无尽的追思 深切的怀念	白书忠 (4)
共产党人的楷模	黄新廷 (8)
比亲兄弟还亲的贺彪	谭友林 (15)
忆军事医疗战线上的优秀战士贺彪	杨秀山 (19)
思念贺彪同志	薛 明 (28)
拜读《贺彪词选》感言	张光年 (32)
难忘战友情	吴子杰 (34)
忆好邻居好朋友贺彪	张铨秀 (38)
怀念贺彪	陶汉章 (39)
贺彪对同志像火一样热情	苏宏道 (42)
“割股除灾毕生愿、功业未竟心切切” ——贺彪同志逝世一周年祭	张自宽 陈仲武 张冰浣 (44)
缅怀我们的老领导贺彪同志	陈仲武 张冰浣 (49)
怀念贺彪同志	洪明贵 (58)

- 学习贺彪部长的“硬骨头”精神 董炳琨 (61)
- 彪炳千秋
- 怀念贺彪同志 谢 华 田仁明 刘 凯 (66)
- 回忆敬爱的贺彪老部长 游全举 (70)
- 救死扶伤 大义凛然
- 怀念贺彪同志 欧阳山尊 (75)
- 贺部长给我治病 严寄洲 (85)
- 一颗明亮的星
- 忆贺彪将军 魏 风 (88)
- 我们敬爱的贺彪同志 李 凌 (92)
- 心中永远不去的身影
- 悼念贺彪叔叔 贺捷生 (96)
- 我的父亲和贺彪伯伯的生死之交 王允刚 (100)
- 贺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纪念贺彪同志逝世三周年
- 钟南辉 李树枝 廖诗权 (108)
- 难忘贺彪部长对战友的深情 涂端清 (113)
- 感人肺腑的纪念 林钧才 (118)
- 哀思 严 昭 (122)
- 永远的纪念 许应南 (125)
- 贺彪部长在贺家川 刘 英 (128)
- 贺彪部长领导我们战胜困难 江 冰 (130)
- 回忆 刘进才 (132)
- 永远回荡的宏亮声音 刘进才 (134)
- 忆贺彪部长接见手术团 李沛文 (136)
- 悼良师 念故友 顾尔承 (140)
- 怀念贺彪同志 张 金 (142)

回忆贺部长在晋绥二三事	许若韦 (149)
贺彪部长为我姐姐接生	于陆琳 (152)
艰苦创业 风范长存	魏明中 李经伦等 (154)
忆老部长贺彪同志片断	申春和 (162)
深切怀念贺彪部长	张咸恒 (164)
深切怀念老首长贺彪	侯景明 (167)
贺部长给我们平反	侯友桐 (171)
深切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强少宇 (173)
亲切的关怀 热情的鼓舞	姜恒明 (176)
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赵培真 (180)
西北地区卫生医疗工作的奠基人	
——怀念贺彪部长	耿健 (186)
第四军医大学发展	
——倾注心血的将军	刘进才 (189)
怀念原第四军医大学的创建者贺彪副部长	梁泽民 (191)
回忆贺彪部长二三事	于清汉 (196)
怀念贺彪部长	胡铮 张敬娥 (198)
正义的贺彪将军	宋儒耀 (200)
深切怀念贺彪同志	刘锡荣 (203)
记贺彪同志二、三事	苏菲 (211)
忆部长良师贺彪同志	张侃 (215)
永远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何鸿明 (220)
怀念贺彪副部长	茹竞华 (226)
贺彪部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健 (231)
贺彪的农村卫生工作思想、谋略及遗憾	张自宽 (241)
和贺彪同志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张之强 (258)
忆老队长贺彪同志	栗秀真 (265)

小扇寄深情	赵一平 (272)
缅怀和学习贺彪老部长	朱 预 (273)
回忆贺彪大队长	刘力生 (275)
正气之歌	
——贺彪同志《忆故人·怀贺帅》浅析.....	陈 济 (279)
是良师 是兄长	陈慧玉 (282)
贺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凝秀 (289)
贺彪部长关怀我军药材装备建设	裘雪友 (291)
怀念贺彪老部长	王万水 (293)
忆贺彪部长在总后勤部工作	樊兆春 (300)
贺彪部长的荆楚之行	杨宣春 (307)
贺龙与贺彪	胡立言 (311)
我记忆中的贺伯伯	
——《贺彪回忆录》编后记	孙阿冰 (320)
三让座骑的人	
——记老红军贺彪	刘雁声 (324)
莫忘密切联系群众	
——访贺彪	张占辉 (326)
贺彪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谭小英 (328)
忆我的部长姑父	窦天美 (332)
姨父，我们全家怀念您	解 扬 (335)
爸爸的爱心	贺 斗 (339)
祭我父	贺 争 (350)
贺彪首长二三事	吕清华 (352)
一位革命者的风范	
——怀念贺彪首长	肖祥建 (355)

诗 词

怀念贺彪

- 贺彪同志逝世三周年祭 张自宽 (359)
- 贺彪老首长两周年祭 罗昆禾 (361)
- 苍松与老人 王万水 (362)

怀念

- 追忆贺彪部长 刘进才 (365)
- 悼念贺彪部长 汪石坚 (366)
- 诗词一首 黄年虎 (367)

怀念我的舅父

- 念碑 葛一林 (368)

英雄永生

- 《贺彪纪念文集》编后 郝秀兰 (369)

功业垂青史 风范驻人间

——深切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张文康



1998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探望贺彪

贺彪同志离开我们两年多了。曾与贺彪同志一同工作和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编了一本纪念文集，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写此短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贺彪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我军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 1926 年参加革命，1930 年开始从事卫生工作达六十多年，阅历深广，知识丰富，功德厚重，功业卓著，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不能忘却的人。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及时地创办和发展了医疗卫生事业，使军队的战斗力和人民群众的劳动力得到有力的保障。贺彪同志的功绩就在于从创建革命根据地时的土地革命战争时起一直从事军队和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建工作，直到“文革”之后他已 70 高龄仍在为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卫生建设运筹策划，呕心沥血。他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贺彪同志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一名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他高度弘扬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历次战斗中救治了无数的伤病员。在长征途中贺龙、贺炳炎、郭鹏等高级将领身负重伤或身患重病，他亲自医治和看护，治疗了他们的伤病，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功绩更为巨大。作为一名卫生工作的领导者，他充分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环境极为险恶、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针对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不断创办医务人员培训班、卫生学校、各种医疗服务机构和药品器材生产机构，培养出了大批医药卫生干部，生产了大批药品和器材。这些业绩，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保障和支援作用；而且为建国后军队卫生系统的建立和地方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贺彪同志留给我们的财富很多，最可贵的是他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结合长期革命实践形成的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和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精神，影响更为深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西北军区卫生部长时提出的“一切为了战争

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工作方针；在组织指挥扑灭西北部分地区鼠疫时提出的“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工作方针，均得到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并予以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成立后他担任副部长，分管计划、财务、医政和药政等工作，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参与或主持制定的有关政策、规章制度、技术标准和发展规划等文件，均体现了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精神，对全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贺彪同志特别关注农村卫生，1959年春天他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山西稷山县农村蹲点调查，筹备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稷山现场会议，为中央制定农村卫生政策作了准备。1965年在毛泽东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贺彪同志又立即响应中央号召，率领一个工作队到大别山区的湖北省麻城县农村蹲点，一面指导医务人员为山区农民群众防治疾病，一面进行调查研究，探索解决农村缺医少药保障农民健康的道路、方法和模式。他与工作队同志同吃同住同工作长达一年，正准备总结经验普遍推广时，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迫回京，接着就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进“牛棚”达8年之久。由此而未能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贯彻到底，他深为遗憾。晚年他曾赋有这样的诗句：“麻城悬壶经有年，割股除灾毕生愿，功业未竟心切切，眼前磨难沥心血”。足见他对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始终萦绕于怀。

我们要继承贺彪同志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前辈们未能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张文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无尽的追思 深切的怀念

白书忠

1999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卓越领导者，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贺彪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

贺彪同志1909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贺彪同志将毕生精力献身于我党、我军的革命事业和医疗卫生工作，为我党、我军卫生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不畏艰险、战斗不息、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值此纪念文集编辑出版之际，我们更加怀念这位德高望重、可敬可爱的老部长。

贺彪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奋斗经历，基本体现了我党、我军卫生工作走过的道路，反映出红军时期创立，并在以后漫长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发展壮大的卫生事业的光辉历程。

土地革命时期，贺彪同志先后担任红二军团医疗队长，红三军军医处长，红二军团卫生部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等职，参加了开辟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组织指挥并亲自参加了反“围剿”作战战场救护和伤病员后送，以及根据地军民的防病治病工作。长征途中，贺彪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在敌人围

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救治红军伤病员，挽救了包括贺龙、贺炳炎、郭鹏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内的一大批指战员的宝贵生命，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种子”。他积极发展壮大红军医护队伍，组织建立各级卫生机构，培训卫生技术骨干，成为红军卫生事业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贺彪同志先后担任八路军旅卫生部长，师卫生部长兼晋绥军区卫生部长，参加并组织了百团大战等战役和巩固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的伤病员医疗后送工作。为打破国民党对我军的医药封锁，他克服环境艰苦、医药奇缺等重重困难，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利用中医中药方法救治伤员，大大提高了战伤救治效率，使近万名伤员得到及时治疗 and 妥善安置，为挽救伤员生命和保障部队战斗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贺彪同志历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长、西北野战军卫生部长。职务的调整和地位的变化，都丝毫没有削弱他同部队指战员的深厚感情，仍然时时刻刻把伤病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他反复强调为部队服务，为伤病员服务的卫生工作宗旨，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都把满足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伤病员的医疗卫生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属点。他组织指挥了保卫延安、青化砭、蟠龙、宜川、太原等战役的伤病员救治工作，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观点和“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工作方针。这些观点和方法至今对我军卫生事业建设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贺彪同志历任西北军区卫生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组织制定的许多医药卫生政策、法规和标准，均对以后党和军队的卫生事业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贺

彪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虽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刚直不阿，面对声势浩大的诬蔑、诽谤，他可以倔强地昂起头来，向“造反派”们大声喊出：“我不是走资派，这些全是造谣”。恢复工作后，他不记个人恩怨，团结整过他的人一道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老红军的宽广胸怀和崇高品质。1977年贺彪同志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后，仍像战争年代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日以继夜的工作。他深入医院、院校、部队，逐门逐户看望、慰问受迫害的高级知识分子，拨乱反正，理顺关系，为专家们落实政策，恢复待遇，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他领导建立和完善军队卫生工作规范，制定军队医院长远建设规划，提高医院管理水平，恢复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强调医学科学研究，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培养卫生技术人才，发展先进卫生装备，重视部队卫生防疫，为军队医疗、预防、教学、科研工作付出了全部智慧和大量心血。1982年退居二线后，他仍然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他不顾年迈体弱多病，亲自撰写了《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等党史军史著作，为科学总结我军历史经验提供了宝贵史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贺彪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卫生事业。长期的革命生涯塑造了他耿直、坚韧的性格，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都不曾舍弃信念、动摇退缩。他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作风正派，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重视调查研究，对事业执着追求；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娇惯放纵，总想用革命的理念将他们塑造成为俭朴、勤恳、忠诚、正

直的人；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崇高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对我党、我军卫生事业做出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

我们真诚的敬仰老部长，我们深切怀念老部长。我们要学习贺彪同志坚定的革命理想和身先士卒、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学习他始终保持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把毕生心血倾注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一心想着官兵健康，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真诚热爱卫生事业，深入实际，体察下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品格。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跑线上，军队卫生工作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严峻的挑战。我们一定要继承老一代卫生工作者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从贯彻落实江主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军委新时期战略方针的高度，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风貌和殚精竭虑的工作态度，按照军队卫生工作“十五”规划总目标的要求，开拓进取，求实创新，扎实工作，努力推进军队卫生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

(白书忠：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共产党人的楷模

黄新廷

贺彪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人们谈起来，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高尚人品。贺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呕心沥血，为人民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建立后，他又担负起国家卫生部的领导重任，不断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针、医药工业的发展、医学教育系统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符合国情的精辟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提出的医疗工作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等主张，至今，仍是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他一生经历坎坷，几上几下，但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指战员的伤痛疾病挂在心上，最关心的是亿万老百姓不再受穷，千方百计使受伤病困扰的人能够摆脱疾病、伤痛。他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我和贺彪相识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他担任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我在红四师第十二团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后，贺彪同志就带领着一支团以上干部伤病员队伍，随我们红四师行动。我们一起渡澧水，过乌江，回旋乌蒙，夜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与数倍强敌浴血奋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贺彪同志那种急伤病员所急，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高尚行为，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长征。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贺龙总指挥挥师直插湘中，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在调头西进中，进行了瓦屋堂战斗，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在战斗中负伤，打断了一只右臂。贺彪骑马迅速赶到瓦屋堂。贺炳炎师长抬到救护所时，已是负伤3小时之后，大臂骨完全炸断，仅连着部分皮肉和几根筋，天气寒冷，又并发急性肺炎，高烧不退，面无血色，呼吸微弱，处于昏迷状态，伤情十分危急。加之在湘中战斗中，卫生部的药品与手术器械受损，更是雪上加霜。贺彪同志虽然心情一阵紧张，但他很快就确定了手术治疗方案，并将其他医生派往前线抢救伤员，由他一人主刀手术，承担全部风险。贺龙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也先后赶来。贺龙问贺彪手术需要多少时间？贺彪回答需要3个小时。贺龙立即对传令兵说：“传我的命令，让掩护部队再打3个小时！没有我的命令，阻击部队不许撤下来！”在枪炮声的激烈轰鸣中，在贺老总不停地看表的焦急表情下，贺彪给贺炳炎紧张地进行手术。在一间普通的民房中，烧着一盆炭火消毒器械，门板代替手术床，将自身带的手术板锯消毒，烧弯的缝纫针当作缝合针；消毒的棉线当作羊肠线……两个小时后，贺彪已是汗流颊背，衣服全湿透了。贺老总又一次问贺彪，还得多少时间？贺彪回答：“还得半小时。”贺龙立即发出了让部队作好转移准备的命令。重压之中进行手术的贺彪，紧张中透着从容，急速中含着细致，他费了很大力气截去断肢、小心地修复炸烂的伤口，还不时劝慰苏醒过来不愿意截肢的贺炳炎。硬是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这位性格倔犟、脾气暴烈战将的生命。

1936年8月，长征抵达藏区的噶曲河畔，总指挥部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幸被隐藏在草丛中的敌人击中，身中数弹，从马上翻下，掉在河里，伤势

危重，命在旦夕。总部派人到红四师，把贺彪请了回去。由于伤员在水中浸泡时间太长，全部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常常咳嗽，最糟糕的是有一颗子弹在髌关节中没有出来，必须立即抢救。在草地之中是没有任何条件做手术的。为了战友的生命，贺彪果断地决定实施手术。他在草地上找了一块相对平坦、干净的地面，让伤员平躺在地上，在旁边生起了一堆篝火，贺彪就跪在地上做起了手术。当时天色已黑，更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他硬是凭着在战争环境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一手过硬的技术，把手术做了下来，而且非常成功。在这样的条件下做手术在医疗史上不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了。战友的生命得救了，可是骨瘦如柴的贺彪，此时双腿发麻，腰酸背痛，几乎都无法站立起来。

我们红十二团的傅传作营长，也是在长征途中被贺彪同志抢救过来的一位伤员。那时，大家都认为他是一点也没有救了，领导让他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贺彪认真分析了傅传作的伤情，采取了非常规手段，又一次挽救了战友的生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王尚荣、顿星云、唐金龙等将军，先后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也是贺彪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从生死线上将他们抢救了过来。

在长征途中，他身边总是带着一支不小的伤病员队伍。红四师政委方明理腿部负伤，师政治部主任朱辉照脚部受伤，我们红十二团政委杨秀山，急性腹泻都曾在贺彪的关照下，渡过那段艰难的岁月。长征越在艰苦时，贺彪的队伍越庞大。方面军许多师团干部负伤后，都送到贺彪这里。他不仅与指战员一样要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而且要为伤病员医治创伤。不仅如此，他还被经常调来调去，抢救方面军的其他危重伤病员。我们红四师在长征途中是整个方面军的前卫部队，卫生部在我们这个前卫团的后面，但却在大部队的前面。有一次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同志肺病复

发，贺龙派人到红四师，调贺彪去总部，进行治疗。又有一次贺龙总指挥得了中毒性菌痢，关政委派侦察连长萧美成专程来请他。他骑马急速后返，昼夜兼程，赶赴总部，为贺老总治好了重病。还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治疗摔伤。我们长征经过了二万五千里，而贺彪同志却不下二万八千里。

经贺彪同志亲手治愈的将军不下百名，许多人后来都担负着国家和军队的领导重任。而他却从不对人提及此事。当事人或有关人士对他表示感谢、赞扬时，他总是淡淡一笑说：“谁当医生都会这样做的。”至今，他的许多感人事迹，还鲜为人知。

贺彪同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医生，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卫生部长。部队过哈巴雪山时，他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向贺老总、关政委提出建议：再过雪山前，行动前要让部队喝上煮开的生姜、辣椒水；翻越雪山时，禁止停下休息，由于部队减员，枪多人少，建议将破旧枪支处理，减少部队负重。首长非常重视他的建议，让他写成文字。关向应政委与甘泗淇主任亲自整理，形成文件以政治部名义行文，下发部队执行。在以后三次过雪山时，部队大大减少了非战斗伤亡。这个文件至今还保存在军委档案馆中。

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我军长期处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敌人千方百计实行经济封锁，部队缺医少药，成了军队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贺彪同志把培养自己的医务人员及开辟药源始终作为工作重点。我军每到一地，他总是要了解当地医务工作者，争取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再发挥这些专业人员的长处，为部队培养大量的中初级医护人员。他自己的医术也是从实践中向这些同志学习的。红军时期，他采集的中草药和在民间搜集来的偏方、验方、秘方、救治了许多战友的伤病。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办了卫生学校，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中初级医务人员。该校后来发展为我军的著名高校——第四

军医大学。他在晋绥根据地办的药厂不仅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需要，而且还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供应。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自办的卫生实验所，迁到了兴县吕家湾后，研发出了破伤风抗毒血清、破伤风类毒血清。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挽救了许多军民的生命。1948年，党中央从陕北晋绥根据地到晋察冀军区时，毛泽东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和前方打仗一样，吕家湾也打了一个大胜仗！”

西安事变后，红二方面军移驻在陕西富平，部队进行了军政整训。当时，贺彪同志担任红四师卫生部长。由于历史上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部队发生了一场风波。上级派来的一些干部在红四师发起了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试点活动，并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师长卢冬生，团长黄新廷，卫生部长贺彪。把这三个人定为部队军阀主义的代表人物。全师指战员哗然。大家都想不通受人尊敬的指挥员和一心为病人的部长怎么成了挨批的对象，有人当场站起来反对这种错误作法。卢冬生师长性格耿直，情绪冲动，当场就要表示反对。贺彪立即阻止了他，让他听完后提出意见。会后，卢冬生留下了团营干部，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气愤地交出指挥权，离开了红四师。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某些人想整贺龙、王震同志，拿我们来做“试点”。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坚决抵制，使这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行动，一开场就无法推行，最后不了了之。

1939年，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贺彪，赞扬了他遇事沉着、冷静对待的好作风。指出：“1937年红军改编时，一些人在红四师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那是很不正常的、错误的。特别是在干部战士大会上，指名道姓批评领导干部，更是错误的。”

为此事，我一直感到气不顺。贺老总找我谈过此事，也没有

解决问题，因此事本来就是对着贺龙来的。贺彪同志向我传达了任弼时的谈话，心里才舒畅了许多。

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是贺彪同志的一贯作风。红军时期，我们都曾被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湘江鄂西苏区领导人夏曦打成所谓的“改组派”，剥夺了自由，差点送了性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都被扣上了贺龙分子、反革命的帽子。批斗、关押、劳改六年之久。身处逆境，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做过一件违心的事，不向恶势力低头。医学界的许多老专家、老教授都非常敬佩贺彪同志的铮铮铁骨。抗日战争时期，康生等人大搞所谓“抢救运动”伤害了不少文化、技术人员。他所领导的晋绥军区卫生部，坚持实事求是，没有伤害一个好人，尽管为此他还受到批评。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贺彪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上能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为了照顾从其他方面军调来的干部，他主动要求从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岗位上下来，被调到三五八旅当卫生部长，把旅的卫生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还接受了陈赓纵队送来的 2000 名伤员，完全治愈后归队。后来又从旅卫生部长调到七一五团当卫生队长。大家都为他抱不平，他却毫无怨言，亲自上火线，抢救伤病员。旅卫生部技术力量不足，许多伤员还送到七一五团卫生队来治疗，他全部接受。无论调到何处工作，他从未离开过手术台，从未放下手术刀，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从不介意职务的高低、大小。文革时期，就在他受尽折磨之时，造反派想拉他出来，以其老资格、老革命身份作门面，建立革命委员会，被他坚决拒绝，宁愿继续再受折磨。

我们俩曾在八路军 120 师党代会上被选为七大代表，共同在延安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此后战斗、生活在不同地

区，很少联系。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又都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相互接触又多了起来。已是耄耋之年的贺彪同志，仍然时刻关注着改革开放事业。我提出的开放内陆边境口岸、选拔中青年干部等建议，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

他联系的军内外知识分子很多，对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科教兴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深刻和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抚今追昔，我们都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空前丰富多彩的世纪。他认为能够经历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大、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并亲自投入其中而感到幸运；能够用毕生精力和遭遇，探寻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感到满足。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多么高尚的情操和宽阔的胸怀啊！

(黄新廷：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解放军原装甲兵司令员)

2001年10月9日

比亲兄弟还亲的贺彪

谭友林

我和贺彪是老乡，都是湖北江陵县人，当红军参加革命前我们曾是一个县的人，但并不认识。后来当了红军，有人介绍贺彪是沙岗人。我们真正熟悉并且感情很深是从1935年开始。

1935年3月，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我就当了红六师17团政委。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臂，碎了的骨头由于没有取出来，使右臂肿得很厉害。贺彪给我治伤，每天都能倒出一杯脓。我要求贺彪保住我的手。行军中，部队给了我一匹马骑。负伤的伤员有几十人，有的轻，有的重，当时担任红二军团卫生部长的贺彪非常忙，每天边行军、边给伤员治病。我们这些伤员跟着贺彪走了几个月，行军中，有的抬担架，还有的人抬炮，贺彪途中还要给伤员换药治疗，所以我们这个伤员队伍，每天都比大部队晚到目的地。作为这支队伍的首长和医生的贺彪责任心极强，他医术精、医德更高。他的医术都是干中学的，也跟军中的外国医生学，所以他各科都通，战争中的各种抢救以及红军长征途中的各种病患，他都能中西医结合，就地取药，对症下药地救活了无数伤病战友。他既耐心细致，又大胆果断，对伤病员极端负责，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和尊重。

后来，我们行军到达桑植县，我要求去当地的一个学校学习，当时贺彪已是红二军团的卫生部长，有一定的文化，念过私塾，而我是个农民，十三四岁就当了红军，没有什么文化，所以需要学习。1935年12月在红2、6军团主力从根据地突围时又



1941年贺彪与战友们在延安。前排：第120师政治处主任李贞；后排左起：新四军第6旅旅长谭友林，贺彪，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聂鹤亭，第359旅副旅长郭鹏

组建了红5师，贺炳炎任师长，我任政委，当时我只有19岁。1936年红四方面军和我们红二方面军汇合之后，我到宝安，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称我是娃娃政委，当时我胳膊上的伤还没好，周副主席对我很关心，请马海德医生来给我看伤，马海德说我的伤要到外国或到苏联去治，但贺老总没有同意，他认为我能打仗，战斗离不开我。后来，在延安抗大一次吃饭时，周副主席见我负伤很辛苦，叫我化妆成学生到西安西京医院开刀，但没能成行。后来又广仁医院开刀，我的伤还没好又到了太原。因为战斗紧张，无暇治疗，我的伤整整3年才算痊愈。

长征途中，过草地，我得了疟疾，是贺彪请杨医官用中药治好了。延安“七大”，我和贺彪都当选为“七大”代表，一起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平时我们也来往颇多，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讨论问题。

最令我终生难忘，也能说明我和贺彪的感情比亲兄弟还亲的一件事是：1944年我结了婚，当时贺彪也调来在延安卫校学习。我们经常见面。1945年在延安，我的妻子生了个女儿，取名晓芳。战争残酷，经常东奔西走，还要突破封锁线，携孩子行军打仗非常不便，我便把女儿晓芳寄养在贺彪家。当时贺家已有3个男孩子。女儿晓芳当时还在襁褓中。战争年代缺吃少穿，贺家已有3个孩子，再加上我的女儿晓芳才只6个多月，可以想象贺彪一家抚养这些孩子的艰难。贺彪的夫人陈凯以及贺彪全家，把晓芳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抚养晓芳整整4年，直到1949年我才把晓芳接回到我身边，但晓芳回来时，根本不认我，依然管贺彪夫妇叫爸爸妈妈。有一次她跑回贺家时迷了路，警察问她爸爸妈妈是谁，她说爸爸姓贺，妈妈姓陈。经常是我接她回家，很快她又跑回到贺家。可见晓芳已把贺家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把贺彪夫妇当成是她亲生的父母。

贺彪夫妇为我所作的一切令我终生难忘，永远感激，从中也体现了贺彪对战友比亲兄弟还亲的真诚与无私。他博大、善良、仁爱的胸襟，永远令人怀念和敬仰。

(谭友林：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兰州军区原政委)

忆军事医疗战线上的优秀战士贺彪

杨秀山

贺彪同志 1909 年 8 月 31 日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沙岗镇，1926 年参加革命，1930 年 7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先后担任看护长（护士长）、医生、红三军军医处长、红二军团卫生部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他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对卫生工作的建设有很大的功劳。

贺彪同志参加红军后，按照上级的安排，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参加短期医训班学习，因情况变化，不能继续学下去，就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随一位医术极高的医生学习，他勤奋努力，进步很快。在此之后，贺彪同志学习态度正确，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运用和提高。部队实际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他都学习，没有界限。不论什么人有什么病找他，他都看。经过长期刻苦的锻炼，后来终于成为一位出色的医务工作者和杰出的医疗卫生工作领导者。

贺彪同志有相当高的组织和指挥能力，每次战斗战役有那么多多的伤员，吃的、住的，伤员需要的各种物品和转移都很困难，加上情况紧急，一切都要迅速处理，红军时期，敌强我弱，物质条件很差，卫生部门的工作尤其艰苦，每次战斗都有伤员，大的战斗和战役，伤员更多，而作战区大多是在白区或很贫困的地区，动员群众抬担架难，医药奇缺，伤员的治疗要手术，不要说没有手术台、照明灯和齐全的手术器械，有时只能用木锯，也没

有麻醉药，没有药棉、纱布，甚至没有止血药。战斗结束，部队转移，而卫生部门要救护伤员，转移起来很困难，贺彪同志总是处理得井井有条。由于他很好的医术和领导有方，不知救了多少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因此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对克服困难很有办法，伤员换药没有纱布，他指示将地主家里的蚊帐弄来洗干净当纱布用；战士干部受凉肚子痛，他将没收地主的鸦片烟熬成水作急救药水止痛。他在实践中锻炼出优良的医疗作风，他虽然当了“官”，但没有一点官架子。他是卫生部长，又是亲自动手的医生、看护。经常亲自为伤员打针换药，不怕脏不怕臭。服侍伤病员，非常耐心细致。他背的皮包里装有药品、注射器、针头、酒精和棉球，在许多情况下遇到病号，自己诊断，需要打针吃药，不用找看护，他掏出针就打针，需要吃药就用药。既及时，又方便。在战斗中又是贺彪同志最繁忙的时候。他作为卫生部长，既要积极组织医护人员救治伤员，还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比如请老百姓抬担架绑担架抬伤员，有时还亲自为伤员搞饭吃。他把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关心和爱护他们。凡是送到卫生部的伤员，贺彪同志对许多伤员都了如指掌。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深厚的感情为他们治病疗伤。有时候有的伤员拿出负伤费，买鸡蛋、鸭蛋、猪肉增加营养，贺彪同志就派人为大家去办。经过贺彪同志的精心医治和照顾，伤员们大都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贺彪同志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治疗伤员，如在长征途中，他就亲自治愈了许多红军指战员，使他们重返前线。五师师长贺炳炎，在湖南瓦屋堂战斗中，被打断了右臂，部队进到晃县，只休息几天，贺彪亲自为贺炳炎截去右臂，很快痊愈，在长征中期，贺炳炎又重返前线，成为出名的独臂师长。贺彪同志做截肢手术不是头一次，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相当高的技术

和勇气，在极端的困难条件下是办不成的，这是奇迹。

我负伤，其中三次是贺彪同志亲自为我治疗，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更加深了我们之间早已存在着的友谊。

1935年4月12日，在湖南陈家河战斗中，消灭敌人五十八师一个旅，我是四师十一团政委，负了重伤，子弹从左肩胛骨上面的脖根处打进去，从脖子后面穿出来，因子弹爆炸了，出口像鸡蛋那么大，肉向外翻卷着，鲜血一天多止不住，将身上的内衣和毛衣、外衣的小半边染红了。晚上我被送到红二军团卫生部，看护长周玉梅为我继续止血。第二天早上，卫生部长贺彪同志亲自为我解开绷带检查换药，站在旁边看的医生、看护同志和军部侦察科长肖美臣也在场，惊讶地说：“哎呀，这么大的窟窿呀！”贺彪同志也颇有余惊，说：“差一点点就打到动脉了，很危险！即使伤好了，左手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功能。”

贺彪同志为我换了药，并换下了身上的血衣，用几块纱布蘸水擦干净我身上的血迹。听说部队准备向慈利的象耳桥地区行动，那里是白区，物质比较丰富，生活能得到很好改善，只要生活好，药品有保障，伤口就会早日痊愈。按照规定，军卫生部不能留伤员的，伤员都要转到后方医院，那里一切条件都差。于是，我和同时负伤的四师参谋长刘开绪向贺彪同志提出：我们都因任有职务配备了警卫员和乘马，随同卫生部行动，增加不了你们多少麻烦，别的伤员和工作人员有意见，请你向他们解释——我们希望能够同军卫生部一起行动。贺彪同志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并且说：“你们不用乘担架了，每天换一次药，有饭吃就行了。”于是，我们每天一起行动，一路有说有笑，有时晚上睡在一间房子里，我们情绪十分愉快，为了给我们补充营养，卫生部还千方百计搞来打土豪没收的腊肉和猪肉给我们吃，使我们的体力迅速得到恢复。贺彪同志还专门派看护长周玉梅一路上为我

俩洗伤口换药。当时，缴获敌人的一种药叫雷氟氯，溶解后用细纱布剪成细条，浸湿塞进伤口里，凉丝丝的，感觉非常好，当时这是治疗创伤最有效的药，仅经两个月，我们的伤口便基本痊愈，就回到部队继续工作和战斗了。

贺彪同志第二次为我治伤是1935年8月，是彭富久他们从无线电截获敌人电报，破译后得悉敌人行动计划，于是在板栗园伏击歼灭敌人八十五师，击毙敌师长谢彬，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许多干部战士负伤和牺牲，十二团参谋长周竟成同志牺牲了，有四位师团干部负伤，伤比较重，都在军卫生部治疗。战斗接近尾声搜索敌人到了一个山上，敌人一群散兵从侧面树林里向我们射击，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指挥部队搜索，敌人的子弹打到石头上，弹片和碎石片击中了我的左脚踝，几个窟窿流血，不能走路，晚上被抬到军卫生部，贺彪同志为我察看伤口并换药。第二天他又仔细察看了伤口，夹出来一块大弹片，说：弹片还有，没有办法取出来，关系不大，时间长了可能适应。

后来证明贺彪同志当时判断是正确的，从那以后60多年，由于腿肿，我到解放军总医院，经过X光照射检查，果然发现左腿里面有14块弹片，有的在肉里，有的嵌在骨头上，天长日久，这些弹片已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

这次负伤，在贺彪同志的关怀和精心治疗下，恢复很快。当部队准备出发去津市、澧州之前，团长到红军学校学习，部队很希望我回去工作，于是，我不等伤完全好，就回原部队了。

我们占领津市后，部队进到石门县白沙度休整。有一天，贺彪同志路过我们团来看我，关心地问我伤怎么样？我说，没事了，可以跑路了，就是伤口里面有几个黑点。贺彪同志安慰我说：“那是些弹片，可能没有关系”原来，贺彪同志知道我的伤没有完全好就回部队了，放心不下，今天路过这里，来看看我。

贺彪同志总是这样一贯对同志负责到底。所有的伤员，他都挂在心上，若不亲自检查，全力治愈，他是食不甘味的。这种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他作为卫生部长如此尽责，令我和所有的同志都发自内心的感动和钦佩。

贺彪同志第三次为我治伤是在1936年9月。我们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我是十二团政委。在成县城东南白沙镇的五龙山战斗，团长说要二营去，我带领第二营主动出击后，二营部队返回原来阵地，我和营长蔡久同志走在最后，我被敌人的子弹击穿臀部，负了重伤。当晚被抬到成县东关的一间市民家里，贺龙和关向应两位首长也到了这栋房子里，看到我又负伤了，失血太多，脸色苍白，贺龙总指挥特地交待警卫员吴国华：“明天天亮后，抬到红川镇，找贺彪去。”

第二天，我被抬到红川镇方面军卫生部，医生、看护们都迎了上来，纷纷说又来啦。贺彪同志挤到我跟前，说：“你又负伤啦？”担架两头搁在长凳子上，他蹲下来亲自解开绷带，看到伤势很重，子弹出口带出了被打碎的骨头，与殷红的肉丝连着，他用镊子夹掉几块碎骨头，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就叫喊，贺彪同志只好停止，连声说：不夹了，不夹了。用两团棉球，蘸足碘酒，分别塞进进出口里，重新包扎上了。他和医生、看护们一边操作一边不停地安慰我，为我分忧。

卫生部转移到微县西关休息几天，贺彪同志和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由于我是臀部贯通伤，只能仰卧，不能翻身，又是睡在硬板铺上，压得我两边臀部疼痛非常厉害，夜里呻吟不止，和我住一个房间的郭鹏也被我吵得无法入睡。一天半夜，正当我痛得难忍难熬时，贺彪同志弃眠来到我的身边，他眼睛都睁不开，满脸疲倦，轻轻地给我翻身，在痛处为我按摩，安慰我，以减轻我一点痛苦。第二天，贺彪同志又搞来一床厚厚的松软的棉絮，给

我垫在铺上，臀部不再压得那么痛了。

此时，由于敌情变化，中央军委要求红二方面军加快行动与一方面军会合，部队开始向北转移。一路上敌军紧追，天上敌机骚扰，部队急行军，担架颠簸厉害。因为敌情紧急不能按时换药，我伤口很快恶化、化脓，发出阵阵臭味，伤痛折磨得我实在难受，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卫生部伤员很多，行动困难，有一天，我的担架又掉队了，远远地落在后面，抬担架的同志很辛苦，我伤口很痛，又饥又渴，正当万分痛苦的时刻，贺彪同志站在路边等我。时值秋季，正是梨子下来的季节，他买来梨削好皮，站在路边等我。深情地说：“快吃吧，解解渴。”并催促抬担架的同志快点走，陪我到宿营地。我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接过梨咬了一口，甘甜的梨汁滋润着我干渴的嗓子。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梨，而是蜜似的梨，是亲切的心。那兄弟般的情谊滋润着我的心，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日月如梭，许许多多的事都淡忘了，但是，那感人至深的一幕，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脑海里愈加难忘，愈加清晰。

有一天，来到渭河边，后面敌情紧急，渭河涨水，队伍必须赶在大的洪水下来之前徒涉过去。在一处河湾，4个老乡抬着我缓缓地走下河去，突然后面有人高声喊道：“慢点慢点！等一等！”这是贺彪同志的声音，他骑着一匹骡子，匆匆赶到我的担架旁，一同下到河里。原来，贺彪同志很细心，他担心我的担架被水冲走，便骑着骡子在我担架的下游紧紧地靠着，掩护我过河，如若担架落水，他可以挡着不被洪水冲走。事情正如贺彪同志所料，就在我们就将要到达上岸时，一个抬担架的民夫脚下一滑，担架的一角浸入水中，这时，紧紧跟在我旁边的贺彪同志眼疾手快，伸手一把抓住担架使劲提了起来，虽然我的右腿和垫的棉絮盖的毯子湿透了，但仍安全地上了对岸。贺彪同志使我免遭

落水之险。

“杨秀山，杨秀山。”到了对岸，又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叫我，那是贺龙首长。他笑眯眯地问我：这是一条什么河呀？我无力地回答说不知道。他说，这是姜子牙钓鱼的渭河，是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一道天堑，过了它我们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合了。原来，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首长到了北岸后，正在指挥部队过河时，看到了我担架落水的一幕，遂赶过来问情况，安慰我。贺龙首长还向贺彪同志问道：“杨秀山的伤怎么样？”贺彪同志回答说：“行军急，得不到休息，不能换药，因而伤口化脓了。”任弼时政委立即指示说：“过了渭河，甩掉了敌人，好好休息几天，想个办法给他好好治一治。”

过河后，我们终于争取到短暂时间休整，在休息的几天里，能按时换药，有时贺彪同志也亲自为我换药，他看到我的伤势有好转，很高兴。有空他还来同我们负伤的同志聊天，有时同我们一起吃饭。大家情绪愉快，伤势更有好转。我伤势一允许便勉强骑牲口行军，后来又能短距离行军。同一方面军会合后，卫生部转到临夏河莲湾休息。这时上级要调一批干部去红军大学学习，其中有我，我也很愿意。贺彪同志同我商量，说我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去学习恐怕不行。我说到学校不走路，有个安全环境就可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军卫生部和贺彪同志。

有病找贺彪，是许多人共同说的话。就是说他的医德和医疗技术都好，在红二军团，许多人都相信他。病了伤了，喜欢说找贺彪。二军团通过草地，过了葛曲河休息两天，我病了，并且很重，发烧，拉肚子，晚上大便拉在裤子里也不知道，四师政委洗恒汉来看我，说找贺彪来看看。即派人找来了贺彪同志。他是一个人骑着骡子来的，在我的帐篷里坐在草地上为我看病。他从放在草地上的皮包里掏出注射器为我打针，并给了几片药，安慰说

吃了就会好的，并说身体太弱，又太疲劳，多休息就会好得快。我听他的话。部队出发时，我的牲口就自己骑，原来是别人骑着收容之用。几天之后，到了有人家的上包座村，我的病就好了。

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云南中甸，部队沿着金沙江逆行而上，一天走到桥头，封建土司头人聚众守在山上，阻止我们前进，四师前卫将敌人打跑了，但师参谋长高福林和十二团参谋长高利国牺牲，一营营长傅传作负伤，子弹打在他的腹部，外面看不到多少流血，血全流在肚子里出不来，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很难受，什么办法也没有。他不是军卫生部，被担架抬着行军，掉队好几天了。贺老总知道了，便叫贺彪同志留下来等，给他治疗。这时贺彪同志用蓖麻油治疗。蓖麻油是泻药，喝了肚子胀得更厉害，然后就拉，拉出来的都是黑血，接着又喝几次，拉了一两天，以后就慢慢好转了。部队走出草地，过了岷山，到了微县，傅传作的伤已基本痊愈，回到十二团当参谋长。我当时是该团的政委，傅传作亲口给我讲了这段故事，他感激地说：“贺彪救了我一命，要不然我早就死掉了。”贺彪同志医术高超，像这样救死扶伤，妙手回春，挽救伤病员生命的生动事例很多。

贺彪同志尊重知识，注意向有知识的同志学习。1935年秋，红二、六军团挺进白区，占领湖南津市时，国民党湖南保安第八团少数人带一挺重机枪稍微抵抗后逃跑，四师部队进入津市后，十团在市民家里搜出一个医生潘本善。后来经过动员，潘参加了红军，在红二军团卫生部工作。潘本善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当时他是红二军团唯一的一个正规大学毕业的医生。贺彪同志为了向他学习医术，在政治和思想上对他格外关心。在帮助潘本善同志进步的同时，贺彪同志虚心向潘本善同志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医疗技术。在生活上贺彪同志也对潘本善百般关心照顾，

行军时，贺彪同志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将潘本善的被子放到自己的牲口上，潘本善在贺彪同志的直接帮助教育下，进步也很快。长征到陕北，他们仍在一起工作，已成为亲近的朋友。抗战期间，潘本善一直在大青山，全国解放后，他在海军当卫生部长。

在艰险的岁月里，红二军团几起几落，历经千辛万苦，不畏险阻，顽强战斗。第三次“左倾”路线肃反扩大化，更是雪上加霜，抓“改组派”数年之久，大批同志含冤死去，我和贺彪同志先后被抓，后来又先后被释放，但革命立场坚定不移。苦斗数十年，中国革命终于胜利，理想终于实现，不料来了“文化大革命”，贺龙同志受冤，我们受株连，长期遭受残酷折磨，在死亡边缘幸存下来。革命一生实属不易，坎坷太多，1973年我由武汉来到北京，一天在黎化南同志家，贺彪同志挤公共汽车来看我，一见面，四只手紧紧相握，四目相望，老泪纵横，千言万语，不知该说什么……后来，贺彪同志写了江城子一词：“南来飞雁北归鸿，笑相逢，惨愁容。黛鬓朱颜，重见几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可见我们的友谊多么深厚。为了大局，让心照不宣的话慢慢忘掉，过了这些年好日子，心身愉快，我们年纪更大了，而贺彪同志被病魔缠身已久，终于不治，于1999年3月31日，与世长辞，令我痛心不已。

(杨秀山：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解放军原后勤学院院长)

思念贺彪同志

薛明

今年夏天，陈凯来看我并向我约稿，她说卫生部的老同志们在编一部有关贺彪同志的纪念文集，要我也写一篇。猛一下使我想起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好像就在昨天。可似乎一瞬间什么都过去了，身边那么多熟悉的人，老上级，老同志，亲朋好友越来越少。然而，贺龙、贺彪和一些老同志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鼓励着我们前进。



1997年，贺彪夫妇与谭友林夫妇看望薛明同志

人们常问：贺龙和贺彪、贺炳炎是一家人吗？贺龙是湖南人，贺彪、贺炳炎是湖北人，他们怎么是一家子呢？1942年我和贺龙结婚，开始认识贺彪同志。他们俩工作上上下下级关系，平时是同志和朋友，两家人确实和一家人一样。我们共同经历了苦难的岁月，我们共同渡过了血与火的日子，我们共同经受了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和邪恶对灵魂的挑战，我们为革命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年华、家庭和亲人，我们虽然不是一家人，却有比一家人还亲的感情。

我与贺龙结婚后，因工作需要先住西北局，后住延安南门外光华农场，即财经办事处所在地，七大前又搬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当时联防司令部住的人很多，山上山下还有些是外地来的领导同志，有吕正操，林枫，孙志远，还有晋绥来的干部。他们每天在开会。有一次我整理贺龙同志的办公桌时，发现有一张白纸，上面有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贺彪，樊哲祥。贺龙同志问我：“你知道这两个人吗？”我说不知道，贺龙用铅笔指着贺彪的名字，对我说：“这个家伙，可不简单啊！对党忠心耿耿，一心为伤员，是个优秀的党员。这个人聪明，好学，谦虚。”刚参加革命时，贺彪不懂医，打仗的时候，因工作需要把他编到卫生队，他想尽办法给伤病员治病，在医药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用一些土办法克服了很多困难。

贺炳炎受伤需要做手术，当时麻药不多，手术器械也不全，贺彪同志给贺炳炎同志作了截肢手术，救了这位钢铁将军，手术结束后，贺龙同志非常激动地说：大夫是英雄，伤员也是英雄。他一提起贺炳炎被锯下来的手臂就给大家讲：“你们想想看，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骨头啊！”

以后和他们相处熟了，也就更加了解他们。一次贺炳炎来我家，刚说到贺彪，贺彪同志就进门了，他一进来就看见了放在窗

台上的老玉米，便伸手把老玉米拿过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贺炳炎一看急了，走上去和他抢玉米，边抢边说：“我早看上这块老玉米，都没敢拿，你一来就抢！”贺彪笑着跟他解释：“老总胆病，不能吃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细心一个人。

贺龙同志向我谈起贺彪时说：“我看他不是什么医学博士，他是中国的医生，洋办法、土办法很多，有什么病都可以找他。他的老婆叫什么？”我告诉他叫陈凯。他说“不对，叫小豆，这对夫妻很好。”我告诉他，我和陈凯在天津时就认识，那是“129”学生运动之前。她本姓窦。到军队工作后改名陈凯，我比你了解她。他笑了，笑的好开心。像是在认输。

建国以后，贺彪同志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工作，他密切联系群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病，他都尽最大的努力去医治。在工作当中还交了一大批朋友。大家都喜欢他。贺龙对贺彪很信任，他向我说，以后你生病就去找贺彪。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住进协和医院，这时贺龙正巧有出国任务，他向贺彪说，我明日出国，薛明治病的事就交给你了。贺彪听了之后认真的说：“老总，你放心吧，我一定重视，好好的为薛明同志治疗。”我听了只想发笑，觉得他像是在接受军令。贺彪说了就做到，他差不多每天去医院看我，并向医生询问病情。难怪有些熟悉的同志说，有病就去找贺彪，就是知道他认真负责。

记得文革初期，贺彪叫陈凯去我们家专门给贺龙同志送《本草纲目》，虽然没见到老总，陈凯还是把贺彪的建议请秘书一定转达给老总：他从《本草纲目》当中发现一种草药的吃法，可以在野外救生的时候用。这本书贺龙看了还记下了一些内容。在文革中我们被迫害关押时，还真起了作用。我和贺龙同志关在西山的时候，吃水泡饭。我在园里剜野菜，贺龙同志就教我哪种菜能

吃，哪种菜不能吃。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七三年我一人从贵州回到北京，住新疆办事处，这时我可以外出走动走动，到哪里去呢？许多老同志，都在什么地方？贺龙受迫害致死，他们被牵连，我虽然可以外出，但贺龙尚未平反，谁会欢迎我呢？我和孩子商量一下，胖子（贺鹏飞）说去感谢一下贺彪叔叔吧！胖子和我去到他家，我一进门，首先见到贺彪和陈凯，一见面，彼此盯着对方的脸，惊呆了，屋里只有两个床，两个木箱子，陈凯给我搬了两个板凳，贺彪眼睛含着泪水对我们说：“快说说你们的情况。”我说：胖子患肝炎时感谢你们通过晓明给胖子搞药。他不等我说完就说，“不要说这些”。当我说到贺龙在西山的情况时，贺彪扭过脸去，用手抹眼泪。以后每逢八一节日贺彪都要写一首纪念贺龙同志的诗词，以抒发他的深切怀念。并经常给我们讲其中意义，十分感人。

贺彪同志的纪念文集要出版了，我非常激动。趁此机会把我对贺彪同志的怀念和敬意表达出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薛 明：贺龙元帅夫人）

2001年12月

拜读《贺彪词选》感言

张光年

我与贺彪同志同是湖北人，有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十年浩劫后，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同属一个小组（支部），开会时接席而坐者十年。我俩都是1927年的共青团员，转党的时间也差不多（我1929年转党，他是1930年）。他比我年长三、四岁，算是老大哥了。可他总是保持一贯的谦虚。他年轻时转党后即加入红军，先后随贺龙同志彭德怀同志转战南北，在军事斗争和卫生工作上为祖国做出了优异贡献。我转党后从事地下工作和文艺活动，也跑了不少地方。八十年代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他的家乡——楚国故都江陵县（市）。他为人耿直。我胸怀开朗。会议漫谈中可以无拘束地思想交流。遗憾的是，会外从未相互过访，没能从容畅谈过。

近日细读了《贺彪词选》，加深了我对这位老大哥革命胸怀的理解。其中第一篇《浩浩黄河》（调寄《满江红》），写于1940年3月从延安赴晋西北渡河途中。当我读到“龙虎啸，风云激，千古恨，心头织。有红旗指引，人民奋起。荷锐持锋争日月，仆前继后鬼神泣”等佳句，很自然地感受到这首词与我著《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内容相呼应。那首大合唱1939年春在延安公演时，贺彪同志在延安，可惜错过了交谈的机会。

贺彪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雄才，又富于医才和诗才。他在1940年8月所作又一首《满江红》——《立马雁门》，写出他在“百团大战”中于雁北前线抢救伤病员时的英勇气概：“立马雁

门，长风起，渊渊伐鼓。”“金瓯缺，只手补；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这首“雄歌赋”写出了自己和战友们的壮志豪情，又与他前此的《浩浩黄河》一词相呼应。

就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并以医道救助军民的英雄人物，在1966年开始的全民浩劫中受尽折磨。就在那些“人妖颠倒功罪乱”，“逆罪加身，暴雨伤神，蹒跚归路雨倾盆”的年月里，贺彪同志仍然“守住殷红心一颗”；身在流放地，依然忧国忧民忧中央：“残更数尽桅灯灭。放眼长安，瘴雾重重叠”。我辈都是过来人，读到这些，同感共鸣，也受到鼓励。

我曾在首都被押去与彭德怀同志、周扬同志陪斗。我在干校劳改期间也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文革”前后，我也曾在工作中多次得到恩来同志、小平同志的教诲。因此在读到《贺彪词选》中悼念彭帅、感怀恩来及《哭小平同志》的词章，不禁热泪盈眶！也感到词作者定是含着热泪写成的。

亏得邓小平同志“心怀济世奠奇功，只手蓝图绘足”。劳苦功高的贺彪同志以九十高龄辞世，生前跟我们一起，庆幸小平同志的改革宏图顺利实现，我们的党和人民大步迈上今天和今后的光明大道。我们的贺彪同志可以放心了。

（张光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

2001年5月10日北京

难忘战友情

——忆贺彪同志

吴子杰

1999年3月31日，我在电视里看到贺彪同志逝世的消息，深感震惊，我久久地凝视着电视屏幕，禁不住流下了泪水。为失去这位老战友、好朋友和尊敬的兄长感到无比悲痛。

现在，贺彪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但战争年代我与他同甘共苦、朝夕相处的历历往事，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1932年5月，我在红7师19团任排长，在潜江县畔湖追击敌人的战斗中，我负了伤。敌人的子弹从我左肋下穿过，血流如注，我被抬到临时医疗所救治。一位中等身材、英俊标致的医生给我处置伤口。他查完伤处，立即进行清洗、消毒、上药、包扎，手法干净利索，十来分钟就处理妥当，我顿时感到疼痛减轻了许多。包扎好伤口，他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注意休息，及时换药，表现出对伤员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和对战友的阶级感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后来我问周围的同志这名医生是谁，才知道他就是贺彪。

1935年，我到红二军团任侦察科长，听说贺彪同志在军团任卫生部长，但部队整天行军打仗，我一直走在前头搞侦察，他在后卫，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8月份，部队进入津市郊区，偶然的机会我在人群中发现了贺彪，大喜过望，出其不意，我从身后一下子把他抱住，兴奋地喊到：“贺彪，我可找到你啦！”他回过头来，也认出了我，高兴地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说不清是

感激，还是敬佩，也许是投缘吧，我把珍藏了很长时间的一件战利品——钢笔送给了他。他是个酷爱学习的人，见到钢笔如获至宝。从此，我们便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36年初，贺彪率卫生部随红4师行动。不久部队进入乌蒙山后，真是有缘，我也调到红4师任侦察科长。这样，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互相之间的了解也更深了。在业务上，他勤奋好学。部队行军打仗每到一地，他不仅忙于救治伤员、收集药品，还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医疗书籍，把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化做钻研医疗技术的动力，就连行军骑在马上，也要看书学习。对伤病的同志，他热情诚恳，从不看职务高低，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致，时刻把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他的行为让我感到由衷地敬佩，私下里我称他为老大哥。

此后，红4师在横扫楚雄、祥云、丽江等10座县城后，继续北上，巧渡金沙江，翻越哈巴雪山。在这些极端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同甘共苦的战斗友谊越来越深。

部队到达白云时，一粒粮食也没有了。卢冬生师长找到我，让我带骑兵侦察连去搞粮食。我带部队出白云向南走了10多里路，进入了一片山谷，发现草地上有新踩的牛蹄印，战士们便来了精神，一路快马加鞭，跟踪进山后，果然发现了地主藏的牦牛，而且身上还驮着青稞和酥油。我一查，有30多头，赶紧命令部队加强戒备，往回赶。我骑在马上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刚要出山口，就遭到了地主武装的袭击，敌人的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的左踝骨。我忍着剧痛，指挥部队一边还击，一边撤退。当返回驻地时，我的左脚已经失去知觉，鲜血染红了坐骑的半个肚子。

听说我负了伤，卢师长带贺彪来看我。一见面卢师长就说，这些牦牛和粮食可解决了部队的大问题，然后问我的伤情。贺彪给我查了一下，对卢师长说：“伤的不轻，就把吴子杰交给我吧，

我带他回卫生部去治疗。”就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就共同生活在一起。虽然我得到了他的细心照料，但由于治疗条件有限，我的伤势仍然在一天一天地恶化。等到了甘孜同四方面军回合时，我的伤口化脓，脚肿的连马镫都插不进去了。贺彪对我说：“保守治疗是不行啦，必须做手术。”我信服他，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早上，他看着我吃饱饭，就找来几名身体强壮的战士，把我按在门板上，笑着对我说：“没有麻药，你老兄就忍着点吧。”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他是用凿子把我碎裂掉的踝骨一点点抠出来，然后再用盐水清洗。疼痛，使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叫喊，可他却泰然处之，用了一个半小时给我做完了手术，我这条腿又被他救活了。

甘孜会师以后，部队准备过草地，许多伤员都寄养在老乡家，我当然也在其中。贺彪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来找我，带我去找卢师长，请求卢师长一定要把我带出草地，并主动承担了我的医疗、生活等问题，卢师长同意了他的请求。部队出发时我才发现，受了伤的傅传作同志也在他那里。就这样，贺彪带着我们俩，还有四个弱小的勤务兵，跟随部队踏入了杳无人烟的泽沼地。白天我们行军在一起，晚上挤在一个帐篷里，共同分享仅能搞到的一点食品。相比之下，他是惟一的身体强壮者，每到一地，他都顾不上休息，搭帐篷、挖野菜、拾柴火、帮我们处理伤口，全部重任都落在他的身上。就是在他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我们的伤势才日见好转，才得以摆脱死亡，走出雪山草地。

在那个恶劣的战争环境中，被贺彪救活的战友数不胜数。上到贺炳炎这些高级指挥员，下至普通士兵，都是因为贺彪的妙手回春，才使他们获得新生，又有了重新为中国革命的解放和建设再做贡献的机会。那时，战士们有一句口头禅：“不怕战场上负伤，就怕负伤后找不到贺彪。”因此，每次战斗，只要有贺彪在，

指战士们就格外勇猛。他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职业道德，让人信服。

走出草地，告别了贺彪，我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到1937年9月红军改编，我留在358旅旅部工作，贺彪同志到715团卫生队工作。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结下的战斗友情却永远不会淡忘。

1992年，我得了肺癌，住进北京301医院。贺彪同志知道后，马上同夫人陈凯去看我。老战友相见，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他还像战争年代那样刚毅，那样自信和乐观。对我说：“不要怕，战争年代那样艰苦都没难倒我们，何况现在条件好了，医学也发达了，没有治不好的病。”在他的鼓励下，我很快下了决心做了手术，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我又恢复了健康。

以后，我每年去北京复查，都去看望他，我们共同回忆那些难忘的往事，一起分享战火中结下的深厚友情。

(吴子杰：大连警备区原司令员)

于2001年10月23日

忆好邻居好朋友贺彪

张铨秀

我和贺彪住对门，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邻居。贺彪同志是1989年搬到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在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因为在战争年代，我们在长征途中虽同在红二方面军，但他在红二军团，我在红六军团。贺彪一直在贺老总身边做医务工作，为贺老总的保健做了很多工作，而且他对伤员很好，医术很高，战争中救活了很多伤病员，是在部队培养出来的老医务工作者，对中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做了邻居，常常在院子里相遇，见了面互相打招呼。他给我的印象是老练、稳重、文静，喜欢看书、喜欢打桥牌，没有更多的嗜好。他身体不是很好、腿有病，虽年事已高但他很注意学习，也很勤奋，写了二部回忆战争年代红军的战斗历程和他所经历的事件的回忆录，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留一点东西给后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这些老红军，打了一辈子仗，有些年轻战友20几岁就牺牲了，我们能够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也很不容易，我们应该把我们革命的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让后人不忘历史，继承党的事业，把红旗高举到底，决不能让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江山垮下来，这是我和贺彪这些老一辈革命者的心愿。

贺彪去世已快3年了，院子里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邻居，我很怀念他。

(张铨秀：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昆明军区原司令员)

怀念贺彪

陶汉章

在纪念贺彪同志逝世三周年之际，作为贺彪同志的老战友，我心中充满深切的缅怀之情。

1935年，我们从湖南桑植开始了长征之路，经过云贵高原，抢渡金沙江到爬雪山、过草地，贺彪一直和我同在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贺彪是卫生部长（医务工作者），他们的任务是营救伤员。他们走在我们之前，我那时是教导营长（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掩护直属队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可以说我们是互相踩着脚印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贺彪同志是我军第一代医务工作者，那时，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救死扶伤，创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很多故事至今鲜为人知。

1936年7月，我们到达甘孜，就要准备进入草地了。这时部队已基本断粮，弄到的每点粮食都是十分珍贵的。司令部的作战科长谷志标同志，满心欢喜地弄到了十斤麦子。真是宝贵啊！他先把麦子簸干净，放在锅里炒熟，然后到河边的水磨房磨成粉，准备带着过雪山、草地时食用。藏民区的磨房都是在河边，利用水力推动磨子旋转。当谷志标拿着麦子刚刚进入磨房里时，砰！砰！河对岸敌人的枪击中了他，顷刻间谷志标已倒在了血泊中，他尽力呼叫，可周围没有人，一位通讯员偶然从磨房经过，才发现作战科长负伤了。他急速转回，向上级领导报告了情况，这时河对岸的机枪声已响成一片，敌人封锁了磨房这一带，伤员

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营救战友是当务之急！军部参谋长李达同志下达命令，由四十九团的团长带领部队先把河对岸敌人埋伏的两挺重机枪打走。在激战中，教导营由我、卫生部由贺彪同志带领武装整齐的20名战士和担架，在四十九团的火力掩护下，冲进水磨房，救出了谷志标同志。我们把他放在担架上，用最快的速度撤离磨房。河对岸的敌人以为我们的大部队来了，机枪哑了，不敢再还击。战士们抬着担架跑步回到了目的地，贺彪同志马上开始了紧张的抢救工作。他先用剪刀把谷志标的衣袖剪开，用大针管抽取滚开以后又放凉的水，冲洗受伤处结成的血块。因为已伤到了骨头，痛得厉害。可是现在在这里哪会找到麻药！贺彪一边安慰他不要急，忍耐点！一边叫周围所有的战士解开自己的急救包，希望能从中找到好一点的药。结果能找到的都是红汞。也行！红汞也能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贺彪同志用许多的药水，敷抹在伤口上准备用干净棉花包扎，突然有名战士找到了一点磺胺，这可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药了，贺彪高兴坏了，将这一小点磺胺全用上了。包扎以后打上绷带。贺彪对谷志标说：“现在你要睡觉，再痛也要睡！”手术完后，贺彪到老乡家买了只老母鸡，炖汤给他喝。以后部队不停地继续前进，谷志标硬是在担架上躺了半个月，才恢复到可以离开担架走路了。事后谷志标说：“我以为我会死在那个磨坊里……”许多同志都这样说过，谁受了伤，只要跟着贺彪，就能捡回一条命。贺彪同志因此广受同志们的爱戴和尊敬。

在长征的队伍中，贺彪的卫生部队最复杂，担架上有重伤员，马背上有重伤员——这就是活动病房。除此以外，每换一地，还要雇用抬担架的民工（大都是藏民，语言不通）。他们的队伍不仅行动快不起来，就是遇到敌机轰炸，隐蔽都十分困难。贺彪同志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心，不管队伍掉队多远，受到多少

人的责备、埋怨，他总沉着冷静，保护好每一个伤员。有一次，他很愧疚地对我说，我只丢下过一个伤员，那实在是迫不得已。

我知道，那是一次在敌人的追击情况下，新编五师的一位姓单的团长，他受了重伤。贺彪竭尽了全力，已没办法救了。但贺彪始终陪着他，这时，尾追的敌人和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近，两百米……一百米……，眼看只有五十米的距离了，这时我们掩护部队已撤离，贺彪仍然坚持在他身边，不肯离开。是单团长含着泪对贺彪说：现在是十万火急，你们快走！能为革命保存一个人都是好的，我已不行了，不要再为我受到损失了，赶快走吧！……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把他留在了山边的草地上——牺牲了。长征中组织上先后交给他一百多个伤员，都是科、团以上干部，前线最需要的指挥员。这一百多个伤员，都是经他抢救、治疗保护下康复后走向战场的。

贺彪同志语言不多，个性内向，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有炽热的爱。在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在通向死亡的军事禁区——雪山、草地，这样的环境中，他从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安危，营救了无数战友，在这些人中：甘泗淇、王尚荣、郭鹏、傅传作、杨秀山、贺炳炎等等一大批同志。他们以后都成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作为医务工作者，贺彪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高尚品德给新一代的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我从心底里深深地怀念着我的好战友贺彪同志。

(陶汉章：全国政协委员 解放军原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

2001年3月26日

贺彪对同志像火一样热情

苏宏道

贺彪、谭友林和我都是湖北江陵县老乡，贺彪和我的老家仅相隔十二里，我们相识却是在 1933 年参加革命以后，当时他是红三军（1936 年改编为二方面军）卫生部长，我是警卫班长，虽然没有工作上的直接关系，但彼此意会到是同乡同路人。1936 年长征以后，我们因工作需要各奔东西。

与贺彪的重逢是在 12 年以后，当我面临生死攸关，成为他的“院下监”的时候。时在 1948 年，我在第一野战军独立四旅任十团团团长。我部队受命攻打国民党军所占陕西大荔，我是年青战士，血气方刚，面对枪林弹雨，无所畏惧。目睹战友相继浴血倒下，便以誓死解放全中国之信念，奋勇向前。战争的飞枪流弹，绝无情面，一颗子弹正射入我脑中，血流不止。按常情，在沙场弹丸之地，如此状况，也只好任之而去。而王震司令员爱惜士命，当即作出决断，下令就地抢救，开刀取弹。我已人事不省，命在旦夕。当日夜晚，在闪烁的马灯下，由潘世珍（已故）和袁光宇（已故，原海军总医院院长）两医生主刀，取出我头颅中那颗致命子弹，保住了我的性命。之后我被送到晋西北山西绛县，当时是西北野战军卫生部驻扎地，贺彪任部长，我因伤势严重，只能卧床休养，头部又痛又沉，不能活动。贺彪对我病情的分析治疗，使我得到精神支持，坚定了信心，渡过了难关，重得新生，返回部队。从绛县分手后，我们就未能再见。

直到解放后，我们都调到北京，昔日战友之情才得以重温。

残酷的战争年代摧毁了我的健康，身体多病，腿部疼痛，行动困难。贺彪也是一样，我俩的健康状况彼此彼此，他却时时出来看望我。后来我住 301 医院治疗，他因患类风湿，周身疼痛，健康日渐衰弱，不再出门，就让老伴陈凯代表，到医院来探视。

岁月流逝，我俩之间的友情日益深厚，但从没有用任何华丽词藻来装饰吹嘘。贺彪去世了，我怀念他，怀念他内心对人如火的真情。

(苏宏道：原军事学院顾问)

“割股除灾毕生愿、功业未竟心切切”

——贺彪同志逝世一周年祭

张自宽 陈仲武 张冰浣

卫生部原副部长贺彪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我们依然怀着悲切的心情思念他。他是我们的老首长，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他的言行懿德对我们感染极深。他为人民卫生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他是我军卫生工作也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的坚强捍卫者和执行者。诚如他暮年所赋诗词中说的：“割股除灾毕生愿，功业未竟心切切”。

贺彪同志 1909 年 8 月生于湖北省江陵县沙岗镇。1926 年参加革命，先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进入红二军团医训队学习。由于在野战医院得到该院院长张典吾（曾留学德国的高级医师）的亲自授课，更因自己勤奋学习，在艰苦条件下医疗实践中磨炼，他很快成为一个有较高水平的医生和具有组织能力的领导干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彪同志历任红二军团医疗队长、红三军团医务所长、军医处处长，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兼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卫生部长，参加了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组织指挥了反“围剿”作战中的战场救护和苏区军民的医疗卫生工作，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胜利完成了战斗中的卫生保障任务。1935 年参加了长征，任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在长征途中，他亲自救治了诸多身患重病和负伤的官兵，挽救了一批红军高级

干部的生命，如贺龙、贺炳炎、郭鹏等。

抗日战争时期，贺彪同志历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卫生部长、120师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军区卫生部长。在日军疯狂进攻和反共派严密封锁造成医药供应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开展大生产运动，创办了卫生学校和多所医院、诊所、卫生实验所、制药厂及生产合作社，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卫生干部，制造了大批药品和器材，有力地保证了晋绥地区抗日武装斗争，支援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

解放战争时期，贺彪同志历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长、西北野战军卫生部长、第一野战军卫生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参加了保卫延安、青化砭、蟠龙、宜川、太原等战役。他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精心策划，科学组织，严格管理，出色完成了战场救护和大批伤病员的收治任务。多次受到彭德怀、贺龙等领导人的表扬。1948年，西北部分地区发生鼠疫，贺彪同志亲自组织指挥防疫队开赴疫区，坚持预防为主，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展，保障了解放区军民的健康。

贺彪同志在革命战争中的这些经历和创造性的举措，既锻炼增强了他的党性和革命意志，又充实培育了他领导管理卫生工作的才能，为他建国以后转到政府卫生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9年9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召开各大军区卫生部长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与会代表，商谈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工作方针。贺彪同志汇报了他1948年在西北地区防治鼠疫的做法。毛主席当即指明：“贺彪刚才谈到要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人员的作用，这个方向是对的。”肯定了贺彪的工作经验。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正式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

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

1954年9月，贺彪同志由西北调到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五十、六十年代，他分管计划财务、医政、药政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等工作。在此期间，他坚持调查研究，从卫生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协助部党组争取到中央领导同志和各有关部门的同意，迅速解决了几个重大政策问题：第一是明确医疗机构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事业性机构，不进行工商业登记，免征工商业税；第二是政府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除保证基建和设备投资外，实行包发工作人员工资的政策；第三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每年都由中央财政拨出专款，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加强县医院的建设。此举得到了刘少奇同志的重视。少奇同志指示，要建设一批“像样子的县医院”；第四是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中对医院工作的指示精神，确立了“勤俭办医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的医院工作方针，推行了“三班门诊”、“简易病床”、“家庭病床”等便民利民措施，并制定和推行了以医院为中心扩大预防，城市支援农村、内地和沿海地区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医院带小医院的制度；第五是制定和颁发了《综合医院工作制度》和《综合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并针对“大跃进”时的“大破大立”对医院工作造成的破坏，制定了《医院工作四十条》即《综合医院工作条例》；第六是积极推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培养“半农半医”和不脱产的卫生员，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千方百计地设法解决广大农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及疾病的预防问题。这几个问题的解决，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使我们铭刻于心永世难忘的是他对广大农民健康的关注。

1959年春，为了探索新中国农村和卫生保健工作发展方向和道路，贺彪同志带领医政司陈仲武、张自宽等同志到山西省稷

山县翟店公社和太阳村，进行二个多月的蹲点调查，并帮助总结经验。当时稷山农村生活相当艰苦，贺彪同志已年逾五十，为搞好这次调查，他始终与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吃在农民的大食堂，住在农家的炕头上。指导我们写出了专题报告，汇报给卫生部党组，当年11月在稷山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现场会议，推广稷山的经验。会后又以卫生部党组名义给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6条意见，得到党中央赞许和重视，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60年2月将此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从而掀起了农村卫生工作的高潮。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指示卫生部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人相继督促和要求卫生部尽快采取措施，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卫生部党组决定组织4个农村卫生工作队，由部长、副部长带队，分别到北京、江苏、湖南、湖北选择一个县蹲点调查，研究如何加强农村卫生问题。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由贺彪同志率领，他选择了麻城县。麻城是位于大别山中的老苏区，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贺彪同志选择这个地方蹲点，意在体现党中央对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农民群众的关怀；再者，取得经验和成效后也更有说服力，便于推广。工作队包括医疗、预防和管理人员共136人，于1965年8月下旬到达麻城。为了使工作队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他制订了8条《守则》，要求全体队员遵守，并且公开宣布对他本人应有更高的要求，除带头遵守《守则》外，还特别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是这样说的也确是这样做的。他同大队部工作人员在一起，住的是四面透风的房子，吃的是粗粳米、酸豇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经常带领张自宽同志到各处巡查，每人手持一根竹棍，身背一把雨伞、一个水壶，在大别山深处转来转去。有一次，到安家畈去看望一个医疗队，

晚上住宿在一个农家的库房里，用门板作床，稻草作褥，两人共一榻。还有一次，他们二人到林店公社卫生所调查合作医疗和采用中草药情况，当晚借宿于林店中学，为逃避公社领导的招待，翌日天刚亮，校门未开，他俩便越墙上路，不辞而别。像这类故事在他一年蹲点中还很多。这就是贺彪同志的本色。

贺彪同志原拟在麻城蹲点2年，取得全面经验在湖北全省推广。令人遗憾的是，刚满一年便奉召回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晚年回忆此事，他不胜感慨地写出了这样一些诗句：“麻城悬壶经有年，割股除灾毕生愿”。“功业未竟心切切，眼前磨难沥心血”。

“文化大革命”中，贺彪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绝不向恶势力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崇高气节和乐观精神。从他在蹲“牛棚”期间所写的诗句可窥见其精神底蕴：“花甲过五秋，常怀大业忧，未被诬谗惘，不因诋毁愁。”“人妖颠倒功罪乱，自信终有秦镜鉴。”“无欺无诡，闲却靠边尾。劳动不输人，枉炼得征顽战锐。无贪无贿，自信可问天，何须罪……”。

天从人愿。历史总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前进。1974年贺彪同志复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1977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随后又担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党、人民、军队和广大医务工作者都不会忘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贺彪同志，他的崇高品德和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张自宽：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
陈仲武：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
张冰浣：卫生部办公厅原副主任)

缅怀我们的老领导贺彪同志

陈仲武 张冰浣

在 20 世纪之末的 1999 年 3 月 31 日，我们的老领导，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同志，在北京家中溘然长逝。闻讯，我们陷于深沉的哀悼之中。贺彪同志，1926 年参加革命，1930 年参加红军，系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他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习锻炼，成为红军卫生系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0 师卫生部长兼晋绥军区卫生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卫生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区卫生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卫生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贺彪同志七十多年来，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红军医疗卫生事业，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保障军民健康，为解放大西北，建设西北五省卫生事业，以至建国后为开展人民卫生工作和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他的丰功伟绩，将在国史、军史中永存，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在贺彪同志长期领导卫生工作中，我们有缘在不同时期，受其领导，从事具体的岗位工作。在贺彪同志逝世周年之际，作为受他教益良多的下属，以沉痛的心情，忆述亲身经历和后知的几件往事，以表对他深切的缅怀。

在解放战争时期，贺彪同志担任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西

北军区后勤部及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在保卫延安及其后的一些重大战役中，他出色地完成了战役战斗中的战场救护和大批伤病员的收治任务，受到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的赞扬。1948年，西北部分地区发生鼠疫和斑疹伤寒流行。贺彪同志亲自组织指挥防疫队开赴疫区，坚持预防为主，实行中西医结合，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保障了军民健康，有力地支援了大西北的解放。1949年9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召开各大军区卫生部长会议，贺彪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朱总司令到会讲了话；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与会代表。毛主席说：“我们党历来关心人民的健康，各根据地一贯地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重要地位。在座各位和广大卫生工作者为革命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卫生事业要有个大发展，因此要有一个卫生工作方针，大家可以在这里谈谈看法。”主持会议的贺诚同志汇报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伤员数量以及治疗情况。毛主席说：“战争时期的卫生工作，有许多经验，要很好地总结。我这里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的卫生工作方针。”到会有同志提出，前些时期，西北有些地区流行斑疹伤寒和鼠疫，很快得到控制，部队没有受到感染，要贺彪同志谈谈防治经验。贺彪同志汇报了为防治传染病，卫生部要求各部队坚持预防为主，举办了预防、消灭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短训班，发动广大军民消灭老鼠、虱子等疾病传播的媒介，并控制流行地区人员往来，防止流行范围扩大。由于部队卫生人员不足，注意发挥当地医务人员，包括中医中药人员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毛主席接着说：“卫生工作方针问题，大家还要认真研究。贺彪刚才谈到要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人员的作用，这个方向是对的。当然，作为卫生工作方针，还不完善。这次会议你们要好好议一议。”主席就此肯定了西北防病治病的实践经验，成为1950年召开第一次全

国卫生会议所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组成部分。

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安市，其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相继解放。通过对旧政权机构的接管和广泛的调查研究，更加深刻了解到西北广大地区大多经济文化落后，民族众多，卫生条件很差，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时有发生。贺彪同志遵照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在这些新解放地区，结合政权建设，对西北五省的卫生厅、处进行整顿加强；对医院、卫生实验研究、生物制品研究、妇幼保健、医学教育等事业单位有计划地整顿充实。工作中特别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在坚持团结教育的同时，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坚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平等相待，商量办事，并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如从美国回来的两位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张为申夫妇，曾为国民党政府派到西北农学院。因为该院设施简陋，生活条件很差，他们所学专业不能发挥作用，贺彪同志亲自专访，深入了解，报请彭总同意，经得中央卫生部贺诚同志认可，将张教授调北京，出任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再如西安市著名防治结核病专家吴霁棠教授，也同样受到政府的尊重、支持和帮助。贺彪同志商得卫生部的同意，将西北财委发给卫生部作开办费用的30袋面粉，折价成经费，用来改建吴教授主持的防痨协会和门诊部，使其在防治结核病工作中做出更大贡献。张查理教授原在兰州中央医院工作，经彭总等领导同志同意，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其后又任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局长。对西北医学院的知名教授、专家，以及社会上的名老中医，贺彪素来重视发挥他们的专长，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经彭总批准，由财经委员会拨给专项资金，抓紧对省医院、西安市医院，生物制品研究所、结核病诊疗所等单位的建设。

1954年9月，贺彪同志奉调到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分管计划、财务、药政、医政以及对外学术交流、人员派出和对外援助等工作，任务相当繁重，特别是医政管理，主要是负责对城乡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与管理。医疗卫生事业在我国卫生事业中占有卫生资源最多，承担着繁重的防治疾病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56年，全国已有四千余所医院，共设病床27.6万余，医院工作人员已达30多万人，全年完成3亿多人次的门诊和5百多万住院病人的治疗任务，并且组织大批医务人员深入农村、矿山、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防病治病工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医院对病人作了许多不合理的规定，门诊制度“机关化”，对病人滥用贵重药材，以致造成很大浪费；行政、勤杂人员过多，技术人员使用不当以及有些医务人员的医疗作风不正等。为解决存在问题，卫生部以周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医院工作的指示为准，于1957年12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医院工作会议。贺彪同志根据总理的指示和医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会前准备工作。他认为医院工作的问题，在于一些医务工作者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勤俭办医院的方针不能很好地贯彻。他在会上作了以《勤俭办医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为题的工作报告。提出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要克勤克俭地办好医院。医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需要配置相应的医疗仪器、技术设备和药材，以提高为伤病员服务的质量和效能。并在报告中提出：强调勤俭办医院，勤就是工作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俭就是在人力物力上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及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医疗作风。而且要尽量提高医疗质量。要解决一切必需的，可以解

决的医疗设备器材；但也要积极挖掘潜力，充分利用一切现有设备，使病人能够得到技术优良而费用低的医疗服务。第二，为便于病人就诊，要因地因时制宜地推行三班门诊制，充分挖掘人员和设备的潜力，根据勤俭和一切便利病人的原则安排工作，并采取不同方式设置简易病床。第三，医院要扩大预防，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第四，进一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要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增强防治疾病的能力。这次会议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医院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继承发扬医院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实践，明确今后工作方针的继往开来的会议。会后，为落实会议精神，1958年3月，卫生部颁布了《综合医院工作制度》和《综合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医院工作制度的侧重点是加强科学管理，严格执行医疗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改善服务态度，便利病人就医等方面，目的在于使医院管理制度化，技术操作常规化，基本设施规格化。医院工作人员职责是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定出各级各类医务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加强各级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还总结了几年来形成的城市医疗卫生网，实行分级分工、划区医疗的经验。以街道卫生院和工厂保健站为初级，市辖区内的综合医院、专科防治单位为二级，省市设立的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综合医院、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及大型企业的中心医院为三级。在统筹安排下，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利于调动基层卫生组织的积极性，也使各级医疗机构各得其所，发挥各级医院相应的社会职能，也为上级医院给下级医院解决医疗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和技术指导，提高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提供条件。此外，家庭病床得到推广，既减少部分病人去医院就医的不便与痛苦，减轻家属的劳累和经济负担，也减少了医院的门诊量，缓

和了医院病床紧张的矛盾。同时也密切了医务人员与群众的联系，改善了医德医风，增强了群众的信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党和政府一向重视农村卫生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下，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通过深入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农村卫生面貌有了明显改变，农村卫生组织建立起来，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其中尤以山西省稷山县的经验最为突出。为总结稷山的经验，贺彪同志于1959年春天，带领医政司的同志，深入现场进行蹲点调研，重点调查翟店公社和太阳村的情况，为期达两个多月。太阳村是公社所辖的一个管理区，从1953年起，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坚持六、七年，由一个穷村、脏村、瘟疫村变成全国闻名的卫生模范村：村内外环境整洁，道路平坦，两旁植树；街头建了简易花园，居家院内外都种花植草；公厕、私厕都普遍进行了改造，全村水井普遍加高、加盖，有棚、有公用水桶，鸡舍和畜圈也进行了修整和改良，对垃圾粪便实行严格管理，既消除了蚊蝇孳生场所，又提高了肥效；群众养成了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习惯；建立了保健站，培训了保健员和接生员。该公社和社员还筹集资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由于卫生工作搞好了，人们身体强壮，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稷山县委和政府推广了太阳村的经验，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农村卫生组织建设，从县到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医疗卫生网，贯彻了中西医结合，专门机构与群众结合，脱产与不脱产人员结合，预防与治疗结合的原则，并普遍推行了合作医疗制度，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保护农民健康，摸索出一套好的经验。贺彪同志认为应当向全国推广，于是主持起草了专题报告，建议在稷山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以推动全国农

村卫生工作。部党组同意这个报告，并责成贺彪同志负责筹备工作，起草会议报告及有关文件。经半年筹备，终于在1959年11月在稷山召开了这个会议。会议肯定了稷山的经验，并对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组织提出一套指导性意见。会议结束后，部党组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并附有《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央认为报告及附件很好，转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执行。毛泽东主席又于同年3月18日亲自草拟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在三年内做出成绩。李富春副总理在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做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推广山西省稷山县等地的卫生运动经验，加强农村医疗预防工作，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在党中央指示的推动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农村卫生工作出现新的发展局面，并先后出现了一批新的县级卫生先进单位。因此，稷山会议是我国农村卫生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成功的会议。

为了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卫生部根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继续组织四个农村卫生工作队，并决定由部长或副部长带队。其中一个队，由贺彪同志带队去湖北省麻城县蹲点。1965年8月，贺彪同志带领由136人组成的农村工作队进驻麻城。要求通过一年的蹲点，对如何从农村的实际出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如：切实加强县、区、社（乡、镇）大队（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的建设，同时也要办好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加快培养农村医药卫生人员，建立一支高中初结合、中西医结合、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的卫生工作队伍；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医疗保健制度，实行合作医疗；建立城市支援农村的制度，采取城乡挂钩、对口支援等办法，支援农村卫生建设。以上要求，本拟通过蹲点

调研，取得经验，另选适当地区进行试点，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蹲点调研即告结束。

贺彪同志于1930年离开党的地方工作，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进入红二军团医训队学习。在野战医院张院长（曾留学德国的高级医师）的亲自授课和病房医疗的言传身教，并经过自身刻苦勤奋的学习，艰苦条件下医疗实践的磨练，成为一个有较高水平的医生和具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先后参加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组织指挥了反“围剿”作战的战场救护和苏区军民的医疗卫生工作。在长征途中，他亲自救治了身患重病和负重伤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贺龙、贺炳炎、郭鹏以及无可计数的官兵，挽救了一些红军高级干部的生命。贺彪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知医药卫生知识和技术在救死扶伤、维护军民生命和健康中的极端重要意义，在担任卫生部门领导工作以后，依然十分重视医学知识的积累，向书刊和专家学者汲取新的知识和信息，用以指导工作和制订科技政策，同时也深知做好卫生工作，必须做好卫生部门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他们是丰富的医学科学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载体，是防治疾病战线上的战士，医学发展的尖兵。因此，在他与新老知识分子相处中，十分重视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视对广大医务人员的团结教育，并创造条件使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深得广大医务人员的赞许。基于对卫生部门知识分子的认识，他对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卫生部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受到冲击；1958年9月，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要求“拔白旗”、“插红旗”，点名批判一批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中很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等行为很不赞成，认为这是自损、内耗，削弱了开展卫生工作的力量。1963年，在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对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贺彪同志有抵触情绪，他对彭总有自己的认识，认为彭总能打

仗、有战功、为人正直、艰苦朴素，有口皆碑。1955年，在关于中医的科学性和在医学界地位的争论中，对受到批判和处分的两位副部长贺彪同志也给予同情，认为他们的缺点、错误被严重夸大了，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对卫生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大轰大嗡，不计成本等，贺彪同志都曾直言不讳地提过意见。当然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思想上是属于“右倾”一类，受到了批判。但是，超越局限，一身正气，不计个人得失，提出意见和看法，确是难能可贵的，显示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贺彪同志1999年3月离开了我们。他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终生的新中国建国50周年的庆祝盛景，但是，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史和党的军事卫生事业发展史，将永远铭记着他的功绩；其他尚健在老战友、老同志、老部下和朋友们，以及由于他的精心医疗而恢复了健康和挽救了生命的人们，将永远缅怀他的品德和业绩。

2000年3月3日

怀念贺彪同志

洪明贵

贺彪同志是我党我军卫生事业创建人之一，他对卫生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业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199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贺彪同志逝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非常悲痛，哀思难以表达。

我是1938年初在延安卫生学校认识贺彪部长的，当时我在卫校11期学习，他在12期进修，时在八路军120师工作，学校给了他特殊照顾，学生的有些活动，他可不参加。在我和他接触中感到他没有认为自己曾是方面军卫生部长而把自己当成特殊学生。

解放后，1952年中央卫生部根据周总理指示，抽调军队和地方一批卫生行政干部赴苏联参观学习，全团共15人，翻译4人，贺彪同志是代表团主要成员，他当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我也是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准备办出国手续时，耽搁了半年，加之在苏联共学习半年，前后我们相处一年时间。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时，按国家规定，代表团团长张汝光一人可住单人房间，照顾贺彪同志也可住单人房，其他同志都是二人一个房间（参观团在苏吃住来往费用由中方负责）。我和白备伍同志合住一个房间，因他打鼾声很大，使我无法入睡，贺彪同志知道后就主动提出要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使我很受感动，感谢他对同志关心。从此我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索契等地都同宿，夜间无活动时就聊天，他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及



归国临别合影赴苏卫生工作者参观团

前排左起：洪明贵、贺彪 张汝光、王锡珍、陈真仁、
丁志辉、叶青山、白备武

后排左起：李亭植、向 进、林金亮、蒲荣欣、詹少联、
杨锡光、肖志功、任国祥

对卫生界各方面看法，彼此也交换了意见，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增进了感情，这一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并得到他许多有益的教诲。

1954年大区这一级组织机构撤销，贺彪调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我调卫生部医疗预防司工作，他分工主管我们司的工作，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者。

我们这种上下级关系将近五年，给我的感觉，他放手让我们

大胆工作，调动医疗司司长、处长们的积极性，有些问题都是以商量的口气研究工作，探讨问题。例如：城市划区医疗怎样推行，在全国城市如何试点等。他对干部平等相处，平易近人，在我们遇到困难时，他劝我们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过急不行。1958年他曾经告诫我少说、少提意见，当时我很不理解他的意图，直到我被下放到湖南省浏阳县劳动锻炼，后来又调到上海市工作，才深深体会到贺彪部长对干部的关心爱护，这个教训对我极其深刻。

他在1995年3月8日写给我一封信，也提1958年同我谈话的情况，回顾他当时的处境，使我更深深感到老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一些老同志、老战友都已年事已高，很难见到面，他在垂暮之年怀念老战友，亲自动笔给我写信，使我深受感动。

贺彪同志对人民卫生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他那种忘我工作、奋斗不息的精神和可贵的政治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洪明贵：上海市卫生局原局长)

学习贺彪部长的“硬骨头”精神

董炳琨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自己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他的两句诗中，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就是说它体现在两个方面，面临敌人或反动势力的攻击、压迫、漫骂、残害，要横眉冷对，坚贞不屈；对广大人民和为人民的事业，要像牛那样的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埋头苦干，尽心尽意。这种硬骨头精神也叫骨气，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最可贵的东西，正是由于历代都有这些有骨气的优秀人物，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发展，并谱写出如此壮观的历史，所以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

过去讲骨气，常常是针对外敌入侵、国家危难或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革命志士舍生取义而言。其实，在革命队伍内部，人民取得政权的社会中，这种骨气仍然是必要的。恩格斯曾说过：“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是说，任何时候都存在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正派与邪恶、真善美与假丑恶等两类之间的矛盾。当后一种观点或势力占上风的时候，就会体现骨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贺彪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1940年贺彪同志在八路军120师（晋绥军区）任卫生部长时，我就是他的部下。那时我是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小青年，接触不多。后来当了医生，与他也少有接触。知道他经常深入基层，作风朴实，处事果断，对干部关心爱护。每次反“扫荡”都和大家一起，“百团大战”时他亲临前线救护伤员，反映很好。1947年他率领卫校一批师生北上参加“绥包战役”时，我留在后方医院未能随去。从此一别十多年，直到1958年抗美援朝结束后，我从解放军胸科医院转归中国医学科学院，改名为阜外医院时才又见面。医院的转接、改名过程都是在贺部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此后的工作经常受到老首长的关怀与指导。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时期，在农村普遍开展“社教”的同时，城市事业单位开始试点，我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被列为中宣部领导的10大试点单位之一。卫生部主要领导率领70多人（后增到100多人）的工作队浩浩荡荡进入协和医院，进院后就把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隔离起来进行“学习”，他们则分布在全院各部门进行“扎根串连”，收集我们的“劣迹”。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挖空心思检讨“大跃进”后这几年所犯“方向性”的错误，每次都有工作队领导参加监视，但总是少言冷语。就这样“学习”了30多次，实在没有什么新词了，我实在憋不住，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协和不是孤立的，每件大事都请示过上级，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如果是方向性的话，也带有普遍性。如果协和方向错了，那么对全国卫生系统该怎么看？”一句话惹恼了工作队领导，他们连夜突击，组织一些人“磨枪擦剑”做准备，只隔了一天就开全院大会对我进行批判。这种会开了7次，“子弹”还没用完，因过春节而暂停。春节后形势变了，中央发布了当时称为“23条”的文件，按新文件精神停止了对我的批判，工作队领导也换了班。

经过一段工作，以对我作了个“好干部”的结论而草草收场。但我怎么也想不通，第一，不知道我究竟错在哪里；第二，我不是本单位第一把手，即使有方向错误，首先负责的也不应是我；第三，想不到有些“群众进步”那么快，“觉悟”那么高，前不久还受到拥护赞同的东西，转眼就成了“方向”性的错误，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这段时间真是苦闷极了。就在我受批判时，贺部长来到医院同我谈了几句话，使我硬着头皮挺了下来。原话已记不太清，大意是：群众运动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只有运动结束后才能搞清楚；要实事求是，不要给自己乱扣帽子，但也不要“顶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后说，我对你了解的。几句话倍感温暖，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持和勇气。第二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林钧才同志被关在19楼地下室，偶然遇到贺彪部长，他告诉我们要把这次运动当作对革命意志的考验锻炼来对待，也是寥寥数语增强了我坚持真理的决心和信心。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贺彪同志的处境和情况我并不知道，单凭我素来对他的了解，料他决不会作“墙头草”，他受的苦难也不会比我少，直到他去世后，陈凯同志送我一本《贺彪词选》，在慢慢吟读中结合往事回忆，才更深刻全面地了解了他的品德之可贵。

常言说“诗言志”。贺彪同志的诗词不是一般文人的吟花弄月，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在现实斗争中的真实思想和感情的流露。这本《词选》大部分内容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情操、品格、意志和作风。借《贺彪纪念文集》出版的机会，谈谈我对《贺彪词选》学习的一点体会，以表对老首长怀念之情，并作为个人有生之年的精神支柱。

运动一开始，凭他多年革命实践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就看

到这场运动决不是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与人为善地帮助同志。1966年7月底他由湖北麻城卫生工作队返京遭受批判时就写道：“归京返任历诡风，绕雾萦烟邪气窜。白绿红黄盖地天，人妖颠倒功罪乱。”

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越是革命意志坚强，不肯同流合污的人，越是重受摧残。“剪背学燕，脱臼折腰肱。任欺凌”，“风波亭上阴森，戕我骨瘦如薪”。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曾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的老革命干部，却遭受“白眼相嗔，血口交喷”的侮辱。面对这些，他坚持“守住殷红心一颗，……淬砺千番还故我”，“行廉身正……效冬青雪松”。对“四人邦”煽起的股股邪火，报以鄙视的嘲讽，“殿上群小共阎罗，逼供声声唱和。监牢白日昏昏，立功破案劳神。何苦无端生事，凭空搅起烟尘”，“九品皆分毒计，还有那高腔怪调。炬火爝，光天指鹿，是非颠倒。”他坚信“周（兴）残来（俊臣）酷，恶极终报应”，总有一天会“历史终辨忠奸”，“旭日照，血债一齐追讨。”

在江西“五七”干校，他尽管身负重冤，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思想丝毫未减。他“管理舒鳧（鸭）六十余，花生选种如山积。万丈草绳细搓毕，拣拾桐果已经亿”。为了保护劳动果实，“唱岭酬山居百七，驱逐野猪百头逸”。台风到来，“陡起狂风冷雨虐，拔树摧林震谷壑”，他所担心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不救收成粮尽掠”。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保护了劳动果实，终于“又经苦雨验忠贞，识得篁笔节高杰”。当看到辛勤劳动有了收获时，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喜闻稻菽顺风香，岂顾汗流腰腿颤”。在此期间，作为一个老革命者，时刻关注形势，忧国忧民之心常在，“功业未意心切切，眼前磨难沥心血。残更数尽桅灯灭，放眼长安，瘴雾重重叠”。“问，问，问。鬼踪魔影，甚时消遁”。但他

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从心底喊出“昔日保疆土，今当整乾坤。得闲须学习，前进莫空辘。考验四十载，革命志更纯。生死只一次，一日无双晨。待到光明日，忠节鉴后人。”

尤如一滴露水映出了整个太阳，薄薄的一册诗选，反映了贺彪同志的高尚人品。学习之后，受益匪浅。现草两首短诗表示对贺彪部长的怀念和自我鞭策。

英才不弃乱事器，
黄沙掩金质未消。
烈火坩埚能耐久，
无私无畏品自高。

乱世盛世皆有折，
不恃不求便是德。
终生无愧也无悔，
白眼黑眼奈我何？

(董炳琨：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彪炳千秋

——怀念贺彪同志

谢 华 田仁明 刘 凯

贺彪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们常常怀念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岁月，怀念他待同志亲如兄弟，待伤病员胜似亲人的优良作风，怀念他对我党我军我们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卓越贡献。

贺彪同志是我军卫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任红二军团卫生部长时，他就从当时我军缺医少药、条件异常艰苦的实际情况出发，十分注重基层的卫生工作建设，建立健全各级卫生组织，千方百计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开办医务人员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了一大批有一定基础的卫生人员，充实到部队，胜利完成了战场救护任务，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贺彪同志任八路军第120师卫生部长。当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我军地处偏远地区，敌伪封锁又很严，根据地医药奇缺，卫生工作异常困难。加上部队流动性大，经常分散作战，频繁转移，战线不固定，距离远，交通十分不便，很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因此，他着重强调了团级卫生队、营部卫生所的建设，加强战场救护，开办药剂训练班、医训队，并组建了卫生学校，培养部队急需的医务卫生人员，轮训在职卫生干部，不断提高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为部队的医务卫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药品极其匮乏是当时我军医疗卫生工作的一个共同难点。因

为没有药品，许多本应康复的指战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贺彪同志为此常常寝食不安，彻夜难眠。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药品，另一方面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因地制宜，在黄河边上的盘塘办了一个制药厂，利用当地的中草药加工制剂，大大缓解了部队用药的矛盾。

频繁的战事使伤病员大量增加，而且多数是枪伤、刀伤、爆裂伤，如得不到及时救治，极易因失血、感染而大量减员。贺彪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从实际出发，积极向师长贺龙同志和政委关向应同志建议，成立野战手术医院。并在条件非常艰苦，财力、物力、人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仅用半年时间，在陕北神木县贺家川卫生部所在地组建起了手术医院，还沿黄河两岸建立五个直属卫生部的医疗所。这样，从战场下来的伤病员基本上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保证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战时外科手术医生，适应了战争环境的需要。

贺彪同志在大力培养基层医务人员的同时，十分尊重专业人才，注意团结知识分子。经常找他们谈心，了解情况，鼓励他们自觉献身革命事业。生活上关心他们，业务上虚心拜他们为师，工作中大胆使用，放手让他们独挡一面，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1940年秋，延安总部专门派外科专家祁开仁同志率外科组到120师工作。贺彪同志经过考察后，认为祁开仁同志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技术水平高，就积极建议组织上任命他为卫生部副部长兼手术医院院长。祁开仁深受感动，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中。

贺彪同志出身贫苦，入伍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从事医务工作。在战争年代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虚心拜人为师，刻苦学

习，潜心钻研，自学成才。他不仅有很强的组织才能，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医疗技术。1935年12月，红二军团第五师贺炳炎师长在指挥湖南绥宁县瓦屋堂战斗时不幸右臂被打断，伤情非常严重，如不手术会危及生命。贺彪同志知道后立即骑马赶到救护所，经检查后确定了手术救治方案。贺炳炎师长从昏迷中醒来，坚决反对截肢，他大声喊：我不能没有右臂，我还要打仗。这时军团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也骑马赶到，劝说贺炳炎师长：要相信贺部长，顺其安排。当时部队正准备撤出战斗奉命转移。贺老总把贺彪同志叫到一边问，手术需要多长时间？贺彪同志答，需要三个小时左右。贺老总为了挽救这位红军虎将的生命，果断下令部队再继续坚留三个小时。在手术器械不全，仅有少许麻醉药的情况下，贺彪同志征得贺炳炎同志同意后，将他绑在门板上，口中咬着毛巾，认真消毒后，亲执板锯，一下又一下为其锯掉了残肢，接着又进行了精心处置，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手术。贺炳炎同志不久就恢复了健康，继续上前线，又任红六师师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驰骋在战场上，成为威名远扬的独臂将军。建国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上将，每当提起此事，总是念念不忘贺彪同志的救命之恩。

贺彪同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在长征途中，年仅十四岁的红小鬼田仁明，过草地时因病掉队。途中被时任红二方面军部长的贺彪同志发现，马上会同中医杨医官诊治，只吃了几副中药就治好了小田的病。如今已年逾八旬的田仁明谈及此事时，依然十分激动，他说：“如果没有贺彪同志的及时救治，我早就在长征途中‘光荣’了，哪有今天。”大家都说贺彪部长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都一视同仁。其实，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贺彪同志一生的最高准则。

贺彪同志身为领导干部，坚持以大局为重，善于团结同志，时时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抗战初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我党决定在红二方面军基础上组建八路军第120师，人员还有来自其他兄弟部队的。贺彪同志到120师任卫生部长时，十分注重贯彻党的政策，特别注意团结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无论什么单位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深受大家的好评。

我们深为曾是贺彪同志的部下，曾是他所在部队的后来者，而感到自豪，感到光荣。“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但是，人的精神是不死的，高尚的精神是永恒的。我们的老部长贺彪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他那崇高的道德风尚和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辉煌贡献，将彪炳千秋，永远激励后人。

我们永远深切怀念他！

(谢 华：铁道兵后勤部原副部长
田仁明：铁道兵第二指挥部原司令员
刘 凯：军委办公厅原主任)

回忆敬爱的贺彪老部长

游全举

我们卫生部的贺彪部长是我们的好部长，他是忠诚的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是我军自己培育的第一代优秀的卫生工作领导人之一。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一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时刻关心军队和人民的健康，他是个不辞辛劳，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好部长，他永远跟着党走，这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思想境界。在他还没有离开家乡湖北江陵时，年纪很小就做地下工作，给党做秘密交通员，黑夜为党送信，传达党的指示，十七岁加入共青团后转为正式党员。他为人正直，从小就养成了不怕死的硬汉子、硬骨头精神。

他事业心强。他 1940 年在 120 师（二方面军改编为 120 师）任卫生部长（那时我才认识他），他是延安卫校（后改名为中国医大）十二期毕业的，他亲身体会了经过正式学习与不学不一样。他见军队缺医少药，于是先成立医训队，后正式成立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全国解放后改名第四军医大学），分几个班次，有高级班（卫生处长、科长以上），学制一年。军医班学制五年（我是军医班第二期的学员）。我们卫校是在陕北神府县的贺家川，我在卫校附属医院实习。实习一年后就在贺家川当医生。所以，我熟悉敬爱的贺部长，我实习的条件很好，遇到疑难病，我就请教祁开仁校长和其他老师。祁校长是有请必来，来院会诊，当场指教，尤其是外科手术，我们全是跟祁开仁校长实

习，外科全是祁校长讲课教的，我感谢我的校长和老师，我更感谢培育我们的贺部长。

那时经费相当困难，部队连每天的菜金伙食费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贺部长还是决心建起了新医院，病房、药房、宿舍。手术室建的挺科学。多年没有伙食费吃什么？部长叫卫生部学校自己种菜做豆腐，所以我们天天有丰富的青菜吃，有豆腐吃，这样的生活那时候就算不错了。（1943年前我们吃黑豆，贺部长、陈凯大姐（带孩子）祁校长夫妇都是吃黑豆）。这应归功于贺部长的事业心所创建的好条件，好环境。

贺部长是个饱受极左之害，反对极左的人，你若看了他的回忆录你就会知道他历来反对极“左”，他痛恨极“左”。他的好战友段德昌是贺龙司令员最喜爱的文武双全的好师长，为人正直，只因他对夏曦的极左乱杀无辜的错误，敢于提意见而被夏曦杀害，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中说：在前后四次肃反中共逮捕三千多人，据贺彪同志回忆，这是个被缩小的数字。据贺龙回忆，只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一万多人。1943年秋在彩林开过一次欢迎大会，由张平化主任致欢迎词，欢迎贺老总。我记得贺龙同志说：我们二方面军的人不是被敌人、国民党杀的，是被王明、夏曦自己这些王八蛋给杀的。就拿你张平化来说，夏曦命令王震将军杀你张平化，是王震将军不相信张平化是坏人，才刀下留人，你张平化今天才能致欢迎词。我最好的师长段德昌，就是被夏曦杀了。这是我亲耳听贺老总讲的。夏曦杀人之多，贺彪同志在他八十四岁写回忆录时还记忆犹新，通过他的回忆录，给很多无辜被杀的好同志平了反，他对夏曦恨之入骨，这个回忆录写的好。

1942年整风，大家通过学习文件，对照自己检讨自己，都有很大进步。1943年秋后按贺部长回忆：却偏离了正确方向，特别是7月15日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长的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夸大敌情，混淆矛盾，发动开展一场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许多单位在整风中大搞逼供信，在十多天的时间，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许多人被戴上特务、叛徒、嫌疑的帽子，造成了严重后果。

康生在延安的错误作法影响极坏、流毒所及，对晋绥军区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九月末，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各成立一个中队，集中在彩林整风，到彩林只学习了两天便召开了四个中队的“反特务”斗争大会。军区除奸部长在大会小会上的发言，夸大敌情危言耸听和康生一个调子，鼓动所谓“失足者”搞坦白揭发，声称如不坦白，将受到严惩。这样正常的整风学习秩序被打乱了。随之，各单位各中队出现了对被审查者实行逼供信的现象。查出一批所谓“特务、叛徒、嫌疑分子”。据我所知我们全部教员，我们军医二期、三期抗日期间参军的全部同学及医院的大部分抗日干部都打成了“特务、嫌疑分子，”我认为其责任主要是康生及晋绥军区除奸部长之所为。对这些作法，我们贺部长是个反对者。贺部长生怕出现内战“肃反”那种情况，他反对除奸部长的做法，他见其他中队上吊跳黄河的人与日俱增，他夜而不眠，想出个办法，离开彩林，免受影响。他向林枫副政委说：“我要求将第四中队带回卫生部驻地贺家川，在那里一边整风学习，一边抓好医疗卫生工作。如果出现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事，漏掉反革命分子，责任由我来负”（这是立了口头的责任状），林枫才同意了贺部长的要求。贺部长第二天就带四中队（卫生部中队）离开了彩林，回到了贺家川，所以，第四中队一个人都没有死，可见其决策英明。

1944年即开始甄别，凡被审查的都经过了甄别，那时我在贺家川医院实习，经邹年发所长，潘教导员提议，经卫生部贺部

长、戴文彬政委同意指定我为该医院（卫校附属医院）甄别组组长，彭德珍、杨章荣（后改名杨青）为甄别组员，负责该院的甄别工作。甄别后把个人写的所谓坦白材料交还给本人，在卫生部、学校和医院合开的群众大会上，由戴文彬政委向群众宣布某某同志政治上历史上没有问题，某某同志是纯正的党员，刘康，吴广志为模范党员，经过这样宣布与结论，大家都能抬起头来。宣布后多数同志都很满意，少数同志仍有气，认为自己本来就没有问题，你们整我干什么？卫生部首长见有些人还有气，又召开了民主会，叫大家提提意见，说说心里话，出出气，等大家气也出完了，话也都说了，民主会才结束。原来有气，这样变成皆大欢喜。

经过甄别来看，我们第四中队一个特务、反革命都没有，红军干部与抗日干部都是革命者，我们贺部长向林枫立的“口头军令状”也好交差了。正是由于第四中队政策掌握的好，善后工作做的好，在后来的自卫战争中，新老干部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

1985年，我和彭德珍想去看望培育我们的贺部长和陈凯大姐，彭德珍给贺部长打了个电话说：“游全举来了，我们俩想去看望您”，贺部长回电话说你们俩在家里等着我去接你们。于是贺部长和陈大姐来接我俩到部长家。我心闷时写的一首“西江月”给贺部长看，贺部长阅后给我指出：你胆子小，写的没有劲。立时拿出他写的很多词给我看，对于爱写诗词的人来说，这就是交心。部长填的词好，值得晚辈学习，他记的词牌也多，他大概不看词谱，提笔就填。在谈及1943年的整风时，贺部长主动说：“1943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是错误的。”部长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完全赞成部长的这一结论。我将这句话写上，让当时被审查的同志也听听。

贺部长在历次政治磨难中表现的很高的政策水平和很强的领

导能力，使我们受益，令我们永远难忘。

(游全举：广州军区后勤部原副部长)

2001年11月

救死扶伤 大义凛然

——怀念贺彪同志

欧阳山尊

(一) 未曾谋面名传耳寰

1939年秋，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为首，组织包括“陕公”、“鲁艺”、“卫校”等单位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赴华北敌后开展工作。纵队由罗瑞卿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际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宣传科长谢文翰同志兼纵队宣传队长，我任副队长。宣传队在行军途中担负起民运调查、检查纪律、行军鼓动、写标语、打路标等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每天行军赶前赶后，比大队要多走十几到几十里路。由于劳累过度，抵达晋察冀时，我自幼所患的小肠疝气（赫尔尼亚）发展得很厉害，鉴于以后还要行军打仗，打报告给纵队领导请求手术根治，但那时纵队卫生处没有这个条件。当时适逢贺龙同志率120师从冀中回师晋察冀，他得知这种情形后就提出可以由120师卫生部负责治疗，于是就由罗瑞卿同志写信将我介绍给120师参谋长周士弟同志，由他安排我到师卫生部干部所。

在干部所的伤病员都是120师的中下级指挥员和干部，其中也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当他们得知我是延安抗大来的以后，就很亲热地与我交谈起来，在交谈中得知120师卫生部长叫贺彪，到延安学习去了。我问：“120师师长叫贺龙，他叫贺彪，一龙一虎，他们是不是兄弟？”这一问引得大家都笑了，他们说：

“‘胡子’（这是干部们对贺龙同志的昵称）是湖南人，贺彪是湖北人，怎么能成为一家。”这么一来使我有些尴尬，只能跟着大家一起解嘲地笑了。在以后的交谈中，了解到贺彪同志在参加部队以前一直是从事青年工作和地方工作的，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后为了工作需要，就干起了卫生医务，担任护士长、医务所长、军医处长直至卫生部长。这时，一个卫生部的干部插话说：“他这个部长不光是管些医务行政工作，而是经常到下边去，尤其是炮一打响，就跑到前方去抢救伤员，亲自动手进行手术。”我问：“他过去没有当过医生，医疗技术是哪里来的？”回答说：“从战斗的实践当中学来的嘛。但是他自己并不满足，所以才到延安去深造。”

从这些谈话中，使我认识到了贺彪同志，也使我悟到了一条真理：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实践来获得。

（二）有幸晤面未能交谈

我在120师卫生部呆了没有多久，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了，干部所决定：能行动的伤病员随所部转移，行动不便的就近“坚壁”到偏僻的山沟里，我被划入“坚壁”之列。不料一天清晨对面山上出现了敌人，我就和两个同屋的伤员爬上后山打了几天游击，等敌人撤走后就去找指挥机关，到了师政治部才知道抗大应贺龙同志的要求，已经将我调到了120师战斗剧社。一到剧社发现又发干粮又发鞋，正在作出发前行动的准备，正临阎锡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中央命令120师开赴晋西北，第二天我就随着浩浩荡荡的大军跨过同蒲路敌人封锁线和酷寒的云中山，抵达黄河边上的兴县。贺龙同志为照顾我的疾病，给了我一匹骡子代步，但在行军中我将其让给其他病号骑，坚持着和队伍一起徒步行军。抵晋西北后，我又坚持了一段工作，但

终于因劳累过度疝气病又厉害起来，不得不立即到卫生部进行手术。在手术前，卫生员告诉我刚从延安回来的贺部长要亲自参加，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与贺彪同志见到面。由于这是我生来第一次接受手术，为了避免紧张，事先找了一本潘梓年写的《逻辑与逻辑术》来看，以期增加自我控制能力。

手术是借用老乡的一间很陈旧的屋子，当然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为了防止从上面掉下尘土，在屋顶下面张挂了一块白布，取光靠的是从窗口透进的阳光，手术台是用门板搭的，上面铺了白布，为了增加室温，生了一盆木炭火放在手术台的下边。我在手术台上躺好后，从屋外进来了两男一女，我正要探身起来打招呼，站在前面的男同志说：“躺下，躺下。”接着向那个女同志说：“何大夫，你为他进行局麻，好了叫我们。”说完和那个男同志出屋去了，我想他们可能是去洗手消毒。在何大夫为我注射局麻针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和你说话的人是谁？”她说：“他是我们卫生部长贺彪，另外那个同志是我的爱人张汝光，他是医务主任。”

麻药生效后，何大夫把贺、张招呼进来，我侧头朝他们窥视了一下，看清贺彪同志长着一张圆圆的脸，一表人才，与其说是个经历长征的军人，不如说更像个斯文的知识分子。他望了望何大夫，何点头表示麻药已生效，于是他向张汝光同志说：“由你主刀，我当助手。”手术开始前何大夫提出：是不是要把病人“固定一下”？我抢着说：“不用，不用，我的自制力很强，不会乱动的。”不过在手术过程中，何大夫还是将我的手紧紧握住。可能由于我患病的时间长，有些血管不易剥离，贺彪同志不由得说出“麻烦”两个字，为了缓和气氛，我开玩笑地问：“会不会在手术台上完了蛋？”张汝光同志的回答则是“不要说话！”手术结束后，何大夫将割下来的那块肉举给我看，我说：“足有四两，

可以拿来改善伙食”。说得大家都笑了，在场惟一没有笑的是贺彪同志，我感到他是一个严肃而有着内向性格的人。

大概因为手术台下边那盆炭火熄灭了，室内温度太低的原故，我着了凉，手术后发起烧来，并说胡话，在迷糊中仿佛部队正在出发反“扫荡”，因我手术后行动不便，就将我拴在驮子上，拴我的那根绳子正勒着伤口，感到非常疼痛，便大声叫喊：“轻一点，轻一点，不能这么勒！”剧社派来照顾我的邸力同志见此情形都急得哭了，她马上向贺彪同志反映，经请示贺龙师长批准，为我注射了一支“消治龙”。现在来说“消治龙”只是一种普通的药物，可能已被淘汰，可是在当时被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封锁的环境中，却是非常宝贵，动用一支还需经师领导批准，而这一针在我身上则产生了神奇的效应，高烧很快退了，伤口也愈合得很好。拆线的时候，贺彪同志在一旁监视，拆完了线他检查伤口后说：“一切正常，多休息几天。”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却表达了他对我的关切和负责。

我惦记着剧社的工作，盼望着早日康复归队，正好在拆线后的第二天，剧社的通讯员为我送文件来，我就让他牵马“偷偷地”把我接了回来，不料刚回剧社就接到上边紧急通知：敌人又开始“扫荡”，令剧社连夜撤到河（黄河）西后方。在夜行军中，我没有骑马，撑着一根棍子一口气步行了90里，伤口丝毫没有出问题，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病未再患，一切良好，这应该感谢贺彪部长和张汝光主任以救死扶伤的精神，操持了精湛的医术。

（三）夺走“尖子”心有不满

贺彪同志的夫人陈凯是战斗剧社的“尖子”演员，她不但戏演得好，歌也唱得好，我到战斗剧社后导演的第一个戏《一万

元》就是由她和朱丹、冯一夫主演的，她在戏里扮演一个“大青衣”的角色非常出色。记得在唱《黄河大合唱》时，由她担任独唱《黄河怨》，她将这首难度较高的独唱曲演唱得十分动人，把歌中那个被日寇屠杀了亲人自己又遭侮辱的妇女的哀怨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战士们听后对日寇无比痛恨，更增加杀敌复仇的决心。陈凯的腿有些毛病，行军时就让她骑剧社的那匹老白马，有一次夜行军，在一个山崖上那马没有踩稳，一下滑下去了。队伍停了下来，大家向下看，可是天黑什么也看不见，都觉得从那么高跌下去一定凶多吉少，没有想到她却拽着马尾巴爬上来了，这才使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陈凯到卫生部看病认识了贺彪同志，由相识到相爱，经过贺龙师长批准他们结婚了，这当然是件非常好的事，两位才貌双全，缔结良缘，大家应该非常高兴，但是由于贺彪同志把剧社的尖子夺走了，又因为陈凯婚后接连怀孕不能为剧社演戏，心里难免有些芥蒂。有一次我们到政治部汇报工作，成荫向甘泗淇主任反映了这种心情，甘主任半开玩笑地说：“谁要你们自己不争气把女演员放走了，以后你们这些光棍应该想办法把她们留住。”说着拿起一支铅笔打着我们说：“棒打你们这些‘薄情郎’”。说完哈哈大笑，我们也被他这些带暗示性的幽默语言引笑了。

我们按照甘主任的“指示”，关起门来，大力促成社内的婚事，首先是朱丹和肖孟结婚，接踵而来的是成荫和申伸、梁定商和马勇、叶林和彦萍、薛海瀛和李清都双双成为眷属，非但剧社的女演员没有“外流”，还争取了剧社外有演剧才能的女同志如358旅李参谋长的爱人文路到剧社工作。自这以后，曾经因为贺彪同志夺走尖子的一点不满心情也就烟消云散了。

(四) 劫后重逢相聚怡然

1942年我到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后就留在联防军政治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上海，三年解放战争都在东北，天南海北，与贺彪同志和陈凯完全断了联系。全国解放后，我们先后进入北京，但因工作性质不同“隔行如隔山”，也疏于来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两家碰巧都住到和平里，相距没几步路，彼此才得以密切联系，劫后无恙相互庆幸。贺彪同志除了为锻炼身体每天一早步行绕住地一圈外，基本上深居简出，还是保持他那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我虽然较他只小5岁，但生就一副活跃好动的脾气，总沉静不下来。我和他们的几个孩子很合得来，常常一起骑自行车去逛旧货商店，买一些旧录音机之类的东西，买到合意的便宜货，大家骑着车得意地绕着和平里转上几圈，我这个年过花甲的人竟成了他们的忘年交。

贺彪同志的长子贺斗是学医的，这恐怕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但他又酷爱音乐，还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这可能是受到母亲陈凯身上艺术细胞的影响。他弄来了一盒童声独唱的录音带，是一个孩子唱的意大利民歌，这个孩子把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歌曲如《圣达露西亚》、《重返索兰多》、《我的太阳》等唱得那样平易单纯充满感情，丝毫不像有些歌唱家那样专门卖弄技巧，而是表现出意大利人民的生活和美丽的风景。我们（包括陈凯）听了都非常欢喜，于是就分头用买来的旧录音机转录下来。

我发现贺彪同志也并不是一个古板难于接近的人，在接触中他虽然话不多，但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是非常热情的，而且富有独特的幽默感。有一次他把我和老伴徐静媛邀到他二楼的屋子里作客，一齐无拘无束地谈心，他听我老伴说的是一口纯粹的北京话，就问她是哪里人，当老伴告诉他：从小就生长在北京时，他

脱口而出地说：“京油子，京油子！”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逗得我们也笑了，这样一来就使得谈话更加轻松融洽。当我们谈到个人在浩劫中的遭遇时，他没有接词，在停顿中打开写字台的抽斗，拿出两块巧克力给我们说：“吃糖，吃糖！”我理解他为什么不想聊那些事，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江青“四人帮”还很猖狂，邓小平同志也遭受打击，中国的命运尚难最后确定，个人的一点不公平的遭遇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由于我们两家住得很近，走往也就频繁，陈凯和她的四个儿女经常来我们家串门，我和老伴也带着孩子去看他们。有一次在他们家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问是谁？陈凯说是她的女儿，那个姑娘接着叫了我一声“叔叔”，我问陈凯什么时候又添了这么个女儿，陈凯笑而不答，后来才知道她是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是陈凯的儿子贺平的未婚妻。平平和毛毛结婚的那天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在贺家的六楼准备了一点冷餐，请了少数亲友参加，我们夫妇被邀请去了，也没有送什么贺礼，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样反显得大家亲切无间。

（五）同悼总理泪湿衣衫

家中有一台黑白电视，每天必看的是早晚新闻联播，希望从中得知周总理的活动和身体健康情形。对我来说，和周总理之间具有着一种特殊深厚的情感，是他将我从延安调到重庆和上海“蒋管区”工作，并亲自给予具体指示，内战暴发，也是由他亲自安排我撤退到解放区。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时由他亲自批准建造了首都剧场，他每次来看戏都是由我陪着，新年和春节，他和小超大姐与我们一起度过，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亲如家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从各种消息中感到他作为中流砥柱的巨大压力和困难处境，每当

从电视中看到他的头发一天天变白，身体一天天瘦下去，而接见外宾的地方又是在医院的时候，心头就像压了一块铅那么沉重。正在这时，我的脚被严重烫伤，行动不便，既无法到地坛公园散步，也不能去贺家串门，在极为苦闷的心情中，传来了天崩地裂的消息：亲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四人帮”丑类规定社会上不许戴白花，不许设灵堂，不许开追悼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由于和周总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是偷偷地决定开个追悼会，问我脚伤未愈能否参加？我说：“不能走爬也要爬着去！”正在此时陈凯来告诉我，他们得悉总理遗体将在北京医院后院举行告别仪式，问我愿不愿和他们一起去？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形下参加这个活动可能要冒风险，但我坚决表示一定要去。我将那双缠着绷带的脚塞进剪开的棉鞋中，坐上贺彪同志弄来的一辆陈旧的伏尔加小轿车从和平里出发，在车上我们三个人默默相对，一句话也没说，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到了北京医院的后院遗体告别的地点，院子里的桌上摆着签名簿，陈凯轻声地说：“签吗？”贺彪同志并未作答，率先上去签下了名字。所谓遗体告别的灵堂只是一间像车库大小的屋子，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总理怎么相称呢？站在门口就感到一阵心酸，热泪不禁淌了下来，我流着泪跛着脚跟着前边的人绕遗体而行，当看到遗容上那一双熟悉的浓眉时，我忍不住号啕大哭得几乎跌倒，昏沉中不知什么人把我扶住，走到门前才发现也是一位泪流满面的老同志。我一颠一跛地会合了贺彪同志夫妇，一同上了那辆伏尔加，在返和平里的途中仍是谁也没有说话，可是我们三个人的心则是由恸悼总理之情贴在一起了。

（六）爱憎分明大义凛然

贺彪同志以他精湛的医道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挽救了许多同

志的生命，他又是一位很有文采的诗词作家，可谓文武双全。他虽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内心却火般炙热，他的诗词情真意切热情洋溢，密切地结合着时代与现实，有别于那种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下放”到农村劳动被安排打更守场，他在寒风凛冽的冬夜所想的则是无法继续救死扶伤事业的遗憾，他在这首《醉太平》的词中这么写道：“更夫瘠容，行廉身正。湿棉吹透寒风，效东青雪松。浮思万重，忠诚落空，灭痾除病初衷，竟南柯梦中。”

他热爱人民，热爱党，热爱同志；痛恨敌人，痛恨邪恶，痛恨“四人帮”，这种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情感在他的诗词中都充分地表达出来，歌颂什么，暴露什么，在他心里是雪亮的。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写的一首《卜算子》中道：“霹雳撼重霄，热泪周天洒。陨落巨星大柱倾，万众湿鲛帕。热血沸满腔，贤相谁能舍。遍地哀声动广陌，鼠辈胆惊吓。”两天以后，对着总理遗像，他又写了一首《诉哀情》道：“此身许国无所留，香灰撒神州。巨星陨，彩霞落，烨煜贯环球。千秋功，铸金鼎，印心头。华夏伟业，万众感奋，壮志能酬。”《卜算子》中写出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厚情感，遍地哀悼声使“四人帮”胆战心惊，而《诉哀情》中除了写周总理以身许国的忘我精神外，更提出“华夏伟业壮志能酬”的预见，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的预见在今天不是已经与正在成为现实吗。

1979年4月15日，《工人日报》发表了彭德怀同志1958年秋到农村作调查后所作的一首诗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他读了以后随即写了一首题为《彭帅平生不染尘》的七律道：“彭帅平生不染尘，探真求是爱人民。忧当喜报嗔左道，过作功夸斥旁门。匝地云烟求钢铁，改行农圃即工人。可怜田里烂粮薯，枵腹

万家度赤贫。”他在诗中歌颂了彭帅洁白刚直的为人，也对当时政策上的失误和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了适当的暴露。正因为在他的心中对于正确与谬误，正义与恶邪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分，所以他的诗词也就既是情感饱满又是义正辞严，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贺彪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他活了九十岁，虽然算是长寿，但是我总觉得他应该再多活些年，再多写些感情深厚大义凛然的诗词留给后人。

(欧阳山尊：中国文化艺术家联合会顾问)

2001年7月

贺部长给我治病

严寄洲

1939年，我从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的文化工作团调到八路军120师贺龙师长领导的战斗剧社时，就听说120师卫生部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部长名叫贺彪。说他医术高明，尤其善外科手术，如当年红二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贺炳炎负伤后的胳膊，都是贺彪在艰苦条件下用钢锯锯掉后保住了生命的。我们大伙儿还一直认为贺彪和贺龙这两个名字像是有什么亲缘关系。其实贺彪是湖北江陵人，贺龙是湖南桑植人，根本不是一码事。

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20师挥戈打回晋西北反顽固，贺老总出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军区首脑机关进驻兴县一带。一天，我们战斗剧社到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布置舞台，准备晚上演出。我正在指挥装台挂幕布，此时一个潇洒、英俊、步履轻捷的年轻军官走了过来，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首长，因为他的军装上衣上有六个兜。（当时许多长征干部穿的军装上除四个吊兜外，另有两个斜插兜）此时有人悄声告诉我，这就是卫生部长贺彪。

贺部长走到我跟前，脸带笑容问我：你们是战斗剧社么？今天晚上演什么节目？欧阳山尊（剧社社长）来了没有？我一一作了回答。贺部长又说：卫生部住在河西彩林，欢迎你们剧社到我们那里为伤病员演出！

贺部长的谈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首长架子，短短的谈话，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后来在不断的接触中，

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41年夏季，我患上了类似“伤寒”一类的疾病，当时在敌后既不能确诊又无药可治，又恰逢连年晋西北大灾荒，粮食短缺，部队给养困难，只能以黑豆充饥，那种用黑豆压碎成的黑豆糝饭很难下咽，而且有苦味。我作为病号吃这种饭不好消化，吸收不了营养，身体日渐虚弱。无奈中剧社只好把我送过黄河西到卫生部治疗，我被分配到一个小山村住了下来，其实这儿和前方没有什么两样，开饭时仍是一碗苦味的黑豆糝饭，外加一丁点儿酸菜，补充不了什么营养。

数天后，贺彪率领卫生部的几个领导来到村里检查工作，见到我时关心地问了我的病情，当他看到其他病号一个个面黄肌瘦，没精打彩的模样，皱着眉头对我说：“眼下最严重的问题是伙食问题，病号补充不上营养怎么行呀！”他转而对大家说：“同志们，部里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这伙食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今天就要过河找贺老总商量，请大家安心养病。”此时我看到贺部长说话时眼睛里含着泪花。

果不然，两天后开饭时我们吃到了小米饭，尽管里头还渗着一些黑豆渣，但在当时来说，无异山珍海味了。

晋绥军区在贺老总的倡议下准备举办一次全军区联合大公演，我们战斗剧社选定了曹禺名剧《雷雨》，我在剧中饰演主要角色周朴圆一角。就在进入排练之前我长了一身讨厌的疥疮，浑身上下痛痒难熬，尤其是两条大腿内侧满布疥疮，脓血和军裤沾在一块儿脱都脱不下来，行走都感到十分困难，排戏时站久了两腿就感到针扎似的钻心痛。当时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卫生员把硫磺拌凡士林，烧一堆篝火边擦边烤火，但结果收效甚微。后来实在无法继续排戏了，领导只得让我步行几十里，渡过黄河到卫生部。我找到了贺彪部长谈了我的疥疮和排练的紧迫情况，希望尽

快给我治疗。贺彪部长察看了我的病情，皱着眉头连连摇头说没有特效药，我听了心中非常着急，贺彪部长看出了我的心事，安慰说：“别急，我们想办法。”接着他和主治医生说：“我们给他注射六〇六行不行？”我一听心中不免嘀咕，参军前我在上海经常看到广告宣传六〇六是专治杨梅大疮的克星，怎么能治我的病呢？贺彪部长看出了我的疑虑说：“六〇六的杀菌力极强，连梅毒菌都能杀死，还杀不死你这疥疮菌呀。不过卫生部现存的六〇六只有几支，须要请示周（士第）参谋长批准才能动用”。不久，经请示批准后，先作了皮下试验，才给我注射了这种在当时算作“名贵”的针剂。之后我回到前方，果然这针剂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没几天工夫疥疮便结痂纷纷脱落，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悠悠往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往事从今天来看似乎非常平常，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但是在当时那个极端艰难的年月，却是使我最最难忘的经历。我永远记着贺彪部长那种一心为伤病员，一心为部队医疗工作的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

贺彪部长离开我们已近三年了，他是今天医务工作者学习的好榜样。

（严寄州：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

2001年3月25日于301西楼

一颗明亮的星

——忆贺彪将军

魏 风

现在认识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如和某人患难相交，有说有笑，不分彼此，可是这个人一旦禄位高升，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他升了官，好像他的知识、水平，也就随着官位一起高升了。他说话的气也粗了，脾气也大了，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了。他总是居高临下，教训人，对这种新贵，只好敬而远之，不，更确切的说是避而远之。

可是贺彪将军就大不一样了，他是老红军老将军，是我军医务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可以说是位大官，是位大专家，可是他毫无官架，毫无官腔，平平常常，如同家人。我认识贺彪时间不长，1995年初，我们要拍一部反映贺龙元帅的电视剧，贺彪是贺龙的老部下，老战友。一天我和电影导演严寄洲一起去访问他。一进他家，贺彪热情地迎接我们。贺彪同志当时已八十高龄，穿一身整洁的军装，非常潇洒。他说：“听说你们要拍一部贺龙的电视剧，我很高兴，贺龙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八一起义时他已是军长，中将军衔，他不贪图名利，毅然把2万多人的20军交给了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握有兵权可不简单，有了人，有了枪就有了一切。另外在1927年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有大批党员被杀，有些党员叛变了，可是就在这种危难时刻，贺龙在“八一”起义之后，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稍停之后他又说，“我今天所以给你们讲这些，因为贺龙为革命交兵权，又在

危难之时加入共产党，这两件事对我一生教育和影响最深，我时刻记着，革命不怕死，革命不贪名，你们看，”他指着对面墙上挂满的诗词说：“我每年‘八一’写一首词，裱好，以此纪念红军诞生，怀念贺龙同志。”

在红军时期，贺彪同志是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他冒着枪林弹雨，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抢救了多少指战员的生命，现在已无法统计。但是他为贺炳炎（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上将）锯伤臂，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在一次战斗中，时任师长的贺炳炎，右臂负了重伤，必须马上截肢，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可是贺炳炎性格刚烈，他听说要给他截肢，他怒骂“妈黑屁，谁敢给老子锯胳膊，我就枪毙他。”贺彪同志再三劝说，他都不听，没办法，贺彪请示贺龙，并说明如果不截肢的危险后果，贺龙思索之后，贺龙叫警卫员拿来半水壶酒，走到贺炳炎面前，大声说“贺炳炎！不要耍蛮。锯！”贺炳炎不说话了，一气儿喝下半壶酒，躺在门板上。当时敌人从四面围攻红军，战斗异常激烈，贺龙问贺彪，手术要多长时间？贺彪说大约三个小时，贺龙当即命令参谋长，再派阻击部队上去，无论如何，保证顶住敌人坚持再打三个小时。

手术后，贺彪从贺炳炎膀上取下一块骨头，交给贺龙，贺彪说“老总，你看这块骨头，贺炳炎真是好样的，一声没吭，把一条手巾都咬碎了。”贺龙接过骨头，深受感动，说了一句“这才是红军的骨头”说完用一块纱布将骨头包起，我问：“用什么锯的？”贺彪说：“是我随身带的板锯。”我又问“余秋里同志的左臂是不是也是你给锯的？”贺彪说“锯的多了，记不清了。”

建国之后，在和平时期，贺彪虽然身居高位，还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贺老总那句“这才是红军的骨头”的话，使他铭记终生。他廉政奉公的事情很多，有两件事使我深深感动。

一件事是：拍贺龙电视剧宁夏文化厅是牵头单位，贺彪同志大力支持，多次提供贺龙的英雄事迹，为了感谢贺彪同志，就派人送一件羊皮背心和一条羊毛围巾。贺彪见到这些东西，很不高兴说：“你们把这些东西拿走，咱们共产党不搞这一套。”可是送东西的同志硬把东西放下就走了。当晚，贺彪就让秘书把东西送还，秘书找不到宁夏同志的住处，就把东西当面交给严寄洲，请他代转。秘书回来汇报了情况，贺彪说：“转交不行，你问严寄洲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必须把东西交还本人。”秘书又连夜把东西送还给宁夏同志。这件事虽小，在宁夏却引起不少议论，有的说：“那算什么礼？这点小东西都不收，了不起。”有的说：“现在的风气，有的不给还要呢，给少了还不行。贺彪这样的首长太少了。”

另一件事，按贺彪同志的级别，离休之后，满可以到一些名胜之处去参观游览，不少人劝他，有的说现在旅游成风，趁你腿脚还可以，应该出去走走。有的劝他去黄山，有的劝他去九寨沟。贺彪说：“中国好地方很多，我反复想过，我一出去，又是秘书、医生、警卫员等等，这么一大帮人得花国家多少钱哪，想来想去，还是不去。”确实如此，贺彪同志离休20多年，一次也不曾去旅游过。现在流传着一首民谣，“毛主席的兵两袖清风”，贺彪，可真成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老兵。

贺彪同志没有上过什么学，可是他十分刻苦，自学成才，从最近刊出的他的65首词可以说是知识渊博，含义深邃，可以窥见他对战友对家庭的隐隐深情，对敌人“烈火焚群魔”的坚强意志，对领袖“承遗志，忠魂慰，看百世流芳，万邦敬佩”的崇敬。在疯狂的年代，他被诬陷，迫害，他和“林彪”“四人帮”针锋相对，始终不低头。贺彪同志一生经历多少磨难，对邪风惨雾，对敌寇横行，他坚信，“血债一齐追讨”。

我对贺彪同志十分崇敬，用什么来表达我的心情，打个比方，现在社会上有各种“星”，有歌星、影星、球星、笑星等等，不一而足，我认为贺彪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银河系里的一颗明亮的星，他在中国医学界，是一颗永不陨落的“星”。

(魏风：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政委)

2001年6月20日

我们敬爱的贺彪同志

李 凌

贺彪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解放军中的医务领导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辛勤、勇敢地为解放军及老百姓担任艰巨的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建国后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他医艺精通，为人忠诚、热情，对中国革命忠心耿耿，一生为革命的事业，深怀大志，即使在最艰苦的情况下，总是信心百倍，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我和贺彪同志一家，是于十年动乱时期（1973年，周总理调他回来）在患难中相识相交的。我的儿子李辛、媳妇刘苏力和贺彪同志的儿子贺平是在哈尔滨军事学院的同学，苏力和贺平还同班，在十年动乱中大家都因家庭受到排挤的关系不能再念书，也没有工作，有时在家闲散，他们经常在贺家相叙，贺彪同志及陈凯同志对他们非常关心，也很亲密，我也常常到贺家，因为贺老夫妇非常仁慈的教导和关心他们，大家就把贺老叫贺伯伯，把陈凯叫陈阿姨，我们跟孩子们一样叫贺伯伯，大家亲密无间，有点像一家人。

1974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日本首相曾来中国访问，邓老接待过他，他就将日本作曲家选录的四首田中首相喜听的乐曲赠给邓老，毛毛把这录音带转录了一盘送给贺伯伯，他请我和欧阳山尊等同志去听，我们都转录了一盒让爱好音乐的人欣赏。因为日本的作曲家，流派也有好几派，有不少作曲家专门介绍西方近代派的作曲法专长新作，但有一派可能是“新的国民乐派”，却

采用西方作曲技法专展日本传统的乐曲，其中有一首“箏”协奏曲，表演非常优美，写得很有特色的，技巧也比较成功，我知道另有一些音乐家，是邦乐派，虽然也重视日本传统音乐、戏曲，但主张丝毫不动，如琵琶，仍用象骨片演奏，尺八（留子）也毫不改进，他们也不断培养新人，说是把它保存下来，作为“活化石”留给后人欣赏。

而日本作曲家图依久磨先生大致属于发展“古箏”这一新派。我因为对这种革新做法比较热爱，就转录下来，让搞音乐的朋友欣赏、学习，也希望更多的同志都像他们这样来发展中国的新的音乐艺术。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我也调回中央乐团工作了，不幸患了胃病，吃不下饭，而且常想吐，贺伯伯知道了，他说：“恐怕不是一般的胃病，最好去医院请专家检查检查”。他主张我不要拖延，立刻介绍我到友谊医院检查，当他知道我切片检查后确定是胃癌时，立刻就代办手续把我送到解放军301医院，指定全国最著名的医师陆维善专家为我做了两次大手术，第一次是把胃割去五分之四，切除一切和脏腑有关的淋巴腺，以免转移。还送我到大连解放军八一医院疗养。过了三个月，又把颈上的小瘤开刀。让我到小汤山医院疗养，他才放心。我对他这位热心朋友的操劳、关切，是永世也不会忘记的。

1980年，我恢复工作，也开始练习写写音乐述评，我看到有人为了为自己卖弄毒素，有意把《梅花三弄》加枝添叶。我知道前人有过记载这首歌的产生和演奏的详情，但这些古诗资料，连《辞源》都在十年动乱中失散了。我知道贺伯伯对古文学很有根底，就向他提出我想找关于《梅花三弄》的记录，他很热心地为我从两部旧书中找到两份论述，我曾把这些材料写了一篇评论，刊了出来。

不久，我搬到城东的团结湖，贺伯伯也调任解放军后勤部的副部长，工作繁重，我也兼了几个工作，大家来往少了一些，但我一年中总是想法去拜望他。

1991年，我和姐娜访问美国半年，回来后我的爱人陈雪枫因心脏病常住医院。到了年底，我也因工作过劳犯了脑血栓右肢瘫痪症，同住在复兴医院。当我能走动的时候，还去看看她，但到年底，她病发，我在1992年1月也住进朝阳医院。不幸雪枫一月七日去世，而我毫不知情，我看儿子李辛，这两天都不到妈妈那里去，我怀疑了，他也不说，直到十日，他和三妹方才来告诉我，怕我受影响，现决定十三日由中央乐团给妈妈举办告别会，十三日那天，孩子用车扶着我去向雪枫告别，这是无限悲痛的。

但在我到场时，却发现贺伯伯及陈凯阿姨也来向雪枫告别。我见到这情形，心里特别感激，贺老是那样关心朋友，关心他的后辈，使我们对他特别尊敬。

1996年以后，贺伯伯身体不好了，手部痉挛，走路也不方便了。李辛、小咪从国外回来时，我们总是一同去拜访他，但他是一天天病更重了，而他还是把他写的一部分诗歌，编了一部《贺彪词选》，送了一本给我，还特别于1998年8月8日签名送了一本给汪里汶。

从贺伯伯的《词选》中，我深深感到他对革命、对事业的忠心，对同志、对战友的关怀，对子女的关爱，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在1940年写的《浩浩黄河》就深信党的革命路线的成功：“有红旗指引，人民奋起。荷锐持锋争日月，仆前继后鬼神泣，只齐心，烈火焚群魔，孰能敌”。

他对战友无限关心，他写过许多首怀念战友的诗词，情深意

重。

在十年动乱中，他一直被监禁，被批斗，他有好几首诗词，写了“血口交喷，辱沾忠诚革命人”。在“军营斗批凶”一首中，形象地写出那些恶魔折磨革命干部的丑相：“军营斗批凶，阴谋许用刑，剪背学飞燕，脱臼折腰肱。任散凌。周残来酷，恶极终报应”。他也指出这些丑类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他意志坚定，毫不屈服：“守住殷红心一颗，长征草地磨难多。腿疼腰酸等闲视，淬砺千番还故我”。的确像1974年教育我们那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难倒，至多是再上山，打游击就是了”。

他对战友前辈如贺龙元帅、彭德怀同志得到平反，非常高兴，而对林彪的爆死沙荒是爱憎分明，“机毁人亡，尸曝沙荒，最最好名臭远扬”。贺伯伯对周总理的去世深表悲痛。他在1997年2月写的《哭小平同志》：“心怀济世奠奇功，只手蓝图绘足。浩浩滔滔，狂澜力挽，英雄无觅处”。殊勋铭刻，华夏昭昭史铸。的确道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李凌：中央乐团原书记)

2001年6月14日

心中永远不去的身影

——悼念贺彪叔叔

贺捷生

我党我军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我所尊敬的长者贺彪叔叔离开我们快三年了。

三年的时光如梭。一个为人所尊敬的人离去，我想，从我们面前消失的，只是一个有形的身影，我们从此不会再见到他夜半挑灯伏案；我们从此也不会在基层、在工厂、农村、机关、部队见到他风尘仆仆的身影。有形的一切会随着一个人的离去而消失。而在我们心中，却从此有了个无形的、永远难以消失的影子——他的音容笑貌；他高大而清瘦的体态；他对我党我军和共和国卫生事业的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他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对待党的事业的执著，还有他不苟言笑然而内心却充满激情、柔情、感情的神态……

我与贺彪叔叔见面并不多。我们同姓，却并非亲属。贺彪叔叔是湖北人，我的故乡在湖南桑植。但相隔遥远的他和我，以及一个长者和晚辈之间，却因为着一条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把我们从此联结在一起了。可以说，从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沐浴了这位长者慈爱体贴且无私无畏的关爱。我的母亲蹇先仁就经常告诉我，没有贺彪叔叔就可能没有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今天一位共和国的女将军！

贺彪叔叔离开我们这三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着，要为我所敬仰尊敬的长者贺彪叔叔写点什么，记述我的思念情怀。每到心思

闪动的一刻，我就想起母亲的话：贺彪叔叔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出生在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那一年的十一月十九日，我的父亲贺龙以及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集结，开始了长征。我当时尚不满二十天，还在母亲的襁褓中。在这之前，为了我的安全和部队的行动，曾计划将我寄养在一户百姓家里。最后，还是父亲母亲和那些时刻关心我的长辈们，才使我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为了长征队伍中的一员。

长征开始，组织上为了照顾母亲，一直让我们随军团卫生部行动。当时的贺彪叔叔担任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叔叔见母亲身体弱，就把我们母女编入伤病员队，还给母亲准备了一副担架。我们这支伤病员队伍行动缓慢，别的部队需要一天到达的路程，我们就要走一天一夜。队伍踏上征途的第一天，我们渡澧水，仅有几只小船不停的来回摆渡，把我们一船一船摆渡到澧水对岸。贺彪叔叔身先士卒，亲自撑篙。当时，天上有敌军飞机经常飞临轰炸骚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支队伍行动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这支队伍却因为它的理想信念和官兵一致的作风，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贺彪叔叔送过了一批一批伤员，最后，清点人员，发现没有了我们母女，贺彪叔叔当下就急了，马上让人四处寻找。当确定我们母女还在河对岸时，贺彪叔叔不顾天上飞机轰炸，不顾炸弹在他身边炸起冲天的水花，不顾飞机上的机枪不停地对他扫射，他亲自驾着小船过河寻找我们母女。当贺彪叔叔把我们母女安全送到河对岸时，他脸上才露出笑容，而全体指战员也都对贺彪叔叔的无畏表示了最真挚的敬意。母亲带着我长征，一路上都得到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那时还未满月的我，经常哭闹。这一点事，也引起了贺彪叔叔的关注。为什么总是哭闹呢？他仔细一检查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说：“我们已经

几天没有休息，小捷生也几天没换尿布了。再加上好久没吃奶，难怪孩子哭。刚出生二十来天的小姑娘，满身是屎尿臭，叔叔要不是医务工作者，早被这股臭气熏跑了。”贺彪叔叔的话，引起了红军指战员们一片笑声。

许多艰难卓绝令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征途，就是在贺彪叔叔这样的前辈们坚定的信念和乐观洒脱的作风中走了过去。

我们这支以红军伤病员为主的队伍，在贺彪叔叔的带领下，一路上得到他的关怀照顾。大家互相鼓励，不顾艰险，渡过了澧水。到了宿营地，母亲浑身的骨节就跟散了架一样，却还要给我洗澡喂奶，其艰难不言而喻。

这还不是最让人担心的。更有甚者，是我们这支队伍，大都是伤病员和一些家属，行动缓慢，每天就是疲于奔命一般追赶着大部队。在当时，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军队围追堵截，天上有飞机扫射轰炸，地上有追兵。偶有不慎被敌军追上，我们这支抗击敌军能力几乎等于零的部队，后果可以想见。因此，如何照顾我的安全，是母亲和贺彪叔叔当时最关心的。贺彪叔叔当时担任着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一方面要照顾走在大部队后面的收容队，一方面还要抓前线大部队的卫生保障和伤病员救治工作，他不停地在前方后方之间来回奔波。为了我们母女的安全，作为这支部队指挥员的贺彪叔叔，却一直在考虑送我们母女随大部队行动，这样，起码我的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

在父亲母亲，也包括贺彪叔叔的关照下，伤病员队伍在渡过澧水之后不几天，母亲背着我去追赶大部队。离开这支伤病员队伍的那天早上，母亲还清楚地记得，贺彪叔叔对她说：“我派副担架跟着你去吧……”

我一直在想。母亲为什么经常唠叨般地叙述着这些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往事？且叙述中总有贺彪叔叔的名字。母亲有几句

话给了我答案。她说起这些往事，总不忘强调，在那么艰难的让人难以想象的长征中，母亲背着不满月的我，跟随着一支没有抗击敌人能力，也缺乏更多更强更广泛生存和求生手段的伤病员队伍，如果不是落入敌人之手，也很可能就是饿死冻死病死……

为了我的生命，虽说我的母亲，还有我尊敬的贺彪叔叔并不曾有过什么枪林弹雨或勇闯敌阵之类的惊人壮举。但是，在那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环境之下的细致入微的关心体贴照顾，或许伴着一点点艰辛弄来的营养品好吃的，一盆洗澡的热水，一块尿布，已经深深的印在了我心里。在那无法比拟险恶环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大概，伴着母亲的乳汁和贺彪叔叔爽朗的笑声，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

一个人的影子留了下来，在心里、在血液里，便永远也不会消失。

(贺捷生：贺龙元帅长女、军科院军事百科部原部长)

2001年8月于京西寓所

我的父亲和贺彪伯伯的生死之交

王允刚

1996年至2000年四年多的时间，我母亲黄克、父亲王尚荣相继逝去，贺彪伯伯也在1999年3月31日凌晨在家中病故。

自1937年8月25日我父亲任120师358旅下辖的715团团团长，贺彪伯伯时任第358旅卫生部长兼该团卫生队长。从那时至两位老人先后逝世，他们相交、相知、相助六十年。

2000年8月30日，贺伯伯的夫人陈凯阿姨八十寿诞，两个孩子一早就聚在她的身边，早晨金灿灿的阳光映在她满头的银发上，她面前的桌上铺满文稿，有贺伯伯病中撰写并已出版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和正在最后润色、修改的贺伯伯遗作《贺彪回忆录》，还有陈凯阿姨满怀对贺伯伯深厚感情撰写的《记忆中的岁月》。她手握舍不得放下的笔，侧过身来，缓缓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和贺伯伯都走了，今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此时此刻我深情地望着慈祥的陈凯阿姨，不，应该是我们亲近的陈妈妈，思绪悠然，想到了我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两位老人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生死之交，以及我们经历的两个家庭相濡以沫的亲情……

(一)

记得1952年爸爸刚从青海调到北京，我们家住在西城武衣库胡同，家里有个大澡盆，每周六有热水，父母和孩子们轮流洗

澡。有一次，我们洗完，围在父亲身边，看见他腿上，胸上都有很深的疤痕，这时母亲拿着毛巾走过来，说：你们的爸爸负过4次重伤，大腿、胸部都被子弹打穿了，腹部也受过伤，颈部、背部和头顶是炮弹皮打的，至今头顶有两块弹片都无法取出，我们上去摸了一下，硬硬的。父亲说，能活过来全靠你贺伯伯，特别是1938年二月在河庄战役中的胸部贯通伤，贺伯伯闻讯赶到现场为我紧急包扎、抢救，山西二月天，天寒地冻，我又得了感冒，一咳嗽，就大口吐血，病情十分严重。又是你贺伯伯几天几夜守在我的身边，当时没有药，贺伯伯想尽办法找到一个偏方：用南瓜瓢子糊在伤口上，一天吐出一钵子血，我昏迷不醒屎尿全靠他清理。因为敌人不断进攻，部队常常要打仗，只好用担架抬着我不停的转移，常常是一两天吃不上饭，就这样，我在你贺伯伯的精心护理下硬是熬了过来。是你贺伯伯救了你们爸爸的命。

小时候，我们常到贺伯伯家玩，时常听贺伯伯讲那战争年代的故事：他常对我们说，你爸爸是个虎将，是个战将，也是福将。1934年4月，他19岁，当红三军的侦察科长。在湖南永顺县塔卧侦察时与敌遭遇，右腿被打穿了，离骨头就差几厘米。1935年11月，你父亲20岁，在5师15团当参谋长，冲锋时一颗子弹打到他的腹部，弹头一半打进肚皮，一半还血肉模糊露在外面，原来，是你们的奶奶在你爸爸出来参加革命时硬塞给他的两块光洋救了他。系在腰间的光洋都打穿了。小卫生员看见你父亲伤成这样吓得直哭，还是你们的父亲自己把子弹从肚子上拔了出来，你说他是不是福将？你爸爸个子大、目标大，打起仗又不要命，最危险的是1938年2月，他23岁，在715团当团长，在山西河庄左肺被打穿，吐血、咳血，都说不行了，那时我29岁，在358旅当卫生部长兼715团的卫生队长，几天几夜守着他，后来又抬着担架转移，没药、没粮食，只能在村里找些草药偏方，

仗着年轻、仗着革命人旺盛的生命活力，硬是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1948年10月5日，全国快要解放了，他在陕西荔北战役独一旅当旅长，指挥所被敌人发现，一顿排炮又把你爸爸打伤了，幸好那次他的战场经验丰富，看着弹着点越来越近，他大喊一声：“快隐蔽”！话音刚落，几颗重型炮弹在指挥所周围爆炸，他背部、颈部、头顶中了几枚弹片，电话员当场牺牲了，而你爸爸又是死里逃生。荔北战役激战10昼夜，光独一旅就歼敌2800人。看着你爸爸裹着绷带作战后总结报告的兴奋样，我们也分享着胜利的喜悦。那次，可把你妈吓坏了。拉着你爸爸左看右看的，老怕我们没把弹片取干净。我插嘴说，那时我8岁，记得妈妈把爸爸破了几个洞自己捻线织的毛衣拆了，给我织了个毛背心，我没福气，长了一身虱子，卵虫藏在毛衣里怎么也杀不尽，只好又拆了给妹妹织了毛袜子。

我曾认真读过后来出版的贺伯伯回忆录，在那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他救治了数不清的革命战士：贺炳炎上将的右臂是他用板锯作的截肢手术，拯救杨秀山、抢救傅传作、郭鹏、救治甘泗淇……这些开国的将军之所以能驰骋疆场、所向披靡几十年，全靠贺彪伯伯这些军中的守护神们。

(二)

贺伯伯是1954年调到国家卫生部当副部长的。那时国家百废待兴，虽然两家的父母们都忙的团团转，但心里都彼此牵挂着。1955年爸爸授衔了，当时政策规定要求部队女同志都转业。母亲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军，一位在战争年代经历战火十几年的老兵怎么也想不通，积郁成疾，医生诊断原决定送她住院治疗，父亲心里不安，习惯地来到老战友贺伯伯家去征求意见

见，两位老人商量认为，像母亲这样的病，要在亲人身边恢复可能更有利，于是决定在家边治疗边开导，那些日子，贺伯伯和陈妈妈三、四天就到我们家来一趟陪着母亲说话，看着母亲吃药。在父亲和贺伯伯一家人的关怀、照顾下，母亲终于想通了。病渐渐地好了。母亲生前经常讲，还是你贺伯伯了解我，只有亲人才能治心病。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父亲当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工作没日没夜，回到家也是来去匆匆的，有一天晚饭，父亲经常爱吃的老三样：葱花肉丝面、苦瓜辣椒豆豉炒小干鱼，外加一小碟茭头刚刚端上来。贺伯伯就推门进来，妈妈赶紧招呼，贺伯伯说，我吃过了，过来看看。一直站着看我们吃完饭扬扬手就匆匆走了。一次，两次……次数多了，我十分纳闷地问父亲：怎么贺伯伯来了不讲几句话，就站在那儿看我们吃饭？父亲则深情地说，生死之交，心照不宣呗！慢慢地我理解了，贺伯伯知道父亲那时压力大，担子重，担心父亲身体不好，常常过来看着父亲能吃好饭，知道身体没大碍，这才放心地离去。

几十年过去了，我经常想起贺伯伯站在桌边看我父亲吃饭的镜头，常常为两位老人间的深情而感动，常常因“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那种关爱而感激和怀念贺伯伯。

(三)

1966年，我父亲被诬陷参与“贺龙兵变”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押了八年；贺伯伯同年8月从蹲点的麻城被电召回京后，以“贺龙黑干将”的罪名批斗、软禁，然后下放也达八年之久。在这人妖颠倒的日子里，两位老人磨难艰辛的遭遇均记载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贺伯伯是1972年从江西五七干校回京，我母亲是

1973年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父亲那时还被关着音信全无。贺伯伯回京见到其他老战友，写了首诗“江神子”表达劫后余生老战友重逢的心情：“南来飞雁北归鸿，笑相逢，惨愁容。黛鬓朱颜，重见几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他和母亲及先出来的战友们开始联手设法营救父亲。文革中母亲眼睛黄斑出血不给治，几乎失明。余秋里、康世恩叔叔不怕牵连，顶着压力把我从东北煤矿调到燃化部帮妈妈跑腿，到中南海信访处给总理送信，在黎化南、顿星云叔叔家汇集各种消息，在逆境中互相鼓劲，互相帮助。从1971年9月林彪摔死，到1974年上半年，父亲的老战友都陆续出来了，可父亲还是被关着。贺伯伯也十分着急和挂念，常跟我母亲念叨，“老王被关了8年，现在变成啥样子了？”听到贺伯伯多次地关心父亲的状况，我们两家几个孩子想利用探监放风时间给父亲照张像送给贺伯伯看看，好让他了解父亲的状况。那天，又到家属探监的日子，贺伯伯的孩子贺平冒充我的弟弟和我一起来到关押父亲的地方，等到放风时间我按预先策划的办法先去陪父亲出来，我给他讲，贺伯伯十分想你，很为你担心，按规定他又不能来看你，今天贺平他们在外面埋伏着想给你偷着照张像，爸爸心领神会拄着拐杖，走的特别精神，贺平他们拍了一张，怕不保险又给我打手势，我乘监视人不注意，又陪着父亲走了一趟……照片洗出来，我兴冲冲地给贺伯伯送去，贺伯伯用微微颤抖的手，长久地握着照片仔细地看，嘴里不停地说：老了……瘦了。我按父亲的意思说：父亲让我转告您，他身体还好，叫您放心。您看，父亲的精神不错，是吧。我的话音刚落，贺伯伯就抬起头来，生气地对我说：“我还不老，眼睛还不花，我看得清楚，你父亲拄着拐杖呢！你们不用骗我，我和你父亲几十年了，我了解他。”说完，又俯下头，十分深情

地、久久地端详着手中的照片……。

后来，贺伯伯听说父亲在狱中尿血，更着急了，他和其他叔叔出主意，让我去找当时在位的彭绍辉副总参谋长，这位独臂将军，战功卓著，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复职早。我到他家时，他正和警卫员从院里化粪池汲粪浇菜。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屋里。大声说：“你父亲的问题总参都上报了，他没事了，怎么到现在还不放人。我明天就去看他！”第二天，我早早赶到看守点，老远就听到彭伯伯厉声对守卫说：“你问我是谁，我是总参的彭副总长，王尚荣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我了解他是受陷害的，总参党委都上报中央了，你们怎么还关着”。几个守卫手忙脚乱地挡在门口，一个急着在走廊打电话，结结巴巴地报告说：“有个副总参谋长要看 13 号……”后来父亲“解放”了，我陪着父亲去看彭伯伯，彭伯伯对父亲说：那时四人帮还没垮，中央二办还在，我看你回去挨了批评，说我无组织无纪律，真是乱弹琴！他还愤愤地说：现在老讲把我们这些老同志解放了，什么解放了?! 我们出生入死的打了几十年仗，解放了全中国，怎么自己还没解放？瞎胡闹！

(四)

文革这几年，抄家、搬家不计其数，贺伯伯回忆录说他们搬了七次家。记得最深的是他们往和平里搬，我们家、谭友林叔叔家孩子都出动了，贺伯伯家书多，虽然弟妹都插过队经过锻炼，又是搬家老手，但那些死沉死沉的宝贝也把大家累得够呛，贺伯伯看着这群孩子，笑眯了眼说，“上阵还靠子弟兵哟！今天请你们吃饭。”几家孩子坐着搬家大卡车就到王府井了，我记得好像在翠花楼，一个我们想开洋荤都没敢想去的地方。1973 年什么

都要票证，我们尽捡有肉的点，小弟好久没吃到鸡，点了辣子鸡丁，服务员说没了，小弟不死心，说改碗西红柿鸡蛋汤，服务员看来肚里有火气，说：“鸡都没了，哪来的蛋？”我们愣了半响，才哈哈大笑起来……。小弟王允泉文革开始才十一岁，一直陪着妈妈在河南干校，放过羊、养过马、种过树，……还要拿两个水桶去挑水。我们家7个孩子，分别在东北、河北、河南、陕西、山西一人一个地方。应付抄家、多次搬家、照顾家中近乎失明的老母亲全靠他，可他却是个患先天性“法乐氏四联症”的病孩子，得这种病，必须及早进行手术才有治愈的可能。原打算稍大些作手术，赶上“文革”给耽误了。1975年小弟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当时贺伯伯还没恢复工作，知道小弟的情况后，就忙前忙后的找到阜外医院专家郭加强主任，深情地对他说：这个孩子，在文革中，为蒙难的这个老干部家是立过大功劳的，他父亲被迫害关押了八年，直到去年底才刚刚被解放出来，我们这些他父亲的老战友一定要尽全力治好他。6月26日，我们一大早到医院，看见郭主任已在树荫下踱步，他这阜外心脏第一刀受老部长之托，也感到担子很重。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贺伯伯就像战场抢救父亲一样，八个小时一直盯在手术一线，保证了手术成功！现在，26年过去，小弟活得和正常人一样，每当我这个大哥，看到历经磨难的小弟能健康地生活，就常常想起二十几年前手术室前的一幕，脑海中清晰的浮现出在手术室门前焦急踱步的贺伯伯的身影。贺伯伯是我们家两代人的救命恩人。

(五)

1974年7月底，关了八年的父亲终于出狱了。同年11月28日出任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常委兼总参作战部党委书记。1978

年2月贺伯伯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两个老战友又为重整河山冲锋陷阵了。父亲出狱不到四个月就挑起了重担。贺伯伯不无担心，父亲无奈地对他说：“上任前，叶帅找我谈话说，你当过十四年总参作战部长，情况你最熟。八一招待会见到周总理，总理又关切地说，尚荣同志你受苦了，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说，中央领导如此信任、理解我们，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说什么呢？”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爸爸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自始至终参加了组织指挥，拟制作战方针，下达作战命令、部队调动、临战训练……3月16日，自卫反击结束，爸爸在人大会堂作了总结报告。而贺伯伯在自卫反击作战中正好是主管总后作战值班室工作，作战结束也作了全军后勤部门卫生勤务保障工作的总结报告。国有危难，几十年在一个战壕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又不约而同并肩为国效力。

两位老人枪林弹雨，历经磨难的生死之交，为我们两家子女的深厚情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位前辈忠于革命、忠于国家的高风亮节，直接影响着我们两家的后代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都会永远牢记和继承他们的高贵品格，都会永远做让两位老人放心的接班人。

(王允刚：总参原副总长王尚荣长子 海军少将 海军装备技术部原副部长)

贺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纪念贺彪同志逝世三周年

钟南辉 李树枝 廖诗权

贺彪同志离开我们三年了。当年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他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坚忍不拔，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对同志热情关怀，耐心教育，爱护干部情同手足使我们终身难忘。

贺彪同志是我党我军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杰出的领导人。

贺彪同志在艰苦卓绝的年代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方面军组建前是二、六军团，全军也只是一万多人，武器装备都非常低劣，物质条件更差，面临敌人几万、几十万大军围剿。贺龙司令员，任弼时政委指挥全军声东击西，转战南北，北出鄂西，东进湘东，战忠堡，板栗园阻击，配合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进行了无数次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大举围剿，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贺龙司令员的指挥下，身为卫生部长的贺彪同志亲临反围剿战场，身先士卒，带头输血，抢救伤员。为适应频繁战斗的需要，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组织医疗队，随军参战，对伤员在战地作抢救治疗。经他亲自抢救治疗的红军战士数以千计。全国闻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在部队行进到湖南瓦屋塘战斗中身负重伤。贺彪同志立即组织急救，生死攸关必须截肢抢救，挽救了他的生命。他跟随贺龙总指挥长征走过了艰难曲折的

历程，也经历了千艰万险，与红色指战员一道，杀退了千万阻敌，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金沙江，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地，其艰苦英勇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斗力量。贺彪同志在长征途中，还把马让给伤病员和落伍掉队的人员骑，自己步行，跑前跑后，关心照顾伤病和落伍掉队人员，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和阶级友爱，把方便让给人家，困难留给自己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

贺彪同志在红军时代，曾任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抗日战争中，长期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长，西北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他一贯重视培养医务技术人才，尊重知识，在他的培养和领导下，创办了晋绥军区卫生学校，继而在西安一片荒凉废墟的土地上，创办了第四军医大学，积极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入学；热情关心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急需的科学技术力量，他们已经成为我党我军的技术骨干。贺彪同志是一位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当年的技术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祖国各地，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出身，其中有些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有的是留学归来的专家教授，有几分高傲，贺彪同志以他高度的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大家信赖他，信服他，心情愉快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在他领导下努力工作，奋勇前进。

整风运动。党中央在领导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同时，领导全党，主要在领导机关和干部中开展了整风学习。我们机关以贺彪为中心组长，动员所属领导干部集中整风学习，以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为主要学习内容，精读文件精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自觉的检查反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小结。通过整风学习使我们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团结，政治更加成熟，党性更加纯洁，作风更扎实，使我们更加经得住资产阶级的思想考验，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整风审干历史过程中，由于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口号下，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党中央及时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我们机关在贺彪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实事求是的给被整错的同志及时平反，摘掉错误帽子。

大生产运动。我们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贺彪同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亲自动手，克服困难，开荒生产，养猪种菜，上山打柴烧炭，生产自己必需的农副产品，还办起了油房、粉坊、豆腐等作坊，并组织数十匹骡马运输队，还置办了商店和骡马大店。他亲自设计制做脚踏手摇龙骨车引水灌田，解决种菜缺水问题，做到了瓜菜满地，猪满圈，蔬菜自给有余，机关办公经费日常开支基本自给，还改善了生活，战胜了困难，保证了供应。在贺彪同志的率领下，每到严寒冰冻季节动员组织指战员，用简易的冰船，到黄河岸边，推拉粮煤储备过冬，减轻农民负担，保证伤病员安全过冬。通过生产运动克服了经济和物质上面临的严重困难，达到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创造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物质基础。贺彪同志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贺彪同志长期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一心扑在伤病员救护工作上。如某隶属单位适逢传统中秋佳节，给首长送的月饼和水果等礼品，他原原本本的转送给伤病员并亲自到医院看病人，使伤残病人深受感动，热泪盈眶，也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一九四五年我和贺彪同志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团结大

会，胜利大会，也是继往开来，迎接八年抗战胜利的大会，当然应该是精神饱满，着装整洁，满怀胜利激情前往。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也没有好衣服，我们的部长慈母般的关怀我，将他的一身新军装亲手给我穿上，并嘱咐我大会期间好好聆听中央首长的报告，以便回来传达贯彻大会精神。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使我们深感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无间，肝胆相照，和睦相处。在他领导下，有一种慈如母、严如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你可以无拘无束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你分析问题，正确的稍有可取之处，他加勉鼓励，有错误他耐心地开导，使你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我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贺彪同志关心爱护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毫不妥协，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对党忠贞，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十年浩劫，人民遭到很大不幸，我们也是遭受残酷迫害者之一，在九死一生的危难中，致伤致残。贺彪同志身处逆境从江西山沟农场返京治病，途经南京，还特地来看望我们，因我当时被隔离审查未能见面。一九七二年当他得知我获释，又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安慰信，读后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更加充满信心，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解放大西北。在彭德怀，贺龙司令员，习仲勋政委的领导下，贺彪同志率领野战医院亲临前线医治伤员，在战斗非常紧张，自然环境非常艰苦，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伤病员每天只有几毛钱伙食，平时很少吃顿肉。但战士却毫无怨言，战斗意志非常旺盛，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其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关爱外，贺彪同志和党委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政治平等，

工作团结，同甘共苦，互帮互爱，情同手足，风雨同舟，生死与共，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军政军民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贺彪同志无论走到哪里，对地方政府都非常尊重，在黄龙战役战斗中，亲自登门与当地政府交涉，动员民工转移伤员和物资供应。一九四九年七月我第一野战军和十八、十九两兵团，向甘肃、宁夏等省进军，歼灭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部，先后解放兰州、西宁、银川等城市。此战役战斗中，他亲赴前线救治伤员，为取得战斗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贺彪同志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拥护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关心着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坚持看书读报，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人老精神不老，人休思想不休，当他八十高龄时撰写二十四万字光荣斗争史《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表现出老一辈革命者赤诚之心和高风亮节，受到了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尊敬和爱戴。

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贺彪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枪林弹雨，身经百战，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贺彪同志虽已离开了我们，他的历史功绩和崇高道德风范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钟南辉：南京铁道医学院原党委书记)

(李树枝：南京军区总医院原院长)

(廖诗权：铁道部原副部长)

2001年5月1日

难忘贺彪部长对战友的深情

涂端清

1932年7月敌人对洪湖苏区第四次围剿，我红三军离开苏区转移到湘鄂边区后到湘鄂川黔地区，这里是几省交界地区，敌人防御比较薄弱，在此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寻机消灭敌人。

1934年10月中旬，在木黄镇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在南腰界开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任弼时同志宣读了中央贺电，又宣布中央电令恢复红三军为红二军团番号，各师进行了整编，我在红六师十八团给团长高利国当勤务员，两军团在贺老总、任弼时首长领导下，紧密团结，统一指挥，战斗力更强了，士气更高了，部队东进时天天行军，不怕疲劳，指战员一心想着要打仗，消灭敌人，先攻占了永顺县城，后又在张家寨打了大胜仗，歼灭了大批敌人，俘敌两千多，缴获了大批武器和胜利品，这一胜利对提高我军战斗力有深远影响。

我军主力南下，部队在寒风阵阵侵入肌肤时，又踏在泥泞道路上急行军。拂晓前对汉浯溪河的敌人猛烈攻击，打垮了敌人并猛追敌人，包围了常德。我十八团和五十一团攻占了桃源县城，我们红十八团住桃源城内进行宣传，扩红，筹集资财，这时我不想给团长当勤务员，要求团长让我学看护，团长开始不同意，后来看我态度挺坚决也就同意了，但他认为我年纪小（十三岁）在前方跑不动，要我到后方。我说团部的同志们把我像小弟弟一样关心，舍不得离开团部，他也同意了，于是我到团卫生队学看护，我从此成为卫生战线上的一员了。我们撤出桃源不久在一次

战斗中卫生队长支宝德派我带民夫抬两副担架送两名危重伤员到后面救护所。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山路羊肠小道很不好走，在路上常遇到敌人死尸，好不容易搞半夜后才送到救护所。救护所设在几个大院里，将伤员抬到堂屋里放下后不久，来了一位身体魁梧的年轻人检查伤情，我以为是个医生，有人叫他贺部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部长，我看他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非常和蔼的说，小鬼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是红六师十八团的。他说十八团打仗很勇敢，打的好。我说我们将敌人追了好远，他又问我多大年纪？哪里人？累不累？我说十三岁，湖北沔阳人。贺部长听说我是洪湖苏区的，很高兴，说了许多关心我的话，使我感到亲切和感动。我说部长这两个伤员交给你了，我走了。他说，小鬼到哪里去？我说回前方部队去。他说天这么黑，路长不好走，不安全，你不能去，就在这里找个地方休息，待天亮走。我说前面正在打仗，要回去。我已走了好远，还听他说要多加小心。走了一会儿心里有些紧张，怕碰到敌人散兵，又怕路上踏着敌人死尸，在路上很注意听周围动静，有时跑的快些，有时走的慢些，偶尔遇上后送伤员的人员，我回到部队天快亮了，向队长汇报说已将伤员交给贺部长了。他表扬我说：“辛苦了，找个地方休息”。

1937年9月初我军东渡黄河到达山西省晋西北地区抗日前线，我716团又深入敌后冀中平原地区，武装人民打击敌人，在齐会打了大胜仗，歼灭了部分日寇。39年底我们离开冀中区，40年初返回晋西北，该地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苦，日寇进行“三光”政策，使军民生活更加困难，部队缺粮少衣，生活非常艰苦，但军民抗日信心非常高涨，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消灭了大量敌人。

1942年夏，组织先送我到晋绥军区卫生学校高级班学习。

当时，高级班是培养卫生队长以上领导干部的，我为了多学习一年，要求到军区学习，但组织未同意，从兴县经几天行程，过黄河到盘塘村军区卫生部报到，幸好与我谈话的是医务主任，我认识他，要求他让我到军区学习，他仍要我到高级班学习。他说高级班只学习一年就毕业时，生活待遇比较好，军区生活较艰苦，还要考试，我说长征那么艰苦都克服了，现在还怕什么艰苦，我愿意考试，我再三要求，后来他同意我到军区，介绍我到军区学习，到神府县贺家川卫生学校报到，经考试录取，将我编入军医三期学习，当时生活艰苦，吃的黑豆，七、八个人睡在老百姓的一条炕上，没有讲义，自己油印，设备非常简陋，没有写字桌子，用石头垒桌子写字，参加劳动生产解决生活困难，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

1943年秋贺总领导军区干部整风学习，卫生部卫校和医院编为四中队，到彩林村集中学习，这时使我遇到极高兴的一件事：一天早起后，在户外活动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看见贺总向我走来，我高兴的跑到贺总面前行了军礼，贺总的双手放在我的肩上，上下看了会说：“几年不见，你长成了这么大小伙子了，你今年二十二岁了。”我说，你还记得，问他身体好吗？他用右手拍着胸部说，身体好得很。又问我在干什么？在卫校学习，他说好啊，好好学习技术，还要学文化，学习政治，一心一意为伤病员服务！问我有什么困难告诉他，我说，学习能跟上，没有什么困难，这时有人请他回去有事，在临别时他再三说，有什么困难告诉他，我也再三要他保重身体！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我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在彩林村学习不久，四中队回贺家川继续深入学习，组织通知我，要我很快到卫生部报到。我到卫生部，贺部长说你来的正好，医院的医务干部都到整风队学习去了，现要你到医院当医

生，你马上到医院去，你独自负责一个内科，也有外科病人。贺部长既亲切又严肃的指示说，伤病员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怕牺牲流血，英勇杀敌，光荣的负了伤，有的因日以继夜劳累成疾，来我们这里治疗休养，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对他们要比亲人还要亲的照顾关心，从生活上好好照顾他们，想方设法积极治疗，使他们在这一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这是我们医务人员的神圣职责，关键问题一是我们要一心一意的为伤病员服务，贺总还交待说，你负责的科，有一病人叫马道清，患严重的肺结核，已躺在床上两年未下地，身体很弱，可是每天他要打八支吗啡，你要在一个月内设法给他戒掉。我说病人受不了不行，我想法尽快的给他戒掉。贺部长说好，那就看你的了，伤病员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要尽力解决，并说你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我，也可请示张汝光、祁开仁副部长。从这里可清楚的看出贺部长对伤病员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高度的重视，使我也受到一次深刻教育。

我第二天上午到医院报到，并进入病室正式工作。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药品器械极缺，我负责的病区有四十多病人，主要是内科，也有外科病人，从每天早上7：30正式查房，看不完，下午也要查房，全部靠物理诊断（问闻叩听等等）因此，看完一个病人很费时间，每天除去查房，还要参加对病人的治疗，而且一个礼拜参加几次手术，每个病人的病历写起来也费时间，因此每天工作很紧张也很累。好在自己年轻，当遇到疑难和重病就请示贺部长。我每次请示贺部长时，他总是说你先走我马上来，总是放下工作马上带我到病房，详细检查病情，当即给我作指示。我记得吕正操司令员的一位厨师，患疝气手术后阴囊肿胀的很厉害，贺部长看后亲自守护该病人很久，看到病情有好转才

离开。那时他是军区卫生部长，要负责全军区医疗救护、防疫卫生工作，他还要负责四中队的整风学习，在他日夜工作繁忙的情况下，还经常到各病区检查，看望重伤病员，很受重伤病员的敬重，看到贺部长到病房时伤员们非常高兴。

战争年代早已结束，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战士也已步入了迟暮之年，但贺部长对战友、对伤病员的真诚的关爱的深情却令我永远难忘。

(涂端清：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原副主任)

2001年9月28日

感人肺腑的纪念

林钧才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一口气读完《贺彪纪念文集》，贺彪部长的亲人、战友、伤病员、同事、部下，自元帅夫人到炊事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期感怀他老人家。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孟子曰：“仁者爱人，人恒爱之；有礼者敬人，人恒敬之”，这是对贺彪同志人品的最好写照。

战争时期我在华东部队，对贺彪同志偶有所闻。1960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有机会到卫生部参加会议，初次听到他批评卫生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大轰大嗡，不计成本的讲话，这在当时是属于否定“大跃进”的“右倾”错误言论。贺部长的实事求是，鞭辟入里，直言不讳的发言，不计个人得失的胆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0年我和董炳琨同志先后调到协和医院一起工作，周恩来总理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协和医院办好。”此时“大跃进”已进入后期，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科委制订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意见”，和国家教委的“高教六十条”。为贯彻“八字方针”，科研“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医学科学院组成调查研究组，指定我为业务组组长，以协和医院为重点，以医、教、研工作为主要内容进行调查研究。历时近一年，最后形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当前工作二十条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关于协和医院当前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

的十二条意见”，以此作为治理整顿协和医院工作的方案。

我把经过医学科学院审定的这个方案和落实工作的思路向崔义田副部长做了汇报，得到他的欣然赞许，并提醒我在实际工作中要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避免犯否定“大跃进”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大禁区，可我并没有领悟到这个提醒的重要性。

抓住调整时期这个大好时机，拨乱反正，正确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进行切实的治理整顿和建设性工作，使协和医院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焕发出协和医院传统的“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精神，医院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正如所料，一场新的政治运动降临了，协和医院成了首都十大社教（四清）运动试点单位之一。卫生部第一把手亲自率领百人社教工作队进院。首先召开党员动员大会，开宗明义地说：社教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协和医院存在的问题很多，其本质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讲到领导权，有个授权问题，有个资产阶级专家争夺青年的问题，都是根本问题。就是根据这个主题和目的，把工作人员分到各科室去“扎根串连”，搜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把我们几个领导干部与群众隔离开来进行“学习”，互相揭发、交待问题，过好所谓的“下楼”关。每次“学习”都有工作队领导参加监听。这样的“学习”进行了三十五次，到了实在无话可说的地步。一向在压力面前不卑不亢、耿直不阿的董炳琨同志憋不住了，他发问：“如果协和的方向错了，那么对全国卫生系统该怎么看？”这一问，被视为抵触情绪，触怒了工作队领导，首先就召开全院大会进行批判，打他的态度。

此间，工作队长召我谈话。口气严肃地问道：“听说你对我们的清查工作有怨气？”我回答：“是有怨气”。又问：“有什么怨气？”我说：“说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我想不通。我们四年来

的工作，都是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精神和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精神进行的，协和医院工作的‘十二条意见’也是经过卫生部批准的。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如果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卫生部有没有责任？”后面这句话惹恼了工作队队长，他蛮横地回复道：“你不能有怨气，现在就是要算你们的账！”那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官大一级压死人。

就在这个有理无处诉的当儿，有一天在医院西门平台上无意中遇到卫生部办公厅欧阳主任。他悄声对我说：“听说你们的日子不好过，贺彪部长说他了解你们，不用怕。要实事求是，不要给自己乱扣帽子，要经得起考验。”患难之中见人心，在困惑中，“了解”两个字给我带来多么大的鼓舞和力量。它曾伴着贺部长的叮嘱支持着我渡过更加严峻的“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的浩劫。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贺彪同志在漫长的战争年月里，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救起多不胜数的负伤指战员，在上有机狂轰滥炸，下有追兵的险境中他以超人的毅力和机智不丢掉一个伤员。“贺彪”这两个字曾经是鼓舞前线指战员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在和平时期，他以战场上救死扶伤的精神关心农民的疾苦，在艰难的岁月里，身先士卒亲自率队到最贫困的农村蹲点。我读过张自宽同志的赠诗，跟随贺彪部长到湖北麻城蹲点深入山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夜泊安家畈》：“夜泊安家畈，农家一库房。稻草铺其上，门板权作床。两人共一榻，徐徐入梦乡。连日多辛苦，虽苦乐融融。”两人同榻而眠，虽苦犹乐。另一首《借宿林店中学》：“借宿林店中学堂，搅扰师生心惶惶。又闻明日酒宴待，佛晓不辞学跳墙。”为逃避公社领导的款待，趁拂晓校门未开便越墙而去，不辞而别。这样富有诗意的真实佳话，读来沁人心脾。贺部长含辛茹苦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寻求“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

到农村”之策，只图为农民造福，不求回报的故事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贺彪同志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是通过在战斗的实践中刻苦自学成才的。他在战场上目睹过许多本应救活的伤员，由于技术和条件不济而不能挽救，他深感不安。出于对伤病员的疼爱，他深知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在救死扶伤中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十分爱惜人才，尊重人才，大胆地使用人才，悉心地培育人才。他善于体察知识分子的心声，倾听他们的意见，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顶住很大的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了许多卫生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他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崇敬。

贺彪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雄才，他既有渊博的医学知识，又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表现出学者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位难得的，很有才干的卫生工作领导人。

贺彪同志具有一种久经磨炼的内在力量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具有坚强的意志，正直的人品，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是一位有棱有角的人，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他不是一个人看“风头”，“看脸色”行事的领导人。对人对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行事。依靠这种优秀的品格和魄力，他创造出出色的工作局面，培养出一代人。他是名副其实的我国卫生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大德必得其寿，贺彪同志在睡梦中安然仙逝，他的功德千秋永垂！

(林钧才：北京医院原院长兼党委书记)

2001年12月11日

哀 思

严 昭

贺彪部长走了，走得如此悄然无息。如此离去，放大了他生命的光环！至此我才意识到党失去了一位多么忠诚、质朴，甚至多才的好领导啊！

赫胥黎说的好：“只有死者才始终如一。”贺部长走了，却留下了一篇大篇光辉业绩；留下了他的浩然正气；留下了他善良博大的胸怀！他走后，口碑载道。所以有人说：“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第一次见到贺部长，是1940年一个星期天，我去中央组织部看望陈云伯伯时。陈云伯伯介绍说：

“这是我们红军的老卫生部长，别看他年轻已当了十年卫生部长了，他是从党校拉大夫来为我看病的。”我那时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还是十分幼稚的一个黄毛丫头，听了陈云伯伯的介绍，不禁对这位年轻的老卫生部长肃然起敬。尤其是他爽朗的谈吐，使满座生风！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血与火的锤炼，经过党的培养，我已从一个黄毛丫头训练成党的中层干部，而当年的贺部长七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救死扶伤，劬劳臻至，不求闻达，仍是位部长！在当今一切向钱看，为名利趋之若鹜的尘俗世风下，像他这样清廉寡欲的人，实属难得！即使他去了，他的楷模永在！

尤其使我惊讶不止的是：作为一个终生从事医务工作，出身贫苦农家，年轻时便参加革命工作的红军战士，经过自学与苦

练，竟成为一位词家，当1998年8月我收到他送来的“贺彪词选”时，惊呆了，六十四首词，写尽了他的斗争生活和文革遭遇，写尽了他的壮怀激烈。其中不少是很难以撰写的长调。给我印象尤深的是1973年，几位刚出牛棚的老战友相会——调寄《江神子》的长调词：

“南来飞雁北归鸿，笑相逢，惨愁容。黛鬓朱颜，重见几哀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上阙）

我惊讶于他的才华，更惊讶于他的大度与豁达！虽则词中微微地带点酸楚，是因他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苦，然而，却能抖落风尘，既往不咎，无怨无悔，宽容大度，使我叹为观止！啊！一个出生入死的老红军，一位救人于危难的老部长，一座永远值得后辈敬仰的丰碑！

贺部长还是我家的救命恩人。先父严朴同志（烈士）在瑞金苏区时，曾任中央苏维埃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毛泽民任部长），1934年长征撤退时，路过川西北的无垠大草原，又名死亡川的松潘草地时，茫茫一万多公里亘古草地，布满了沼泽、泥潭和有毒的滞水。红军在过草地时，饥寒交迫，许多战士浸顶在泥沼里，当时还传染着严重的疟疾病。我父亲的坐骑弱马，无奈被杀掉为同志充饥了，他一身患了疟疾，形销骨立，走路东倒西歪，警卫员拿一根木棍拉着他蹒跚在草地上，夕阳黄瘦，眼看就要倒下了，这时巧遇到张金宝老妈妈（她后来在解放后任全国总工会主席），见此情况，在怀中掏出三颗“奎宁”（即金鸡纳霜）交给父亲说：“病发作时服用，全服三天”，我父亲如法服了药，果然病好了，父亲感谢张妈妈救命之恩，张妈妈答道：“不是我救的你，是贺彪部长救了你，这药是他给我备用的，不想却救了你！”从此，贺部长三颗奎宁救活了爸爸的故事，便深刻在我们子女心中！

多年来，我一直想着要回报这救父之恩，所幸在甲四号我们又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想着这下好了，来日方长，可以报恩了。

谁知道他竟这么快便溘然长逝了！连告别仪式都没有！我怅然若失久之，在打听到他在八宝山火化之时，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朝着八宝山的方向，在阳台焚香顶礼，作悼联哭拜之：

“五十年前即识君，道德不随时下乱，
九原台上仍教我，英灵还望梦中来”

晚 严昭 哀泣

挽联的纸灰随风直上九霄，贺部长灵爽非遥，定能鉴此精诚！

(严昭：中国科协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2001年9月

永远的纪念

许应南

贺彪首长离开我们已经二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出现在我的梦中。他一生最关心的是亿万中国老百姓能够不再贫穷、困苦，千千万万受伤病困扰的人能够摆脱疾病、伤痛。离休后仍然关注着国家和军队卫生事业的发展，关心着老一辈医务精英的身心健康，关注着中、青年医务人员的健康成长。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他千百次地用白求恩同志对技术精益求精，竭力救治伤病员的动人故事教育着我们总政老干部服务处门诊部的全体医务人员。

记得我是1989年3月调来服务处门诊部的，贺部长的保健是同年6月归属我处，当时分配我主管首长保健。巧合的是1978年，贺部长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时，因类风湿关节炎、心房纤颤第一次住301医院时，主治医生也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平易近人，没一点架子，待人和蔼可亲，他关节疼痛难忍，很少麻烦人，总是让你把时间用在其他病人身上，此次在干休所再度相遇，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当我询问他的病情时，他还是老话，我没有事，我是老医生，会照顾自己，你们多去照顾别的首长。同志们特别喜欢听贺部长讲故事，念诗词，贺部长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白求恩同志的故事，那是1938年，白求恩同志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在晋西我军区救治伤病员，贺部长奉命跟随白求恩，协助他工作，照顾他生活，亲眼目睹了白求恩大夫的精湛医术和对伤病员的极端热忱，极端负责任的美德，老

人家给我们讲这些动人的故事，目的是教育我们，希望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的一生正是实践着白求恩大夫的这种精神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贺部长从进驻到离开我们整整 10 年，3600 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朝夕相处，医护人员有话愿意对他讲，有委屈也愿意向他倾诉，他从不训人，而总是耐心开导，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你克服困难。他关心支持我们门诊部的建设，关心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的思想、工作、家庭、孩子，如果那一天值班人员换了班，他都会仔细询问是不是家里有事，孩子健康怎样？他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别人，而对自己的痛苦很少诉说，晚年关节变形、肿胀、疼痛、睡眠很差，甚至晚上起来入厕不慎摔伤，血流满面也不准公务员叫医生，他用惊人的毅力忍受着自己的痛苦。这点点滴滴，我们看在眼里，牢记心头，有时我们也很生气，因为他太不理解我们，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任了。他拒绝去医院检查治疗、他对药品很反感，极少用药。从 80 岁进驻我处至 90 岁谢世，10 年中仅因一次发高热住院 4 天，其余的日子全和我们在一起。贺部长关心我们，我们敬重他老人家，早在 1996 年贺部长和我开玩笑似地讲了：以后不准你送我去医院到处插管子（指气管插管、胃管、尿管、输液管等），也别浪费那些急救药，就让我安安静静去见马克思好吗。我也开玩笑似地爽快答应了，心想到需要的时候，就由不得您老人家了，没想到他老人家真的没有麻烦任何人，连睡在身边的公务员也没喊一声，就安安静静地，不声不响地睡着走了，姿式还是那么自然，表情还是那么安详，大家都说贺部长是好人，好人有好报。老人家在干休所的 10 年，每时每刻都在用他的做人标准——真正共产党人的标准教育我们，激励我们，我们一定牢记他的教诲，以白求恩同志的精神做好老

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以抚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以此作为对他的永远纪念。

(许应南：总政服务处门诊部主任)

2001年7月5日

贺彪部长在贺家川

刘 英

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吃不饱穿不暖，从来没有发过衬衣，冬天只发一套土布棉衣，空身穿着，大风一吹从脖子胸前灌进去，再从裤腿里出来。裤筒就似穿风道，手、胳膊和腿上被风吹出许多小裂口，一走路就痛的厉害。

那时我在医院做护士工作，医院叫“一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村，和晋绥军区卫生部住在一个村。当时贺彪是卫生部长，他常下来看望伤员，向伤病员问寒问暖，关心伤病员的病痛。那时因为条件非常差，没有手术室，该做手术的伤员也做不成，为解决这一困难，贺彪部长就亲自带领大家动手在村子的西北角处和我们一起掘土，将一个大沙丘挖平，抬沙子，将地面垫平，然后在这里盖起了一座手术室。就这样在这座手术室里开始了给伤病员取子弹做手术的工作。

村东边有一条河，叫神木河，每到山洪时节，都从河的上游冲下很多大煤炭块子来，贺彪部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所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山洪一下来，就带领全体人员下河捞煤炭。大家捞的捞，搬运的搬运，我那时小，才十二岁，同志们都叫我“小刘英”，所以只能打着个灯笼在河边站着给照个亮，或是看管煤堆。每次都能捞很多煤炭，以解决伤病员和工作人员的过冬取暖问题。

贺部长还带领我们在神木河的东边开垦了一片荒地，在那里种菜、种土豆，还种了些瓜果。在地里搭起了一个草窝棚，有人

值班看着菜地。贺彪部长很关心大家，经常过来看看，带领大家施肥，浇水，拔草。生产的这些菜蔬也解决了伤病员和工作人员部分吃菜问题。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经常扫荡、破坏和实行“三光政策”，加上山区又隔着黄河、神木河，就是每天每人供应的半斤粮食也经常供应不上。贺彪部长想办法，让大家用木筏子从神木河上游运粮回来，解决了伤病员和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贺部长就这样带领大家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渡过了最艰苦的难关。

总之，贺部长是一位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好首长，他的这种美德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进。

(刘 英：电子部第六研究所卫生所所长)

2000年11月19日

贺彪部长领导我们战胜困难

江 冰

1940年我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卫生部材料科作调剂员，卫生部长是贺彪，材料科长是许允安，司药是杨正模，当时我十五岁，是最小的一个。就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掀起反共高潮，实行经济封锁，就连一点微薄的供应也给断绝了。再加上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和疯狂的扫荡，特别是日本鬼子实行的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致使我军万分困难，生活十分艰苦。但大家抗日救亡的情绪高昂，干劲十足，即使生活再艰苦也毫无怨言。当时吃的粮食、烧的煤炭都要自己从几十里远的地方背回来，夏天只发一套土粗布军衣，冬天发一套棉军衣，不发衬衣，有时一套棉衣要穿两年。1941年连棉衣也发不成了，发的是没有里没有面的老羊皮袄。虱子长成堆，也没法治，不少人生疥疮。没粮吃，吃的是喂牲口的饲料黑豆充饥，每人每天也只能供应四两。由于黑豆不易消化，致使许多人拉肚子，继而出现夜盲症，这就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1942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贺彪部长领导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方面大力开荒种粮种菜，解决吃的问题；另一方面为解决部队缺医少药的困难，发动大家上山采中草药。中医张秉钧同志及有关人员成立药厂，利用当地山上采来的中草药黄芩等，制成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感冒散”，用龙胆草制成“龙胆酊”，用防暑中草药制成“行军丹”，用炼好的猪油和研成细粉

末的硫黄研成膏，叫“硫黄膏，”用以治疗疥疮。用小米羊肝为原料，将小米炒熟、羊肝焙干研磨成细粉，叫“光明散”，发给部队用于夜盲症患者服用。伤病员用的纱布棉花绷带等卫生材料，就用大锅煮沸脱脂，然后发到各医院使用。

1944年春夏之交，国际友人傅莱从晋察冀到延安去，路过晋绥，到卫生部来了一下，他带了一个小药箱，里面装了几瓶磺胺嘧啶片，赠送给卫生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磺胺类药品。贺彪部长把这些药品交给材料科保管，并指示，使用这些药品一定要部长批准，以便使这有限的药品，保证抢救危重伤病员的需要。

就这样，贺彪部长领导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保护我军有生力量，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缅怀贺彪部长，就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对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对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领导，好部长。

(江冰：卫生部药政局原局长)

回 忆

刘进才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贺彪部长带领卫生部机关、卫校、手术医院全体人员，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他鼓励大家“渡过困难，光明就在眼前”。

那时，我们年龄才十八九岁，有的在卫校学习，有的在医院当护士、调剂员，有的在警通连当战士，还有的在机关任干事，经常同贺部长一起劳动生产，在集体的生活中，我们共同谱写了这一革命诗篇。

东渡黄河去背粮	河水涨来去捞炭
掏粪挑水去浇菜	开荒种地搞生产
建设校院拣石子	为织毛衣捻毛线
缝被补衣靠双手	盘腿纺线车儿转
战胜蒋阎的封锁	丰衣足食作贡献
自编自演配锣鼓	陕北秧歌扭的欢
女扮男来男扮女	晋戏梆子震山川
二胡拉起唱京剧	官兵同乐响彻天
陕西神木贺家川	咱们驻了整三年
攻破难关得胜利	日寇投降进兴县

注：1. 贺彪同志是八路军 120 师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

2. 我们驻地有条神木河，河水涨来时，从神府煤田冲下的炭，用我们自织的麻网下河去捞以备做饭和冬季取暖。

3. 陕西方言，好的意思。
4. 晋戏、山西梆子。

(刘进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原政委)

2000年11月于西安

永远回荡的宏亮声音

刘进才

一九四〇年十月，120师贺炳炎三支队，到我家乡扩大新兵，当时，我才十七岁，刚念完高小，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踊跃报名，光荣地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八路军三支队。

同年十一月，支队接到12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的命令，由晋察冀边区，开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我们满负武装，艰苦行军，跨过太行山，越过五台峰，爬山涉水，途经宁武、大同、苛岚、五寨等地，到达了山西兴县魏家滩宿营地。

那天，刚吃过午饭，支队司号员小高，发出了紧急集合的号声，我们跑步集合完毕，只见贺炳炎支队长，转过身子，向一位身着灰色军装的首长说：“部长同志，请你讲话。”他健步走到队列前面，向我们施了个举手礼说：“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我是代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向你们问好的。”接着又说：“队列里凡是高小文化程度的同志，请出列向前三步走。”他的话音刚落，我们六十名青年战士，整整齐齐列队，站在他的面前。当时把我愣住了，但也不敢胡思乱想。

刚回到驻地休息，忽然听到值班员边吹哨子边喊，说“各班注意，中午走出队列同志，打好自己的背包，到食堂集合，提前吃饭，准备出发。”到食堂时，只见支队首长和给我们讲话的那位首长，在食堂等候着我们这六十几名战士。

贺支队长讲话中告诉我们：“这位首长，是120师卫生部部长贺彪，是来支队迎接你们的。我代表支队全体同志，欢送你们

去 120 师卫生学校学习。”

整队出发了，贺部长同我们一路步行到了 120 师司令部驻地——蔡家崖。他发出了口令，队伍席地而坐，放下背包，原地休息。可是贺部长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到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那去汇报到三支队招收我们到卫校学习的情况。贺师长向贺部长说：“你们挖了贺、余（注）三支队的墙角，他们没同你闹架吗？”贺部长回答说：“首长，没有吵架，我们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他们很支持我办好军队卫校，痛痛快快地把六十名高小程度的青年战士给了卫校。”贺师长、关政委笑着对贺部长说：“你亲自去选兵挑将，肯定这批青年战士经过卫校培养学习毕业后定是好的军医，坚强的好干部，将会勇敢上前线，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

贺部长汇报完后，带着我们，淌河翻山，到了卫校驻的地方——碧村。很快把我们编入学员队，开始进入了学生生活，以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来培训军医。

课余时间，同学们互相闲聊，各自谈到自己是怎么到卫校学习的，我们当时高兴地回答老同学说：“不瞒你们说，我们是贺彪部长到 120 师三支队，在队列中，请我们出列，向前三步走，走出来的。”后来同学们开玩笑的说：“贺部长的三步走，把卫校扩大了，如果多喊几次向前三步走，我们卫校定会发展成大学哩！”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数十年革命生涯过去了，离休后每逢遇到多年的老同学，总以“向前三步走”相互称呼，三步走同学你好！咱们革命老前辈贺部长真行，为发展扩大卫生学校，让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他虽然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宏亮的“向前三步走”的声音，永远在我们耳边回荡。

注：余政委即余秋里同志，后任总政治部主任。

2000 年 11 月于西安

忆贺彪部长接见手术团

李沛文

1940年秋末调我往军委总卫生部手术团，去八路军120师参加救治百团大战的重伤员。行军至绥德县120师359旅驻地，有部分重伤员需要做手术治疗，在该地工作了约两周，到达120师卫生部时已是初冬季节了。卫生部领导和负责供给管理工作的同志对手术团倍加关心，安排好伙食和住宿，给每人量体制做冬装，对领导的关怀，手术团全体同志都十分感激。

手术团到达120师卫生部所在地——山西省兴县赵家川口第二天，卫生部贺彪部长和刘运生政委接见了手术团全体同志。贺部长首先说：贺老总（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十分关心手术团来120师工作，刘运生政委和我代表卫生部欢迎手术团来到，欢迎你们参加百团大战重伤员救治。大家报以热烈掌声。接着刘运生政委和大家见面后有急事要去处理，大家热烈鼓掌，感谢刘政委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接见我们。

为使手术团同志们了解百团大战救护治疗伤员情况，便于开展工作，贺部长简要地说：伤员都就近分散收容于卫生部各医疗所，各医疗所设施条件都很简陋，手术团去各医疗所开展手术是很不方便的；只有医疗四所位置较为适中，位于黄河西岸深山之中，环境较稳定，各所的伤员转送医疗四所也较为方便，请示师首长批准，手术团并入医疗四所，扩建为120师手术医院，祁开仁任手术医院院长，刘庆珊任政治委员。紧接着贺部长又介绍了120师卫生干部情况，他说：120师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边

作战边巩固发展，部队人员增加很快，相对的后勤卫生人员感到十分不足，在师首长指示下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采取缺什么人员就培训什么人员的办法，我们先后开办了短期调剂、医助、医生训练班，对伤员救护治疗起到了良好作用；但是由于部队继续扩大发展，卫生人员仍感不足，请示师首长批准于1940年春在山西省临县固贤村成立了120师卫生医训队；我们的设想是通过医训队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训练卫生干部，充实提高部队卫生工作水平；但是由于教学人员不足，一位教员要教多门课程，总有力不从心之感；现在手术团来120师工作，加强了医训队的教学力量。贺部长又接着说：手术团的任务，一是救治百团大战的重伤员，二是培养训练卫生干部，为了便于培养训练干部，卫生部医训队迁往原医疗四所驻地神府县贺家川。

手术团到达贺家川后，其他人员包括政工、行政管理、财务供给等都先后到达，经过紧张准备，手术医院正式成立了，各医疗站收容百团大战的重伤员源源不断地输送来手术医院治疗。医训队也按时迁来新的营地贺家川继续教学上课。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们完成了百团大战120师重伤员的救治工作，同时又带领医训队第一期同学临床实习。

当手术团在手术医院完成了救治百团大战120师重伤员任务之时，贺龙师长亲临手术医院，肯定了手术团的工作，决定在神府县贺家川建立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拨款1万银元作为修造手术医院病房经费。当时财政十分困难，贺师长拨款建校建医院深深地激发了同志们们的热情，1941年四月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正式在神府县贺家川成立，手术医院成为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祁开仁任校长兼院长、刘运生任学校政委、刘庆珊任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兼手术医院政委。

从手术团到达120师建立手术医院，到正式宣布成立晋西北

军区卫生学校（即120师卫生学校）短短三、四个月中，贺彪部长做了许多工作：调来任过团长的红军干部担任管理科长、任过县委书记的知识分子担任供给科科长。贺部长亲自到部队挑选有相应文化程度的战士和其他人员来校学习。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成立不久，除原有的军医期、调剂期、护士期外，贺部长又亲自着手组织一年制高级班，逐个审定批准入学名单，其中有卫生处长、卫生队长、医务科长、休养所长、主治医生等，共办了两期计五十多人。

贺部长是一位热爱伤病员、关心爱护青年同学、非常尊重知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好领导。当时120师所在地晋西北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不能保证饱饭，常常是半饥半饱去工作，上课，或去诊疗病人。记得有一次冬天晚上八九点钟，教员们在备课中觉得肚子很饿，大家凑了些钱买了面粉油盐，正在煮面条吃的时候，被贺部长知道了，他自责：“怎么能让教员饿着肚子讲课，这样能行吗？”从此教员和医生吃饱饭问题就解决了。并不是粮食瞬时充裕起来，而是贺部长指示：宁可我们少吃些，也一定要保证教员医生吃饱。后来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牛养羊，学校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教员和附属医院医生的生活也得到适当的力所能及的关照。

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即晋绥军区卫生学校）自1941年建校至日本宣布投降四年间，共培养各类卫生干部约四百余人，充实提高了当时120师卫生战地救护治疗力量，很好地完成了战伤救治任务。办卫生学校的指导思想十分鲜明正确，就是：提高医学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服务于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学制随着战争的需要而调整，有些同学临时调出去工作，完成任务后再回校继续补课学习。领导和群众、教员和学生同心同德，在十

分艰苦困难的环境里培养出一支战斗力十分坚强的队伍。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很大发展，进驻西安前后几次易名，1952年被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在卫生学校学习过的同学中，有些担任了军医大学主要领导，也有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的，在地方工作的有不少是卫生厅长、卫生局长或大学医学院校领导，这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和120师首长尽心办好卫校的丰硕成果。

(李沛文：第四军医大学教授)

2001年元旦

悼良师 念故友

顾尔承

1979年春我在养蜂夹道认识了贺彪同志。二十年的交往贺老以他朴实无华的作风，宅心仁厚的秉性使我得到一位知己，在工作上给我支持，思想上对我帮助。从此我与贺老结为牌伴，经常参加各种桥牌活动。

1996年我迈进古稀退出现役后，与贺老仍常见面。

1998年8月贺老已在病中，我闻讯从上海赶到北京，医生叮嘱与贺老交谈的时间不要超过五分钟，当时我心中一凛，意识到老人家的病况已很严重。然而在护士搀扶下的贺老，仍断断续续地与我交谈了十多分钟，还亲手递赠一册《贺彪词选》。当我从扉页看到老人家于同年7月亲笔题写“赠顾尔承同志”几个大字时，不禁泪水盈眶，心情激动。当天我把《词选》中六十五首词句认真地通读了一遍，十分惊讶地发现老人家的文笔词学造诣竟是如此之高，对总理对小平同志，对贺、彭两位元帅以及许多老同志的感情如此深厚真挚。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良师益友而感到自豪幸福。

1999年3月我困于糖尿病，当听到贺老已乘鹤仙去的消息，刹那间老人家对我的深情厚谊，珍贵友谊之情涌上心头，悲痛之感久久难平。

今年我76岁记忆日衰，鉴于数十年的工作性质，我在乒羽两项、棋牌两界、亚奥两会的朋友何止百千。但迄今难忘音容的也只有贺老等少数老人。于是抓紧时间，从脑褶深处挖掘记忆写

了这篇二十年感怀，用一瓣心香纪念贺老在天之灵。

桥牌是两人结伴与对手比赛的项目，因此同伴间的团结默契、互信互谅非常重要。我当中国桥协副主席、秘书长长达十八年之久，对全国牌手提出的首点要求就是“牌风正”。经过多年实践我越来越感到桥牌内涵丰富，有很大的推广价值，其规程、规则中的许多可以称之为“君子之间的智力考核”。但有时在一对牌手间，因叫牌、出牌，对敌分析等失误而引起相互指责、争吵甚至反目拆档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是牌风不正、修养不够所致。而我与贺老结伴二十年，凡遇失误输牌等情况总是赛后平心静气地探讨研究，我们俩的牌风极好，完全符合“君子”两字的要求。

贺老有原则、讲道理，严以律己、平易近人的作风很突出：有一次我们四人应邀到天津打牌。按说老人家完全可以住进主人安排的高级宾馆，但他坚持住总后勤部驻津办事处的招待所。此事对我教育很大。

又有一次，外地有一个庆祝活动托我从北京邀请若干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参加盛会。我去动员贺老时，他说：“这个地方是沿海地区，政治风气敏感，我是个军人，去那里不妥”。

还有一次我与贺老谈起皖北一个纺织女工患白血病到北京就诊找过几家大医院，因种种原因不得其门而入。想不到隔天从贺老司机那里听说老人家竟亲自跑到301医院去落实了这件事。

以上几则都算不了大事，但从贺老身上却可从细微中见真情。他说话不多但是非分明，他从善如流却嫉恶如仇，是个顾大局、识大体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也是我个人学习的好榜样。

(顾尔承：国家体委干部)

怀念贺彪同志

张 金

大约是 1942 年 11 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合河晋绥军区干部所，当时任主治医生的我接到通知，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贺彪同志到了，叫我去谈话。一进窑洞，贺彪同志起身与我握手后示意我坐下，不及寒暄，谈话就切入了正题。一身戎装的贺彪同志英姿飒爽、精神抖擞，既严肃又和蔼。他说：“你是江西瑞金红军卫校毕业的，在延安医大进修了一年多，跟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了半年多。现在需要你来卫生部医政科担任科长，管理医院，管理医务干部。”当时我考虑的是，我的临床治疗技术还需要提高；晋绥军区卫生部医政科长的担子重，我们的队伍里会找到比我更合适的同志担任。因此我谈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1942 年秋，枣子红了的时候，我从延安进修回来，晋绥军区卫生部政委刘运生同志已经同我谈过担任医政科长的事，当时我以同样的理由婉拒了。

听了我的说法，贺彪同志说：“我们的工作要发展，我们的队伍要扩大，我们的技术要提高，你的经历和经验适合作这一工作，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党的需要，组织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说的了！”口气不容争辩。1943 年 1 月，我接到命令，到陕西省贺家川卫生部报到。贺彪同志马上又找我谈话，谆谆教导我如何做好科长的工作。从此以后，贺彪作为我的同志、战友、师长和领导，开始了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

要说见到和听到贺彪同志，还在这时之前。我是红一方面军



1940年,在晋西北军区贺彪(前左二)与张汝光、章德炎、张金(后右一)、何曼秋、张汉斌等合影。

的，贺彪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以前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未能相识接触。长征开始时，我正在江西瑞金红军卫校学习，长征路上在湖南宜章县被编进五军团做实习医生。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编在左路军。总卫生部在左路军，部长贺诚同志，副部长苏井观同志。我在隶属于总卫生部的红军总医院（原四方面军后方医院）工作，1935年冬天在西康绥靖丹壩，上级把我们实习医生召回总卫生部卫校随军开课继续学习。毕业后我被分到红军总医院（原四方面军的后方医院）工作，当时医政科长是江一真同志。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左路军三次穿越茫茫数百里草地和皑皑大雪夹金山，历尽艰难险阻。1936年我们医院在过了草地抵甘肃岷县哈达铺后才归二方面军建制。

1936年长征到康藏高原藏民族地区时，我们队伍中本来就很不贫乏的后勤被服供应早已断绝，部队衣衫褴褛，穿着五花八门，但士气很旺。这时有一个人气宇轩昂穿过队伍，有人说：“看！那就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卫生部的部长贺彪。”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贺彪同志。

1936年到1937年前半年，我和二方面军的孟德利、章德炎、张汉彬等同志一起工作，听到了有关贺彪同志的情况。得知贺彪同志很早参加红军，对革命忠诚，不畏艰险，善于动脑筋，工作能力很强，深得贺龙同志赏识，早在洪湖苏区就是红军卫生工作的领导人。听到这些说法，我对贺彪同志十分敬佩。

贺彪同志对工作抓得很紧，他要求我经常下医院了解情况，一星期要向他汇报一次，并要求我对发生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也总是及时地、耐心地给以指示。

贺彪同志重视技术，重用技术人员。他经常嘱咐我，对干部

不能以个人好恶为衡量标准，而应以政治表现、技术水平做为衡量的标准。凡是对革命工作负责，经过学习培训，有一定实践经验，就应当重用，应当提拔，应当放在重要的岗位上，还应当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积极培养医务卫生人员。在我担任晋绥军区医政科长和晋绥军区卫校校长期间，我们遵照贺彪同志的指示，提拔、选择了不少优秀的医务干部和教员，培养了许多医务人员。这对于巩固和提高晋绥军区医院和卫校的水平，发展和壮大晋绥军区医务人员队伍起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制定了绥包战役计划，准备歼灭侵犯我边区的国民党部分主力。为了配合这一战役，晋绥军区卫校改为临时野战医院建制，准备接受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的伤病员。根据当时一些教员缺乏实践临床经验，医药物资又匮乏的实际情况，贺彪同志不满足于我们已有的准备和对策，亲自骑马来到新组建的临时野战医院驻地绥远丰镇，详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作了许多及时和必要的指示，指挥我们一起制定了周密的方案。详尽到如何与友军协同收容伤员，如何通过兵站将重、轻伤员向左云县、右玉县转移这样的具体工作。同时他还点名指派我与晋察冀军区派来联系工作的一位团级干部一起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后勤部争取支援物品。我带领着从张家口拉来满满五大车、三套牲口拉着大车的棉花、布匹、消毒药品和消毒器材等战地医院急需品，返回了驻地丰镇。

由于傅作义的骑兵从绥远以东卓资山经商都插到张北并占了张家口，避开了我军主力，绥包战役成了一场有备而未打的战役。我们由卫校改制的临时野战医院虽然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未遭遇此战。可是贺彪同志应对从容、指挥若定、思虑充分、布置周密的作风又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战争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延安战略撤退后，隶属中央

的生物制品所退到山西，当时晋西北各县天花流行，贺彪同志指示买了二十多头牛，由生物制品所在牛身上接种制出牛痘疫苗，派遣卫校的学生到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临县、忻县和五寨县等解放区给老百姓的小孩种牛痘预防天花。在当时敌人封锁、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救治解放区人民群众作出了贡献。贺彪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善于动脑筋抓住时机的作风，由此也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贺彪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我于1952年国庆前后由山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之职转业到山西省卫生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厅长（按中央规定由民主人士任厅长）。在山西卫生厅工作期间，我深深感觉到山西卫生工作的成绩同样浸透着贺彪同志的心血。

山西卫生工作最突出的是建立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保健站、合作医疗、县医院办卫校和培养典型、树立样板。

1955年初级社时，高平县米山乡一个大村里的三个农业社联合组织了一个卫生所（后改称保健站），把私人诊所、药铺的医生吸收进来，给他们的工分比最强的劳力要高，农民看病吃药不掏钱。1956年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向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时由民主人士李德全女士任部长）徐运北同志电话作了汇报，徐运北同志非常重视，专程来山西考察，视察了卫生所并分别请农业社干部、社员和卫生所的医生开了座谈会，了解到群众十分拥护这种办法。当时国家一穷二白，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援农村的卫生工作，大多数农民也生活贫困，没有余钱看病吃药，米山乡的经验能解决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又受到群众的欢迎。徐运北同志返京后经部党组研究决定，大约1957年3月份，在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让我发言一个多小时，介绍米山乡的情况和经验，胡乔木同志带领两个苏联专家也参加了会议。

有了卫生部的支持，同时我们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领

导下，在全省宣传提倡米山乡的经验。请广大农民依靠自己，依靠农业社，在自愿的基础上捐献一把米、一个鸡蛋，自筹建立卫生所、保健站，并结合宣传提倡沁源县、武乡县“三土”（土针、土法、土火罐）、“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药材）经验，多余的药材卖给药材公司，换取必要的药品和用品。各地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要求和发展水平，实行免费或免“四费”（挂号、出诊、注射和小手术费），在可能的条件下，给每个农民建立健康状况档案。就当时的条件来讲，农村建立保健站，实行合作医疗，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缺医少药和看病吃药问题。

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当时对这一作法也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甚至有争议。贺彪同志多次给我打气撑腰，他说：“建立保健站实行合作医疗，农民不花钱或少花钱，这办法简便宜行，收效很快，还容易推广。这是群众要办，对群众有利，要坚持下去，毛主席说要走群众路线，不要管别人说什么！现在批评你的人，将来可能要向你道歉！”贺彪同志的态度，无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促使我下定决心，坚决把这条路走下去。

根据农村保健站和合作医疗发展的需要，我们采取措施让县医院办卫校，县医院医生当教员，采取社来社去、队来队去的办法，免费招收农村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社员进行培训，培养乡村医生（当时称赤脚医生）。一开始是自带粮食学习，后来由卫生厅统一拨款，每人每月补助5元人民币，以后又增加到9元，到文革开始前，全省培养了将近万人的乡村医生（当时称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卫生工作预防和医疗的骨干。这种作法提高了农村卫生工作的技术水平，巩固了农村保健站和合作医疗，加强了“预防为主”方针的贯彻。贺彪同志来山西视察指导卫生工作看到这一情况时，兴奋地对我说：“县医院办卫校这条路走对了，我们在战争年代办卫校培养医务人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伤病员

的问题，现在这样做同样可以解决问题，而且是解决更大的问题，可以解决广大农民看病吃药、增强体质的问题！”

我们还采取培养典型，树立样板的办法带动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山西省第一个因陋就简办卫生，适宜推广的卫生模范典型是稷山县太阳村，1959年11月12至21日，全国卫生工作现场会就在那里召开，卫生部党组为此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1960年3月18日在报告上作了相当长的指示，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和稷山太阳村的卫生工作成绩，卫生部也提出了全国卫生工作“学太阳、赶稷山”的口号。山西卫生模范典型稷山县太阳村和晋城县东四义村卫生成绩两次在广交会作为新中国的成就进行展览。我们还发出号召，让每个县、每个公社都培养自己的卫生模范典型，全面带动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贺彪同志两次到太阳村和东四义视察指导工作，对这两个典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热情洋溢地对我说：“培养典型、树立样板是个好办法，我们在战争年代就是给英雄挂大红花，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这是个好传统！”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在第三世界推广中国的经验（合作医疗、乡村医生、县医院办卫校），希望到2000年在第三世界的农村能够实行初级卫生保健。

现在，当我们纪念贺彪同志，回首往事和成绩时，我不能不想到贺彪同志对革命事业、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呕心沥血和耿耿忠心，不能不想到贺彪同志对我的谆谆教导和同志之情。贺彪同志不愧是红军卫生事业的先驱者，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领导人，更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好师长，好领导。

（张金：山西省卫生厅原厅长）

2001年6月于太原

回忆贺部长在晋绥二三事

许若韦

1941年春季的2、3月间，八路军百团大战晋绥地区伤病员治疗工作暂告一个阶段。我们手术团准备返回延安。这时，贺部长告诉我们晋绥要成立卫生学校并成立医院作为治疗和教学医院。要我们留下，军区司令员贺龙老总亲自来看望我们，宣布成立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即120师卫生学校），祁开仁任校长兼手术医院（即卫校附属医院）院长；我们任教员兼医院军医，手术团成员都留在晋西北卫生学校教学、手术，不能回延安了。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即第四军医大学的前身）就这样在抗日炮火中诞生了。

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诞生在抗日的烽火里，成长在艰苦的环境中。贺部长将卫生学校原有的青年学员和新招收的知识青年（中学、高小毕业生）划分为军医一到四期；还指示各军分区、独立旅、团单位将没有医学大专以上学历的卫生领导干部，卫生队长、处长、部长调到卫生学校，成立了高级班，接受医学大专课程教育。这样，学校班级多了，党员也增多了，造成学校医院教学、床位紧张。贺部长指示给学校、医院增加床位，新建病房。于是，我们大家在贺家山自己动手挖窑洞、建病房，晋绥地区气候非常寒冷，所谓“床”都是“火坑床”，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就在这样极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为我军培养自己的医学专业人才。卫生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后都成为我军各医疗单位的骨干或领导。

1942年春，晋西北军区扩大为晋绥军区，晋西北军区卫校亦随之扩大为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当时在解放区由于敌人封锁，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军粮供应不足。每人每天只能吃九两制黑豆糊糊。据说只有贺老总才能吃到一点小米饭。上级党组织要我们卫生学校学员、教职员工自己生产粮食，贺部长带领我们到黄河东岸开荒。贺部长说：“军粮供应困难每年有三个多月供应不足，咱们要努力开荒，解决吃粮问题，东岸荒山很多，大家开荒生产吃饱肚子，才能安心教学和学习。”

贺部长是我军优秀卫生事业领导人，也是一位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不少青年被打成“失足者”、“国民党特务”。康生的错误也影响到晋绥地区军队整风运动中。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党政机关中许多干部被打成“特务”，卫生学校很多学员、干部也被带上“特务帽子”。贺部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他对我们青年教员说：“革命干部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革命历史，不能群众指东就说东，指西就说西，你看我们学校‘坦白’了这么多特务，有几个是真的，一个都没有！”最后贺部长给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干部做历史结论是一个“特务”也没有。贺部长的结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避免了康生错误的扩大化。挽救了干部、青年。

抗战胜利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卫生学校有部分教员、工作人员（田荣斌、张鹤、徐化之）、卫生部首长（张汝光副部长，戴文彬、戴正华两位政委）调到东北工作。其他卫生人员也有要求想去东北工作的，贺部长给大家解释说：“晋绥地区靠近延安老根据地，蒋介石反动派不会让老区安宁，定会出兵扰乱人民生活，这里一定有防卫反击战，是需要我们医疗卫生人才的。”贺部长这个预见非常正确，不久，果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贺部长叫我们组织了医疗手术队，带领卫生学校

学员到全区各卫生医疗机构诊治负伤人员。卫生学校在贺部长的领导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直至全国解放，迁到西安。

贺部长为我军卫生医疗、教学事业培养大批人才，业绩永存！

(许若韦：第一军医大学原副校长)

2001年5月28日

贺彪部长为我姐姐接生

于陆琳

我是在晋绥边区认识贺彪部长的。与贺部长的夫人陈凯也是那时候认识的。当时我在晋西北临县市区工作，工作上与贺彪部长接触不多，但我常到贺部长家作客。

在晋绥边区工作时，有一次我发烧，乘船过黄河到了后方，贺彪部长安排我住了医院，还经常来看望我。那时，住院条件非常艰苦，我记得我住在一个窑洞里，一排炕，开始只有我一人在炕上，发烧很厉害，昏迷过去，醒来时，炕已住满了病人。休养了一段时间，病好了以后我就回去工作了。贺部长给我的印象是工作认真，对同志诚恳，没什么架子，很容易接触，为人很好，他的夫人陈凯也是这样。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部长为我姐姐接生。当时，贺部长在延安参加一个会议，就住在我姐姐于若木家后面山上的窑洞里。姐姐临产，来不及去中央医院了，我急忙去找贺彪，是深夜，人都睡了。由于天黑，不知贺部长住在山上哪一个窑洞里，我就挨个窑洞门敲，连敲带喊，终于找到了贺部长。贺彪当时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当时是冬天）只披了一件棉大衣，穿着单裤，就奔我姐姐住的地方来了。姐姐怀的胎儿由于胎位不正，难产，贺彪到后，马上洗手，后来中央医院的人也来了，他们带来了接生用品，这时胎儿整个身子已下来了，只有两只手和头还未下来，如他们洗手和消毒可能就来不及了，这时贺部长已洗好了手。用中央医院拿来的接生用品把孩子接了下来。记得当时孩子

不哭，还打了一针，提着腿，拍了一阵屁股才哭了出来。

这个孩子长大后我带他去看望贺彪部长，告诉他，贺部长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要好好记住他、感谢他。

(于陆琳：中华社会大学校长)

艰苦创业 风范长存

——怀念西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贺彪同志

魏明中 李经纶 卢希谦
李鸿光 梁泽民 张吕重

贺彪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西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们曾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事迹耳闻目睹，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以及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及无私奉献精神感受颇深，现就我们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片断回忆，写成此文，以表示我们对贺彪同志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西北地区卫生事业的奠基人

贺彪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西北军区卫生部部长、第一野战军卫生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等职，为西北地区卫生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卫生事业尚在初创，医疗机构极少，专业人员匮乏，防治能力薄弱。由于历年的战争，灾荒、疾病流行。贺彪同志根据彭总指示，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卫生部，按要求由各军、师、团派大批医疗队消灭地方上的多种传染病。派干部到各省、市、县建立卫生厅、局、科，成立医院和防

疫站、妇幼保健站，办各种培训班。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召开全区卫生干部大会，决定新建扩建一批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1月6日，根据西北军区贺总命令，建设新型的军医大学“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第四军医大学前身）。扩建并独立设置西北医学院（原西北大学医学院与陕西医专），并在西安南郊小寨选择新址，建设校部和第一附属医院。独立设置兰州医学院（原为兰州大学医学院）、扩建兰州生物制品所，新建青海、宁夏、新疆医学院，在西安接收和扩建西安制药厂，新建西北医药公司、西北防痨协会。1951年，成立了陕西省第一、二卫生学校、接收和改扩建了西北医学院附设护士学校，西北医学院附设药科学校，陕西省助产学校，陕西省延安、宝鸡、渭南、汉中、安康等卫生学校，甘肃省三所卫生学校，新疆两所卫生学校和军区医专、青海省和宁夏各新建一所卫生学校等，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并责成各地清理和接管民国时期遗留的卫生机构和中级卫生学校，并新建西安第二医学院、延安医学院等。开展巡回免费治疗，延安老区实行全免费医疗，加强延安人民医院，普遍进行预防接种工作，培养了大批各类层次的医疗防疫干部、教师和技术人员，对西北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西北地区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建国初期，陕西省全省90多个县，仅有城市综合医院3所，传染病院1个，产院1个和1个卫生试验所及部分县卫生院所，全省医师仅有226名，技术力量普遍薄弱，设备极其简陋，全省仅有3台X光机。有些县卫生院连疝气手术都作不了，连一个大学生也没有。经过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医务人员大量增加，医疗设备大为改观。各种短训班的开办和医药院校的建立，解决了当时卫生事业发展需要人才的燃眉之急。为了提高地方医疗水平，建成了三原县示范医院加以推广。抗美援朝期间派原第一野战医院赴朝鲜参战，在陕西地

区新建了四所康复医院，广泛开展反细菌战和爱国卫生运动。贺彪同志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付出了艰辛劳动和领导智慧，西北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贺彪同志功不可泯。

尊重知识和人才 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

卫生系统是知识分子集中和技术性很强的行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尤其重要。贺彪同志在西北任职期间，非常重视知识和人才培养。解放初期，卫生事业单位除从革命队伍中调派补充了一批卫生技术人员到地方各省区工作外，有相当部分卫生技术骨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员和党外人士，重视和发挥这些人员的积极性和作用，是作好当时卫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各级卫生领导岗位上，有经多年党的培养的红军干部，也有党外人士。他们精诚团结，共同工作，配合很好。陕西省卫生厅厅长陈纯炳、李经纶同志，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魏明中调任西北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他们都是红军和战争年代培养的卫生干部。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季陶，原是民国时期陕西省卫生处处长，党外人士。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张查理，原是国民党时期兰州中央医院院长，西北卫生部教育处长乔树民是兰州大学医学院院长，非党知识分子。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教授，原是建国前该院院长，党外人士、著名生理学家。杨鹤庆是著名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家，民国时期曾任陕西省卫生处处长，建国后任西安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党外人士。妇产科专家民国时期兰州产校校长陈桂云教授，建国后任甘肃妇幼保健院院长。著名结核病专家吴霁棠教授，出任西北防痨协会总干事。一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卫生部门领导岗位上任职，贺彪

同志善于团结和发挥这些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这些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交换征求意见，以诚相待，畅所欲言，使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心情舒畅，大胆工作，勇于承担责任。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及工作热情，使这些干部成为既有领导才能，又能掌握卫生专业技术的全面人才。为了党和人民的卫生事业，为了人民的健康事业，党内外同志共同努力奋斗，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西北卫生部改为西北卫生局，贺彪作为杨明轩同志的助手任西北文委副主任，魏明中任卫生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局长是非党专家张查理。贺彪仍然直接指导和关心卫生局的工作，对西北卫生工作做出了积极有效的成绩。90年代初，生理学家侯宗濂教授、结核病专家吴霁棠教授常常念忆老领导贺彪同志，贺彪同志也托人看望侯宗濂教授。还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业务骨干受到贺彪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分别在各自的岗位和专业上作出了成绩。贺彪同志在西北地区任职期间，关心知识分子，重视人才，团结党外人士是当时有口皆碑的，大家称他为西北卫生事业的一面旗帜。

党的卫生工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

贺彪同志长期在西北及晋绥地区任职，在战争年代，他提出“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曾精心组织，出色完成了战役战斗中的战场救护和大批伤病员的救治任务，多次受到彭德怀、贺龙等的赞扬。他重视预防工作，提倡预防为主，实行中西医结合。他的这些见解和工作指导思想，在建国后全面卫生工作会议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建国初，我党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他坚决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结合西北实际，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防治。选派医疗队深入工厂农村，陕南陕北山区，巡回医疗，普遍进行预防接种工作，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中去。监督、检查食品卫生、劳动卫生、环境卫生，改变西北地区卫生落后面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当时西北各省基层卫生工作机构少，人员分散，力量薄弱。陕西省卫生厅首先抓了将个体私人诊所组织建设为联合医院（所），形成集体力量开展工作，又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展开业务和政治学习交流，对推动全省卫生工作起了显著作用，这些工作都是在贺彪为首的西北卫生部（后为西北卫生局）领导下开展完成的。贯彻落实中医政策，发展中医药事业，成立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聘请中医黄竹斋、米伯让先生到西北医学院新成立的中医科主任主任、教授坐诊看病，成立中医巡回医疗队。国家各级医疗机构建立中医科室吸收中医参加工作，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并在各地成立防疫委员会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广泛兴起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地方病的防治研究工作。陕西是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的重发区。当时对这些地方病的病因认识不清，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他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出发，组织专家作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工作，首先在陕西全省推广了含碘食盐的防治办法，为以后防治工作开了个好头，奠定了基础。贺彪同志要求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深入病区，他常说打仗不能让战士老在前面，司令员也要在第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要求卫生行政人员必须懂业务，业务人员作管理后，不应只抓技术，要会管理。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和贺彪同志接触较多，他政策性、原

则性强，工作计划性强，安排工作着眼当时，考虑长远，工作有步骤。他个性耿直，体谅下级，待人真诚，要求严格，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非常关心爱护同志。他工作认真，作风深入，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工作，为我们出主意见办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了解群众的思想及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工作实事求是。他看准的事一定下决心办，而且要办好。贺彪同志是一位有能力、有威望、有魄力的卫生工作者。

贺彪同志很有远见卓识。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刚解放时，他考虑到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而西北地区卫生工作基础薄弱，医学教育人才少，疾病多的情况，为了争取战争尽快胜利，及时与西安军管会（主任贺龙）、青年团（共青团）西北工委、妇联等有关方面协商组织西大医学院、陕西医专一批师生分别派至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医院共七十多人参军工作支援前线（在西安的后方医院也有部分人员就近去帮助工作），这部分同志到医院即给予排级干部待遇，发军装、发津贴，他们参加了咸阳反击战、扶眉战役及 18、19 兵团的大量伤病员抢救、治疗，接着参加了关山战役、解放兰州战役伤病员的抢救治疗。贺彪同志原计划这部分同志留在部队工作下去，并向青海、新疆、宁夏进军，但由于该三省区很快解放，新中国也即成立的情况，为了把这些同志培养成西北地区教学、医疗的骨干力量，故决定调他们回西北医学院继续学习，补学完其应学课程。通过动员说服，绝大部分回校补课，在学习期间生活上给予补助照顾，随后又将其中高年级学生（西北医学院第十三期毕业班）保送至中央卫生部所办医学院校师资培训班学习，被分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南京医学院接受著名专家的培养，于一九五一年秋毕业，分配至西北各省医学院校任教，后大都成为各专业学科的带头人，作出重要贡献。近年来根据组织上

规定，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干部有离休和退休不同对待的规定，这些同志要求明确其按离休对待的问题难于解决，经向贺彪同志请示证明提出意见，贺彪同志认为应按离休办理并出示证明。目前大部分省市均按此办了离休手续，只是个别省市仍按退休对待，为此贺彪同志在离休后，患病中仍念念不忘，关心着这件事情的处理。

这部分同志在野战医院参加各次战役伤病员抢救中，工作积极负责，克服了长途的行军作战的困难，生活艰苦，环境险恶，脚上磨泡、感冒、胃肠病不断都挺过来了，最不幸的是由兰州返回西安途中，由于山洪暴发，泾河涨水，汽车翻落水中，致使在第一野战医院工作的武琦、冯白华两位女同学牺牲，西安各界为她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团员，授予烈士荣誉称号，武琦同志安葬烈士陵园，冯白华同志遗体被洪水冲走，甚为遗憾。

西北地区，地处边远，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外界信息闭塞。贺彪同志调中央工作后，仍关心西北和陕西卫生事业的发展。1960年西安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魏明中同志，作为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团长，出访巴基斯坦。1963年3月，魏明中同志作为中央卫生部代表团团长，出访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与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谈判达成我国第一批援外医疗队的重要任务，开始了我国陆续对发展中国家派出医疗队的友好援助工作，这也是西北地区卫生界较早走出国门，开阔视野，促进卫生工作国际交流的重要外事活动。每次人选的选定和活动安排都与贺彪同志对西北卫生工作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贺彪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对同志亲切、平易近人；他说话简单明确，性格直爽，诚恳待人，从无浮言华语，作风民主和深入，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原则性强，对我们教育和

影响十分深刻，他的工作作风和革命风采至今我们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的革命精神和风范永存。

(注：本文由梁泽民同志安排策划，辛智科同志执笔整理)

(魏明中：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李经纶：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卢希谦：曾任陕西省卫生厅厅长

李鸿光：现任陕西省卫生厅厅长

梁泽民：第四军医大学校史办公室主任

张吕重：原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顾问)

忆老部长贺彪同志片断

申春和

贺老部长原是晋绥卫生部老部长。我从晋绥军区卫生学校第二期毕业后，于1943年组织决定调我到晋绥军区卫生部医政科工作。

晋绥军区卫生部当时在陕北神府县贺家川，1945年日寇投降后移驻山西省兴县赵家川口。不久蒋介石挑起内战，于是开始了三年的解放战争。1946年夏天，贺部长带领我们到临县青塘镇，准备攻打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据点——汾阳县。派我与李效苏（现在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到通往汾阳县边境的路上设了两个转运站。有一天的半夜里，被我军围困在离石县大武镇的敌人忽然逃了出来，将我们一个转运站中刚从临县招来的连军装都还没有来及换的新兵抓到山头上进行杀害，有的新兵还被国民党兵将小便器给割掉。真是残忍之极。

汾阳县当时驻扎的是阎锡山的部队和投降却不交械的日寇，他们垂死挣扎，到处危害百姓。汾阳县城是敌人很顽固的一个据点，我们围困攻打一个月未打下来，便挑选了一个连兵力，向城里挖暗道，不料被敌人发觉，敌人用毒气将一连战士全部熏死在暗道里，在全团召开的追悼大会上，目睹战友被敌人残杀的情景，干部、战士都痛哭流涕，激起了大家对敌人的更深的仇恨。

当敌人的顽固据点还没有拔掉，正在继续攻坚的时候，绥包战役吃紧，部队受命转移北上去和傅作义部队作战。贺部长命令我们北上开赴右玉县一带救治伤员，当时天气已经转冷，我们路

过兴县赵家川口，到卫生部所在地去拿棉衣（战争年代艰苦，一套粗布棉衣要穿三年）。可是被卫生部祁开仁副部长留下，仍又调回到卫生部医政科工作了。

在贺部长领导下工作和生活的年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下级的关心和爱护，他不光使用干部同时更注意教育培养干部。他工作责任心强，一贯尽职尽责。搞运动掌握党的政策稳、准、好，例如1942年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时，有一阶段搞“抢救运动”扩大化了，但他领导下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却没有受到伤害。他在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部长期间，在“文革”后期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落实政策，我和他原来的秘书王子阳同志一天晚上去招待所探望他，我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想到那次相见竟是永别。回忆往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永远怀念老首长贺彪同志，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近又听老梁同志说，贺部长的夫人陈凯同志股骨颈骨折，同样令人挂怀，话长纸短，难以尽述。最后祝陈凯同志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申春和：西安市儿童医院原顾问）

2001年8月于西安

深切怀念贺彪部长

张 咸 恒

贺彪同志离开我们走了。我十分地想念他。身为晋绥军区卫生部长，他对待下级干部、战士如亲兄弟一样关爱。他的事迹说也说不完，他的音容笑貌时刻闪现在我的眼前。现就我一九四二年调到晋绥军区卫生部以来印象最深的几件事记下来以作纪念。

1942年我从抗大七分校毕业分配到晋绥军区卫生部当组织干事，当首长讲话时，发现贺部长有口吃的毛病，着了急就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口里老重复着一句责骂自己的话——“他妈的”。我很为他难过，就对他说：“你是首长，不要老在说不上话的时候重复责骂自己的话，我听人家说口吃说不上话的时候，停下来想想下面要说什么，就会好些。”他听了很高兴。以后讲话就再也听不到了口吃时重复的那句话，而改成“什么东西”。我常见他拿着书大声的念，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为了练习讲话，可见他是多么谦虚，对我这个青年干部提的建议也这么看重。

在抗日时期那艰苦的岁月里，为活跃部队生活，卫生部由机关工作人员、卫校学员组成一个业余演出队，每月至少要演一次，京剧、山西梆子、眉户戏、秧歌剧等，什么都唱。个别从大城市来的干部说：“看你们的戏，身上都起鸡皮疙瘩”。的确演的不好，可是贺部长每次演出必是全家都来，看到最后才离去。他还动员医生护士把伤病员扶着抬着来看。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1944年大生产运动中，卫生部在黄河滩上开荒种地，天大旱，大家心急火燎的议论想办法：“把黄河水提上来就好了。”贺

部长是南方人，当过农民，他就根据自己小时候所见，连夜画图设计了一条龙骨水车，还和木工刘同志一起造了一架，又亲自示范教大家使用从而抗过了旱灾。到冬天卫生部和卫校师生全部出动，去国民党封锁线上的煤窑去拉煤，两人一副“冰拖子”，白天步行数十里，距煤窑十几里处住下，到晚上就潜入国民党封锁线岗楼下的煤窑，悄悄地把买来的大块儿煤捆在冰拖子上，顺着窟野河的冰上拉回住地贺家川村。每拖五百斤左右，虽不算重，但走在冰上常滑倒，很辛苦。贺彪部长和警卫员也拉着一拖子和大家一起运煤，一路欢笑，对大家鼓舞很大。有贺部长和我们一起艰苦劳动，心里也不觉得怎么累了。

1947年春，我们卫生部的两个医疗队参加“汾孝战役”后开到黄河边的柳林镇穆村，准备和北线的贺部长带领的卫生部会合。我向祁开仁副部长请假回三区西上庄村探家，和家人欢欢喜喜地过完春节回到了穆村。贺部长见了我关切地问：“家里都好吧，你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挺生气地说：“你这个同志真是的，回了一趟家，这件大事都不办。是找不到对象？”我说“有对象，就是还没报告组织上批准，就没办。”他说：“反正也不太远，你明天就回去结婚。组织上我讲一下，我批准了。另外给你个任务，现在人手不够，你能动员些新兵来就好了”。我高兴极了！第二天我走之前，贺部长叫高管理员给我送来二十块银元。回家后我大哥为我张罗婚事，我每天忙着动员新兵。我们孝义县是个老根据地，新解放区。1933年刘志丹派闫红颜到孝义组织过红军游击大队；1936年春毛主席率领红军到孝义宣传抗日，和阎锡山部队打了一个多月后回到陕北；1937年春到1940年夏邓小平、杨尚昆带领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党校住在孝义。所以老百姓对我军很有感情。报名参军十分踊跃。当时有一首民歌唱到：“天上的云彩云堆云，地上的女儿新脑筋。不要媒人自由婚呀儿哟，一心要嫁八路军。”

婚后过了几天就把新兵带回了部队。得到了贺部长的表扬。

1949年进西安市后，卫生部组织了以祁开仁副部长为领队的卫生干部大队120人进大西南。我任政治指导员。出发时贺部长亲自把我们送上火车，并叮嘱到：“过秦岭巴山雪很厚，要注意防冻”。真是关心倍至，让我们依依难舍。

1958年夏，贺彪同志突然来到重庆市第七军医大学（现第三军医大学）。我问：“来开会的？”他说：“在成都开了会，就想来看看你们。”我和其他同志请他吃了顿便饭。席间他说：“谢满元（原通信员）来信说，回家以后生活很困难，我给他寄了些钱物去。”又对我说：“你打听一下张荣华（原马夫）的下落，从长征到冀中抗日、绥远解放这十多年来，总是我骑着马，他喂马。进了西安坐上了汽车，他连人带马调走，至今不知下落。想来真对不起他。”可见他对战士的感情有多深啊！

1971年夏天，我去北京三里河看望贺彪同志。他非常地热情，亲自和爱人陈凯同志下厨房为我做饭。谈了同志们在“文革”中受冲击的情况。临走时他说：“我没车送你了，我的车在这里。”说着亮出了公共汽车月票。然后亲自步行送我到展览馆汽车站上了车。“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贺彪同志又恢复了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工作。1978年的一天，祁开仁同志和我们十几个人去看望他，大家畅谈了打倒“四人帮”的开心的话题。不料这次竟成了与贺部长的诀别。

贺部长你安息吧，如今这人寿年丰的太平盛世你虽然没有看到，没有享受到，但这不正是我们千千万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建立新中国革命的一个目标吗？

（张咸恒：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原政治部主任）

2001年4月

深切怀念老首长贺彪

侯景明

贺彪同志是我敬爱的老首长，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万分悲痛。他对我党、我军、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他离开我们两年多了，哀思中往事涌上心头，激起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贺彪同志是一九四零年三月从延安到晋西北 120 师卫生部（后改为晋绥军区卫生部）作部长工作的，我也在此时期由师政治部教导营调到卫生部政治处作组织工作，以后到医院作政委工作。建国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贺彪部长领导下的卫生系统工作达九年之久。但因当时职位的关系，无法知道他的全部情况，现仅把记忆的情况作介绍，表达思念之情。

亲赴战地抢救伤员

只要部队有战役行动或较大的战斗，贺彪部长他都亲自率领医护人员赴战地组织救护伤员。一九四〇年七、八月我军对日寇发起百团大战，他在山西雁北参加救护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绥远晋北大同战役，他率医疗手术队和医院组织伤员的救护安置。当时医院驻在右玉、左云一带，而他只随带着秘书、警卫员、马夫几个人，不顾新区危安、身体劳累奔跑在指挥部、手术医疗队之间，使伤病人员及时得到了住院治疗。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派其嫡系胡宗南统兵 24 万，向我陕

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进攻。我们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命彭老总率一野解放军与敌人浴血奋战，贺龙司令员命贺彪部长在黄河东岸部署后方医院，收容西北战场转下来的重伤员。47年底到48年初他即在晋南吉安、乡宁、江津、绛县三泉镇设置了医院。我有幸跟随他驻在三泉镇西北第二后方医院附近冯古庄。他经常去医院巡视检查，看望伤病员，参加研究医院治疗方案，有时还亲自给伤员作手术。有几次见他在白村后方医院直属所同许若韦同志一起作手术。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又赴西北战场工作。

重视人才关心干部

一九四〇年开辟晋绥根据地，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加之敌人的封锁，部队粮食短缺，一度伤病员较多，而医院缺医少药，伤病员痛苦不能及时解除。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医少药是卫生部门最大的难题。就在此时，延安总部派来了以祁开仁同志为首的医疗手术队（祁开仁同志是有名的外科大夫），他们的到来真如雪中送炭，是部队迫切期望的。给卫生部增加了技术骨干力量，缓解了卫生部门缺医的燃眉问题。为使医疗手术队迅速开展工作，而又能将这批技术人才留下来，贺彪部长建议在神木县贺家川组建了手术医院。由祁开仁同志任院长，并修建手术室，将卫生学校编属手术医院领导，让手术医疗队的医生任教，发挥他们技术专长，培养技术干部，为使他们安心工作，提出要积极主动做好团结工作，要和他们交朋友。政治上要关心，领导上要和他们多接触，多交谈，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当时卫生部与手术医院在两地驻扎，除去看望外，有时还派人送些食品、日用品等。针对有的同志不大理解，贺彪部长指示要教育干部，学习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重视技术人才，团结技术人员，生活上不能搞平均主义。

他关心爱护干部，特别是对战斗部队回到卫生部机关开会办事的干部关怀备至。说他们在部队辛苦，回到机关一定要好好照顾，让他们休息好。有时还亲自交代管理部门，安排好食宿，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都尽量给予解决。广大干部对他真挚的革命感情很感动，从内心里对他尊重和敬仰。

自力更生搞大生产

一九四二年，由于日本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为渡过困难，毛主席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实行生产自给，开展大生产运动。贺彪部长带领部队积极响应，坚决贯彻执行。他亲自为机关搞农副业生产出谋划策，驻地晋西北山多地少，可垦荒地很难找到，经他亲自查找，选定了络峪口上游黄河中间一块滩岛。滩岛上杂草丛生，多年淤积形成的有百十亩地，决定开垦五十亩地。在开垦中用船送肥时他亲自参加，播种的棉花谷物当年获得了好收成。他还亲自指导着木工制造了类似南方的手摇式提水灌溉车，受到大家的赞赏，还让他的马夫老张参加机关纺线生产组，后被评为机关纺线最多的能手。由于机关部队自己动手搞生产，解决了部分吃穿用问题，胜利渡过了困难时期，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贺彪同志文革期间遭磨难，被弄到江西劳动，七三年回到北京，此时我已在总后工作。我同崔燕常去看他和陈凯同志，七八年他到总后勤部任副部长后，我们见面机会较多，两家住的也较近，常去家里看望问候，见面时他虽然话不多，总关心地问候我们的生活情况，并关心地询问过去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们的情

况。有时他也谈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的形势。在多次去看望过程中，见他身体日渐消瘦，常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不爱说话。我们为他的状况很担心，总希望老首长的身体能有新转机，没料到他会突然病逝，离开我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丰功伟绩永存。

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和接触中，从他身上切实感受到一个老革命家的形象感染着我们，教诲着我们。他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对同志真诚关心热爱，对敌人无比仇恨，对四人帮一伙厌恶鄙弃。他一身正气，襟怀坦诚，好学求进，生活俭朴廉洁。他高尚的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首长贺彪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侯景明：总后政治部离休干部)

贺部长给我们平反

侯友桐

1943年秋，晋绥军区的干部，集中在晋西北黄河边的彩林地区，进行脱产整风学习，听取整风后一阶段的动员报告。我们住在一孔石头砌成的窑洞中，既是寝室，也是学习室，为了保证学好，后勤工作人员在困难的情况下，把伙食办得很好，每天小组按规定时间在窑洞中学习。大家端坐在炕上，几乎每个人手里都用碎纸卷着自己种的烟叶，而后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起来，接着，开始了紧张的“抢”与“救”。

一天，课间休息时，房东老大娘问大家：你们一天到晚吃不上好的，钻在窑里，不干活儿，嘈嘈嚷嚷，推来推去，在闹甚么名堂？是的，老百姓的确不可能想到我们是在进行“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在最上层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指导下，搞成了肃反扩大化。他们主观主义地要求某个单位要抢救百分之几的特务反革命，才算完成任务，这样一来就给下面增加了极大的压力，骨干分子为了完成任务，开始是主动地后来是不得已地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对待被抢救的对象，抢救无结果时，有的采取了车轮战法，轮班劝逼对象，也有个别人漫骂动手的，于是不少人被抢救成了“特务嫌疑分子”。

运动正在紧张进行时，我们四大队得到通知：回卫生部驻地——陕北神木府谷贺家川孟家沟，继续进行学习。四大队大部分是卫生部的干部，运动至此，我们卫生学校的教员已有不少被抢救成“特务”。

贺部长贺彪同志是四大队整风主要领导。1938年在陕北富县张村驿卫校第12期同学时，听说他在长征最艰苦的行军途中被王明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夏羲打成“改组派”，戴上手拷脚镣，进行残酷的迫害，差点儿没有活过来。现在，面对目前这种状况，他脑海中浮现出当年的那一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间，然而，限于身分，他也无能为力，只好迂回解决，因而想出了调四大队回原住地的办法。回来后他不时地采取个别地或会议的方式要求和提醒大家，要老实交代，不许胡说八道，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四个月后，对被错误定性的人，一批一批地做了甄别平反，保护了一大批好同志。

回忆这些消极面的东西，在这儿多费了一些口舌。无非是想温习温习“前车之鉴”吧！那种样式的群众运动，确实不能再搞了。

(侯友桐：第三军医大学原副校长)

深切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强少宇

贺彪同志是我国卫生战线上的一位老领导。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十分怀念他。

我认识贺彪同志是在1950年。当时他任西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卫生部长，我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供给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但是，真正认识他还是在筹建、扩建西北医学院的工作中。1950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西北地区缺医少药的实际，决定在原西大医院的基础上，筹备建立西北医学院。这年三月，组织上调我到筹建的医学院主管后勤、财务和基建工作，因工作中的问题，我有幸多次向贺部长当面汇报，直接听取他的教诲。他那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干脆利索的工作风度，以及关心爱护干部的革命情谊，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现在回顾起来，仍历历在目。

筹建医学院，首先必须解决院址问题。当时确定将西安城内一所私立中学的旧址划拨给医学院，但在交接中却有几个单位插足进来，说什么旧址占地八十多亩，医学院用不了，空下地皮太可惜，要求划出部分给他们。我将这一情况及时汇报贺部长，他听后说：现在用不了不等于将来用不了，事业在发展嘛，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将来还不够用呢。他及时开会作了协调。就这样，八十多亩旧址全部划给了医学院。他的远见卓识，给以后西北医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刚解放，接收的国民党烂摊子，可以说百废待兴，急需用钱的地方很多，何况筹建一个大型医学院，用钱的数目就更不用说了。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将基建预算送交贺部长后，他二话没说，一次性的给特批了人民币旧币七十亿建院款（折合现人民币七十万元）。由于资金全到位，我们抓紧施工，不到一年时间，就修建起三万多平方米的平房校舍，建院工作顺利完成。保证了教学和医院的需要。1953年经贺部长的争取，将西北医学院又列入国家计划，在西安市南郊征地一千多亩，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1956年，贺部长已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但他仍十分关心西北医学院的发展，当他得知医学院遭受水灾后，又给拨款百万元进行修缮和续建。就这样，在贺部长的关心和支持下，西北医学院经过前期的艰苦创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现在医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两千余新病床，专业、系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和现代化教学医院，几十年来，为全国，尤其是为西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各类医务人员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专家和领导骨干，为我们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又将医学院并入西安交通大学，使其进入全国名牌重点高等院校的系列，使原西北医学院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贺部长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尤其是关心爱护知识分子。1952年西北医学院开展的“三反”运动中，有群众揭发一位教授有重大的贪污问题，使不少专家、教授等十分紧张。贺部长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来院，召开教职工大会，讲解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既不使有贪污行为人的漏掉，也不使没有问题的人受不白之冤。对那位所谓有贪污问题的教授，他亲自听取查证报告，并找本人谈

话，最后落实教授没有问题。通过这件事，不仅教育了群众，而且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那位教授更是十分的感激，更加勤奋工作，后来还曾担任了西安市卫生局局长的要职。

（强少宇：陕西省文化厅离休干部）

2001年10月17日于西安

亲切的关怀 热情的鼓舞

姜恒明

一九四六年底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总卫生试验所迁至晋绥吕家湾，改称晋绥卫生试验所。一九四七年十月把我调到该所工作，直至西北全部解放，我一直在贺部长领导下工作。他的革命创业精神，对同志的热忱，对我感染之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现将我回忆起来的二、三事记述如下：

一、开创卫生事业的引路人

从我接触到贺部长后即深受教育和鼓舞。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部队在前方打仗，伤员中有百分之二的人患破伤风，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买不到预防救治的药品，就连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筹集的药品器械在运送途中也被国民党扣压。因此死亡率很高。前方指战员们反应，为了革命牺牲生命都不怕，得了破伤风实在太痛苦。中央首长的心紧紧地牵挂前方的伤病员。伤病员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调你来就是让你和李志中、翁远、周伯其四同志研制血清疫苗，救死扶伤，保护部队的战斗力。你们的任务是在三个月内制造出破伤风抗毒素，你们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会千方百计的设法解决。”后来，在研制工作中购买药品需要一些钱，制造破伤风抗毒素时需要为数不少的马匹，他立即向贺龙司令员请示汇报，贺司令员对他很器重，对研制工作积极支持。对他说：“你们需要的钱给白洋（到国统区买东西只要白洋），需要的马匹我立即下令调用，连我的马合用的话也可以使用。”贺部长也向

中央首长及时汇报情况，也得到中央首长的关怀。培养细菌需要琼脂（洋菜），毛主席指示，缴获到洋菜用快马送到卫生试验所。周副主席也从北平搞来破伤风菌种。贺部长这种不辞辛劳，认真负责忘我的工作精神，激励着我们卫生试验所的每一个同志，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亦无资料可循的情况下，同志们努力拼搏，锐意创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比如当时培养细菌用的试管、烧瓶起初都没有，就用日本鬼子的酒瓶及墨水瓶代替，没有大的孵卵箱，就土法设计制作了地坑孵箱，自制大型毒素过滤注射装置等等。在创制过程中碰到很多技术难关，没有测定破伤风毒素毒力和抗毒素效价规格的试验动物，就在狗、鸡、家兔上进行试验，在家兔上获得成功；在制造抗毒素对马匹的免疫中，单用类毒素效价上不去，便大胆地以类毒素做好基础免疫，然后用大量毒素进行高度免疫，获得抗毒素的高效价；自制标准毒素和标准抗毒素，测定出合乎国际标准的抗毒素。同志们遇到困难争着上，同心同德团结协作，日以继夜地奋战，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完成抗毒素的研制工作。随后大量制造供给前方，保护救治了大批的伤病员免受破伤风的危害。苏井观部长向大家传达了毛主席发来的贺电，大意是，你们和前方一样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全体同志倍受鼓舞。我们取得的成果离不开贺部长的关心，决心再接再厉，为党的卫生事业多作贡献。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临汾解放后，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药材生产，经苏井观、贺彪两位部长研究决定，一九四八年秋季，将晋绥卫生试验所与联防军卫生材料厂合并，迁到晋南新绛泽掌镇，随后把晋绥制药厂也合并进来，组建成西北人民制药厂，下属血清疫苗、制药、卫生材料、医疗器械、木工五个部。在建厂时贺部长指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利用民宅、破庙自己动手，就地取材修建厂房。同志们全体动

员，分别学做木工，学做泥瓦工，起早贪黑奋战一月，修建了合乎工作需要的各类工作室。贺部长看望大家时说：“你们干得很好，争取了时间，节约了开支。”血清疫苗部完成任务最好，卫生部授予了集体一等功和“发扬艰苦奋斗”奖旗一面。天津、北平解放后派我到京津两地采购机器设备与原料药材，生产条件大为改善，产品产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为大规模生产药材打下一定基础。当年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药工会议，朱总司令和苏井观、傅连璋部长参加了会议，会上确定把药厂建成西北药材生产基地。一九四九年在西安建厂，一九五三年交给地方，即现在的西安制药厂。

二、尊重知识 培养爱护干部

贺部长经常对我们说：“卫生事业是需要知识的事业，它的工作都与人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从事此项工作，一定要很好的学习医药知识。”他很重视对干部的培养，关心学校的教育。药厂的药剂人才集中，生产设备和工艺比较完善，利于教学和实习。他就把西北医药专科学校（第四军医大学前身）的药剂班委托给药厂代办，培养一批合格的药工人员。他非常爱护技术人员，与技术人员广交朋友，对具有技术基础的干部，都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才能。就我个人来说，虽是大学毕业，但实践经验不多，制药也不是我的专长，但他先后任命我为主任、厂长，放手把建厂、生产重任交给我，使我在实践中发挥了闯劲和创新能力。在创制破伤风抗毒素成功之后，经卫生部党委授予我、周伯其、宿树楠三同志“甲级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使全厂的同志深受鼓舞。他对干部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看望同志，平易近人，亲切交谈。经常视察工作，具体指导。同志们与他的关系非常亲切，有机会就必定看望老首长。我每次看望他，他都告诉我有关老同志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探望他

时，他正在受造反派的冲击，他问我你们这些好同志不会因为我受到牵连吧？这表明贺部长对同志们政治上的关心。对我们这班人生活待遇上也是非常的照顾，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每月给技术津贴十五斤肉，见面时总是问寒问暖。有一次他看见我衣服有些单薄，就让人把缴获的毛呢美军军服和数件羊毛衫送给我，给我奶粉喂养初生没有母奶的孩子，救活了孩子，我永远铭记在心。老人家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永远怀念他。

(姜恒明：兰州军区后勤卫生部原副部长)

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赵培真

1949年5月，西安刚解放，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走上了革命征途。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奉献了一份力量。在1951年我由医学院毕业后又分配至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在当时任部长的贺彪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当时机关成员中有三个部分：延安来的老同志和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解放前的留用的人员。我们当时大部分时间从事教学工作，有时也在机关中跟随领导外出调查，深感以贺部长为首的老同志除了尊重、团结留用人员外，对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经验而单纯幼稚的青年人倍加爱护、认真培养，并寄以厚望。1954年大区撤消后，我又奉调至中央卫生部工作，贺老任副部长，仍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几十年来，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和实际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位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下级倍加关怀的革命老前辈。在“贺彪回忆录”读后，他的形象又不时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回想历历往事，难以忘怀。现仅就我了解和想起来的几件事写出来表达缅怀老部长的心情于万一。

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贺部长是一个十分勤奋好学的楷模，酷爱读书，他在党校学习期间，还在课余阅读历史和文学著作，记得一次来电话要我到

党校为他抄写诗词，我整整抄了大半天才得以离去。在“贺彪词选”一书和近来贺部长的回忆录中看到 he 写的大量诗词，说明他一直坚持写作。离休后，并未荒度时日，他还写了厚厚的一本回忆录和其它许多文献和资料，真是孜孜不倦。而且他受着多种疾病，尤其是类风湿病的折磨，他竟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这些病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直至生命终止。这样的老前辈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他在长期的救死扶伤的革命实践中，深知医药卫生人才和知识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国需要大量医药卫生人员，尤其是严重缺医少药的大西北地区更为突出。当时贺部长主持西北卫生部工作，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是我党的一贯政策。”他真诚、尊重和热情地团结了当时医药卫生界一些著名的老知识分子，贺老不但把他们当做知心朋友，并根据他们的专长，委以相应职务，使他们有职有权，在贺部长的领导下，这些老知识分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当他离开西北后，也不忘记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贡献，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每当出差到西安，总要去看望他们。而这些老知识分子也同样怀念贺彪同志，如原西安医学院院长侯宗廉老教授，直到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和贺部长之间的友谊和贺部长在人生观和革命事业上对他的帮助。

他在重视发挥老知识分子作用的同时，对建国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和爱护更是倍加关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不久，蒋介石反动派不断进

行空袭，胡、马敌军反扑西安，敌我双方对峙于咸阳一带。保卫西安的一场激战，迫在眉睫，前线急需医务人员。同时，第一野战军经宝鸡向甘肃挺进，解放甘肃兰州的战斗也十分激烈，急需医务人员。由于西北地区本来就严重的缺医少药，在国民党长期统治和反动宣传下，少数的城市医生对共产党尚心存疑虑，动员他们不可能也满足不了前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贺老协同有关部门动员西安高等医学院校的进步学生参军参干，迅速组织了一部分高年级的医学生参军，分别把他们编入第一野战军卫生部下属第一、二、三野战医院，6月中旬即奔赴前线；并给他们确定为副排级待遇，发了当时的解放军服（均为灰色粗布军装）；工作和生活与原部队军医待遇一样，享受全供给制；有处方权，参与大手术，并主刀小手术。这批学生随军转辗陕西、甘肃一带，从事战地医疗，在解放大西北的决定性战役中如扶眉和兰州战役等做出了贡献。其中武琦、冯白华两同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这批学生入伍后，成了野战医院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对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一些体弱和后来返校的学生安排在野战军后方医院服务。西北解放战争告捷，贺部长从战略角度考虑，为解决西北地区严重的缺医少药，西北军区卫生部又下令将这批学生调回原校继续完成学业（仍由国家供给）。为了解决基础医学师资的缺乏，毕业后又把他们分别送到协和、北医、南京等三所医学院设立的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和公共卫生五个基础课专业，由当时的知名教授如蔡翘、张钧、胡正祥等执教的师资班学习。完成学习后，分配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个省区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部门。这些学生成了开创西北地区医学教育的第一批种子，几十年来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大批医药人员，不少人已是著名

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把整个青春年华贡献给居住在这片古老而又待开发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保健事业上。

贺部长对他们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和在西北卫生事业中所作的贡献总是念念不忘，尤其是1982年中央关于离休干部条件的规定出台后，他特别关心这些同志退休后的待遇问题。当时他已离休，且有多种疾病缠身。但他完全出于对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他主持的这一历史事件负责到底的精神，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苦地一封封的证明信寄给当时参军同志所在单位，说明情况，并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表明他的意见。据了解除陕西省外，被分配到其它各省市工作的那批同志，都根据贺部长等的证明和中央文件精神给予了离休待遇。而陕西有关单位虽然也收到贺部长和当时具体办理此事以及接受他们的三个医院的主要负责人等多份证明和材料，但至今尚未落实。贺部长曾抱有遗憾地说，此事我最清楚，并写过很多材料，早应该给他们落实解决，不知陕西省怎么搞的，我们不能办过河拆桥之事（大意）。贺部长并不认识这些人，也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只是本着对他主持的这一历史事件负责到底的精神作出实事求是的证明，而且对他们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所做的贡献念念不忘，应当予以肯定，落实党的政策。现在老部长已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了我们，而目前仍未给落实政策的同志，有的已去世，在世的已进入古稀之年。现在开发大西北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要大量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我想那些尚未落实政策的单位如能尽早给他们解决这个不应发生的遗留问题，不但能告慰老部长在天之灵，更能启示后人。

1992年，一次我陪一位前西北卫生部的同事去看望贺部长，那位同事带了一些土产，可我手边只有一个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我把这个证书给贺部长看时，他却十分高兴连连点头说：这礼物好！这礼物好！说明只要他的部下对党和国家有所

贡献他就十分高兴。他对新老干部，新老知识分子的关怀，都是以其对国家的贡献为依据的。他的这种高尚的人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

主持正义，关心爱护干部

他对干部的关心在卫生部部级领导中也是少见的。北京西直门外净土寺卫生部住宅小区曾集中住了一批在卫生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贺老调离卫生部后，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总是怀着深厚情谊每年仍到小区看望老同志。在他行动困难时竟坐着轮椅去看望，同志们深深为之感动。他的辞世，大家无不为之落泪，痛失了一个保持共产党与群众水乳交融老传统的好领导。

贺部长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在乌云翻滚的“文革”中，不仅自己没有屈服，还敢于挺身保护所谓“黑帮子女”。我在协和医院学习期间，一天贺部长让他的儿子带了一个姑娘拿了一些X光片要我找人会诊，后来我才知道这X光片是正处于困境中邓小平同志的，那个女孩就是毛毛。

他对那些受到打击，对党忠诚刚直不阿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下级干部同样十分关注。1983年岁末，在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窗外寒风飒飒，室内昏暗，一个面色焦黄身体消瘦的病人仰卧在病床上，他就是一向称为老干部中最年青的硬汉子——刘美亭同志（原卫生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贺老从西北军区卫生部到中央卫生部，都曾是刘的上级）。那时，刘已是生命垂危，犹如风前残烛。刘一向是哪里艰苦到哪里去，诸如下乡医疗队、地震（内蒙、云南、唐山）救灾，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和贫苦山区如湖北医疗队以及河西走廊。因长期艰苦的工作，积劳成疾，由慢性活动性肝炎发展为肝癌。在这危难时刻，少数从不到下边做艰苦

工作的领导人对刘漠不关心，而且由于刘在工作中一贯刚直不阿，大公无私，得罪了某些领导或与之有不同意见的人，个别人甚至幸灾乐祸。就在美亭弥留之际，这时唯有贺部长听说后，由于骨折卧床，不能到医院探视，便躺在床上给美亭写了一封信，对美亭的为人和工作给予公正评价，这也是美亭临终前，亲自听到一位老领导给他的评价，从而得到莫大安慰。

老部长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不二，嫉恶如仇和光明磊落的高尚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他那孜孜不倦、诲人不厌以及尊重人才与爱护干部的崇高精神和美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我们永远怀念他。

(赵培真：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病理教授)

2001年11月

西北地区卫生医疗工作的奠基人

——怀念贺彪部长

耿 健

贺彪同志是我党我军医疗卫生战线上的老同志。长期从事卫生医疗工作和担任卫生战线上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受命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在工作中严于律己、热情待人、平易待人、工作认真负责，富于开拓精神，在西北地区短短的几年，率领广大卫生干部，深入群众，团结一致，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奠定了西北卫生保健工作的扎实基础，使以后的卫生工作能够持续发展不断前进，为西北地区的各项生产的发展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起到了巨大作用。

西北地区，解放前长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压榨下，生产落后，民不聊生，各族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疾病流行，医疗卫生工作十分落后，广大各族群众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特别是广大农牧区，由于严重的缺医少药，再加上卫生条件、环境条件很差，因此一些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小儿麻痹、梅毒等，流行猖獗，严重威胁着各族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针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和巨大的困难，贺彪同志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首先把培养卫生医疗干部，建立和健全卫生医疗机构，增强卫生医疗工作放在首位。除对西北原有的西安、兰州两所医学院，加强了领导，增强了教学力量，扩充了教学设备，并逐年扩大了招生名额，为西北地区卫生医疗工作的发展，培养和准备了源源不断的干部。同时还新建立了一批各类卫生学

校，到 1953 年底西北五省各类中级卫生学校已发展到 20 余所，为加速培养各类中级卫生干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地处祖国西北的新疆，也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建立了三所卫生学校，为边疆农牧区培养了大批的各少数民族的卫生干部，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源。此外，为了更快地培养和加强卫生工作的力量，还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设立了许多短期培训班，训练了一大批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如 X 光诊断，临床检验，妇幼保健，卫生防疫等人员，事实证明，这些干部不但解决了当时的急需人员，还为以后不断发展和壮大各级卫生医疗机构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工作质量，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卫生医疗工作的发展中，医药和医疗器材的及时供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西北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工业生产非常落后，医药和医疗器材的生产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解放初期卫生部即设立了西北药材总公司，各省也成立分公司，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各医疗卫生单位的急需，也对各单位工作不断发展给予了非常有力的支援。

解放初期，由于广大农牧区卫生人员、机构极其缺乏，疾病流行，严重危害各族群众的健康和影响生产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卫生部在短期内，抽调了老解放区和城市的一部份卫生医疗人员，并培养了一批卫生人员，组成了五个防疫医疗大队，分赴各地区开展以防病，“消灭四害”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西北五省也成立了类似的队伍，深入农牧业生产第一线 and 大的工业建设第一线，为广大群众，免费治病、防病，深受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基层还培养了一些卫生人员，建立基层的卫生组织，经过反复不断的努力，经过广大群众和卫生人员的数年辛勤劳动和奋斗，使原来存在的，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天花、黑热病、疟疾、梅毒等基本消灭，或得到控制。由于妇幼

卫生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新法接生在农牧区得到很快的进展和取得显著的成果，婴幼儿死亡率很快的下降了，婴儿出生率和成活率都有很大的提高，一些牧区人口从解放前的人口处于停滞或下降的状况出现了人口兴旺和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农牧业生产也得到发展，各族群众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西北地区的卫生医疗工作，在短短的数年中，由于贺彪同志精心筹划、积极领导，团结广大卫生人员齐心协力，为偏僻的西北地区的卫生医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取得很大的成绩。使西北地区的卫生工作能够和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一样，不断发展，大步前进，保障了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

贺彪同志和我们永别了，饮水思源，他所呕心沥血创建的西北地区卫生工作永远造福人民，给我们留下终生的怀念！

(耿健：原新疆伊犁自治州卫生处副处长，离休后现住上海市。)

第四军医大学发展

——倾注心血的将军

刘进才

秋天虽是凄凉的，可是在这里，丝毫没有这种感觉，绿绿的草坪，衬托竞相开放的秋菊，显得格外美丽。几位古稀老人，围坐在刻着花纹的石墩上，回味着战争年代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故事。现选几段叙述如下：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刚刚和平解放，贺彪同志奉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贺龙的命令，到北平、天津筹措后勤物资，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驻北平、天津办事处。

刚获解放的北平，社会秩序很乱，物价高涨不跌，人心惶惶。大、中学校多数未正式开课，从东北到北平来的医学界高级知识分子，处境也十分窘迫，加之国民党暗藏的特务制造谣言，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先洗脑筋，再行批斗。弄得失学青年和高级知识分子心乱如麻，情绪不稳；是参加解放军好呢？还是不参加好呢？高级知识分子应聘参军后究竟是乐还是忧。贺彪同志洞察这一情况，下决心同地下党组织联系，抓住机会想方设法招收一批失学青年，就地聘请部分教师医生，扩大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卫校发展后易名）师资力量和吸收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入伍参加人民解放军，将部队卫生学校学员的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贺彪同志掌握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采用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救国、解放军战士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事迹，做好思想动

员，并个别联系，说服教育，解除他们的顾虑，争取他们自觉地参加志愿军和应聘。

收获来自有心人，结果有四百多名初、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三十多名医生、教师报名参军应聘。他又通过教师、医生、学生的关系，给医药专门学校配置了不少的教学书籍、图表、仪器和解剖模型等，以解决教材不足。

贺彪同志，他爱护人才，尊重知识，同应聘的知识分子结下深厚的友情，朝夕相处，没有任何官架子。应聘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坦诚地说：“我们是在迷雾中找到了航船，看到了明亮的灯塔，解放军贺同志（指贺彪）是我们的引路人，方向正确，前途光明。我们到学校工作后，一定好好的教育人，为军队培养更多的军医，努力工作，答谢解放军的恩情。”

四百多名青年学生和三十多名教授、教员、医生换上新军装，由西北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史书翰和学员大队武广志大队长带队。到达山西省新绛县南古交村学校驻地后，受到全校教职员、全体同学锣鼓喧天夹道欢迎。

时光如流，我们已迈进了二十一世纪。迎来了高科技、新知识、应用电子信息发展新时代。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万不可忘记，这位跟随党和毛泽东主席，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解放战争，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经历了血与火斗争的将军。他创造性地为我国我军的卫生事业，为第四军医大学的发展，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音容笑貌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以及为人师表的革命军人风采，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0年10月于西安

怀念原第四军医大学的创建者贺彪副部长

梁泽民

原第四军医大学的前身是八路军 120 师卫生学校（亦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于 1941 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特别是华北抗日战争中百团大战的需要，在八路军 120 师司令员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的授意下，120 师卫生部部长贺彪和医务主任张汝光亲手组建起来的。1942 年扩大为八路军晋绥军区卫生学校。1948 年底易名为解放军西北军区医药专门学校。期间，学校转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线，边办学边参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医务干部支援前线。1949 年随军南下才从晋南农村迁址陕西省西安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0 年易名为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1951 年易名为第一军医学院，1952 年易名为第四军医大学（称之为原第四军医大学）。1954 年中央军委决定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撤销迁来西安与第四军医大学合并，这便是现在的第四军医大学。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批准第四军医大学为全国首批重点高等医学院校，为全国四所重点高等医学院校中的一所，也是中央军委确定的全军三所重点院校之一。1981 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硕士授权单位。1997 年又成为国家首批“211 工程”重点院校。

卫校在抗日战争中，为部队培养了 400 余名医务干部，为我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不少人在战争中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余生的同志早已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地卫生战线上的骨干。如 50 年代初山西省卫生厅

长张金、吉林省卫生厅长韦公浩，以后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的杨鼎成，石油工业部部级干部章德炎，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董家龙等均是卫校早期高级班的红军学员。全国知名的医院管理专家原北京医院院长董炳琨则是卫校第一期的学员。第四军医大学建校以来，为我军培养了5万余名医学专业人才，其中研究生3000余名。解放后培养的学生，不少人也已成为国内外知名专家和我军各级卫生机构的领导，还涌现出了曾被国家和军队授予“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华山抢险战斗群体”等荣誉称号的典型。1996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数量居全国医科院校之首。总数仅次于清华大学，居全国高校第二位。

贺部长领我们走上了革命路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刚捷，全国的大城市有三分之二尚未解放。时任第一野战军并西北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的贺彪，受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和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之命，赴北平、天津筹建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驻平、津办事处。任务是筹措解放大西北的有关物资。1949年初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社会情况极为复杂：奸商投机，企图大捞一把；地痞流氓横行，肆意敲诈勒索；国民党潜藏特务，伺机作案。总之，社会秩序很乱，物价飞涨，人心不稳。当时的形势是两党交兵，大局未定，许多知识分子思想矛盾进退维谷，还正处在犹豫徘徊之中。贺部长在筹措战略物资的同时，也关心着西北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然而当时西北却缺少高级医务人员，西北军区医药专门学校学员的文化素质也不尽人意。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北平地下党和魏一斋同志的帮助下，在北平当时大中学校多未正式开课的情况下，抓住时机招收了400多名青年学生参军入学，同时

动员了郭文宗、王化歧、苏成芝、李继硕、于清汉等 39 位高、中级医务人员到西北军区医药专门学校任教。

贺副部长曾经告诉我：“你们参军离开北平不易，当时北平市对你们这批知识青年不放，是我找了贺龙司令员，贺龙司令员又找了北平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聂主任还定不了，他又去找了北平市市长彭真，这才同意将你们放行。”我们当时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反动统治，凭着寻求真理的满腔热情，毅然跟着贺部长走上了革命的路。由西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校长史书翰带领我们一行 400 多人，乘坐闷罐火车从北平——天津——山东德州——河北石家庄——山西榆次——灵石，然后步行，晓行夜宿数日才到达山西省南部新绛县南古交村——西北军区医药专门学校所在地。

在贺副部长领导关怀下成长发展

跟随贺部长参加革命的老师 and 400 余名热血青年，在晋南艰苦的农村西北军区医药专门学校，经过一段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与思想改造之后，从思想深处接受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奠定了坚实的革命人生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完成了从旧社会教师到革命军队教师的转变，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到一个革命军人的转变。在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之后（在农村集会拉线听广播）1949 年冬从晋南新绛县徒步行军到了陕西省西安市，开始了医学专业学习。毕业后除留校近 50 名同学外，其余的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各海、空军医院；分配到兰州军区总医院、第一、二陆军医院等。有 40 多名同学参加了抗美援朝，王济农同学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后也有不少同学参加了青藏剿匪、西藏平叛。宋廷禧同学在剿匪中牺牲，定为烈士。

如今，北平参军的教师苏成芝、李继硕、杨为松、侯悦都年逾80岁，均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技术一级教授。已成为全国全军知名专家。于清汉教授年逾九十岁早年离休，是西北及全国知名精神病学专家。

400多名学生中，曾有2名军医大学校长（少将），1名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在部队的绝大多数已离休，多数为技术四、五级老教授或者老主任医师。技术三级以上教授、主任医师有10多名，其中技术二级教授及主任医师有5名，这些老教授和老学生（现已都是老教授、老主任医师了）都为军队和国家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贺副部长病逝的噩耗传来之后

当贺副部长病逝的噩耗传来之后，我悲痛万分，顿时热泪夺眶而出。在我们这400多名师生当中，我与贺副部长的接触最多，受教育最多，感情也最深。尤其是我负责编写第四军医大学校史以来，经常进出贺部长家。他教导我最多，给我的帮助最大。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向校领导作了报告，向许多他的老部下、我们的老师和老同学作了通报，并即提笔起草和发出了三份唁电。

经陈凯同志同意，我从西安乘火车上午到达北京，总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接我住总后招待所，下午即去贺副部长家中悼唁。我怀着沉痛的心代表第四军医大学、代表西安市和第四军医大学贺副部长的老部下、代表他在北平刚解放时带领参加革命的教师和400余名老学生，向贺副部长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之后与其家人一一握手深表慰问。我带着沉痛、敬仰的心在总后同志的陪同下回到了总后招待所。我那沉痛的心，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我多么想再和敬爱的贺副部长说上几句话，多么想再

聆听一次老首长的教诲啊！

次日上午我怀着更加悲痛的心情，再次代表第四军医大学、代表西安市和第四军医大学贺副部长的老部下、代表他在北平刚刚解放时带领参加革命的教师和 400 余名老学生，和总后一位处长乘车到八宝山参加了贺副部长的遗体火化仪式。

在那庄严肃穆的遗体火化会场上，悬挂着贺副部长的遗像，他安详的静静的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老领导、老战友、老部长，在哀乐声中围绕着他走过，每个人都深深地三鞠躬。贺副部长永别了！您把毕业的精力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敬爱的我们参加革命的领路人——贺副部长，您安息吧！

我们永远怀念您！

敬爱的贺副部长，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梁泽民：第四军医大学校史办公室主任、教授）

回忆贺彪部长二三事

于清汉

贺彪部长是我们一行参军的领路人。1949年3月初，北平解放时，我们正和沈阳、长春等地医学院校的教授、讲师和医生以及北平一些教授、医生、护士和技术员等人，观望大局的发展，考虑战争局势和我们今后前途的去向，工作、失业、生活等问题都在迷茫中失去方向。正在这时贺彪部长在北平等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驻北平、天津办事处，观察到一批医学院医生、教授、护士和技术员失业，处境困难，生活无着。贺彪部长当即决定，就在北平招收我们一批教授、讲师、医生、护士、技术人员等39名。同时，又招收400余名高、初中学生。并购置大批医疗仪器、教学设备、图书和药品。史书翰校长和吴广志同志来京带领我师生400余人乘车进军山西省南古交驻地校址。

19××年，干部部门评定我们教员属于离休或退休的问题。离休和退休按总政治部文件的内容条件，根据参军年限、时间和生活待遇等划分为离、退休两种。我们一行39名参军日期是1949年3月初，即1949年10月1日建国前，不是供给制，也不是工资制，是属于包干制，是按当时解放后和建国前之间的阶段，就是既区别于供给制，也区别于工资制，是为了我们39名同志当时的特殊情况，生活需要的暂时措施。八十年代提出离休和退休待遇不同。如何评定我们39人是离休或退休待遇，干部部门对我们的待遇意见有分歧。司局领导难以决定。因为对1949年当时情况不了解，因此，请示贺彪部长，贺部长来信写

道：①于清汉以下 39 名在北平是我招收；②当时部队未有工资制；③为了招收一批知识分子，暂行包干制（以小米斤数价格计算）。

在贺彪部长关怀下，我们的参军和离休待遇问题解决了，已无后顾之忧。现在继续工作的和离休者还有 10 名。

（于清汉：第四军医大学教授）

怀念贺彪部长

胡 铮 张敬娥

贺彪副部长是我们深深爱戴的老人，他生前与张查理来往密切，我们是张查理的子女，藉此出版纪念他的专册之际，特写此短文，寄托我们对贺老的怀念。

张查理是我国老一辈的解剖学家和外科学家。早年毕业和工作于沈阳奉天医科大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他义愤填膺，自发与爱国人士收集大量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资料，公布于世。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虽身受酷刑，仍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后经多方营救出狱。他不甘在沈阳日军铁蹄下做顺民，离职南下，供职成都中央医学院。1942年，他深感大西北缺医少药，怀着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奔赴兰州，历尽艰辛，创办兰州西北医院。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强令限期兰州西北医院迁往青海，否则轰炸医院，夷为平地。他不顾个人安危，团结组织全院职工，并亲自持枪，昼夜护院。终于迎来兰州解放，兰州西北医院完整保存下来，改名为兰州军区总医院，继续担任院长。后调任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和北京中央卫生部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资料组长。在职期间，他日以继夜，勤奋工作。在反右期间，被划为右派，调离卫生部，到天津医科大学教解剖学。最后因他古稀之年，退休回北京。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度遭到身心摧残，于1970年含冤辞世。

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卫生部正式发文，通知他的子

女“错划右派，恢复名誉”。贺老亲自到张查理的子女家安慰他们，含着眼泪，话不成句，断续地说：“张老是人，有名的外科学家。我在解放区，用他写的《外科实用解剖学》为课本，培养医务人员。写得很好。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很尊敬他，记着他的名字。解放后，我发现他在兰州，请他到西安帮忙。我来北京中央卫生部，推荐他来北京卫生部，更发挥他的作用。不幸十年动乱中，我没有能力保护他。吃了苦头。真对不起张老，也对不起你们。”从此，贺老每逢春节，不顾严寒，总要来张查理子女家，看望他们，亲切地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每次见到贺老时，内心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慈祥 and 真情实意。他器重张查理的学识，再三地重用他，目的不是建立私人感情，而着眼于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爱人才。他这种崇高的精神，教育我们为中国的富强昌盛而努力。

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聆贺老的教诲。但他的《词选》出版后，亲自署名，立即寄给我们。我们捧着他的《词选》，一气读完，以后不知读了多少次，爱不释手，从中获益匪浅。《词选》生动地记载他的高尚精神和非凡的一生。正如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贺老赠送我们这本《词选》，体现他时刻不忘爱护和教导张查理的子女。

我们永远怀念他！他的伟大形象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胡 铮：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教授，张查理的女婿）

（张敬娥：北京眼科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张查理的女儿）

正义的贺彪将军

宋儒耀

解放初期，由于抗美援朝和整形外科医院工作，我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师及戴正华、饶正锡和贺彪诸将军有过较多的接触。整形医院的院名，即是朱老总亲笔所书，在和他们接触中，我发现他们除了军事天才以外，都是少有的充满正义感的人，是今世之人的学习楷模。现介绍有关贺彪将军的两件事如下：

一

一九五七年秋，卫生部党委为了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北京民族饭店开展一次全国性的“拔白旗”运动。会场上两个鲜明的标语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竖无产阶级卫生正气”。批判的对象是当时我国知名的七位卫生工作者。我不幸是七位当中的最后一名（在健康报上的排名）。全国批判以后，各所在单位又深入批判一个时期。最后，才不了了之。

“拔白旗”运动在卫生系统虽然结束，但它在全国的影响并未完了。运动过后，全国的医学杂志全都停刊。数年之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促之下，才得恢复。

历史是公正的。我的“罪行”是我发明的“一个新的腭裂修复术”。美国著名腭裂外科专家，S. Wynn 采用我的方法给数目较多的患者治疗以后，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和严谨的科学检查，于 1976 年发表文章，说明该手术为无害而有益。

七位中的汤非凡教授的“罪行”是他发现沙眼的病因是一种类似病毒的病原体。他将从病人眼部取得的病原体接种在自己的眼结合膜，产生沙眼以后，又在自己的结合膜病变处培养出同样的病原体。英国医学会于1959年称他的工作是50年代最重要的发现。不幸，他在运动中愤极自杀！

钟惠澜教授是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主任编辑。他用英文向国外介绍新中国的医学成就，功不可没。

冯澜舟教授是杰出的寄生虫学家，运动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一日雪后，自己挎篮上街买菜，因路滑而摔倒在马路沿上，当即死亡。死得“轻如鸿毛”！

篇幅有限，不容我一一叙述。总之，七位教授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初期，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把他们当“敌人”来批判，人民群众颇有看法，特别在对于错划为“右派”的人都给平反后，对于这些无辜的学者，竟是无人过问。

使我永远难忘的是：在中华医学会成立7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贺彪将军发言，提出应该给1957年定为“白旗”的七位教授平反。当时坐在我身旁的钟惠澜教授，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这回我们可有希望了”！作为七个“白旗”中唯一还在世的人，我由衷地尊敬他，因为当时的社会“左倾”思想的余毒还很深，许多人还没有转变轻视知识分子的观念，专家教授的政治地位不高，而且在经历了数次运动后，许多学者都感到悲观、失望。贺彪将军能够在这种时候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无疑鼓舞了我们为党和国家继续努力工作的士气和信心。

二

1950年的朝鲜战争，美军依仗他的空中优势，给我志愿军

造成大量的凝固汽油弹烧伤和炸弹炸伤，急需整形外科治疗。1951年春，我率领一个“西南整形外科手术队”，亲赴前线，出色地完成了大批战伤的修复治疗，给我国“军队外科史”增添了整形外科一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给部分尚未治愈的重伤员继续治疗，同时培养更多的整形外科医疗工作者，于1957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和平医院（原法国医院），成立中国第一所整形外科医院。医院面向全军、全国开展这个专科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党的领导和众多同道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整形外科即由无到有迅速地以高质量发展起来。此后，这个医院转归地方，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1969年末，在文革的高潮时期，这个医院被关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9年经国务院6位副总理签字批准，整形外科医院又在北京八大处原亚洲学生疗养院恢复重建。当时，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我国经济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无不缺少资金，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贺彪将军从财政、物资等各方面大力支持整形医院的恢复，从而为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整形外科专科医院的重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贺彪将军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医务工作者，他还是富有正义感、事业心和高尚品德的正直的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宋儒耀：整形外科医院原院长、教授）

深切怀念贺彪同志

刘锡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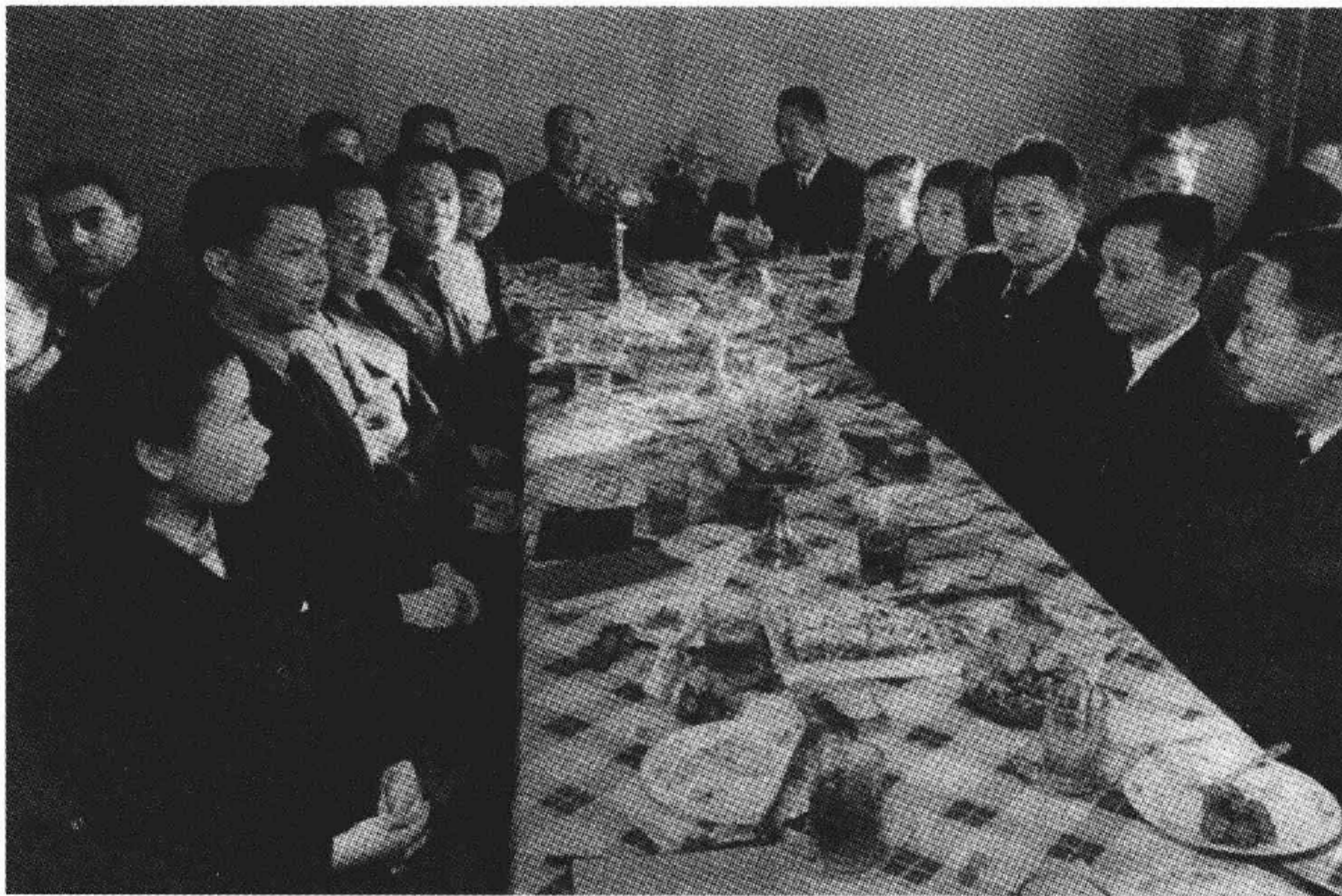
贺彪同志是党和军队卫生工作的老一辈领导人之一。他于1926年17岁时投身革命，终身奋斗在卫生战线上。他工作勤奋，开拓进取，建树颇多，为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卫生事业鞠躬尽瘁，为保障和改善中国人民和军队官兵的健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贺彪同志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岁月的流逝，丝毫没冲淡他给我留下的富有教益的印象。他的坚定的政治信念、优良的传统作风、耿直坚韧的性格和关爱青年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有幸於1959和1961年两次随同贺彪同志（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去欧洲出席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天天接触，亲身感受他待人处事的风格，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现择其印象深刻者记叙如下。

重视交流，学人之所长

第四届社会主义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于1959年9月18日起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均派代表团与会。中国代表团由贺彪副部长率领。此届会议的主题为《乡村卫生事业的现状和远景》。贺副部长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乡村的卫生活动——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的报告。他在发言中，除介绍我国乡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and 成就外，着重阐述了如何



1952年9月,莫斯科。为中国政府卫生工作代表团举办的欢迎宴会。

发动群众改善乡村卫生面貌的做法和经验，受到与会各国的重视和好评。代表团还散发了中国大规模防治寄生虫病的书面资料。各国代表对我国在防治寄生虫病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表示赞赏。



1961年，贺彪访问前民主德国，参观实验室。

（右一为翻译刘锡荣）

3天全体会议后，主办国用6天时间安排参观保加利亚的卫生设施，重点访问农村地区。保加利亚是个以生产农产品为主的国家。二次大战后，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农村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医疗预防体系，传染病得到控制，农民可以就近医疗。保重视培训医务人员，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尤其重视妇幼卫生的宣传和实施，大大降低了婴儿和产妇死亡率。这些都是可供各国借鉴的好经验。

贺副部长对出席国际会议十分重视。出国前着重抓了发言稿的准备，力求发言精炼，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出国后，他要求

中国代表团成员认真听取和观察其他国家的好经验，以利借鉴，特别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那些措施。此次赴保与会收获很大，这是与贺副部长一贯重视国际交流、学人所长、为我所用的思想分不开的。

在保加利亚参观的最后一段是黑海边上的瓦尔那市。这是欧洲著名的疗养胜地，海边是一条宽阔的金色沙滩。站在海滩上向后望去，远处小山坡上是建筑别致美观的疗养院和旅馆，近处沙滩上是一排排简易的季节性帐篷，住满了众多来此游泳晒日光的家庭。贺副部长对帐篷十分感兴趣，向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帐篷租金，帐篷使用率以及人们的接受程度问题，与住在里面的青年夫妇交谈并与孩子们逗乐。了解情况后他对我说，这个东西好，好就好在投资少，使用方便，租金低廉，群众欢迎，特别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看到我在仔细听，又进一步说开了。他说中国现在还穷，人们的工资低，生活还比较艰苦单调。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将会增加，将来也会有年假，人们也会有外出度假的需要。此时沿海省市政府应发展一些便宜的旅馆。休养快乐是人们的要求，而这种帐篷是个很好的选择，值得今后在国内试用推广。贺彪同志作为卫生部的领导之一，分管计划和卫生机构的发展和建设，他不仅考虑眼前，同时也在规划设计远景的发展，为人民提供合乎国情的及医疗休养设施。他心中挂念着人民的健康并时时处处为此操心。他与我的谈话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真情心声的流露。

多做工作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

第六届社会主义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于1961年6月5日至7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中国代表团贺彪部长率领。在匈

会议期间，中匈关系正处于低谷。会议主办国囿于中苏论战和政治分野，虽邀请中国赴会，但官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不冷不热，担忧中国代表团的影响。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事业远景规划中的主要问题》。我代表团成员、卫生部计划财务司陈致明司长在会上作了《中国医药卫生队伍的成长的报告》，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会后，代表团到匈牙利各地参观访问。

参观前夕，贺副部长召开全团会议提出。会议期间，虽然官方接待冷淡，但应当相信中匈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是谁可以轻易抹去的。他要求大家在参观访问中积极主动接触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促进了解，增强友谊。在各地参观访问的7天中，代表团了解了钢铁中心的工业卫生工作和中心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参观了药用植物研究所、温泉浴疗所和结核病疗养院等单位。由于中国代表团采取主动，与广大医务人员和工农群众进行了交流和叙谈。我们发现，基层群众与过去一样对中国人民友好，很乐意与中国来访者交谈。中国代表团周围总是围绕着一批匈牙利友好人士，打破了会议期间的沉寂。

在埃格尔市参观医院结束时，一位高年资医生邀请中国代表团去他家喝咖啡。他说他夫人和孩子听说中国客人远道来此参观，很想见见中国医生们，如能去他们家稍坐，这将是他们很大的荣幸。当我们到达他家时，他夫人拿出家中所有的美食和水果来招待我们，不仅端上浓香的咖啡，还将久藏的葡萄酒瓶打开，请大家干杯。夫人让12岁的大女儿在钢琴上弹奏匈牙利名曲，供客人欣赏。大客厅内洋溢着中匈人民之间的友谊。临告别时，贺副部长向主人赠送了中国工艺品，女主人说我一定要把中国礼品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他们全家送我们至门口告别。这时周围邻居知道了，也纷纷出来，加入送别行列，中国代表团走远

了，但几十双热情的手仍在空中挥舞道别。此情此景久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尊重知识，关怀医学专家

贺彪副部长在布达佩斯与会时，遇到了也在布市参加国际放射医学会议的协和医院一位放射科女教授，她回国的日期与我们的归期接近。当天晚上，贺副部长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这位女教授是学科带头人，对发展我国放射医学作了很多工作。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在工作上要支持他们，在生活上要尽可能地照顾他们。她从匈牙利回国要在莫斯科转机，一个女的单独旅行诸多不便，你设法调整她的行期和机票，让她与我们代表团同行。经过努力，重新安排了她的行程。她与我们同乘火车由布市去莫斯科，我们把最好的包厢下铺让给她，在莫斯科上飞机时，又把最好的座位让给她。她深受感动，多次向贺副部长致谢。我深信，她一定会把部领导对她的支持和关怀转化为行动，更好地投入医学教研工作，为发展医学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归程中的这一插曲给了我深刻教育。我亲眼看到贺彪同志是多么尊重知识，爱护关怀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大家一起工作。在我逐渐成长担任较负责的工作时，我一直以贺彪同志为榜样，尊重知识，在国际交往中尽可能地给老专家们以支持，与中西医专家交朋友。这些均是受了贺彪同志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贺彪同志受到冲击，被专案组押解到江西永修县“五七”干校强迫劳动，继续接受审查，直到1972年5月，在周总理关怀下，他得以从江西回到北京，暂在和平里安家。回北京后，许多老专家打听他的住址，坐了公共汽车去贺彪家中看他，像张孝骞、钟惠澜、吴桓兴、吴阶平、吴英恺、吴慰然、张

庆松、林巧稚、胡铮、宋汝耀、王巧璋、魏龙骧等。他们都是我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仅这张名单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更增加了我对贺彪同志的敬意。

难忘的多瑙河畔的教诲

在布达佩斯与会期间，各国代表团均住在临近多瑙河的一座五星级旅馆中。一天晚饭后，我陪贺彪同志在多瑙河畔散步，后来又靠着河边护栏，远望河对岸的国会大厦建筑艺术。这时，我鼓起勇气向贺彪同志提了一个早想获得答案的问题。我说贺部长你早年参加革命，没有进过正规的中学，更没有上过大学。可你文化水平不低，文理通顺，讲话有条有理逻辑性强，听说你还会写诗词，你能告诉我，你是怎样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吗？贺彪同志带着微笑转过脸来，用长辈特有的慈祥眼光注视我这个年仅20余岁从医科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卫生部尚涉世不深的小伙子，他稍加思考后，开始回答我的提问。他说：“小刘，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要终身面对的问题。首先你要提高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做革命和建设工作的，一定要重视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有了知识你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你才能分析问题，你才能提高管理水平，做好工作，而且这是一辈子的事，要话到老学到老。只有你认识了学习的重要性，才能提高你学习的自觉性。第二，在学校学习当然好，但我们革命工作很忙，无法都去学校正规学，你就得学会挤时间自学，点点滴滴地学，积少成多，时间长了，也能学到很多知识，从而提高管理水平，完成工作任务。”他还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肩负繁重的领导责任，战斗忙时全身心投入战斗，在战斗间隙和工余时，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面，政治理

论和中国历史书是他最常读的。时间允许时，他也钻研古文和诗词。最后他把他的学习经验归纳为：思想上重视，行动上挤时间学，持之以恒，必有所成。

多瑙河畔的短暂谈话已过去了40年，但自那时起对我影响最深。我一直保持着看书的自学习惯，每晚必读完当日报刊，并选读工作急需的知识，充实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做外事工作的干部应力求做到“外知世界，内知国情”。读书使我接近这一水准，本人也从读书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贺彪同志的优点很多，上面谈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断。贺彪同志是卫生界受到大家敬重的老领导。为了追念他，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品德，他的品德将是我们不时汲取的最有益的源泉。

(刘锡荣：卫生部外事司原司长)

记贺彪同志二、三事

苏 菲

贺彪同志和马海德大夫生前从延安到北京一直都在卫生系统工作，俩人的私交非常好，可算是挚友，因此，我们两家从延安到北京也一直是经常来往的好朋友。现在他们两位都已作古，缅怀他们的友谊，感慨万千。

贺彪同志为人精明、干练，且平易近人，对战友、部下和年轻人都关怀备至，因而，也深得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在延安时期马大夫享用每月有四斤肉的特殊待遇。每次他都是和好友们分享，领回肉他都会提醒我一句：“省着点吃，好约贺彪部长他们来家聚聚”。差不多是两个星期约请贺彪、饶正锡、苏井观和巴苏华大夫一起来我们窑洞打一次牙祭。大家一起动手做米粉肉，这可是当时最好吃的菜肴，我们用洗脸盆把肉洗干净切片、再把炒好的米用擀面杖擀碎和土豆片一起上锅蒸。削土豆的任务是贺彪同志的“专业”，因为他不会干别的活儿，一把大笨刀，他用起来还很灵巧的，削出的土豆基本合格。米粉肉出锅后，大家吃的特别香，肉再肥，也没人挑剔，饭后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直到现在，我每忆及那时的情景，激奋之情，久久难以平静。俱往矣！

全国解放以后，大家一起到北京，贺彪同志仍在卫生部任职。延安时代米粉肉餐式的聚谈，因为工作忙，虽然机会少了，但彼此的关怀丝毫未减，大家偶然叙及那段往事，都会有无限的温馨和快慰。



右起：廖承志、贺彪、苏菲、马海德

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文化大革命”来了，卫生部一下子被宣布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是被打倒单位，部长们首先被揪斗和抄家。一天深夜，贺彪同志的女儿16岁的小贺利，从我家的后窗爬进来要求“避难”，我马上将她安排好，自己心里却非常痛心和难过，贺彪同志和我们这些人当然也包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马大夫，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正是为了像贺利这样的孩子有个美好的明天吗？而现实，却让这样小小年纪的孩子受惊吓遭磨难，我们这些作监护人的父母和长辈又到哪里去说理和讨还公道呢？多少年过去了，贺利自美国留学归来看望我们，谈及那段往事时，从她眼神中看不到那场大劫难的阴影，而我却凄凄然，心想：怎么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后辈人不再遭遇那疯狂灾难的人生？众所周知，那灭绝人性的时刻，贺利那样的少男少女还可以跳窗避难，而他们的老爷子只能等着被揪斗和被强制劳动。可怜他们有的年事已高，有的体弱多病，几乎每天都要被两派群众轮流揪斗，揪斗时被强制弯腰，做喷气式，斗完后还要去挑煤。运煤当属重体力活儿，加上牛棚里的清水寡油的伙食，他们早已饥肠辘辘了，哪里还能干得动多少活儿，而监工的则不依不饶，轻则呵斥，重则打骂。一天，钱信忠、黄树则和贺彪同志为—组的拉煤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被马大夫看见了，忙回家叫了儿子幼马和保姆黄玉兰替他们装车，换下他们进屋喝茶休息一下。开始，他们不敢接受这样的善情，怕被监工的发现，罪上加罪。聪明的老保姆黄玉兰对他们讲：“你们只管进屋和马大夫喝茶休息去，我一个人装车可以，看到有人来时我进屋叫你们出来。”“四人帮”倒台后，贺彪同志对此事念念不忘，一再说黄玉兰是善人，一再向她表示谢意。我对贺彪同志说“造反派用了调虎离山计，等马大夫和我都不在家时，进门就抄家，家里只留下黄玉兰一人，她不顾造反派对她的威胁，大喊大叫，表示反抗，他们把

她捆在椅子上，嘴给塞住，不让她乱说乱动，她一点不屈服。”以后我问她：“你当时不怕吗？”她说：“我怕什么？我是工人阶级，你们都是好人，他们那样对你们是错的。”贺彪同志当时也补充了他被揪斗时的一件事：“一天，两派人揪斗我，对我推推搡搡多时，等到都斗完了，我回牛棚，一摸棉大衣口袋里，有两个新鲜的馒头，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看来，世上还是好人多”。

是的，还是好人多，好人越多才可以制止坏人作乱。我们的后辈人才可以长治久安。我们寄希望于法制和德治，并以此告慰贺彪同志在天亡灵！

(苏菲：马海德夫人)

2001年5月30日

忆部长良师贺彪同志

张 侃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贺彪同志接人待物最可敬的特点。对工作，他坚持真理，正义直言，是个有威信的好领导；对同志，他严格要求，关心爱护，是个让下级敬重的良师。我 1950 年在全国第一届卫生行政会上与贺彪部长见过面，1952 年在全国第二届卫生行政会上又和他谈过话。1954 年贺部长调到卫生部后，在他的领导下所受教诲很多，有几件事使我受益终身，没齿难忘。

一、1950 年，卫生部在筹备全国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时，决定调我们刚毕业的十几个同学去调查农村卫生情况，并留我们参加会议，从而有机会见到年轻英俊的贺部长，知道他是老红军，长征干部，心生敬佩之意。当时卫生部医政处鲍敬桓处长，以当个好医生、做一个好的组织管理者，对人民贡献大，对社会造福多，来说服我们六位同学留部工作。但不到两年，大家都陆续离开，我也几次动摇产生回医院的思想。1952 年底召开第二届卫生行政会议时，我作会议联络员，并作小组记录。一次小组会休息时，贺部长主动找我说：你们在部里的同学都走了，就剩下你和邓乃序，问我安心不安心。他再次重申鲍敬桓同志讲过的道理，恳切地说：你是科班出身，懂业务，卫生管理工作很重要，需要懂行的人来做。并一再鼓励我安心。一席话，打消了我想走的念头，坚定了工作信心，稳定了思想情绪，奠定了一生的工作方向，终身不变，至今无悔。

二、1958年下放农村一年，1959年回部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所管的结核与疗养工作，人员先后调走，工作基本停顿。特别是1956年苏联疗养专家斯米尔诺夫来部后，领导要我用两年时间把苏联疗养经验学到手，并特地成立疗养结核科。两年中随专家到国内有名的疗养区，搜集了大量人文地理、气象地址资料，以及疗养工作现状和发展建设的设想。中苏关系恶化，殃及疗养，一切将弃置无用，心情受到压抑。1960年底，贺部长去中南地区调查农村救灾工作，特地要我参加。从湖南工作结束后到广州，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房间，问了我两年多来的工作、学习、思想情况。我如实向部长汇报后，贺部长以长者的身份，良师的语气，情真意切地说：不要消沉，挫折是最大的学校，要抓住时间好好地读点书，先读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列的其它著作，同时还要读点历史。要认真地读，还要认真地思考。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唯物论、辩证法，对你今后的工作与进步十分重要。至于那些疗养资料，抓时间整理出来归档就是了。那些宝贵资料，将来肯定会有用处的。此时我似乎恍然大悟，贺部长特地要我陪他出差的用心，倍生亲切感激之情，不禁潸然泪下。

回部后，我即认真按部长意见，开始读书，除了那两本书外，还读了反杜林论，并结合中国历史，对照自己十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自觉思想境界有所提高，对事物的认识有豁然开朗之感，从而驱走了消沉。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每念及此，心中总是充满对部长良师教诲的无限敬意。

三、1962年贺部长建议调我到城市处管医院，参加由他亲自主持为整顿医院起草文件的工作。

贺部长十分关心人民健康，关心农民疾苦。他经常说：卫生队伍70%在医院，卫生经费也是70%用在医院，搞好医院是搞

好卫生工作的重要环节。但医院必须面向基层，面向农村。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把自身建设好。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出对卫生工作重要指示后，贺部长于1957年底主持召开了“全国医院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勤俭办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强调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医务人员；加强城市划区分工医疗，大小医疗机构建立逐级业务指导关系；通过了《综合医院工作制度》23项337条（后修订为64项580条）和《综合医院工作人员职责》13项350条（后修订为97项642条）等等。这就为医院的管理建设发展制订了重要的方针政策。

1958年大跃进，医院工作受到冲击。1959年贺部长又主持召开“医院工作制度座谈会”想予以纠正。由于反右倾运动，不但座谈会中途停止，而且又遭进一步的冲击破坏。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号召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贺部长当即抓住时机，对医院工作进行整顿。从外省市抽调几位有经验的院长和医政处长，与医政司的同志共九人，住到颐和园，起草整顿医院的文件。贺部长与大家一起研究分析材料，共同讨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见。这种领导与同志一道研究问题的工作方法，既产生较高的工作效率，又是领导艺术的实际演练。贺部长教会了我重要的工作方法。

贺部长胸有成竹，明确提出这次整顿医院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一是要明确医院的基本任务是以医疗为中心，医疗是医院任务的基本实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保证，同时要实行医疗教研相结合，只有在以医疗为中心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好的临床医生，才能在总结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发展医学科学技术；二是在培养人才方面，对老专家要尊重，要发挥他们学术带头人作用，对中年要作为培养重点，使之成为承上启下的骨

干；对青年，要严格要求，要加强“三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三严”（严肃的工作态度、严格的工作作风、严密的工作方法）训练；三是要恢复几个重要的制度，包括总住院医师制，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恢复护理部，明确医护分工；四是要着手研究拟订医疗护理常规和各项技术操作规程；五是经过修改，重申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和医院工作制度。有了这些明确具体的意见，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关于当前医院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医院工作四十条）的起草工作，经部党组讨论后下发全国，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医院整顿工作。这个文件的基本思想和内容，一直是1964年和1981年两次制订《全国医院工作条例》的基础。对目前和今后医院的管理建设工作，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贺部长对我国医院工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四、1984年我从卫生部调到中华医学会工作，许多同志都热情颂扬贺部长在任学会会长期间，特别关心学会的学术活动和杂志工作，尊重专家，重视专科学会，主张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他离开学会后，每年都到学会看望工作人员。学会的同志每谈及此，都流露出无限崇敬心情。我到学会第一个春节去贺部长家看望，他一如既往，开门见山叮嘱我要从头学，好好干，似闲谈又是指点。他建议我有计划地拜访专家，特别指出要请教吴英恺、钟惠澜、吴慰然、宋儒耀等等，春节前后要拜访他们，至少也要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说吴阶平当了会长，要多向他请教，及时向他汇报。并说办好学会一定靠专家、靠会员，要发挥理事会常务理事的作用，不要搞“秘书长专政”。学会机关要建立制度，要培养干部，要重用学会原有的工作人员等等。以后每年春节期间，我都去看望他，他每次都问问学会工作情况，并鼓励我好好工作。一次，当他知道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后，满目流露出满意与

喜悦之情。1999年春节是我与贺部长在他家中见到的最后一面。那次他谈了许多在卫生部工作的情况。谈到医院，谈到疗养院，谈到农村卫生，麻城蹲点，谈到文化大革命，在五七干校赶野猪，也谈到了学会，并让我向傅一诚同志问好等等。

贺部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对我的教诲、帮助极大，每忆及此，总要从内心默念：“感谢恩师贺部长”。

(张侃：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

永远怀念老部长贺彪同志

何 鸿 明

一九五四年为加强全国卫生工作的领导，贺彪同志从西北大区卫生部长调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那时我是部机关一个科员，对他的初步印象很深，他头戴一顶皮帽，年轻、潇洒、英俊、精力充沛，走路说话快捷，腰板挺直，颇有军人气质。机关一些年轻同志在私下也有过这样的议论，觉得卫生部来了一位非同凡响的副部长。他讲话湖北口音较重，而且有点口吃，开始我们听他的话有点吃力，慢慢地也习惯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确是一位不同一般的领导同志。

贺彪同志一贯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特别是敢于仗义执言。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卫生部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存在着一些问题，可是在那一段异常时期，很少有人，特别是在当时的领导层里，敢于提出认真的、客观的评议，或者给予善意的批评，而贺彪同志就是敢于仗义执言的个别领导之一，他不怕个人被误解，遭受打击报复，敢于站出来，难能可贵。众所周知，由于贺彪同志与党组主要领导同志对贯彻政策和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不同认识而发生争论，并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当时我曾有幸看到过一些贺彪同志自己书写和反复斟酌修改的发言提纲，其涉及内容很多，有关于中医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对卫生系统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和一批卫生行政领导干部被公开点名批判的事例；还有城乡卫生事业建设、医院管理以及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常见、多发病，诸

如精神病、麻风病甚至当时并不被人注意的头癣等的防治问题，他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总之，针对当时卫生部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忽视业务工作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不少意见。他的意见我认为都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提出来的，有事实，有根据，有的还有数据，正如他经常所说的“要算几笔帐”。这涉及当时卫生部在方针政策、大是大非问题上正确与错误的争论，贺彪同志代表的是正确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对此已经做出结论，如果当时能够多听一些正确意见，我们卫生工作一定会少受挫折，做出更大的成绩。在“文革”爆发的局势下，贺彪同志被误批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老爷”之一，他始终正确面对，冷静沉着，胸怀宽，遇事不躁，他本着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精神，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他在逆风腥雨艰难的境遇中，挺过来了，表现出一个革命领导同志的高贵品质，使我们深受教育。

贺彪同志对群众、下属平易近人，关怀热情和真情实意。就说一件事罢，一九五四年冬我结婚，按当时的做法就是在机关会议室举行一个简单仪式，但出人意料的是贺彪同志身为部长，刚到任不久就来参加一个过去素不相识的一般科员的婚礼，使我们夫妇极其感动。多年以后我们还常常讲起这事，怀念在心。晚年我也曾经有几次去看望贺彪同志，他都是特别热情，问长问短，谈起一些过去的事情，给我们以鼓励。

贺彪同志始终把卫生事业看成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大事，他十分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亲自领导各个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的编制工作，对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经常深入实际和基层调查研究，除了在卫生部内部各个业务部门之间做好统筹兼顾、妥善安排外，并积极向国务院、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反

映情况，争取支持和协助，共同把卫生事业办好。贺彪同志分管计划财务工作，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百废待兴而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认真贯彻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和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总体思想，有计划、有重点地合理部署各项事业的发展，第一个五年卫生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以后年度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期间开始建设了一批重大项目附有限额的卫生骨干，其中主要有北京、兰州、成都、武汉四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同时在北京市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建设，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及流行病研究所、苏联红十字医院、北京结核病疗养院、亚洲学生疗养院、中央直属综合医院以及为加强医学教育建设的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医科院、大连医学院、西北医学院、中南医学院、华南医学院等一批附属医院。为了培养中医新生力量，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先后创办了四所中医学院，当时全国中医医院也已发展到 79 所之多。

贺彪同志十分重视卫生基本建设工作，在那期间，还初步试订了城乡综合医院和部分专科医院的设计标准和面积定额，以及各类卫生机构的装备标准定额，这一系列工作都为我们如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更加规范地发展建设卫生事业积累了经验。

贺彪同志提出加强县医院建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十分严重，贺彪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和广大农民的看病就医问题，一贯强调卫生工作安排要城乡兼顾，要加强农村，对此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当时由于国家财力所限，对县医院的投资使用比较分散，一般是零打碎敲、添添补补，人员和设备也较少，大量农村病人长途辗转送到城市就诊，针对这一情况，贺彪同志提出自 1959 年起在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安排上，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加强县医院的全面建设，要求在三年、五年、八年内相当一批县医院要在房

屋、人员、技术、装备、管理等方面大体上接近城市一般医院的水平。这是贺彪同志对卫生事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决策，它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1962年在中央政治局听取文教口汇报设计的问题时，刘少奇同志就明确指出，县医院要充实，一个是要有一个像样的县医院，还应有几个分院。在加强县医院建设上，贺彪同志始终强调城乡兼顾、统筹安排，把城市与农村，县与县以下的卫生事业之间互相联系和有机结合起来考虑，所以加强县医院建设，实际上达到了更有效地发挥城乡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使它们的医疗质量和工作效率都得到提高，在保护人民健康，解决广大患者就医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此，贺彪同志直接抓了几个大区不同规模样板县医院的建设，亲自主持召开了徐水县医院建设现场会等一些重要会议和深入基层蹲点、调研，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县医院人员、设备、建筑设计等参考定额和标准。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2年，全国有一批县医院的面貌得到了较大改观。

令人遗憾的是，在那颠倒黑白的“文革”中，正确的决策遭批判，正确的规划实施倒退了若干年。直到“文革”以后卫生部恢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加强县医院建设才又一次提到正式议事日程，纳入中长期规划，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建设。

贺彪同志十分重视医院的经济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解决医院（约占卫生资源的70%）的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在五十年代，国家财政对医院实行的是“差额补助”办法，即医院的开支主要靠自身的业务收入解决，差多少财政经过核定给予补助，说是“差额”补助，实际上历年补助不足，缺口很大，以致医院工作人员的工资大部分也要靠业务收入解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这不仅影响了医院巩固和发展，也影响卫生队伍的稳定和

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对此贺彪同志长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抓住了医院工作人员“工资”问题这一主要矛盾，不厌其烦地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方案，要求国家财政把国家办医院的工作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3%的福利费，2%的工会会费）包下来，即所谓的对医院实行“包工资”的办法，这个建议经多方磋商，终于在1963年4月经国家批准实施。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几个方面都有利，首先是医院工作人员不再为自己的工资而担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其次是医院的各项劳务收费有了进一步的降低，减轻患者的负担；三是缓解了医院的收支困难，有利于医院的发展。这是贺彪同志为医院建设、为人民造福做的一件大好事，它得到广大群众和医务人员的欢迎。在今天看来，可能不算一回事，但在50年代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还有很大难度，在当时可以列为卫生部门经过多年争取才得以实现的一项重大改革。

贺彪同志十分重视和关怀计划财务干部素质的提高，一贯强调干部要牢固树立自力更生、勤俭办事业的思想；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深入下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讲求实效，力戒浮夸。贺彪同志也十分重视卫生统计工作，在一些卫生计划财务会议上都要对卫生统计工作提出严格要求，他历来强调在卫生统计工作上一定要讲真话、实话，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情况，为领导提供可靠的数据和资料。贺彪同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坚持真理，带头这样做。有时为了筹备召开专业会议，会前他都要亲自下去做调研，听汇报，收集资料，自己动手写讲话稿，并反复斟酌修改，力求准确，在会前他还要反复朗读，努力做到发言流畅，使与会人员听好报告，他对工作、事业的执着、认真的态度，深深教育着

我们。

贺彪同志为卫生事业发展建设功不可没。我们永远怀念贺彪同志。

(何鸿明：卫生部计财司原司长)

2001年8月

怀念贺彪副部长

茹竞华

每当回忆 50 年代在卫生部工作时的情景，我首先怀念的是老同志、老领导。那时我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有的只是满腔热情，是老一代革命者的言传、身教、关爱、培养，让我学会了怎么工作以及如何为人处世，奠定了以后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始终没有走上歪路的基础。这样深远的影响，他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可我却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

1951 年我被分配来卫生部工作，不久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是我们在报纸文件上看到过的名词。因为苏联就是连续完成了几个五年计划发展起来的，现在轮到我们啦！能参与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真是无比荣幸，但是这崇高的神灵妙计内容究竟包括些什么？怎么做法？虽然领导有过交待，一旦着手做时仍然是摸不着头脑。经过反复摸索，我们有点明白了，作为卫生事业发展中的基建计划，简单地说，就是发展一张床位要多少平方米的建筑？多少设备？最后落实到需要多少投资？而这“多少”是怎么订出来的呢？要有定额标准，尽管我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也提不出一个合适的数字。当时只为学习苏联，但又不能照搬，因为国家经济实力不同，病人生活习惯不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那时则是满脑子的敌对情绪，根本不屑于去用。就这样我们几个具体工作的人，开夜车、打算盘，从数字到数字反复计算，最后总算选了一个我们自认为最合

理的定额标准，但是心中并没有底。

1954年贺彪副部长来到卫生部，计划财务司是他主管的业务之一，为了制定计划的需要，司里决定基建处投主要力量制定一套定额标准。从1955年开始便收集各地区医院基建资料。在1956年组织了辽宁省卫生厅、医学科学院和基建处共5个同志，从东北到西北，当时去西南的铁路尚未修成，我们坐卡车过秦岭到成都，又从成都翻山越岭，坐小船渡险滩到重庆，然后顺长江而下到中南，华东、几乎走遍了全中国、选择典型医院呆上1~3天，了解门诊病人从排号到看病到取药等的往返路线；住院病人的活动范围生活治疗情况；跟踪医护人员，记录工作行走路程；手术室、各科治疗室、X光室等的特殊要求；洗衣、消毒、用水、用电等等都做了细致调查，经过测绘，取得数据，征求使用人的意见，找出合理的使用面积及合理部署，最后制订了一套城乡综合医院和部分专科医院的设计标准，面积定额还有各类卫生医疗机构的装备定额，并且设计出不同床位的城乡医院标准设计图供参考。这项工作受到国家建委的重视，在卫生部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组织有关单位参加，其中南京工学院副院长、著名建筑学家杨建宝教授主动要求来听我们的汇报。建委认为当时建国初期各业务部门都缺乏根据我们本国情况的定额标准，而这又是制订计划的基础，直接影响计划的准确性，卫生部带了一个头，希望各业务部尤其是文教事业都重视这件工作。

对这些事当时只觉得领导交给我们任务，我们认真完成而已，后来工作时间长了逐渐有所体会，尤其是看过《贺彪回忆录》后更认识到，成绩的取得来自领导的正确决策部署。当时贺部长贯彻落实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出的方向，搞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中有发展城乡卫生医疗网，抓好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制订定额标准正是全盘计划中为

开展这些工作打基础的一步棋。首先让我们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有了第一手资料才能产生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定额标准。这是一项科学准确的部署。

其次，医院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既有独特的“工艺流程”，又是以人为主的建筑。建国初期时的医院，充分体现半殖民地的特色，有德国式的，有美国式的，有日本式的等等，至于什么是中国式的很少有资料提供，因此设计人员也感到设计起来很难办。如果有符合我国国情的医院设计标准及标准设计作参考，按照我国的医院管理制度、医疗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设计的医院建筑，有利于医院管理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也有利于实现少花钱多办事，实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照顾美观的基建方针。后来我们几个调查人，根据大量数据，系统归纳整理，写出了一篇《全国医院调查报告》并附有图及照片。被刊登在建筑学的最高学术刊物《建筑学报》上，而且列为首篇。现在看来文章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它是从无到有的开始。不少到基建处找我们收集资料咨询医院设计的工程师们，提起此文，看见作者竟然如此年青，感到出乎意料，20多岁才工作几年就发表文章，先是惊讶继而称赞。正是因为领导抓住了关键问题，我们的成果才因为社会需要而被重视，我们这几个贺部长棋盘上的棋子也因此得到培养。

我看过许多名人传记，尤其是革命者，敬佩他们的高尚情操，机警才智，献身精神，但都是书本上的，而贺部长是我亲眼见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亲身受到感染教育的一位。看着《贺彪回忆录》，联想到我对贺部长接触的认识，真是栩栩如生、音容仍在，好像看录像一样，真实极了，贺部长就是这样的人。

当年我只是计划财务司基建处的一名小小科员，本来和部长之间相隔有好几层领导，就是没见过面也有人信。但是贺部长不

同，为了一些不太清楚的数字，尤其是财务问题，经常直接到我们处里来，找具体承办人问个清楚，省去了层层转达。他为人直爽豁达，快人快语，时常是人未到声音先到，说话的声音虽大但平易近人，让回答的人并不感到紧张拘谨。

在徐州召开县医院建设现场会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由系主任吴良镛教授带领去那里搞规划设计。一个学生介绍医疗机构的规划设计，贺部长提了几点意见，那个学生不服气，说刚才那位同志讲的我有不同看法，他说完了贺部长又和他交换意见。事后，我告诉那位学生，你说的那位同志是卫生部副部长，他一伸舌头说：“呀！他说话的语气让我一点也没感到是部长，我真不礼貌！”吴良镛教授当时已是建筑界的著名专家，但很年青，我介绍给贺部长，贺部长热情地请他在吃饭时坐在自己身边。对待一个不熟悉的知识分子，能如此尊重，在那个时代不是每位部长都这样做的。这是他一贯酷爱学习，尊重知识的具体表现。

1960年我离开卫生部，到文化大革命时，我虽然自顾不暇，但十分关心贺部长和陈凯同志的处境，知道他们到干校，托陈仲武同志一定代我向他们问好。我不认为他们是“走资派”，即或是也仍是好人。我永远记着陈凯同志曾经告诉过我，在别人困难时给予的关怀是最珍贵的。1972年他们回到北京，因为陈凯同志原来也在计划财务司工作，她对我们这些同志像大姐姐一样，从生活到政治各方面都有帮助，所以接触较多，我有时去看望他们。但是因为贺部长职位高，倒有些顾忌。1996年我去看望他们时，贺部长身体已经比较衰弱，但是还热情的接待了我，谈起过去他在卫生部时计划财务司的工作以及后来的处境，对许多同志记忆犹新，清晰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哪个同志非常能干，哪个同志非常好，谈了半个多小时，直到陈凯同志提醒他该休息了。一个基建处的小科员，四十多年后受到老部长的如此热情接待，

让我感动不已矣！

贺彪同志是在苦难的旧社会，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追求真理，刻苦学习，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孕育出的特殊一代中的杰出人物，铁骨铮铮，无坚不摧。在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立过不朽功勋，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事业做出丰硕业绩，为全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奉献毕生精力，成为事业上的成功者，政治上的清白人。

老一辈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贺彪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茹竞华：故宫博物院 高级建筑师）

贺彪部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 健

贺彪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事业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贺彪同志 1999 年 3 月 31 日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参与开创和领导我党我军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光辉业绩，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品德，他对敌恨对同志热忱的鲜明立场和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耿耿忠心，他多谋善断战则必胜的大将风度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严肃认真、言简情深和爽快正直的音容笑貌随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处处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贺彪于 1909 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十七岁参加了革命。之后二十多年血与火的斗争和对马列主义的忘我追求，使他锤炼成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矢志生平闹革命的性格。他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是在战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从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依靠党的领导，为创立和发展革命卫生事业而战斗。他对革命无限忠诚，不顾险恶一心向党，革命到底，坚持原则和刚直果断的特色在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 1959 年调来卫生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1963 年确定任

贺彪同志秘书，一直到贺彪同志 1978 年离开国家卫生部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时为止。

我曾记得，1963 年卫生部党组决定我任贺彪同志秘书，上班的第一天贺部长跟我谈话说：“你是王健，好！干吧！你就管办公室。你的办公桌就放在我这屋的西北角。”谈话就这么简单、明确、严肃、热情。但，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了。我想，“就管办公室”的意思是不让我过问私事和家事，我觉得，简单的十几个字表示部长爽快果断和关心下级的性格，表明秘书必须把办公室工作做好，不要管家务和其他非部长交待的事。我来卫生部之前作过河南省省长的秘书，知道秘书的职责和应有的形象，要注意把部长的办公室工作做好，当好处理政务的助手，文字工作必须跟上。

我上班后，贺部长每天七点半以前到办公室，十点左右处理完当天的公文，然后回家读毛选或马列。在京时几乎天天如此，并经常教育我们“一定要认真的读毛选！学了还要用！”。

我到卫生部就听到一些卫生部历次政治运动的情况。还听说 1963 年六、七月份贺部长在部党组扩大会上曾冤枉地受到批判，说他“保护牛鬼蛇神”、“是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等等。其实这恰恰说明贺彪同志敢于对当时的“左”倾错误加以抵制，敢于直言，是正确的。他对卫生系统的反右倾、拔白旗等事都曾整理过材料。我也曾给他誊抄过，也向周总理反映过，总理也同意他的看法。到后来，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贺彪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而且对事物观察敏锐果断，是非分明刚直不阿，是高级干部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榜样。他还经常教导我们：“反革命有罪，把革命当成反革命也是犯罪！”他功高不傲，坦荡无私无畏。他无论在任何环境，是顺境中还是逆境中，都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毫不放弃党的原则。贺彪同志

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都敢于站出来坚持真理，敢于为遭到批判、打击、排斥的好同志和受到冤屈的教授专家知识分子仗义执言，绝不明哲保身。

六十年代中期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贺彪同志几次严肃地对我说：“咱们今年一定要把所有药厂、器械厂看一遍，看这些厂的设备条件、生产能力。”所以我随他到全国各厂视察时都作了记录，不但了解了目前生产状况，而且预计了一旦发生战争，能心中有数地组织其生产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他还让医政司把输血问题抓好、把全国医院情况摸确切。还有，贺部长让我去协和图书馆查、借最权威的《植物志》，主要看能吃、能药用的草木，一旦战起或饥荒年可食或药用。这些都使我的心中暗暗地佩服他，他确实不空喊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地贯彻毛主席号召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我随贺部长到苏州医疗器械厂。该厂是60个小厂合并而成，主要生产一些耳鼻喉眼科器械，全厂同志积极奋斗，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华东日报》《健康报》都曾在头版大加表扬，说该厂产品“超过德国西门子蛇牌、马丁牌。”贺部长去后看了厂房车间，晚上也去厂里查看，结果车间一夜敲敲打打，甚至影响睡眠。部长想，难道这样干能超名牌？他说：“不管别人如何表扬，我要泼点冷水，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要有稳定的质量，从设备、技术管理、科研各方面提高，不能不问条件盲目的表扬，这样会纵容他们搞浮夸。”贺彪同志又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浮夸，不能一会儿敲出个蛇牌，一会儿又敲出个冒牌。”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员会，想结合贺彪同志，找他谈话。他横眉冷对，坚决不答应。文化大革命前期各地来京串连，造反派要贺部长批条子，让计财司给造反派十万元作招待用，他坚决不批，说“计财司的钱都是用于全国卫生事业的，这

是国家的规定，干别的绝对不行。”后来造反派又向他要汽车，他也坚决拒绝。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贺彪同志十分爱护干部，尊重和爱护人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要发现运动走偏，便挺身而出，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许多干部、专家知识分子。

1964年卫生部在协和医院搞社教（四清）试点，错批错斗了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如林钧才、董炳琨院长，贺彪同志极表同情。支持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表示他们是可信赖的好同志、好院长。

每当一个巨大浪潮扑来时，他逆流而上迎风扑去。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很大危险的，甚至是冒生命之险。贺彪同志历次冒险保护干部、保护专家，深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他深信在党的领导下，一时乌云终会消散，振作起来终会走出困境。

贺彪同志待人比春风还暖，他在长期卫生工作领导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知识分子的重要，应该善待知识分子。1965年去湖北麻城蹲点时，从北京和武汉带去一百多名中西医务人员，他经常向住在各乡镇的小队长们说，“北京、武汉来的医生，辛勤地为农民服务，街上买个鸡蛋吃不要批评他们。”每到一地都亲切地看望大家，问寒道暖，医护人员都看他像温暖慈祥的家长，尊敬的长辈，都觉得说不出的亲热。

我几十年来遇到过许多老专家，包括吴英恺、黄家驷、胡传揆、吴阶平、胡铮、李洪迥、张晓楼、孟继懋、吴执中、钟惠澜、张庆松、林巧稚、裘祖源等，他们开口就说“贺部长是关心我们的好部长！”一个个从心里佩服。我想这不光是他为知识分

撑腰说话，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心系大家，大家也心系他。更为重要的是，说明贺彪同志是透透澈澈的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

1975年我被当时的部长刘湘屏派去藏北阿里带医疗队两年多。贺部长当时还没“解放”。他听说我到高原后已四次大片眼底出血，很焦急，说“这是高山反应，眼底出血几次不得了，应立即回京休养”。但，当时部领导左倾主观，竟告诉我“原地休息”。其实我一去狮泉河就看了烈士陵园，死不足惜。自1975年6月至1977年我在藏北期间，贺部长曾多次到我家看望我的家属和孩子。有时给他们买糖买梨吃。孩子们对他非常亲，看到贺部长就边跑边喊贺伯伯。1977年8月我回来后，三个孩子都争着说，贺伯伯对他们最亲。我听说，咽下眼泪想，他老人家被关压、被批斗、被殴打，折腾了八年，身体虚弱，我照顾不了他，他倒这样关心我和我的全家。我回老家同全家人说，父亲也流下了眼泪，全家非常感激。

据我记忆，我同贺部长一起出差，从来不让我为他拿东西；上火车软卧从来不让我睡上铺；从来吃饭一块吃，吃同样的。贺部长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下级的饥寒冷暖，就是离休后每年去看他时，也坚持要我吃了饭后才能走。

1991年6月我爱人在积水潭医院作髌关节置换手术，因规定铁路职工只能住铁路总医院，住路外任何医院不予报销。贺彪同志知道后说“钱不够从我这儿拿。”

1994年春节，贺部长亲自来西直门卫生部宿舍小区，向大家拜年。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还重病在身，行动不便。他是这样做的惟一的老部长，同志们都非常感动，并传为佳话。此后，每年春节我去看他或电话里问候时，他都让我代他向大家拜年、问好！

贺彪同志对大家真挚的感情，确实是表里一致的，比春风还温暖，我每每想起都感动的流下眼泪。

坚持调查研究 一切从实际出发

贺彪同志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后，他认真考虑如何贯彻毛主席题词中“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他在防治慢性传染病方面，除抓紧肺结核、麻风、头癣等病防治外，同时又了解到中国有盲人600万，致盲的主要原因是沙眼，当时沙眼患病率高达50%~90%。他决定要在全中国打一场防盲治盲、防治沙眼的人民战争。在他的领导下，卫生部制订了《全国沙眼防治规划》，强调从实际出发，从现有条件入手，号召全国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一方面为可以复明的盲人进行白内障手术等，另一方面在全民中开展沙眼防治，号召各地组织全民参与。同时宣传个人卫生，眼睛保健。贺彪同志在1958年哈尔滨全国沙眼防治大会上讲：“要大力组织沙眼防治工作”，并强调“在防治沙眼工作中必须贯彻防治结合，中西医并举，充分发挥城乡卫生医疗网的作用。”他还指出，“这是关系全国人民健康的大事，关系改变广大群众数千年来不卫生习惯的大事，因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使防治沙眼形成一个家喻户晓的群众运动”。之后，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无沙”工厂、“无沙”学校、“无沙”区县。沙眼患病率迅速下降。对此，我国老一辈眼科专家毕华德、周城浒、罗宗贤、石增荣、郭秉宽、张晓楼、胡铮、张敬娥等都深有体会的说“贺部长是我们的好部长，他非常关心人民疾苦。”

为了解决《中国药典》中国化的问题，早在1955年贺彪同志就为药典会的工作指出了方向。他明确指出：“药典会要改组、加强。过去的药典有缺点，不合乎国情，没有民族性，没有中国

的特点。今后要注意，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经验。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同于苏联的，而是要编成一部具有中国特点的质量高、指导性强的新中国药典。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文字和语言上都要大众化，民族化，要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要在文化科学上无论国外的还是历史的都要批判的、选择性的吸收。1960年要编出新的药典。要有中药部份，不收人是不对的，中西医认为有效的常用的中药都要整理编入。今后，西药要高质量发展生产，中药也要注意分析研究提高。二者都要认真抓。”

为了端正精神病防治工作方向，在贺彪同志主持下，1958年6月在南京召开了精神病防治工作会。他强调指出：全国解放已经八年，“对精神病人还在关押捆绑，电休克，过着非人生活。要抓！要在精神病防治工作上来一场革命。”“对精神病人的管理要从封闭式改为开放式，要破关押捆绑；立疗、教、娱、劳。要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依其所能安排一定的劳动，同时进行教育和文艺活动等。”在治疗上他强调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精神治疗和教工娱结合的治疗方针。而且号召禁止使用切断前额叶联系线手术和针灸小脑和延髓以及其他使病人生命健康受损害的各种疗法。也尽量不用或少用电休克。并确定了“积极防治，就地管理和重点收容”的原则。当时大会讨论非常热烈，对全国震动很大，对学术界也震动很大。从此，我国精神病防治工作出现新局面。

贺彪同志在反对左倾中，也很注意从实际出发掌握政策。1959年贺彪同志在医院工作制度座谈会开幕时就讲，“谈到医院改革成绩是巨大的，但在破除医院的陈规陋习时往往破的多、立的少，在破和立当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制度在改革时存在片面性，缺乏研究和全面考虑，往往忽视保证疗效和质量。”他还特别强调要认真对待许多同志反映的当前医院的“乱、忙、

累、重、低”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医疗单位混乱不堪。贺彪同志十分焦急。他说“医疗单位也这样乱，不行！”于是便立即组织人起草文件，明确提出卫生系统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各医疗单位必须坚持正常业务，不能以任何借口放弃医疗预防工作。搞革命也必须“促生产”、促工作。周总理看到起草的文稿后，当日即转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这对全国医疗单位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样果断行动，不怕“造反派”抓辫子，不怕批斗，任何时候都想到人民利益，都从实际出发并毫不顾及个人得失，就是贺部长突出的性格。

顶风抗邪 刚直不阿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贺老总，制造所谓“二月兵变”，卫生部军管会和造反派也为它成立了“贺彪专案组”，并按着林彪集团定的调，诬陷贺彪为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对贺彪同志实行“专政”。当时私设公堂，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抄家数次，推搡打骂，批斗审讯，无所不用。而贺彪同志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绝不低头。他始终说：“我不知道贺龙有什么问题”，“我了解贺老总出身贫苦，忠心刚直，嫉恶如仇，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再问就说“我相信毛主席在延安曾为贺龙有过三条结论：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再问他就说“我始终坚信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绝不会搞什么政变，不会有什么‘二月兵变’，‘二月兵变’是一桩千古奇冤。”

贺彪同志从来只认真理不畏强暴。早在1932年夏曦主持湘鄂西分局时搞肃反扩大化，搞什么“改组派”、“AB团”，当时贺

彪同志也被诬陷为“改组派”而被捕，当时贺彪同志是红三军军医处长，行军时手铐脚镣用绳串在一起，还要背两支枪，被关押、审讯、打骂两个多月，他不“认罪”、不低头、不求饶，反而直言顶撞不怕刑罚、不怕死。最后还是贺龙，关向英同志解救了他。贺彪同志不但抵制左倾路线，还帮助保护了许多干部和医务人员。

1960年前后，因严重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短缺，由此而导致了浮肿病和干瘦病的广泛流行，有些地区还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贺彪同志去几个省、区调研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回京后即向党组负责同志反映，非但未引起重视，反而责怪贺彪同志是“大惊小怪”、“否定大跃进”。1960年秋，贺彪同志从湖南、广西等地调研回来又一再反映浮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和妇女子宫脱垂“四病”的严重情况，仍然没人听。当时，社会上有人独出心裁，提出用蒸汽疗法治疗因营养缺乏导致的浮肿病，即把浮肿病人用蒸汽来蒸，对这种违反科学，草菅人命的做法，卫生部的主要负责人非但不加制止，反而在上海召开交流会进行交流。对此，贺彪同志坚决反对。

1963年六七月份卫生部党组扩大会批判贺彪同志。连续开了十七次批判会，当时批斗的主要内容是说：“贺彪同志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贺彪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所谓贺彪同志是“彭德怀俱乐部的成员”是指贺彪同志对“大跃进”说假话，搞浮夸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浮肿病流行提出了意见，说了实话、真话。所谓“贺彪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指贺彪同志对卫生系统整风反右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整了一大批好同志提出了批评。例如把不少老同志如贺诚、王斌、齐仲桓等打成反党集团，把不少知名专家如毕华德、钟惠澜等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批，并被拔了“白旗”。对于这些既违反党的干部政策又违反

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做法贺彪同志坚决反对，并为这些被批判的同志说了一些公道的话。可是贺彪同志这些正确的意见非但未被采纳，反而诬陷他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长达二个多月的批判中，贺彪同志始终没有低头，没有屈服，而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真可谓是刚直不阿。

我非常佩服贺彪同志这种顶风抗邪刚直不阿的革命的高尚品质。

贺彪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他英明果断、远见卓识、高风亮节；他对敌人狠，对人民亲，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他正直清廉，为人正派，光明磊落，敢于伸张正义，坚持真理；他善于抓大事，思考大事，思考如何“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如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工作；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思想的精髓；他艰苦奋斗，淡泊名利，反对说假话、搞虚夸，凡事他有自己见解，决不随波逐流看风使舵；他赞扬讲真话，办实事、收实效，不徒有其表。正是依靠这种品格和力量创造出出色的工作局面。他有排山倒海的气魄，在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开创苏区的卫生工作，创建二方面军的卫生工作；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参与和领导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经受了“文革”十年浩劫的惨痛考验，经历了历史上社会变革最激烈而复杂的多半个世纪，并为解放全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不顾身。作为一个有威望的领导，他具有敏锐的思维决策，高超的组织管理和对事业献身的精神。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为我党我军和国家卫生事业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史册。

（王健：中华预防医学会原副会长）

贺彪的农村卫生工作思想、谋略及遗憾

张自宽

贺彪同志是我军又是新中国卫生事业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于1954年由西北大行政区卫生部调到国家卫生部任副部长，曾分管计划财务、医政、药政等工作，对制定新中国卫生方针政策、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及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与管理的规章制度、技术标准等均有诸多建树，尤其对农村卫生倾注心血更多。自1959年春深入山西省稷山县农村搞调查，到1966年8月结束湖北省麻城县的蹲点工作，长达8年之久他都在研究解决农村卫生问题。

我是1954年8月由东北大行政区卫生部调入国家卫生部医政司的，在贺彪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他领导的稷山调查，主持筹备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以及后来的麻城县蹲点，我均参与并随从他行动。正如他1995年1月18日给我的信中所说：“你送我的一本小诗集，病前又拿出看，躺稻草（指我诗集中的《夜泊安家畷》与他在铺满稻草的门板上同眠），好像是我昨天未作完的还乡梦。为了广大人民健康，你我不计时间和艰苦，到太阳村，跑两湖、两广、陕晋和冀中，蹲点麻城，头是开得好，熟悉了农村，得知识与经验不少，苦中有乐。然而，狂风暴雨一到，前有红头剥皮，后有黄花吹散，唯独野草哀叹。”在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上，我与贺彪同志可以说是心连心、手携手共同奋斗了八九年，深知他的思路、谋略与心情。如今他已作古，我有责任把它记述下来，以示后人。

全文分四部分：秣山调查，全国会议，麻城蹲点，牛棚怒歌。

一、秣山调查

贺彪同志出身于农村，在参加革命后又很早就担任医疗卫生的组织领导工作，深知农民群众的疾苦和搞好农村卫生的重要性。对于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所说的“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的论述；在抗美援朝时期发出的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血吸虫病等危害人民最严重疾病的号召；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对卫生工作的要求；他都知之甚详，领会很透，并会同卫生部其他领导同志予以认真贯彻执行，化为自己的实践，做出很多成绩。他综合长期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经验，认为要全面搞好农村卫生，须同步进行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广泛深入开展群众卫生活动，改善环境卫生，减少外在致病因素，提高人们防病保健知识；二是要普遍建立卫生组织，培训医药卫生人才，改善医疗卫生设施，使群众得病能够及时得到治疗；三是要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使群众不致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去医疗机构看病。当时贺彪同志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概括成三句话，就是要解决农民群众“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和少生病不生病”的问题。

他之所以要去秣山县农村调查，是因为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如何在这个新形势下依靠群众和公社集体力量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摸索出一套经验以便向全国推广。在这个思想驱使下，他于1959年4月带领陈仲武同志和我以及山西省卫生厅厅长张金同志，深入秣山县进行蹲点调查“解剖麻雀”，重点是翟店公社和太阳村，时间达三个多月。

太阳村是当时翟店公社所辖的一个管理区，有220户，1005口人，位于黄土高原地带，干旱少雨，水井深达30余丈。解放

前，该村是有名的穷村、脏村、瘟疫村，年年瘟疫流行、人畜的死亡率极高。解放后，从1953年开始，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了六、七年，由一个穷村、脏村、瘟疫村变成为全国闻名的卫生模范村。我们一到太阳村就发现，这个村确实与众不同：村内村外环境整洁，道路平坦，街道两旁栽植了松柏杨柳，街头还建立了七座简易花园，家家户户院内院外都种植了各种花草，真可谓万紫千红，一片清香。全村的公共厕所和社员家庭的厕所都普遍进行了改造，做到了“三无”（无蝇、无蛆、无臭味）。全村水井普遍加高、加盖、有棚、有公用水桶。养鸡场、养猪场和畜圈，也都进行了整修和改良。鸡住上了三层楼，猪的食、宿、便实行了三隔离，牛棚、马圈做到了勤起勤垫，不见粪便，闻不到臭味。对垃圾、粪便普遍实行严格管理，泥封堆肥，既消灭了蚊蝇孳生场所，又提高了肥效。“四害”基本上消灭了。家家户户窗明几净，人人养成了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习惯，就连小孩子也懂得了讲卫生，形成了“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社会风尚。

为了保障社员的健康，太阳村还建立了村保健站，请来了医生，培训了保健员，接生员。并采取了由村里的公益金补助一点，社员个人出一点的办法，筹集了资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从1958年开始，保健站每年给社员做一次健康检查，并建立了健康登记卡片和健康档案。每月给孕妇检查胎位，对孕妇进行保健指导。社员看病，免收挂号费和出诊费，只要到保健站挂签，医生就上门看病，送药到家。农忙时，医生还带着劳动工具、药箱和卫生课本到田间、工地，有病治病，无病参加劳动并做卫生宣传。这样，既贯彻落实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又使患了伤、病的社员及时得到治疗，大大方便了社员群众。为了歌颂保健站给农民群众带来的好处，太阳村的社员编了

一首顺口溜：

保健站，真方便，
有病挂上签，医生巡回看。
夏季农忙到田间，冬季农闲搞训练。
搞训练，带助手，卫生人员队队有。
医生和气又耐烦，全心全意为社员。

在太阳村，由于卫生工作搞好了，使人们身强体壮，精神焕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文明建设，出现了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一派新气象。正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凤山所概括的那样：“同是一个村，前后两个样，过去太阳村没太阳，共产党来了太阳放光芒，男女老少讲卫生，家家户户出现气象，人强马壮多打粮，日子越过越兴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太阳村，带动了秸山全县乃至山西全省的卫生工作。太阳村的经验，得到了秸山县委、县政府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秸山县和山西省都在太阳村召开过现场会，总结和推广太阳村的经验，在全县、全省的范围内广泛掀起了“学太阳，赶太阳，超太阳”的热潮，相继涌现了一大批类似太阳村这样的先进典型。

值得重视的是，秸山县委、县政府在推广太阳村经验的过程中，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注重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农村的卫生组织建设，从县到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健全的医疗卫生网，贯彻了中西医结合，专门机构与群众结合、脱产人员与不脱产人员结合，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普遍推行了合作医疗制度，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保护广大农民的健康，摸索出了一整套好的经验。

秸山县的经验充实了贺彪同志的认识，使他解决农村卫生问题的思路更加明晰，信心也更强。他和调查组同志都认为，在全

国来说，稷山县地处黄土高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稷山县能办到的，其他地区也应该能够办到。稷山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如能在全国推广，必将对推动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

基于上述认识，贺彪同志向卫生部党组织写了专题报告，建议在稷山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总结和推广稷山的经验。

卫生部党组同意这个报告，并同意在稷山召开现场会，责成贺彪负责筹备，起草会议报告及有关文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报告稿一再改写，均未获通过。其原因可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报告稿未能突出“反右倾”和继续组织“大跃进”。因为当时正是在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同志的所谓错误之后。

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经过近半年的筹备，终于在1959年11月在稷山县召开。卫生部党组负责同志没有让贺彪去稷山，而是由党组负责同志亲自去稷山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反右倾，鼓干劲，继续组织农村卫生工作大跃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内容也是把由贺彪主持起草的原报告稿抛在一边，在会议期间重新起草的，突出了“反右倾”的内容，增加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情绪”、“右倾思想”的批判，但对稷山经验的肯定，以及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必须“积极发展及提高农村卫生组织和卫生队伍”等业务上的要求，仍用了原来报告稿的材料，这表明贺彪的农村卫生思路和务实的作风是不容否定的。在会上，由医政司起草《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点意见》也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并进行了讨论。因此，可以

这样说，这次会议尽管受到了“反右倾”的干扰，减弱了会议的务实性；但由于总结交流了稷山的经验，肯定了稷山的一套比较成功的做法，并对如何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组织提出了一套指导性的意见。所以，总的来讲，稷山会议在我国农村卫生发展史上还是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

稷山会议的最大成效是在会议结束后，以卫生部党组的名义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内容以及中央和毛主席后来的批示，对我国农村卫生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例如，《报告》提出：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卫生工作，从县到生产队需要一个和生产紧密结合的、健全的卫生医疗保健网，需要有一支中西医结合、高、中、初级卫生人员结合、脱产与不脱产人员结合的强大的卫生队伍”。

——“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所的技术力量，首先应大力加强县医院的工作，使其成为全县卫生业务技术的中心。

——要“继续组织城市医药卫生力量支援农村。”

——要“大力培养医务干部，既要办好医药院校，又要大力发展医学专科学校和县办中级初级卫生学校，提倡中西医师带徒弟，在职干部进修提高。”

——“在农村要放手地培养和提高脱产的群众卫生工作骨干积极分子，这不仅可以更好地开展群众卫生工作，而且也是充实卫生事业队伍的一个来源。”

——“关于人民公社的医疗制度，……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其主要点是：1、社员每年交纳一定的保健费；2、看病时只交纳药费或挂号费；另由公社、大队的公

益金中补助一部分。具体做法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实行这种制度，对于开展卫生预防，保证社员有病能及时治疗，和巩固公社的医疗卫生组织，都较为有利。”

另外，《报告》还将《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为附件，一并上报中央审阅。

对于卫生部党组的上述报告，中共中央于1960年2月2日以中发（60）70号文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的报告及其会议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很好，现发给你们参照执行”。

事过一个半月之后，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于1960年3月18日以中发（60）251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故也称为“3.18指示”，）对稷山会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央于今年2月2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年、1961年、1962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是贺彪同志对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因为没有稷山调查，就没有全国农村卫生会议，没有全国会议就没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后来被称为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三大支柱”——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乡村医生队伍和合作疗制度也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和奠定基础的。

三、麻城蹲点

“麻城蹲点”是贺彪同志依据其卫生思路谋求解决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又一次尝试。

去麻城蹲点与到秭山调查有些不同，多少带点被动性。其历史背景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加上连年开展“四清”运动形成的政治压力；各级党委和政府无力也无暇顾及卫生工作，秭山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基本没有得到落实，许多地方又出现缺医少药的状况。毛主席出于对农民健康的关怀，于1965年6月26日在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时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广大农民服务，并强调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此形势下，卫生部党组遵照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决定组织4个农村卫生工作队，由部长、副部长带队，分别到北京、江苏、湖南、湖北的一个经过“社教”的县蹲点，调查研究农村卫生问题和解决办法。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由贺彪同志带领，在麻城县蹲点。我是这个工作队成员之一，随同贺彪同志一起行动。

蹲点的目的，据贺彪同志讲，在四个农村卫生队下乡之前，刘少奇同志曾召集四位部长、副部长做了明确交待：农村“四清”以后搞建设，卫生工作要跟上去。你们到“四清”过的县去蹲点，就是研究和实践如何把一个县卫生工作搞好，认真解决好农村卫生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服务。

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在出发之前，对此次蹲点的目的和通过蹲点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要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农村医疗卫生组织建设，积极培养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把农村医疗卫生网进一步建立健全起来，解决广大农民看不上病的问题；二是研究和

探索适合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适合于广大农民觉悟程度的医疗保健制度，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解决广大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三是发动、教育和指导农民群众，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防病知识，结合生产生活推行“两管一改”管理好饮水和粪便，改建烟囱灶，抓好卫生预防工作，解决广大农民少生病和不生病问题。

为什么要选在麻城蹲点？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麻城既是老苏区，又是大别山区，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很差，在这样贫困山区县蹲点，既能体现党中央对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农民群众的关怀，取得经验和成效后更有说服力，更便于推广；二是麻城是全国少有的全县普遍实行合作医疗的一个县，从1958年开始一直坚持下来，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麻城县坚持办好合作医疗的经验，使之逐步推广，对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这个想法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原拟在麻城蹲点两年，取得经验后再转移至洪湖水网地带继续蹲点，以便能够获得水网地区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可是刚在麻城蹲点一年，即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贺彪同志奉召回京而使蹲点工作停顿，未能进行到底。这是贺彪同志一生最大的遗憾，直到暮年仍耿耿于怀。但贺彪同志在麻城蹲点时期的工作、生活风范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共有136人，下设一个卫生防疫队，三个医疗队和医政、药政、教育三个工作组。全队于1965年8月下旬来到麻城，经与县委研究决定，先搞乘马区，然后再由点到面铺开。为使工作队发扬当年老红军、老八路的作风，贺彪同志从自己做起，严格要求全体干部和队员都要遵守《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使之成为《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队

员守则》：

一、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工夫；

二、坚持同农民结合，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三、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

四、注重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

五、作风要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

六、勤俭节约，爱护公共财物，减轻农民负担，反对一切浪费。

七、注意搞好团结，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八、生活艰苦朴素，不特殊化，不乱买东西，不接受礼物。

以上八点，是全体队员的共同守则。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他本人，除了要带头遵守《守则》外，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坚持实事求是方面，贺彪同志特别注意毛主席所教导的“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一切从麻城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看当地的需要，又要看当地的可能，坚持“七不准”：不订高指标，不唱高调，不说空话，不搞形式主义，不搞强迫命令，不与农活争时间，抢劳力，不用钱买经验，真正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进行艰苦的工作。

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贺彪同志强调既注重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又要耐心启发群众的觉悟和自愿，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同不卫生的习惯做斗争。例如：在开展以管水、管粪、改建烟囱灶为中心的群众卫生运动时，首先是先行试点，搞出样板，通过典型示范说服和吸引群众，让群众自己下决心，因此深受群众的欢迎。农民群众为了能早日改建水井、改建厕所、改建烟囱灶，千方百

计地克服材料不足等困难，他们上山炸石头，下河挑沙子，收集碎砖乱石，有的还把土地庙、山神庙拆了，用旧砖、旧石、旧木料建成了新的合乎卫生要求的水井、厕所和烟囱灶，节省了不少投资。为了支持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卫生工作队还吁请县、区物资部门供应了水泥、炸药、陶土烟囱等物资，为推行“两管一改”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证。

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方面，贺彪同志更是率先垂范，为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做出了榜样。卫生工作队的大队部就设在乘马区的王福店公社，住的是四面透风的房子，吃的粗糲米，酸豇豆，工作和生活条件甚至还赶不上当地农村基层干部。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经常跟随贺彪同志巡回到各区、各公社的医疗点调查研究，慰问医疗队员和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并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全县 12 个区、2 个镇、103 个公社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两个人，经常是每人手持一根竹棍，身背一把雨伞、一个水壶，在大别山深处转来转去。而且每到一处，事先不打招呼，不要迎送、陪同和招待，免去了所有的繁文缛节。有一次，我跟贺彪同志到安家畈去看望医疗队眼科组的何玉兰大夫，她是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眼科专家，在安家畈这个偏僻山村的农舍里办起了临时眼科医院，吸引了麻城全县乃至周边各县的白内障患者，一批又一批做白内障复明手术。我们在安家畈工作结束后，当晚就住宿在一个农家的库房里，睡在稻草上。我在一首打油诗中记述了此经历：“夜泊安家畈，农家一库房。稻草铺其上，门板权作床。两人共一榻，徐徐入梦乡。连日多辛苦，虽苦乐融融。”（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躺稻草）还有一次，我们俩人到林店公社卫生所调查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的情况，当晚借宿于林店中学，为逃避公社领导的招待，翌日天刚拂晓，校门未开，我俩便越墙上路，不辞而别。我也为此事写了一首小诗：

“借宿林店中学堂，搅扰师生心惶惶，又恐明日受款待，拂晓不辞学跳墙。”

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在贺彪同志亲自带领下确实发扬了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在乘马区工作5个月，为乘马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给群众解决了不少问题。

在医治疾病方面，共治疗病人83647人次，抢救重危病人176人，手术3453例，体检2599人，治好了大量的疝气，鞘膜积液；割下了患病30年、3次进城被拒绝治疗的、30多斤重的阴囊橡皮肿；为患病17年的巨大卵巢囊肿患者解除了病痛；开展了眼科白内障复明手术，使343个盲人重见光明。

在培养卫生专业人员方面，帮助县医院开办了半工半读学校，开设西医班和中医进修班，共招学员119人。同时，为全县开办了23个半农半医培训班，共招学员703人；乘马区的127名学员，经过第一阶段4个月的脱产培训后都配备了保健箱，回到生产大队当半农半医（保健员），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防病治病工作。

在药品管理方面，帮助卫生院、所清理了药房和库房，处理了过期失效、霉烂变质的药品，毒、剧、麻药实行了专人专柜管理。对当地的中药材资源进行了调查，大力提倡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大力提倡针灸、推拿、拔火罐等经济有效的土方土法。此外，在合理用药、降低药费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医疗队治疗病人8万多人次，平均每张处方仅为2角钱。

在推行合作医疗制度方面，工作队连续两次召开医疗座谈会，并深入进行了如何巩固、完善和进一步办好合作医疗，如何改善和加强合作医疗管理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地区除麻城外，还深入到新洲、罗田、稀水、黄冈4县未办合作医疗的地区，做了

对照性调查。在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并代麻城县委、县政府起草了《关于加强合作医疗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合作医疗暂行管理办好》等法规，以政府红头文件发布施行。

在卫生机构整顿建设方面，帮助县医院进行了“四清”后期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并配合县医院抽调了14名医生、护士和医技人员组成一套班子，加强乘马区卫生院并在万义公社新建一所红军医院。卫生工作队的各医疗组还帮助各公社卫生所建立了简易手术室和换药室，建立健全了各项基本的工作制度。

上述各项工作贺彪同志一般都亲自参与，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分析研究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脑中有策，指导有力。

作为麻城蹲点的第一阶段——乘马区的试点工作，到1966年1月基本告一段落。过了春节以后，卫生部工作队在麻城的蹲点工作便在全县12个区、2个镇全面展开。正当深入进行之际，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卫生部党组多次来电催促，贺彪同志和各司局的卫生行政干部不得不结束蹲点工作回京，只留下几个医疗小分队继续为麻城农民服务，直到1967年7月。作为贺彪来说，在麻城的实际工作时间整整一年，没有完全实现预定的蹲点计划和目的。

尽管如此，但通过一年的蹲点工作，贺彪同志的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解决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思路和谋略更加清晰更加成熟了。根据他与我们多次交谈和长期实践的体会，我觉得在他的脑海中已形成了这样几个观念：

（一）必须切实加强县、区、社（乡、镇）、大队（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的建设。这是搞好农村卫生工作的基础和组织保障。县级卫生机构，应当重点加强县医院的建设，同时也要办好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和卫生学校；区、社（乡、镇）卫生机

构以设综合性的卫生院、所为宜，其中对重点区卫生院逐步加强使之成为中心卫生院；生产大队（村）应建立卫生室，配备半农半医和接生员。上述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中，县级卫生机构应是全县医疗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区、社卫生院应是承上启下的中间枢纽，大队（村）卫生室则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网底。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应当建立起逐级技术指导关系和双向转诊关系，使之形成布局合理、分工协作，有机结合的农村卫生服务系统。

（二）必须下大力加快培养农村医药卫生人员，建设一支高中初结合、中西医结合、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的农村卫生工作队。除了要加强县医院技术骨干的配备，并为区社卫生院培养医生外，重要的问题在于为农村基层培养半农半医的医生和卫生员、接生员。这是我国农村卫生建设上的一件大事，是尽快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把农村卫生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有效办法。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每个生产大队（村）培养1~2名经过专门训练的半农半医的医生和接生员，为每个生产队培养1名不脱产的卫生员。这些半农半医的卫生员，能掌握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保健知识，能用中西两法治疗小伤小病，能指导农民开展卫生运动和计划生育，在平时为生产建设服务，在战时为战争服务。有了这支队伍，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就比较好办了。

（三）必须研究、探索并建立适合于农村、适合于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制度。根据麻城的经验，农村的医疗保健制度，以实行合作医疗为宜。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抗御疾病、保护健康发扬合作共济精神的体现，它是一种互助互济、民办公助性质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麻城的经验证明，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在于：第一，实行合作医疗是解决农民群

信和几首诗词中充分反映出来。

第一首词《玉楼春》：

“麻城悬壶经有年，割股除灾毕生愿。归京返任历诡风，绕雾云烟邪气窜。白绿红黄盖地天，人妖颠倒功罪乱，今朝被斗北医喧，自信终有秦镜鉴。”

他说，写这首词的背景是他返京后见卫生部满院大字报，情况异常。不几天，即被揪到北大医学院开“斗批城市老爷卫生部长大会”，同遭批斗的崔义田和史书翰问他，这种不分真理和是非的骂人大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无言以告，乃吟出此词。

第二首词《暮山溪》：

“无欺无诡，闲却靠边尾。劳动不输入，枉炼得、征顽战锐。无贪无贿，自信可问天，须请罪。翻两臂，白昼摹神鬼。论实务是，归了走资位。红册度年华，巧领略，无争三昧。歧谈怪议，成攻须时日，宁缩退。权夺起，关我冷房内。”

这是1967年春，卫生部造反派夺权，逼迫他批准开事业经费支票支持造反，遭到他拒绝被关进冷房内有感而作。从这首词可以看见贺彪同志的刚正不阿和对人民卫生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如同一头被困在笼里的狮子一般在怒吼。

第三首词《醉落魄》：

“伤离恨别，愁肠已套连环结。山高路远音讯绝。劫火连天，无计珍红叶。功业未竟心切切，眼前磨难沥心血。残更数尽桅灯灭。放眼长安，瘴雾重重叠。”

这是1971年10月，他被下放在江西永修县广山卫生部“五七”干校关“牛棚”劳动，一位老友派人去广山告他，说林贼已亡，为他而喜。而他则答贼寇虽死，奸人（指江青等“四人帮”）仍在舞台上表演，前景不容乐观。乃作此词，以抒心怀。

第四首词《后庭花破子》：

“花甲过五秋，常怀大业忧。未被诬谗惘，不因诋毁愁。‘老爷头’，诽余犹可，诬君无根由。”

这是1975年秋，贺彪同志从江西回京后，从各省来京参加全国卫生会议的10多位卫生厅老厅长到贺彪家去看望他，被人诬说邓小平同志指使贺彪开黑会在卫生系统“篡党夺权”。这10多位同志遂遭祸殃，被查讯。所以贺彪同志愤而作此。

诗言志。诗词是述志、抒发心声的。从贺彪同志这几首词里所说的“麻城悬壶经有年，割股救灾毕生愿”、“功业未竟心切切，眼前磨难沥心血”、“花甲过五秋，常怀大业忧”诗句中，可以看出贺彪同志对人民卫生事业特别是农村卫生问题是多么萦怀于心，对于有志难酬是多么痛苦，对于麻城蹲点任务之未能全部完成又是多么遗恨不已。

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贺彪同志的崇高品德。

（张自宽：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

和贺彪同志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张之强

1956年春，我调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和原来的副部长不太熟悉，而且为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又分配到湖南湘阴县卫生工作队蹲点，所以互相之间除开会外，很少接触，了解不多。贺彪同志是120师卫生部长，我在359旅工作过，所以对120师在晋西北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卫生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早有所闻的。

“文革”之火烧到“城市老爷卫生部”时，我被匆忙地从湖南调回卫生部并任“文革办公室主任”，成为造反派攻击对象是意料中事。不幸在一九六八年一次混乱的批斗中，我的右腿静脉受伤，形成严重的栓塞性静脉炎，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整个右腿肿的不能走路，只能躺在床上。当然，批斗仍要进行，就是把我放在担架上，用卡车拉到会场；专案组的审查和外调照样进行。孩子们都先后到东北和内蒙牧区插队，老伴程西筠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审查劳动。继母没有见过这样的世面，每日胆战心惊，难以应对惶恐的日子，无疾而终。只得请一位保姆照顾，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的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创立了“五七干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干校劳动。之后在全国推广，认为“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卫生部军管会确定在江西省永修县周田云山垦殖场的广山丘陵地带为校

址，筹建了“卫生部五七干校”。一九七〇年五月份，卫生部军管会决定我到干校劳动改造和受审查。为此，程西筠赶回北京，为我收拾行装、搬出宿舍，由卫生部军管会在德胜门内大街卫生部宿舍内另找两间房子存放东西。由于我不能独立生活，按照规定夫妻一方可以同住，但却被军管会拒绝。出发时，我由担架送上火车，坐在两人共用的椅子上，可以依着行李卷倒身而卧，这也算是照顾了吧！

车到上海站，所有专政对象都集中在一起，以便于看管。副部长郭子化年老体弱，长须花白，步履维艰，颤颤巍巍。不久，忽见一年轻女子手提饭盒，由专案组人员领着到郭老面前。郭老也是躺在地上休息的。据说她是郭老的女儿，要求见父亲一面。女儿满面泪痕，打开饭盒，亲手把温热的鸡汤喂郭老食用。最后女儿噙着眼泪和老父告别，女儿一再叮嘱他要照顾好自己，依依惜别。我的眼泪也横流不止，难道真的是“生离死别”么？！

到了干校，暂住在一个作仓库用的大棚里。后来得知这就是周田云山垦殖场的马山。安排住下后，干校领导宣布：干校的任务，除参加农副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外，要继续进行“斗批改”，主要对象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老爷们及所有政治上有问题的专政对象。刚到干校，一要建筑住房，二要准备耕地，所以批斗会议相对少了些。每个专政对象，都要参加劳动。我是拄拐杖的病人，贺彪同志因长期被批斗，体力衰弱不能参加劳动。其他人都根据本人条件参加劳动。开始，我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搓草绳等。待到稻田插秧时，为防止鸟类、鸡、鸭的糟踏及人为的破坏，需要有人昼夜值班照看。经领导决定，由贺彪和我两人搬往稻田地区负责看管。我们两人必须从专政对象住房里搬出。在一片稻田的中央地区，原来有老乡搭过一个草窝棚，我们就准备搬到这个草棚内安家。我是北方人，对如

何种稻、看稻一无所知，十分犯难。贺彪同志是湖北省江陵县渔米之乡人，熟悉整个种稻、看稻全部过程。他很快就将作废的草棚，拆拆补补，并请人搬来两个门板作床用。经他一安排，俨然一个新居。他还在草棚中间拉上条绳子，为我们搭手巾、衣服之用。他设方想法把一个草棚规制成两人住的窝棚，使我赞叹不已。我们从专政对象的住房里拿出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大家告别。一些同志还一再叮咛在野外生活要小心，防止蚂蟥叮咬，钻进腿里如何拍打出来以及防止蛇咬等生活注意事项。草棚离我们原来住地不太远；到我们所属的连队要走一条小路，过小桥、上一个坡就可以到伙房打饭。开始，两个人走不了那么远，就由其他专政对象送饭。

我们要看守稻田，必须到处查看，逐渐就多走些路，增加些距离。后来，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的麻烦，我们就拄着棍子走走歇歇去伙房打饭拿回来吃。在这个过程中，他教我许多生活知识，如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俭朴而熟练，使我们的生活有条有理。我只有敬佩、羡慕，但学不到，跟不上，不少时候，生活上的杂事他都替我做了，我十分感激。这可能因他出身贫苦，跟随红军长征久经锻炼之故，我嫌麻烦，每天晚上不洗脚，他不止一次地讲解洗脚的好处，后来我也跟着他养成每晚洗脚的习惯。从这些生活小事，使我看到他乐于助人的质朴品格。

生活和劳动任务安定下来，心情也好多了。野外夜晚，微风吹过，十分清爽。坐在草棚，凝视云天，思绪绕牵。家人的事常在脑中出现。由于与贺彪同志相处中感到亲切，就情不自禁地念叨起家人来，如那些不大懂事的孩子都是黑五类，事事受到歧视，不知如何适应当地的环境（女儿、儿子都在内蒙和东北农场劳动）。老伴程西筠性格耿直，不知又受到什么折磨。“文化大革命”如何处置那些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出

生人死干革命的人？又如何引导那些视毛主席为“神灵”的小孩子（如我的女儿为了争取到内蒙牧区锻炼而咬破手指写了到最艰苦的地区去锻炼的血书）。为什么一些人把荒谬当成真理？把凌辱当成乐趣，把权力当成追求？贺彪同志听了久久沉默不语，若在深思，却又难于作答。反说：“这些现时谁能说得清楚，就待历史去评说吧！”

后来，连队种了花生，我们又改变了任务，要搬到花生地里看野猪。花生从下种到收获，都要有人看管，否则会被野猪偷吃，据老乡说不要多长时间就能全部吃光。花生地处于东西两山的一条川里。山上是树林，不时有野生动物诸如山兔、山狼和蟒蛇等下山觅食或过路，或到水库喝水。据老乡们的经验，要盖一个二层的草棚，上层可住人，下层可以休息、吃饭，上下设一木梯，也很方便。这个任务并不轻松，我们两人轮流分前后半夜值班，任务是不断巡逻花生地（大体有10多亩）。在巡逻时，一边敲铜锣，一边高喊：“噢——”以警示野猪：这里有人！看来，野猪也是怕人的，虽然它十分凶狠。为了预防蛇类及蚊子的叮咬，值班时要全副武装起来。上身要穿长袖衣服，下穿长裤，脚登高腰雨靴。手拎一棍子或铁锹，不时沿地边走动，边走边高声喊叫，以防野猪前来。夜间走路，地边上上下下，没有真正的路，地势坎坷不平，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地沿下。夏季雨多，如遇雨天，不时滑倒，弄得一身泥泞，只能忍痛爬起，继续前行。据老乡讲，这里过去经常出现野猪，野猪很少单独行动，一群野猪不要一个小时就能吃光一片花生地，这使我们更加小心。由于经常下雨，草棚挡不住大雨。下大雨时，两人就不能睡觉，只好把被褥堆在一起，共同出去巡逻，不时用毛巾擦去身上的雨水，故经常感冒，吃药治疗。若遇雷雨大风天气，还得躲开大树和草棚，以防雷击。干校六连就有人被雷击毙。有好心人常在大

雨之后送来防治感冒的药。这时，贺彪同志如临雪上加霜，身体十分虚弱，走路就更困难些。我由于身体没有大病，经过这样“锻炼”，反而好了起来。这段生活主要是在贺彪同志关心、指导下挺过来的。回到北京后，和家人谈到“干校”生活，我不止一次告诉家人，“我能度过‘干校’这一关，要感谢贺彪伯伯。”

粮食收获之后，要堆放、晒场、脱粒、晾干等一系列操作之后，才能装袋存放。白天、夜晚都必须有人四周巡逻，以防人畜偷吃偷拿。我们在谷场的东头盖了一个窝棚，根据前两次经验，除能防风防雨外，还要垫高底层，以防雨水浸入。即是如此，遇到大雨时，仍有雨水淌进草棚，只好将被褥挂起，以防被雨水浸湿。哪知在翻扣铺地稻草时，发现草铺下竟是蛇窝，我们同蛇同居了不少时日，生活十分艰难。

“二人相知，贵在知心”。特别是闲暇时谈谈身世、家庭、历史是很自然的事。贺彪同志性格比较内向，但为人真挚，当对方敞开心扉时，他是真诚地接受，静静聆听，谈到伤心处，他低头不语。当我谈到我的老母因为没见过“文革”那样的世面，当我被隔离审查她来给我送饭时多次提出：咱们回老家吧！我知道向她解说不清，就要她好好照顾自己就可以了，我的事不必担心。但她终于吓得起不了床，最后无疾而终。他十分动情地谈起他年老体弱的老母，久久不语，黯然神伤。他是经过苏区的肃反，见过大世面的，究竟对“文革”是怎么个意见，我是不便问，大家也不便说。记得有一次，专政队长在早饭后参加劳动之前，总有一段训话。看到老贺穿着破旧，补丁满盖的裤子，队长看着不顺眼，就训斥“贺彪！你穿得像什么样子！”大家对这位专政队长早就愤恨至极。老贺说：“我该穿什么不穿什么，有什么规定，你宣布过么？！”顶得这位队长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但说不出话来。给大家出了一口气。他平时对人都十分客气，甚至对不了解

情况的人也不发脾气。但他非常痛恨那些趋炎附势的人。每当专案组来人叫他“交待问题”时，他都黑着脸，一声不响地跟着走。回来时，久久不语。专案组的事是不好问的。有一次我被专案组叫去审讯，要我交待莫须有的问题，最严厉地训斥我：“我们给你网开一面，你可以交待，得到宽大处理；你要自绝于人民，那我们也救不了你！”我和她并不熟悉，俨然是一个泼妇。我想“文革”要把人引导到哪里去？我对贺老说：“人都疯了？！”他说这是好的，我几乎被专案组折磨死。林彪反革命集团为实现夺权，制造了一个所谓“二月兵变”阴谋，将贺龙夫妇抓了起来，于是原来在二方面军工作的同志就被诬陷为“黑军师”、“黑干将”、“黑爪牙”等等。军管后，他被立案审查，关押起来。专案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使用各种手段进行体罚。昼夜亮着八百瓦电灯照着。伙食极差，每天发一瓶水。每餐发给两个小黑窝头。昼夜刑讯，使他身体日渐衰弱。我这时才知道，来干校时，他身体那么虚弱的原因了。后来，他们又诱骗他：“你的资格老，只要你杀个回马枪，揭发贺龙问题，起码也能当个中央委员。”贺彪同志坚持真理，将专案组顶了回去。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我熟悉的120师的一位团政委忽然跃升为某大军区司令员，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再不见这位“司令员”的大名了。这说明贺彪同志的高尚人格！历史终究是公平的！刚到干校时，我看到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那么多的折磨。听了他的叙述，我再不愿提起它。这些都等待历史去叙述吧！在干校，他身体如此衰弱，还无微不至地帮助我，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那就是同志的阶级友爱。我记得他老母不幸去世后，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语，我很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和悲哀。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消

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在干部问题上，认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从北京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体弱多病者，允许回京治疗和检查身体。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程西筠同贺彪同志与陈凯同志一起回到北京。我们回到北京以后，他常去看望一些老专家，慰问他们，开导他们。有一次，大概是开卫生厅局长会议，不少厅局长到他家看望。为此，还闹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他到总后勤部工作后，几次和陈凯同志到西直门卫生部宿舍看望卫生部的离退休同志们，当他们离开时，大家都簇拥相送，同志们说：“贺部长没有忘记我们！”

一九九九年三月，当听到贺彪同志逝世的消息时，深情挚意的情感使我处于极度的悲痛中。他的遗嘱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无论如何要送别老友。我要到贺家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老同志也要和我一起去送别他们的老部长，最后，另找了一辆大车，我们一同到了贺家。大家向贺彪同志的遗像献了花圈，深情地向贺彪同志三鞠躬！

(张之强：卫生部原副部长)

2001年7月5日

忆老队长贺彪同志

栗秀真

贺彪同志是我党我军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奠基与开拓者中的重要成员。1955年春，我由湖北省卫生厅调到卫生部才认识他的。我先后在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妇幼卫生司工作，由于分管该两司的是另一位副部长，故我与贺部长接触不多，只从参加部务扩大会时，各位领导的发言，深感他性格刚直，敢于直陈主见，不违心随和，保持了我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1965年8月初，我结束在辽宁省金县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队工作后回部，原计划参加第二批“社教”工作队到江苏去再搞一次“社教”工作。8月9日张凯副部长，人事司周毅胜同志找我谈话，据云，党组研究为认真贯彻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卫生工作队由部长、副部长带队到已搞过“社教”工作试点的县去进行卫生工作试点，摸经验，时间约一年左右，你分配到湖北卫生工作队。队长是贺彪副部长，你和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刘美亭同志任副队长，要很快组织队伍，本月底即下去。从此，与贺彪同志就接触多，印象深，虽时隔多年，仍记忆犹新，略举几例，以示怀念。

一、民主作风

湖北卫生工作队是由卫生部、省卫生厅、黄岗地区卫生科、麻城县卫生局四级卫生行政、医疗、卫生防疫、妇幼卫生事业单位选调干部组成的一支综合性队伍。1965年9月到1966年1月，



贺彪（左四）与栗秀真（左三）等在湖北麻城

队员 113 人；1966 年 3~8 月队员有 389 人。在组队过程及蹲点中的工作计划与实施方案进度，均在队长的领导与主持下，经过广泛协商，作出决议后，各自按分工的任务去贯彻执行。贺彪同志身为副部长、队长从不以领导自居，自作主张，更改计划，他把自己作为队中一成员，平易近人，从而使工作队成为一个团结、互助、友爱的集体，愉快、积极、认真地完成各自应负的任务。80、90 年代，我因其他事到湖北，抽机会到麻城去看看，每次去，县里的卫生干部还在惦念着贺彪同志。

二、谦虚谨慎的作风

卫生工作队是要到省里一个经过“社教”试点工作已结束的县去蹲点，当时湖北已有两个县“社教”试点工作已基本结束。一是荆州地区的江陵县，是个平原湖沼水网、经济富饶的县，也

是贺彪同志的家乡，红二方面军的发祥与活动地区，贺彪同志幼年时即就地从事革命活动，后长期担任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领导工作。二是大别山区红四方面军发祥与活动的麻城县。省委领导张体学、许道琦、韩宁夫等同志对卫生工作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对到何地蹲点也早有研究，认为选麻城为试点县比较合适，但又不敢自作决定，要与贺彪同志商议后再定，见面后，他们是采取建议的口气提出，湖北省三分之二的地方是大山、丘陵地带，麻城县属山区县，该县从1958年全县公社化起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在进行“社教”试点时，“社教”工作队员中对此有两种意见，一些队员认为“合作医疗”是对社员的经济平调，一些队员认为是群众自愿组织的不是平调。“社教”工作队领导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征求农民社员的意见，座谈会中社员一致认为“合作医疗”是共产党为农民办的第三件好事，不属平调，就此结束了争论。你们卫生工作队是卫生部门的最高领导，下去看看，是否对头，总结些经验。贺彪同志听后发言，尊重省委意见，到麻城县蹲点。9月6日队领导与队员分头出发，向麻城县前进，到达麻城后向县委领导汇报，说明蹲点目的；县委领导及卫生局全面介绍县里的生产生活卫生工作建设概况后，共同研究蹲点的计划与步骤。

卫生工作队在北京出发时原定一年时间，后因麻城县大，三分之二是山区，又系老根据地，如乘马区大革命前人口约20万，因是革命老区，群众参加革命跟红军走了一部份，被国民党杀了一部份，逃荒流落外地一些，我们去蹲点时，该区只剩下8万人口。经研究确定试点全程两年，先在乘马区试点，再向全县其他区、社铺开，多为老区群众作些实事、好事。贺彪同志考虑问题是从实际出发，县委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尊重地方领导的意见，并定时向县委汇报工作进程。整个蹲点过程中，工作队员是自觉

地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三、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作风

麻城县在湖北全省来说，生产是比较好的地方，但全县各区、社的情况是三分之一的平原丘陵区社较山区要好，群众生活水平差距也较大。贺彪同志在蹲点的一年中，同队员同吃、同住、同行路，不接收任何额外照顾。工作队员的伙食标准和当时的社员群众基层干部一样，当地生产什么吃什么，不额外加菜。住的问题，队员多同公社卫生院干部同住，队部设在乘马区王福店公社所在地，住房是区税务所职工宿舍、兽医站等单位让出一部分空房，队部的工作人员分别挤住在这里，房子墙薄，四面透风，冬春季节特冷时每个房子靠一盆木炭火取暖，或到室外太阳地坐坐。开会也多采取此办法，县委领导曾建议三位年龄均已五十多岁的队长，最好住在县委招待所，对这些关怀贺彪同志只是感谢，仍坚持同队员一起生活。在行动方面，队部在王福店，距各公社驻地也分别有二十多里左右，全县工作铺开，路就更远，队长虽有分工各管几个点，贺彪同志则要全面照顾，到各医疗点去看看，山路难走，他拿个竹竿当拐杖，爬山越岭过河过沟都坚持步行。湖北卫生厅副厅长孙光珠副队长，他从内心里担心贺彪同志的健康与安全，由省卫生厅调来一辆吉普车，拟供贺彪同志下去时使用，但贺彪同志决定这辆车供医疗队员抢救重病群众、输送药械行李及队员使用。孙光珠感慨地对我说，贺彪同志还是老红军的艰苦奋斗作风。

四、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作风

试点的任务，是想解决群众能看上病、吃到药。吃起药、吃到清洁水，改善住的环境，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等问题。贺彪同志总的指导思想，是从实际出发，挖掘潜力，就地取材，以点带面，量力而行，不拿钱来取经验。在解决群众有病能得到好的

治疗问题上，是依靠卫生工作队员结合当地县、社原有的医疗卫生人员，学政治、学技术，提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及技术水平，为每个大队培养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达到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区。并在几个山区重点建设几个区医院，解决群众有大病就近就医的问题。在群众吃上药吃起药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医生开处方，要开治病的药、小处方，要采用土方土法，就地采集集中草药，自制药品，采取针灸、按摩治疗，每个“赤脚医生”要学会常用的几十个穴位治病，减轻合作医疗有限经费的负担，尽量把经费用在治大病方面。在改良环境卫生方面，如改良吃水、厕所、烟囱灶、住房开窗户等。这些方面的不良设施，影响群众的健康，但已习以为常，要改良还不是容易的事。改良中有些也需点经费，贺彪同志则强调先搞试点，就地取材，启发群众自觉，量力而行，逐步推广。由于群众尝到好处，自动改造的不少，1967年7月蹲点结束时，据统计新建水井3060口，公共厕所7079座，改建烟囱灶三万多个，住室后墙开窗采光通风的也不少。

麻城县卫生工作的试点工作计划是两年，刚近一年，全队正在按原计划进行中，因“文革”运动的干扰，贺彪同志、刘美亭同志先后被调回部参加部里的运动与工作。我和孙光珠同志留县继续工作，按原计划进行，到1967年7月结束。其间也受来自多方的冲击与干扰，因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好事，排除干扰，基本按计划结束，并向县委、省委作了结束工作的汇报。他们从内心感激工作队的全体同志两年来的成就与贡献。贺彪同志后期虽未能亲临指导，但整体工作是在他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他是有功的。

(栗秀真：国家计生委原副主任)

2001年6月

一九六五年冬，在湖北麻
城院子公社参加了一日
尸卫生工作，山路泥泞，
大雨倾盆，汗流浃背，
以竹枝为帚，在烈日下
辛勤劳动，精神百倍，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革命到底，永垂不朽。
魏能润
一九六六年七月

魏能润赠贺彪扇子上的题词

小扇寄深情

赵一平

同济医科大学国内知名老教授魏能润，1965年冬，随卫生部卫生工作队赴湖北麻城巡回医疗。途中大雪纷飞，山路崎岖泥泞，魏老以竹杖助行，突然摔伤倒地。次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卫生工作队大队长的贺彪同志闻讯步行几十里赶到医疗小组驻地院子公社慰问魏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已成为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由之路，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更是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地接受劳动改造，哪能奢望摔一跤还让部长来慰问呢！此情此景魏老一直牢记在心。经过十年浩劫，我在北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中与魏老不期相遇，欣喜之余，又回忆起在麻城时老部长对他的关怀。魏老深情地说，在文革中，他十分怀念贺彪部长，得知部长还健在，高兴异常，对我说：“请你明天一定要来开会，有事相托”。次日，我如约相见，他神情严肃地把一把扇子交给我并慎重地说：“扇子是在西苑饭店买的，因是不期而遇，没有事先准备好礼品，礼轻人义重嘛！”嘱我一定亲手把扇子交给贺彪部长。然后宽慰地说：“我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拜托了”。我把扇子及时地亲手交给了贺部长，完成了魏老的重托，部长看了很高兴，还亲自写信感谢魏教授。

（赵一平：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2001年4月

缅怀和学习贺彪老部长

朱 预

贺部长已离开我们三年了，回想 1966 年他带领我们到湖北麻城县白果镇、宋埠等处，下乡为农民服务，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贺部长是老红军，是我们的总领队，他住在麻城，我主要在白果和明山水库，带领一个手术小组，医护共五六人。贺部长过一段时间要来巡视，考察我们的工作，我们数月也要去麻城到他驻地汇报。有几件事我很受感动，迄今难忘。一件事是他下来巡视，看到我们的伙食很差，就对我说：“要做好工作，也要注意营养，不要管有些人说什么，只要街上有卖的，你们可以买，不要因为营养不好而影响身体，影响工作”。我们就买当地盛产的松花蛋，也有时手术完了就到街上馄饨店里吃馄饨、肉丝面等，我们也注意影响，不是经常去，但心中深感贺部长对我们的关心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另一件事是我们去麻城汇报工作，当地没有交通工具，只好走路从白果到麻城，进麻城时还要脱去鞋袜，走过一条小河，回来时贺部长就让他的司机开吉普车（罗马尼亚生产）送我们回去，怕我们走路太累太辛苦。在麻城时吃饭，给我们备出较好的伙食，有时晚上回不去，还组织我们几位打打麻将消遣，了解了解下面的情况，和一般医务人员很亲近，让我们休息得好，过得愉快。

贺部长古文根底很好，写了不少词，出版了一本词选，特意送我一本，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事。虽然词中一些典故我也不懂，

但读后我很受感动。有多首激励我心，如第一首，浩浩黄河（满江红）词中“有红旗指引，人民奋起，荷锐持锋争日月，仆前继后鬼神泣，只齐心，烈火焚群魔，孰能敌”充满了红军的革命气概和远见，也为历史所证实。

有四首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词“霹雳撼重霄”，“此身许国无所留”，以及1976年1月15日送周总理灵车过长安街的满江红；1976年清明节悼周总理的破阵子，老少庄严肃立，词中“此刻生民心是鉴……英灵在世间”，革命感情教育后人。为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词“彭帅平生不染尘，探真求是爱人民”。彭帅为人民说真话，这种精神要提倡，要学习。念奴娇哭小平同志“心怀济世莫奇功，只手蓝图绘足。浩海滔滔，狂澜力挽，……华夏昭昭史铸”真是情切意浓，对于小平同志，我也是景仰万分，有了他的改革开放理论和政策，我们才有今天。

（朱预：北京协和医院原院长）

回忆贺彪大队长

刘力生

1965年面上四清结束后，单位领导通知我和李引护士长到湖北参加农村医疗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医疗队队员多数来自协和医院与医科院几个研究所。队长是贺彪同志，栗秀真、刘美亭是副队长。我们全体队员到武昌后先在洪山宾馆集训。那时因为面上社教刚结束，我对于自己算不算得上“小小的走资派”心中无数，这个集训会是什么气氛？心情多少有点紧张。没想到这位贺部长一点架子都没有，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说话略微有点口吃，但直截了当，一点也不啰嗦，讲话的大意是鼓励大家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六二六”指示，为老百姓做好医疗服务。他的坦诚使我顿消疑虑。

集训的内容除“六二六”指示外，主要是介绍麻城革命老区的人文、地理和缺医少药的现状，大队工作计划等。

几天后，我们便乘卡车分散到乘马区各公社卫生所住下，我是江树公社的小队长，队员有朱宣和、钟祖恩、张文英、吕玉梅、王菊芬等。乘马区是丘陵地带，最边远的生产大队每天劳动工分值只有1角9分。砂眼、中耳炎和由于重体力劳动造成的疝气、子宫脱垂是常见病。冬季山区寒冷，儿童们缺乏御寒取暖条件，患肺炎和其他传染病的也很多。第一个冬天我们遇上了流行性脑膜炎，发病急，病情重，有的父母早晨出工时还一切如常，收工回家后孩子已被暴发流脑夺去了生命。因此造成当地群众的极大恐慌。医疗队全力投入了抢救，贺部长、几位大队长和我们

并肩战斗，到各个疫情严重的地方蹲点，组织药品，关心队员，整个医疗队齐心协力终于把当年流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控制到最低限度。

流脑季节过去以后，大队便按计划开展春季大扫除，动员家家户户清理垃圾、打扫卫生，管水、管粪，改造烟囱灶。贺部长有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的经验，他领导大队部督促我们有计划地在专业人员集中的王福店和江树分别因陋就简地建立了外科手术点和眼、耳、鼻、喉科手术点。我除了公社日常工作外，还负责培养半农半医，充分发挥每个队员的特长。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夜晚，急促的叩门声惊醒了我们，来人要求我们到十几里外去会诊。病人是急腹症，我赶到时，只见这里是一间磨房，一匹骡子正拉着磨吱吱呀呀转，病人就躺在一旁的草堆上。我艰难地进行了体检，发现没有肠鸣音，腹壁紧张，压痛明显。我判断是急性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送县城已来不及了，于是我让他们赶快送王福店手术点，这时天还没亮，老乡们立即卸下门板抬着病人上路了。这个病人最后顺利地进行了手术并痊愈出院。

正是因为大队建立了急诊手术点，才使这穷乡僻壤的危重病人得到及时妥善的救治，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所知道的如在望花山公社，周墨宽医生抢救一名颅外伤硬膜外血肿；江树区朱宣和为白内障病人手术让他们重见光明，并矫正砂眼睑内翻，使许多病人改进了视力；钟祖恩用气管切开抢救急性喉头水肿……。分布在各公社的医疗队队员们充分发挥特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每当我们走在路上，常会遇见迎面过来的老乡，只要他们猜出我们是医疗队员就会仁足称赞，说我们是“北京的高级医生，麻城人民给你家传名”。

农村交通不便，只能步行或骑车，雨天道路泥泞，我们就穿草鞋或干脆打赤脚。大家都愿意到大队部去开会，听贺部长讲

话，了解各兄弟医疗站的动态，再改善一顿伙食，十分热闹。

我负责半农半医培训，工作之中一度感到困惑，贺部长为这件事用写信方式给全队发了一期简报，指导我们如何结合农村实际，教给半农半医一些治疗常见病知识，留下“不走的医疗队”，以及怎样用启发式代替填鸭式教学方法，使我增强了信心。我终于对培训工作产生了兴趣，以至于翌年当卫生部派我出国学习时，我也不舍得丢下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和我的半农半医弟子们。

贺部长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此使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医生护士到了湖北医疗队都能意气风发，大显身手，创造奇迹，登上大红榜！

贺部长关心队员，他常说“过年过节要让大家回家，我不能让他们当牛郎织女”。其实大家回北京后惦记的还是湖北，这里虽然不是家，但却很温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医疗队已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贺部长也和许多部长一样靠边站，接受批判。一次我和蒲广寒同志到栗秀真同志处商谈工作，看到建设麻城农村卫生工作计划将半途而废，无法继续下去，感到十分惋惜！

医疗队撤回北京后，贺部长生怕队员们遭受批判，他多次明确地嘱咐队员们不要因为“出身”，否定哪一位队员的成绩，他并且坦诚地说“湖北医疗队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广大医务人员无私奉献取得的，它不容置疑。如果有什么错误也完全由我本人负责”。……在当时“谁不批判别人谁就不革命”的形势下，贺部长这番话只能让我对他更加敬重。

文革结束后，贺部长仍惦记着他的队员们，春节都到各家去走走，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后来他行动不便，大家又忙于工作，偶尔凑齐了几个人去看望他，他总是十分高兴地和大家共同回忆医疗队战斗在湖北的那段时光。

如今贺部长已离开了我们，三十多年前跟随他在麻城医疗队工作的不少同志（王权、刘美亭、尤娴玲、孙成孚、侯虞华）也先后走了。但这一支曾经挽救了无数群众生命的湖北医疗队的事迹将被永远载入史册，而当时一批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在这里受到的肯定、信任、支持和鼓舞，也在他们毕生事业中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刘力生 北京阜外医院教授）

正 气 之 歌

——贺彪同志《忆故人·怀贺帅》浅析

陈 济

1974年8月1日，是周恩来等同志率领，由贺龙同志任总指挥的南昌起义四十七周年。这时，贺龙同志已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5年多。贺彪同志以无限深情和满腔义愤写了这首《忆故人·怀贺帅》，深切怀念贺龙同志，声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这首词热情地歌颂了贺龙同志从“崛起湘西”开始革命斗争的光荣的一生。贺龙同志20岁时，率领二十一名青年，“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占芭溪盐局，组织起农民武装，他从此戎马倥偬，叱咤风云，指挥部队不停地同地主武装、军阀武装、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洞庭左右，长江上下，太行东西，河套内外，秦岭南北，敌军前后，都有他英勇的身影和战斗的迹，他把一生献给了党，把一切献给了党。词作者以“万马军中韬略筹”、“围歼阵式雕鞍布”、“地罗天网顽敌沮”，来形容、讴歌贺龙同志的英勇斗争业绩，反映出作者对贺龙同志的深知深解。熟悉贺龙同志斗争事迹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帅，正因为他有勇有谋，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战胜十倍、百倍、千倍于己的敌人，并所向披靡，使敌人闻风丧胆。

词作者以“见风流”、“识神武”、“人仰擎天柱”，来反映党和人民群众对贺龙同志的认识和评价。“风流”一词，意为杰出、

英俊，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句，毛泽东同志在《沁园春·雪》中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句，句里“风流”一词都是这个意思。“神武”一词，书面上的文言词语是英明威武，多用于称颂德高望重的将帅，“神”字单独解释，又有“人才智技能超绝者谓之神”一意，“神”、“武”组合为词，讲的是武功超群。词作者用“风流”、“神武”来称道贺龙元帅是很贴切的。党和人民群众非常赞赏贺龙同志在南昌起义，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巩固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解放西北、西南，进军西藏以及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伟大斗争中所作的卓越贡献，对他的高尚品德也十分景仰。贺龙同志公开处决蒋介石派来诱降的“说客”熊贡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的“肃反”，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斗争，保护一大批干部，在党内军内传为佳话，他那种一心为党、忠贞不贰、刚正无私、英勇无畏、大义凛然、一身正气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人们。人们从类似许许多多的事实里，“见”、“识”了贺龙同志的“风流”、“神武”，把他如实地看作党、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人仰擎天柱”。在贺龙同志入党的仪式上，周恩来同志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迫害贺龙同志时，在1966年9月14日对贺龙同志说：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时，再次明言他四十八年前说过的话“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贺龙同志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没有行动自由的时候，窗外的哨兵轻声地唱起了“洪湖水，浪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是家乡……”。这一切，都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贺龙同志的评价，恰

是“人仰擎天柱”。

就是这样一位人所共仰的“擎天柱”，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竟采用卑鄙手法，给贺龙同志扣上“大军阀”、“大土匪”、“三反分子”、“黑线人物”、“篡军反党”、“二月逆流的主角”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词作者无比愤慨地写道：“浩劫年中，忠烈遭阴盅”。作者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比作“枭獍”、“鬼狐”，只有深刻地认识这一伙人穷凶极恶的反动本质，才能打出这样入木三分的比喻。“枭獍”亦作“枭镜”，相传枭是食母的恶鸟，獍是食父的恶兽，杜甫《草堂》诗中有这样两句：“焉知肘腋祸，自及枭镜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反革命目的，陷害忠良，祸国殃民，如枭如獍。“鬼”是见不得人的，“狐”是阴险狡猾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采用卑劣阴险手法，如鬼如狐。

词作者贺彪同志是一位很老的革命领导干部，曾较长时间与贺帅一起工作，他对贺龙同志的人品和业绩有着深刻的了解，对贺龙同志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溢于词里行间。这首词不仅是对贺龙同志个人的，也反映出作者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诚之情，词中“叹忠烈，凄风雨”，“大业宏基谁与护”，一字一泪，我们从这里听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心声。如今读这首词，不会有什么风险，但当时作者写这首词是不容易的。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提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八一建军节前后，正是他们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的时候，作者爱憎分明地写出这首词，需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陈济：解放军报社干部）

是良师 是兄长

陈慧玉

1999年三、四月间，贺彪部长和我的老师章德炎同志相继仙逝。他们都是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士，走完了纯真而又英勇忠诚的人生历程，坦荡地向马克思报到。他们的音容笑貌和风格情怀深深地永存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缅怀之中。

无序油然而起的思念，几乎是我这个古稀老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一张故人的照片，更是引发着我的思绪。就是常年摆放在我家会客室夹在玻璃框里的那一张。我陪伴德炎同志35年，也就是说天天要见到这张照片已有30多年之久了。常听德炎指着照片说起往事：这张照片是1949年秋在西安照的，该照相馆名为“白宫”，地址西安东大街341号。我这里有一张在“白宫”照的贺部长的相片。那时他们都沉浸在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新中国诞生之际的兴奋、欢欣、激动情绪之中，组织上分配他们分赴全国各地建立新政权和开展百废待举的建设工作。这张照片上的六位战友，都是120师的卫生干部，前排中间是贺彪部长，右边是周长庚同志，左边是祁开仁同志，后排中间是潘本善同志，右边是董新山同志，左边是章德炎同志。他们中的三人奉命赴西北，另三人赴西南。在临行前的日日夜夜里，他们依依不舍，爬雪山过草地，万水千山，连绵烽火，严酷斗争，艰难险阻，一幕幕历历在眼前再现，他们共生死同患难将近二十载了。在西安当时，他们都已三十多岁了，风华尚茂，憧憬着为党的事业还要大干实干苦干，相约要在各自新岗位上做出成绩，互相淳



1949年贺彪与一野卫生部战友合影。前排左起：周云庚、贺彪、祁开仁，后排左起：董新山、潘本善、章德炎。

谆勉励。特别是贺彪部长，是他们的老领导，长期受到他严谨作风的熏陶，一旦要不听命于他的“声音”，真还有点不习惯，有点舍不得。于是，他们决定临行前合影留念，让二十年共同浴血奋斗中凝结的情谊永驻常在。

这张照片是战友情谊的纽带，照片上的六人，无论到哪里相互信息不断。后来，随着党的事业发展，相继又都调京工作。贺彪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周长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祁开仁任该院院长，潘本善任海军卫生部长，董新山任中央化工部人事司司长，章德炎任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党委书记。从德炎的日常言谈中，我深切感受到，他对照片上的人都视为他的良师和兄长。不仅因为他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小（个子矮，外号“矮章”），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他高。贺部长当然是最受到崇敬的，在红军时代，像贺部长那样已有比较娴熟的战争创伤外科技术，且又会吟诗赋词，真是“大知识分子”了。潘本善和祁开仁都是当时难得的科班出身的医务人才。德炎迫不及待地向他们学习，他之所以能锻炼成为一名战争创伤外科医生，得益于这几位良师的指点和帮助。董新山如大哥似地呵护着他，若遇有人“欺侮怠慢”了德炎，董大哥必出来为“矮章”讨个公道。长征过草地时，董的大布袋塞满稻草当盖的被子，章的大布袋塞了稻草当垫被，就这样蜷缩在一起睡觉，当然比亲哥哥。他们六人之间的友谊厚重，连他们的家属子女都很珍惜这份情谊。前年潘本善的儿子还特地翻印这张照片，他说他这个做侄辈的要永远怀念与他父亲共生死同患难的伯伯叔叔。这张照片总是在引发着我们的思念，至今我与这张照片上人物的家属有着姐妹之情，贺彪夫人陈凯大姐、潘本善夫人孙桐君大姐、董新山夫人胡凤英大姐，总是把我当成小妹妹那样安慰勉励我。

德炎是个“红小鬼”，从1929年参加红军就在红二方面军卫

生部门工作。贺彪同志是他们的领导。一个方面军的卫生工作，从开创建立到逐步健全完善完备，是极为艰辛的。贺彪同志是有积极贡献的，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比较大，故而老部下们特别推崇他。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有很多特点，我听到过德炎说过不少，但我无能概括。然而给我记忆和印象最深的是，贺部长强调突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具有鲜明的求真务实精神。他们在晚年时常饶有兴味地聊战争年代部队卫生工作的那些状况。预防为主必然表现在极为重视第一线的工作，贺部长认为团卫生队员是基层骨干力量，编制不能缺员，分工合作必须快速及时到位，结合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特点，部署布置好卫生工作要求和做法，力争不发生时疫和救护不力的情况。贺部长最反对稀稀拉拉的队伍和作风，贺部长在当时二方面军里是出名的“帅哥”，衣着整洁，精神抖擞，“矮章”很羡慕。在长征途中，尽管条件艰苦，德炎当队长的卫生队比较“合格”，也是服装整洁，缝制了统一的手挎包，走在队列里，整整齐齐，受到夸奖。在工作上他们也是雷厉风行，从不七零八落。贺部长深有感情地说，当卫生干部比别的战士要苦一倍，不但一路上要行军要服务，到了宿营地却又更加忙起来，安置伤病员，烧水督促大家洗脚挑水泡和挖土厕；宣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预防什么，怎么预防，等等，尽可能减少可以避免发生伤病和事故。在贺部长业务思路影响下，红二方面军和 120 师的卫生工作积极认真地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出了很大成绩。1983 年全（国）军在编写预防医学史料时，对贺彪同志在预防医学实践方面的成绩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肯定。

贺部长和德炎在晚年聊天时，常谈到战争年代对卫生干部的素质养成，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比如说，当年的“红小鬼”们，文化程度普遍极低，为了把大家领进学文化学技术的广阔天地，

贺部长想了很多办法，不间断地办培训班，师资教材只能就地解决，先学过的教后学的。“红小鬼”大都勤快机灵，经过培训，操作就比较规范，符合卫生科学要求的程度易于提高。贺部长还督促大家学文化练汉字书法。德炎的毛笔字大有长进，直到建国进城后在知识分子圈中任职，别人赞他签名挺漂亮，德炎说“亏得那时贺部长提倡练字，一辈子用上了”。贺部长总是引导大家向更高程度的业务技术攀登，提高大家学习愿望和自觉性，每隔一阶段各级卫生干部就有机会进培训班。德炎任旅卫生部长后还到晋西北卫生学校高级班学习。学习结业后，贺部长宣布章德炎任该校校长。1944年他终于进延安中央医院进修，三年的系统学习，使德炎有机会从师于国内外赴延安的进步医学专家，学习他渴求的知识和技术，熟悉了阿洛夫、马海德、傅莱等等外国同行。至此，视野见识得以开阔，树立了精益求精的技术思路，锤炼积累着战争创伤外科“土”专家的素质。德炎晚年回首往事，感慨很深的是，他向往成为一名战争创伤外科专家的理想，受到了贺部长的领路和指引。从“红小鬼”造就成一名“土专家”，岂止德炎一人，不说成万，也要上千，在培训一代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卫生干部事业中，贺部长也是有杰出贡献者之一。

德炎从“红小鬼”时期就认识贺彪同志了，相识相交七十年了，堪称老友。战争年代共生死同患难，建国后政治运动风风雨雨，贺部长也经常从思想上开导他。更有一段时间，我们两家住得近，他家在和平里，我家在北新桥，相距三、四站地，又值“文革”刚结束，大家刚从“牛棚”返京，劫后余生，感慨万千，都在家待命复职，有时间有心情见面聊聊。以后也常见面，贺部长写了一些诗词和回忆录稿子，我们有幸聆读，被邀说些感想和体会。在与贺部长及其家属长期交往中，我感受到德炎对贺部长怀有感激之情，他常说：“我是在贺部长眼皮底下长大成长起来

的，贺部长是我的良师，是我兄长。贺部长关心爱护同志，虽然说话口气严厉，对人要求严格，一是一，二是二，遇我们有差错，训起来真有点下不来台，但他讲求育人树人，千方百计提高大家的业务技术水平和过硬的思想作风，贺部长经常告诫我们，要有大聪明，小聪明不足……”。

“大聪明”和“小聪明”的点拨，对德炎一生的启示很深。德炎回忆，那时在“红小鬼”群体里，往往因为未经世事，历练不深，文化底子浅，有了一得之功就沾沾自喜，滋长浮躁不扎实的风气。贺部长经常要敲打这些他认为是小聪明的人，他让大家懂得“大聪明”和“小聪明”的区别何在。德炎感受，农家出身的小孩子，在红军部队里，单纯天真得很，整天不怕苦不怕累，学干什么也有机灵劲，但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知识有多广，技术有多高多深，往往自己学会做了一点事，就以为自己蛮聪明蛮有本事。还有一种想法，认为有了这点本事就行了，待到革命胜利、“老婆儿子热炕头”就行了。这些都是农民意识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必然引出“小聪明”意识的各种表现。德炎说，有不少战友没有在卫生工作岗位上坚持下去，其中就有嫌卫生工作又脏又累，职务提升困难，不如军事政治干部个人发展快，他们就是缺乏贺部长告诫的“大聪明”，就是缺乏全局观念、整体观念、长远利益观念、政治责任心、社会责任心、事业责任心、工作责任心……。贺部长引导大家不要固步自封停步不前，要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使我们大家热爱卫生工作，愿意踏踏实实地干一辈子卫生工作。

到了晚年，我们在和平里贺家寓所聊天时，我也听到贺部长说过几次：“做人要做大聪明的人，切莫做耍小聪明的那些人……”。他强调大聪明的人遇事必定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考验，永远站得住脚跟，做人无愧。而耍小聪明的人往往投机取巧，甚

至弄虚作假，甚至损人也不利己，最终不能自圆其说，没法向历史交代，切忌做这种人。我们敬佩贺部长的为人，他毕生襟怀坦荡，刚正不阿，实践了他做人要做大聪明的人的座右铭，为战友们作出了榜样。德炎到了晚年趋于稳重谦谨，就是得益于贺部长境界的示范。贺部长推崇大聪明的告诫深入了德炎的心坎，认识了真诚正直的“大聪明”包容了合理和正义。

贺部长离开我们已有二年多了，他精辟的诗词，时不时在我脑海回荡：诗如其人，诗言其志，正气之歌，豪迈高亢，其诗义愤深沉庄重，其诗情真意切热忱；然而，他对我们恳切的告诫，更加犹如在侃侃而谈娓娓入耳……。

贺部长的人格富有魅力，备受战友部属和子孙们的敬仰爱戴。我们要继承先人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中，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国策实践中，争做智净贤明的社会中坚砥柱，定让先人含笑九泉。

德哉善哉，斯人已逝，风范永垂。

(陈慧玉：首都图书馆外文部原主任)

贺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凝秀

一、贺彪同志经常对我们讲的几件事。一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二是建设好防疫站、医院、学校、科研院所、药厂、医疗器械厂、生物制品厂。三是搞好中西医结合、中草药开发。四是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五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选拔好各级领导班子。这是他大会小会个别交谈、经常讲的几个问题。

二、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批斗贺诚、傅连璋、饶正锡、孙仪之、张汝光、张步峰等人，说他们是走资派，修正主义。贺彪同志私下对我们说，他们为我党、我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做出重大贡献。他们是我党、我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被别人左右。有一次批斗他时，造反派问：贺彪你老实交代“贺龙是土匪”。贺彪说：我没见他抢东西。造反派问：贺彪你老实交代“邓小平是走资派”。贺彪说：我没见他贪污。造反派问：贺彪你老实交代“贺诚是修正主义”。贺彪说：我没见他修改什么。造反派压他低头弯腰，再问，他一言不发。

三、贺彪同志经常来医院检查工作，事先不打招呼，不到办公室，直接到病房和病人交谈，到科室和专家教授、工作人员交谈。再到办公室和院长、政委谈。有表扬，有批评，有根有据，同志们都很佩服。我们对秘书说：“首长来先给我们打个招呼。”秘书说：“首长不准。”

四、贺彪同志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有时病人伙食不太

好，他立即找我们说：“精神、营养、药物、体疗”都很重要，院务部要狠抓营养治疗。总后的同志说：贺彪部长批评人很厉害，但他不整人，还保护了很多人。

五、他办事认真、严格、果断、快捷。我们提出医院缺医、教、研生活用房，他立即组织卫生部、营房部、司令部的同志来院调查研究，决定逐年给解决。我们提出缺少医务人员，要到院校选拔一批研究生，应届毕业生。他很快组织卫生部、政治部调查决定。我们选拔院校毕业生百多人，学科带头人 30 多。我们提出要所需医疗设备，他立即派药材处同志来院调查研究，很快给解决了电子显微镜、生化自动分析仪、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微量元素自动分析仪等数十台先进仪器。无论机关或基层或伤病员，都普遍反映，贺彪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他关心群众，正大光明，公道正派，赏罚严明。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张凝秀：解放军 302 医院原院长）

2001 年 3 月 28 日

贺彪部长关怀我军药材装备建设

裘雪友

贺彪部长在战争年代曾长期领导军队的卫生工作。1978年2月，受中央军委之命，重回军队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并一度兼任总后卫生部部长。我有幸曾任首长的秘书，在首长身边工作虽仅一年，而在工作岗位上对我的教导，在以后20多年来往中对我的教诲，真是终身受益，终身难忘。由于自身专业的关系，贺部长关怀我军药材装备建设的事例，感受尤为深切。

贺部长直接领导了1979年2月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战前，早就指示主管部门要筹集充足的战伤药材和血、液、氧等医药物资；战中，亲自督办补充大量的急救包、输血、输液管等耗材；战后又抓紧卫生勤务保障总结，明确指出：“药材装备是完成卫勤保障任务的物质基础，师以下卫生装备要轻便机动，尽量一物多用，便于携行、运行和展开撤收。战救药材要品精、质优、量足，认真做好血、液、氧的供应，保障需要”。

贺部长在兼任总后卫生部部长期间，定期到卫生部机关主持部务会议，布置工作，研讨问题。1979年12月3日的部务会，有部机关的副处长（当时部下设处）以上干部参加。贺部长在布置的9件工作中，有5件是药材和装备工作。首先提出了救护装备和技术车辆的研制、配备问题。他询问了运血车的性能和生产状况，并提供了适用“底盘”的解决渠道。接着，研究直升救护机和海上救护艇的问题，要求与空、海军有关部门联系研商。贺部长非常关心医疗装备改革，他对解放军总医院展览的技术革新

成果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的“三防”装备，在会上指示有关处、室，一定要组织专门班子，作为工作重点，抓好生产和推广使用。贺部长说：“抓起来有很多困难，要想办法，采取多种方式解决”。

1981年10月，全军药材清仓、药政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贺部长指示会议筹备组向总后报告，恳请几位主要领导到会作指示。结果，总后洪学智部长亲自作了批示；王平政委，胥光义、贺彪、张汝光副部长都到会作了长篇讲话。贺部长在讲话中专门强调了药材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药材工作是整个卫生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成卫生工作的各项任务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药材物资做保障，那是不可想象的”。“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必须重视和关心药材工作，每一个做药材工作的同志，要充分认清药材工作的科学性、技术性和重要性，要任劳任怨，安心本职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来”。这既是对药材装备工作的强调，也是对全军药学工作者的激励与殷切期望。我相信，一代一代的药学同行们一定会牢记贺部长的谆谆教导，做好本职工作，为我军药材装备的现代化作贡献。

(裘雪友：总后卫生部原处长)

2001年8月

怀念贺彪老部长

王万水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对于曾在贺彪老部长身边工作过的我来说，是个十分悲痛的日子，这一天，我深为崇敬的贺彪老部长，在岁月的长河中跋涉了九十个风雨春秋，走尽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静静地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与世长辞。他留给了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崇高精神，带走了我们对他的由衷爱戴和深切思念。

贺彪老部长原是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从长期被关押的牛棚中解放出来，之后调到军队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一度兼总后卫生部部长），彼时我是他在总后的首任秘书。贺彪老部长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工作认真，廉洁奉公，是我党不可多得优秀党员，是我军不可多得的高层领导干部，是我辈和年轻一代不可多得的不朽楷模。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特别是全国全军卫生界的重大损失。

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曾有一句闪光的名言，即：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啊，贺彪老部长的高大形象至今还矗立在我们面前，他那不朽的精神还时刻活在我们心中。他，贺彪老部长，还在以他生前的言行语重心长地教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

我深切怀念贺彪老部长，敬佩他敢于负责的工作精神和严谨

的工作作风。早在“文革”之前，原总后卫生部医疗器械检修所设在天津，由于“文革”的劫难，所领导班子不稳定，管理上松散混乱，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客观因素，致使包括精密昂贵仪器在内的大批进口医疗设备，得不到及时检测维修，像垃圾一样堆放在露天仓库里。“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总后各医疗机构急需添置医疗器械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医疗器械检修所却仍处于有求难应的怠慢状态。鉴于这种情况，当时总后领导中分管卫生工作的贺诚、饶正锡、贺彪和张汝光四位副部长，几经研究、讨论，久久未能统一认识。随着时间的拖延和医院建设的迫切需要，身兼总后卫生部部长的贺彪老部长，在三次亲自到天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医疗器械检修所本身存在的问题，权衡了北京、天津两地的利弊条件，力排众意，果断地拿出将总后卫生部医疗器械检修所由天津迁往北京，同原在北京的总后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合二为一的意见，并提出了搬迁、合并的总体设想和实施原则，得到当时总后张震部长、王平政委和总后常委的赞同，受到了总后和全军卫生战线的普遍好评。时至今日，总后卫生部医疗器械检修所迁京后与原药品检验所合为总后卫生部药品器械检验所已二十二年之多了，无论从加强领导、精简机构和提高管理水平上，还是在方便工作和提高为医院服务的质量上，都明显显示出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二

我怀念贺彪老部长，敬佩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者精神。一九七八年的八月初，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和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精神，贺彪老部长和总后白相国副政委带领总后机关有关部局十多名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进行调查研究，促其拨乱反正。刚到四

医大时，整个学校一片混乱，在校领导班子中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一是学校是以政治为中心还是以教学为中心；二是对“文革”中的问题是继续纠缠还是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三是对受迫害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等高级知识分子是继续强令他们“闭门思过”，还是尽快解放出来，轻装上阵重新走上教学岗位。在部院系中层干部中，围绕着造反派和保守派谁是谁非等问题，还在打派仗争高低。在基层群众中，除一部分人不上班，一部分人出工不出力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排着队向总后工作组告状。在这种情况下，贺彪老部长坚决贯彻总后党委关于拨乱反正的指示，一边在学校党委中耐心细致地作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的工作，一边逐家逐户对深受迫害的五十多名老知识分子登门探望、慰问、调查。与此同时，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位著名教授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继而在对不同层面、不同范围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又召开了“尊老敬贤、尊师重教”大会。通过二十多天的工作，使全校上下由逐步受到触动，进而引起震动，学校的混乱状态始见变化，正气始见伸张，第四军医大学复兴的局面出现了可喜的端倪。在座谈会上，有些老知识分子激动地紧握着贺彪老部长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总后工作组的到来，给第四军医大学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新生，我们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在有生之年，为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献出这把老骨头。”

三

我怀念贺彪老部长，敬佩他落落大方的外交风范和令人仰慕的人格魅力。一九七八年的十月份，贺彪老部长亲率由全军部分大单位卫生领导干部和专家教授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此前，作为随行人员的我有两个问题犯嘀咕

咕：一是贺彪老部长多年在地方卫生领导机关工作，“文革”中又被隔离了多年，这次刚到总后还没几个月，对军队卫生工作还不十分熟悉，对外军的卫生工作情况更是了解不多，一旦在访问中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能否妥善对应；二是岁月不饶人，当时贺彪老部长已年届七十岁高龄，面对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访问日程，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但是，近20天的访问实践，完全说明我的担心和疑虑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在访问的全过程中，作为团长的贺彪老部长一直是浩然大方，应对自如。在拉合尔参观军队的一所精神病医院时，巴方专家突然问到中国对此类病人的治疗情况，当时，贺彪老部长看到我们的专家（实际上我们代表团中没有精神病专家）未能作答，便毫不犹豫地谈了三条治疗原则，即：一是使用药物；二是做适当强度的劳作和体操；三是开展调整心理、愉悦精神的娱乐活动。话音刚落，巴方专家就伸出拇指称赞贺彪老部长不仅是位高层军事长官，而且是位名副其实的医学专家。同时，认为三条治疗原则对他们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当在卡拉奇参观完海军医院后，巴方国家卫生部领导前来就地顺请参观一所地方医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日程外的追加安排，我们没有思想准备，巴方那所地方医院的领导也是临时接到通知，看样子他们很为难，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面对这种情况，贺彪老部长却很轻松地指出，真实的东西是勿需包装的，愈是自然的愈是美丽的，愈是本来的面目，愈是事物的真谛。一句话，使该医院领导心中的局促、尴尬和歉意顿时烟消云散。特别是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受当时的巴总统齐亚·哈克接见的近一个小时中，贺彪老部长在没有任何讲稿的情况下，有理有力有节地向哈克表达了对巴军盛情接待的谢意，谈到了访问的感受和收获，介绍了我军卫生工作的概况，提出了在中巴两国两军友谊日益加深的今天，两军卫生工作进一步加强交流和合作的意向及建

议。整个谈话，观点明确，思维敏捷，脉络清晰，表达得体，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和我军卫生工作发展的良好态势。在接见的全过程中，齐亚·哈克总统的脸上一直洋溢着钦佩和赞赏的表情。

那次出访，先后参观了十三个城镇，考察了二十五个医院、学校、部队和科研单位。由于在频繁的跨城镇活动要乘直升飞机，连日的陪同使巴军卫生部领导显见疲惫，飞行中屡见“瞌睡现象”，但贺彪老部长一直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事后我问他为何不显累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也是人么，怎能不累呢？我的年纪比你们都大，我是强忍着疲劳，强打着精神坚持访问的，外事无小事，因为我们是解放军的代表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和风貌。在外交场合，每时每刻都要维护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尊严。”这一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四

我怀念贺彪老部长，敬佩他对人对事的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一九七八年的初夏，贺彪老部长从国家卫生部调总后不久，正逢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召开，当时他住在京西宾馆。一天中午，我往他手里递文件时，突然发现他的左上臂下垂着不能摆动，不能屈曲，更不能上抬。当我拿起电话准备叫医生时，贺彪老部长立即用右手压下电话，制止了我，他说这次旧病复发的原因是，上班时冷不防被车门猛然别了一下，并告诉我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不要麻烦医生，他自己就能解决。于是，先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他用右手帮左手抓住我坐的椅子背，先是轻拉几下，继而外旋、内旋，之后向上猛拽了一下，转瞬间左上臂缓缓地恢复了功能。当我感到高兴时，他却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若有所

思地说，那是“文革”期间，他被关在牛棚里，由于造反派的频繁批斗，挂牌子，坐“飞机”，两上臂经常被拉过来扯过去，时不时的被拧肿、扭伤、脱臼。幸好他本是外科医生出身，无奈，每次都是以牛棚里的门框或暖气片等作“医疗器材”，自行进行复位。说到此，他看到了我对造反派产生了气愤的表情，便调转话锋，指出造反派的做法定然很野蛮，很粗暴，也很幼稚，但他们当时都很年轻，都是娃娃，都正在要求进步，他们以为对我批斗的越厉害越是进步的表现，整得越凶越是革命的行动。从根本上说，这不能完全怪他们，关键是“文革”这场运动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大局，看长远。紧接着，贺彪老部长指着军委首长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件说，去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方向拨正了，人民的劲头就会鼓起来，大部分年轻人包括原来的那些造反派也都会觉悟，也会积极投入到四化建设中来的。干革命不要怕吃苦，不要怕挫折，更不要怕受冤枉，革命是大家的事，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大事业，对那些犯过错的人，甚至整过自己整得厉害的人，只要他们认识到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们就要不记前嫌帮助他们，宽容他们，团结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小肚鸡肠，更不要耿耿于怀甚至挟嫌报复。

五

我怀念贺彪老部长，敬佩他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和品德。记得一九七九年春节之前，全军著名心外科专家、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主任吴公良教授，曾托人给贺彪老部长捎来两盒黄山茶叶，我擅自代他收下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贺彪老部长说，吴教授是军内外有名的专家，对卫生事业有很大的贡献，本来我们对人家支持的不够，就有些歉意了，还怎能收人家的礼物

呢，当即让我把茶叶退还本人。我再三考虑，假若真的退回去，会使吴教授感到难堪，于是在贺彪老部长心情平静以后，经他同意把茶叶留在了办公室，作为待客之用，并代他给吴公良教授写了一封信感谢他。

贺彪老部长离休后，有一次我去看他，谈话中了解到，他珍藏多年的一些象骨轻纱折叠扇，在“文革”中被抄家时抄走，仅剩下几把也被撕光了纱面只留下骨架，当他拿给我看时，我便提出可以设法修复。于是，便通过我的老朋友、时任空后卫生部副部长的张贵平同志，在杭州作了免费“复原”。贺彪老部长拿到修复的折扇后，像心爱的宝贝一样，端详来端详去，打开了再合上，合上了再打开，紧接着就拉开身边的抽屉，拿出一些钱来往我手里塞，虽经我反复声明系免费修复，但他执意不肯收回，在相互推搡往返拉“锯”之中，我便趁机转身离开了他的家。此后，我再去看他，他多次重提此事。一九九三年的秋天，贺彪老部长在北京市桥牌赛中得了季军，他便把得的作为奖品的一件高级羊绒衫送给我，我几经推辞未能奏效。我深知，这件羊绒衫所体现的纪念意义，更深感这件羊绒衫所蕴含的贺彪老部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清廉精神，直到现在，我每当冬季穿上这件羊绒衫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啊！贺彪老部长虽已离开我们两年之久了，然而，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音容笑貌和特有的人格魅力，仍时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那为党的事业风骨遒劲、兢兢业业、爱才如命和朴实清廉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万水：总后卫生部医疗管理局原局长）

2001年6月30日

忆贺彪部长在总后勤部工作

樊兆春

在我走过的历程中有一段使我平生难以忘却的岁月，这就是我担任贺彪部长秘书的一段时间。1979年11月，我来到贺部长身边工作，他当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长达近六年的秘书工作，使我耳闻目睹了他在总后勤部工作的主要过程。贺部长高贵的品质和人格魅力不可掩视地表现在工作当中。他高洁的人品，深厚的修养，严谨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我。他对我军卫生工作极强的责任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敢于解决问题的风范一直在激励着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军卫生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面对如何开创军队卫生工作的新局面这个重大问题，贺部长倾注了全部心血。在总后党委领导下，他紧紧围绕加速人才培养、调整卫生机构、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协作攻关、推动军事医学研究和医疗、教学工作的全面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军卫生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下是根据我的工作记录和回忆，记叙贺部长的一些工作思想和实践，以纪念他对我军卫生工作的重大贡献，也以此寄托我对老首长深深的怀念。

一、贺部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落实精简整编

1980年军队进行30年来第四次精简整编。为落实好卫生系统的精简整编工作，5月的一天，贺部长对我说今天到309医院



1979年，贺彪视察部队卫生医疗工作

调研，我说先给309医院的领导打个电话，贺部长说不用了。我们到了309医院，没有先到领导的办公室，而是到各个科室进行察看。后来朱院长闻讯赶来，随贺部长几乎转遍了每一个科室、病房，贺部长边走边了解情况，最后才到院部听取汇报。整整用去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时年，贺部长已经七十一岁。这样一调查贺部长对309医院的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为在精简整编中实事求是地调整编制机构和合理配置人员，达到精简整编的目的提供了有利保证。

还是5月的一天，贺部长上班后对我说，今天咱们去丰台药材库检查一下，看看他们的管理工作做得怎么样。贺部长还是不

让我先和领导打招呼，直接到了仓库。他先后检查了5个药品库房，而后对仓库的领导说，我这次来比上次满意，看来你们的工作是有进步的，但是有些工作还要改进。比如，要进一步加强药品的规范化管理，做到各类药品器材要登记准确，及时处理失效的药品等。我们跟贺部长整整跑了一上午的时间，大家都感到很累了，可贺部长却毫无倦意。我们从内心里对贺部长的工作精神十分钦佩。

贺部长不但工作上务实深入，实事求是，而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十分关心。他曾对我说，做工作要多动脑筋，考虑任何问题都要全面些，做事要严谨、细致。贺部长的这些教诲我都铭记在心，对我的成长进步有着莫大的指导作用。

二、贺部长关于编辑《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卫生勤务保障工作总结》一书的思想观点

1979年，我军取得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总后张震部长对在这次作战中的卫生工作是满意的，认为防疫工作做得好。贺部长要求卫生部很好地总结一下这次作战卫勤保障经验，提出要编写《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卫生勤务保障工作总结》一书。为编写好这本书，贺部长做了很多具体指示，他说一定要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卫生勤务保障经验总结好。

1980年7月11日上午，贺部长找有关人员系统地谈到他的想法。他要求，总结工作要讲科学，书的内容要充实，文字要精炼，逻辑性要强，各类数据要准确。关于书的文字风格，贺部长说，我们写这本书不是写小说，但文字也要流畅活泼一点，否则大家不愿意看。

在思维上，要注意好的方面不要讲过头，一般、较差的也不宜批评过多，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更不能带倾向性，一个新东

西，还未肯定对不对，先不要下结论。前言、序言应考虑：一是提一提广大医务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二是提一提现代战争条件下卫勤保障的新特点；三是提一提师团两级卫生机构如何作好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在内容上，要重点总结组织指挥，医疗编组，技术演练，药材筹措，战伤救治，后送运输，卫生防疫等等，这些都是关键。我军卫生战备建设应向“四高”进军，即：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率、高适应能力。要从这四个方面有计划、有目标地研究和解决我军卫生战备问题。如不从战略上着眼，不从现代化的战争对卫勤保障的要求做准备，就很难完成战斗任务。

在数据统计方面，贺部长要求做到：准确、真实、系统、简便。他说，数据搞错了就失去了科学价值，我们编写的这本书是宝贵经验的总结，当前、今后都要对卫勤保障起指导作用。我们今天有条件，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要动脑筋，辩证思维，求精，求准，用科学的态度反复思考，写出高水平的文献，没有这个水平，作为历史文献，意义就不太大了。这本书搞好了是对历史的贡献。

三、贺部长关于加强医科院、总医院 协作攻关的思想观点

1979年4月，贺部长主持召开了已经有16年没有开过会的第三届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会议，这是一次盛会。会议期间，许多老专家，老教授欢聚一堂，畅谈振兴军事医学事业发展的大计，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圆满，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不久，贺部长开始思索协作攻关加快推进我军医疗、科研、教学工作的发展问题。他选择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医院这两个具有代表全军科研和医疗实力单位进行协作，

以此带动全军的协作攻关。

1980年8月，贺部长召集总后卫生部、医科院、总医院领导及专家专门研究协作攻关问题。他说，医科院、总医院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协作，向科技进军，以此推动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搞协作就是要解放思想，集中智慧，群策群力，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搞协作要树立全局观念，反对本位主义，协作的双方都要当促进派，不能互相制约，设置障碍，要积极创造协作的条件；搞协作就是要集中人才、设备、条件，发挥最大效益，解决当前医疗、科研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1）在人才培养方面，要采取联合培养的办法，把有限的人才、技术骨干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同时，还要注意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在学科建设上做到后继有人。（2）在设备使用方面，能互为利用的，就不一定各买一套，要节俭花钱，双方要把现有的设备、仪器种类提供给对方，以方便选择使用。（3）在科研方面，要密切科研和临床的关系，在烧伤、野战外科、药物等学科方面都可以合作。要及时将科研成果进行鉴定、定型、生产，充分发挥作用。（4）在图书资料方面，要做到资源共享，不要封闭各种信息，要加强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总之，凡是可以合作的项目都要设法进行协作。贺部长说，搞协作，首先要制订好计划，制订好原则。医科院、总医院的领导要多协调，积极为协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大协作和小协作相结合，不能搞成一锅粥。他还说，医科院、总医院在协作的问题上先走一步，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军医大学和全军卫生单位。卫生部要认真地办好这件事，加强协调工作。全军医疗专家、教授600多人，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必要时召集一次会议专门进行研究，制订一个可行的办法。大协作是经常性任务，以后

还要加强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这次会议后，在总后卫生部领导的支持下，医科院、总医院很快制订了加强协作攻关的意见，后来又逐步推进到军医大学和全军医疗科研单位。至今，这件事仍在继续进行着，极大地促进、加快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人才的步伐。

四、贺部长关于医院管理问题的思想观点

1. 关于医务干部考核和医院管理问题

1982年7月8日，贺部长在参加驻京单位卫生干部考核汇报会时，谈了他对卫生干部考核等问题的一些想法。他谈到，医院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医院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和提高。对老专家、老教授要提出要求，要让他们带好青年医生，把考核工作搞好。我们这次是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要在全军全面展开。考核就是看看平时的训练水平如何，医术、医德、医风怎么样，医疗制度是否健全合理，对不健全、不合理的要改进和改正；还要看工作职责明确不明确，病房的管理规范不规范，这些对医院来说都是大事情。考核要坚持实事求是，针对医院科室的不同情况进行，不要一刀切。考核的方式方法要灵活些，不能给下面出难题，通过考核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加强医院管理。

院风、医风、作风要搞好。医院里要有好的院风，医务人员要有好的医风，大家都要有好的作风。

2. 关于购买进口设备和管理问题

1982年8月30日上午，在听取总医院李其华院长汇报赴日考察医疗器械情况后贺部长谈到，你们这次去日本考察，参观了他们的几家医疗设备生产厂家，了解了医院体制和设备管理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医院购置一些设备是需要的，但是必

须是急需的，以前你们买了些“万国牌”的设备不配套，不便于维修，今后购买设备要通盘考虑，做到有计划性，选择的设备以哪个国家为主要论证好，我们的经费有限，应本着节俭的原则办事。对购买的设备摆放要合理，首先要考虑方便病人检查，不要使病人为一项检查跑上跑下。其次，要对使用设备的人员进行培训，要了解设备性能，熟练掌握规程。各医院都要加强设备的管理，不设大小设备都要管理好，重要设备要实行专管统一使用。设备是医务人员的武器，没有设备就等于没有武器，医务人员离开了武器怎么战斗啊。卫生部药材处以后要检查各医院购买的设备配不配套。医院要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是要装备一些设备。我们国家出钱买一些设备，如管理不好，把仪器搞坏了，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在另一次会议上，贺部长也提到设备问题。他说，要尽量用国产设备，要充分利用现在设备，不要买重复了，以节约经费。

关于医院的发展和建设问题，贺部长有很多值得记叙的思想观点。对于医院的科研、人才培养、医疗事故、医德医风，等等诸多方面，他亦有颇有见的主张。贺部长勤于学习，深入实际，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风范和优良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作为在贺部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从贺部长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思想和品格，这些将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为此我将永远怀念他、敬仰他。

(樊兆春：总后医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长)

贺彪部长的荆楚之行

杨 宣 春

1998年5月，贺彪部长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他的故乡江陵。那次的荆楚之行，是借参加鄂湘两省有关部门在武汉召开党史工作联席会的机会，顺访他的故乡的。我和樊兆春同志作为身边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他的活动。时间虽已过去10余年，但几件事情依然历历在目，晃如昨日。

江陵是贺部长出生的地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但自1930年他参加红军离开江陵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次都未回过故乡。我心里清楚，退居二线以前，他忙于工作，无暇回乡。而退居二线的他，不愿意离京外出的主要原因，一是怕花国家的钱，二是不愿给地方增加麻烦。这次的荆楚之行起因于一些老战友向他反映的情况。

原来，“文革”之后，洪湖地区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斗争史迹陈列馆。贺部长虽因故未能参加开馆仪式，但他收到了陈列馆的全部资料，包括陈列馆的画册，翻阅之后，他发现馆内陈列资料，较全面地反映了湘鄂西儿女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但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给湘鄂西苏区造成的惨重损失，却几乎没有提及。更有甚者，在王明路线时期，在湘鄂两苏区党政军中大搞“肃反”，错杀了成千上万革命者的当事人的巨幅照片，与被错杀的红军高级将领的照片一起，赫然悬挂于陈列馆的显著位置，却未作任何说明。邓家泰等一些老战友，在参观陈列馆后，也异常愤慨地向他谈了这些情况。这引起了贺部长深深的忧虑。经过认

真考虑后，他接受了鄂湘西省有关党史部门的邀请，决定出席武汉会议。

临行之前，他嘱我收集资料，以便协助他准备发言稿。在会议驻地武汉东湖宾馆，在修改讲话材料时，贺部长对我说：我们党一再犯“左”的错误，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有的人把“左”当成革命，似乎越“左”越革命，以致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浩劫，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多么惨痛的损失，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在大会发言中，贺部长以老战士的身份，阐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候，湘鄂西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他还历数王明路线时期，苏区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的史实，阐述了发生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根源，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贺部长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受害者，在第二次肃反时，他被诬为所谓“改组派”成员，被捕关押一个多月。由于贺龙、关向应的干预，他才幸免于难。对于个人的这段经历，原湘鄂西苏区时期的老同志都清楚，而贺彪部长在这次发言中却只字未提。

武汉会议期间，贺部长见到了许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战友。从参加红军起，贺老即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即使在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他也从未放下手中的手术刀，与会的代表中，许多人是他冒着枪林弹雨，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的。岁月如流，当年英姿飒爽，驰骋疆场的红军战士，今天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战友重逢东湖之畔，谈往忆旧，总有说不完的话，许多人不免满怀感激之情地提起当年贺老在战场上抢救自己的情景，贺部长总是笑着说：“我记不得了。”

曾任湘鄂西省委书记的杨××，也是与会代表之一。此人是洪湖苏区第一次肃反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一批红军军师级将领和相当多的苏维埃党政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惨死在

“左”倾路线的屠刀之下，杨××作为执行者，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这次会议是在当事人中征集史料，以便为撰写史书作准备的。然而，在会议的发言中，杨××却只讲自己的“丰功伟绩”，而对王明路线下的那场肃反“左”祸，居然只字未提，这使与会代表们非常失望。一次会议休息期间，杨××找到贺部长，相当谦恭地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离开洪湖后的经历。整个谈话过程，贺部长一言未发。当杨××说到全国解放后，他曾与贺彪等陪同贺龙元帅观看歌剧《洪湖赤卫队》时，贺部长只是淡淡地说：我记不得了。

会议结束后，我随贺老回到了他的故乡江陵。在江陵县贺家湾，他到自己父母坟前缅怀双亲，看了自己出生直至参加红军前住过的老屋。大部分时间，他同荆州市委、专署和县委县政府以及群众座谈。当乡亲们告诉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可以吃饱饭了，贺部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然而，农民仍然不富裕，他曾对我说，当年他少小离家时，故乡湖泊密布，路边桑树成行。全国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人，但是由于农业和农村政策上的偏差，片面强调抓粮食生产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填湖造田，砍光桑树，不仅生态被破坏，农村的多种经营也难以发展了。他把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同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交换了看法。

“文革”之前，贺老在中央卫生部工作。因此，故乡之行，他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当他在调研中发现，曾在旧社会危害百姓的血吸虫病，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得到扑灭，而在一些地区又有死灰复燃之势时，引起了深深的忧虑。回到北京后，贺老就湖北之行向中顾委写了专题报告，在充分肯定农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他在报告中，专门就农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发展，以及重视血

吸虫病防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顾委领导十分重视贺彪同志的意见，将他的报告转发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湖北省委。

江陵县沙岗镇，是洪湖苏区的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沙岗父老为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早期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邹资生，就牺牲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为邹资生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在沙岗，贺部长偕我们一行前往祭扫邹资生烈士陵园，缅怀这位 1929 年即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英雄。遗憾的是，烈士墓碑周围积水成洼，肮脏不堪，我们只得在十余米远的地方鞠躬致意，寄托哀思了。

(杨宣春：贺彪部长秘书)

贺龙与贺彪

胡立言

我在甘肃成县、徽县采访红二军团革命斗争史时，听到了许多当地流传的红军传奇故事。其中贺龙与贺彪的故事尤为精彩。传说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贺龙与贺彪是亲兄弟。两人并肩携手、配合默契，机动灵活、英勇顽强的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这种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红军指战员亲如手足战友之情的认可与赞美。其实贺龙与贺彪并无亲属关系，一个是湖南桑植的革命将领；一个是湖北江陵的楚地书生。但在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的战友关系，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1934年秋至1935年底，红二、六团军会师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在贺龙、任弼时的领导下，展开了凌厉的湘西攻势，整师整旅成建制的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牵制了敌人十几万大军，有力的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减轻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压力。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作为红二、六团军总指挥的贺龙在军事指挥上起着关键作用。时任红二、六军团卫生部长的贺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保障了大部队机动作战中的伤病员抢救及卫生保健工作，而且将总指挥贺龙的健康时刻挂在心上。

在连续取得了龙家寨、浯溪河、陈家河战斗胜利，歼灭3个旅的敌军后，1935年6月9日夜，贺龙巧设调虎离山计，在湖北省咸丰县忠堡设下了一个伏击圈。被调之虎就是国民党纵队司令

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战前，贺老总就断定：“那个做梦都想活捉贺龙的张振汉，会带部队和我们决战。”

6月，正是湘西的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细雨下个不停。卫生部长贺彪格外忙碌，数月连续战斗，重伤员较多，他既要亲自做手术，又要到部队部署检查雨季防病工作，心里还总是牵挂着贺老总和任弼时政委的身体。虽然贺老总有着一副龙帅虎将的身板，很少生病，但他却连一件雨衣都没有，整日冒雨勘察地形，选择战场，组织调动部队，忙得几夜都没有合眼。他心里着实放心不下，准备查看重伤员后，到指挥部去看看。

张振汉当夜率3个旅，分左中右三路，向忠堡前进。贺龙与任弼时一起奔上山顶指挥战斗。贺龙一刻也没有休息，询问了俘虏的敌军官，核实了敌人行动，又立即派人向红四师、红六师传达了战斗命令，给两师指挥员交待：“一定不要把张振汉给吓跑了。”战斗打响后，贺龙紧绷的神经才稍稍地放松了下来，此时，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但仍强打精神，不断地发出命令。任弼时发现贺老总忽然失去了平日的诙谐、乐观的情趣，除了下命令的果断声音外，其他一句话也没有。他劝贺龙走进山坡上的一间茅屋，一看贺老总的脸色有些异常，伸手摸摸额头觉得挺热。任弼时政委立即派通信员下山找卫生部长贺彪。

贺彪正要去指挥部，通信员匆匆赶到。贺龙的身体状况贺彪是非常了解的，他体格健壮，性格开朗，平日生点小病从来是让体内生长抵抗力，战而胜之。今日发高烧，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带上仔细选定的药品，随着通信员迅速来到老总的临时指挥部。

贺彪一看贺龙脸色泛红，立即从上衣口袋中拿出那支仅有的、部长专管的体温计。短暂的沉静后，体温计的水银柱停在了39度上。任弼时急了，力劝贺龙休息：“前面的战事由我负责。”贺龙也急了，说：“我万万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

真会急出病来。”

贺彪知道，此时怎样劝说，也无济于事，包围了张振汉的3个旅，总指挥无论如何是不会离开战场的。他集中精力分析老总的病情确定治疗办法：连续三四天没有得到一次足够的睡眠，沐雨栉风，衣服就没有干过，再好的身板也是撑不住的，如何让其迅速退烧，而又能够不中断战场指挥呢？当时，他身上最好的药是几支德国产的“白乃定”，还是陈家河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他动作敏捷麻利迅速给贺龙打了一针。半个小时过去了，一测体温，水银柱仍高悬在39度上。贺彪也有点急了。他考虑到贺老总平时的体质状况及当前的病情，果断决定：破例在半小时之后，再注射一支“白乃定”。二次注射后，他不时地切脉、听诊，观察贺老总的病情发展。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几乎要停滞似的。又过了半个小时，贺总的体温慢慢地降了下来，贺彪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高烧一退，贺龙立即伸展了一下腿脚，不容贺彪劝说，立即跑到山坡上的军团迫击炮兵阵地。贺彪紧随其后，两眼紧盯着贺老总，注意到他步履不稳、身上时有战栗的细微变化，提醒警卫员，不离其前后。贺龙高举望远镜，观察了战场上我军将张振汉纵队包围的态势，命令炮兵向山谷中张振汉指挥部轰击，一发炮弹正好击中了敌军无线电台，在猛烈的炮轰中，敌纵队参谋长炸死，敌纵队司令张振汉也负了伤。敌阵地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贺龙从容指挥部队，将敌军分割包围，全部歼灭。一心想活捉贺龙的张振汉也被贺龙活捉。贺老总与张振汉促膝长谈，使其幡然悔悟，跟随红二方面军一起长征，北上抗日，一直到达延安。贺彪还在长征中为张振汉检查身体。

红二方面军转战湘鄂西，牵制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使党中央率红一方面摆脱了险境，到达遵义，召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遵义会议。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领部队，从桑植出发，开始了长征。回旋乌蒙山，抢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与反动派前堵后截的几十万军队和恶劣的大自然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贺龙运筹帷幄，指挥红二方面军与强敌周旋在千里征程中。贺彪带领着一支不小的伤病员队伍，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顽强的行进，救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为革命保存了可贵的火种。一前一后，与贺老总配合默契。

1936年7月，经三个月的雪山、草地的艰难跋涉，红二方面军到达藏区阿坝地区。当时部队粮食奇缺，全靠吃野菜掺少量粮食来维持生存，只要是微苦的野菜和不苦的草，嚼烂了硬往肚子里吞咽。先头兄弟部队啃过的牛骨头、马骨头，用水煮煮再啃一遍，打到个把野兽，连皮带肉就是一顿美餐。贺龙总指挥与战士们一样只有少量粮食搭上野菜充饥，眼看着一天天的消瘦下去。贺彪带着师团干部伤员组成的越来越大的队伍，随着前卫红四师部队顽强的前进。贺彪不仅要为伤病员治疗，还要筹措粮食，组织指挥卫生部行军宿营，检查部队防病治病。跑前跑后，本来显得清癯秀气的贺彪，此时已是瘦骨嶙峋了。

贺龙带领着总指挥部成员，走在部队中间。在过草地中，只要遇到河滩，贺龙总要去钓鱼，然后骑马追赶部队。遇到部队，他总要拉紧缰绳，放慢马步，鼓励大家：“还有炒面吃吗？”“可不要掉队，掉队土匪就把你抢走了！”尽管他脸颊消瘦，颧骨突起，却总是那么精力充沛，乐观诙谐，关心部属，说几句逗趣的话，引得大家笑个不止，忘却了饥饿与疲劳。贺龙把钓来的鱼总是送给机关及警卫、侦察连队。而他自己却不断地收紧那根已经收过多次的皮腰带。

离开阿坝，进入潘松大草地的第三天，侦察连连长萧美成，捡到了一块小小的干羊肉，在手中颠过来，倒过去，口中充满了

唾液，也没有舍得吃下去，左思右想，还是把这块干羊肉送到了总指挥的面前。作为侦察员们对统帅的一份爱心，强塞到贺龙的手里。

白天，贺老总依然谈笑风生，到了夜晚，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接着腹泻不止，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兼二军团政委关向应立即派侦察连长萧美成和两名最好的骑兵通信员，赶到红四师把贺彪请来。

贺彪率领的卫生部，超出了总指挥部一天的行程，约有50华里，这几十里路可绝非一般的路程，是在沼泽与草地中穿行，萧美成整整追赶了一天，才赶上前卫部队。贺彪接到通知，心中十分焦急，立即准备后返。他选择药品，牵来骡子，带了一把弯刀，连夜匆忙上路。当时，贺彪也没有几颗粮食了，这把弯刀既给骡子割草，也为自己挖野菜。在草地行军，每前进一步都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喜悦，如今要后返几十里，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贺彪此时却没有多想，占据他思绪的全部都在贺龙总指挥的病上。老总平时很少得病，在今天的困境中他几乎是全军的精神支柱，怎么就病倒了呢！他那强健的体质，只要得了病准保不会轻，如若误食毒草，用什么药解毒？怎么救治……贺彪越想越急，以最快的速度后返，于次日下午，终于到达了总指挥部。他顾不得与任何人打招呼，径直来到贺老总跟前，映入眼帘的是贺龙那熟悉的面孔和那已不熟悉的消瘦身影。关向应说：“你可来了，你看，老总的脸色都变了。”贺龙强打精神，风趣地说：“谁知得了什么病，我是一点劲都没有。”说着给贺彪递过去一个眼神，露出了一丝微笑，好像在说：“贺彪，这次又把我交给你了”。关向应在一旁急切地催促：“快点给老总吃药啊”！贺彪放松了表情，仍然是往日那副沉着的样子说：“先观察了一下。”周围人们那些急切的情绪似乎也都平静了下来。

贺龙再次腹泻时，贺彪在一旁仔细观察，发现他是欲泄不下，欲停不止，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排泄物全是白色粘稠的液冻物，数量不多，上面还有明显的血丝。当时没有任何化验设备。贺彪找到一根小棍子，挑起一坨排泄物，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没有一点通常大便的臭味，而是一股呛鼻的腥味。贺彪心里暗想：糟糕，可能是中毒性痢疾。那年月，得这病可不是个个都能治得好的，说死人就死人，何况还是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大草地呢！虽然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贺老总指挥得了什么病，贺彪却一字不讲。他尽量放松自己的表情，心里却掂量着这事的份量：总指挥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影响着指战员的意志。总指挥部里人人心急如焚，直属部队的指挥员焦急的互相询问：“总指挥到底得了什么病？怎么老止不住啊？”贺彪将这种巨大的精神重负，悄悄地压在自己一个人的心头。

为了准确诊断，贺彪又观察了一遍。当他第二次将排泄物放在鼻子下面时，一股强烈的恶腥气味扑来，中毒性痢疾无疑。贺彪大胆地采取了泻消兼施，先泻后止的治疗方案。他把带来的两种药同时给贺龙服用，一种是泻药甘汞，一种是止痢消炎片，他根据贺老总的病情及体质，加大了药量。一个小时过去后，病人却无反应。贺彪又给贺龙服了第二次药。间隔一小时后又服药这是有一定风险的，他凭着对贺老总体质及意志的深刻了解，才下了这个决心。第二次服药后，贺彪心情确实有点紧张。他一边观察动静，一边给贺龙揉肚子。不多时，贺龙疼痛加重，接着就腹泻，这一次排泻量比以前大了许多。说明诊断、治疗没有错。贺彪一颗提在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两人同时感到一阵轻松，一个是排除病菌后的轻松，一个是精神压力下降的愉悦。

贺彪叫来贺龙的警卫员李建斌，让他烧了两大壶开水，找来一些醋加入水中，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给贺老总大量喝水，一

点都不能马虎。李建斌原是贺彪的警卫员，贺龙看上后要走的。李建斌对贺部长的指示执行得非常认真，简直近乎固执。次数多了，贺龙就顶牛：“别人生病没见喝什么水，我干吗要喝那么多水？”关向应政委也对此法提出疑问。贺彪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手头就那么点药，不得不采取这个土办法。”边说明道理，边把水送到老总的嘴边。此时，贺龙摇摇头，无奈的把水喝了下去。当夜，贺龙又腹泻一次，已无多少粘性分泌物。

翌日，警卫员扶贺龙上马，贺彪一直陪同，在草地上艰难的行进，以便随时观察治疗，并不时提醒贺老总勤揉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劝其多喝水。途中，贺龙多次腹泻，排泻出大量带有血丝的水样大便。贺彪挑起嗅了嗅，一丝笑容出现在他疲惫的脸上。贺龙在马上也说：“肛门也不下坠了。”贺彪立即改为消炎收敛药物。

中毒性菌痢，治疗很难，在过草地的艰险环境中就更加不易。贺彪硬是凭着对贺龙的了解，凭着丰富的经验，治愈了！创造了奇迹。贺彪一直陪同贺龙三天，还让贺老总寻找病因。贺龙起初觉得并无特殊食物入口，与大家一样，以煮野菜为主撒少量炒面充饥。贺彪认为中毒性菌痢必有外因才致病，多次让他找原因。贺老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对着贺彪的耳朵说：“莫不是萧美成送的那块干羊肉捣的鬼噢！”

光阴流逝，星转斗移，1955年，贺龙已调任国家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贺彪也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一天，贺彪的老部下、贺龙副总理的保健医生史书翰来找贺彪，见面就说：“贺老总让我来找你，请你去看看他。”贺彪问：“有什么事？”史书翰答：“老总讲：他们（指保健局）什么也不让我吃，咸的不能多，甜的不许沾，感到浑身没劲。让你去看看

他。”贺彪得知原委后，一时感到很为难，想了想，对史书翰说：“这事归保健局负责，你还是找保健局长傅连璋同志吧！”

隔了数日，史书翰又来找贺彪，一进门劈头就说：“贺老总讲，你是不是把他忘了，他让我请你一定要去看看他。”贺彪知道贺龙的脾气，二话没说，立即随着史书翰来到了贺龙的住处。

贺彪见到贺老总的第一个印象是：魁梧的身材确实见瘦了；洪钟般的嗓门也降低了。贺龙见到贺彪显得十分高兴，开门见山地说：“贺彪啊！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怎么不来看我啊！”贺彪也开门见山地问：“老总身体哪儿不舒服啊？”贺龙讲：“我的身体你还不知道？血压有点高，有点糖尿病，可他们什么也不让吃，也不让多活动，时间长了，感到身上没劲。”

贺彪从史书翰那里要来了保健局制定的食谱。这是一张按照当时苏联的保健制度给高血压、糖尿病人制定的食谱，严格规定不许吃鸡蛋、食糖……菜谱中多系豆腐、芹菜之类的食物。从医学角度来看，是无懈可击的。贺彪翻来覆去地看着食谱，思路却并没有寻找其正误，而是一门心思琢磨着贺龙副总理这个人。贺老总驰骋疆场，运筹帷幄，戎马倥偬的形象，立刻闪现在贺彪的脑海里，想着他那挑起千斤重担的肩膀；想着他那经得起艰苦磨练的身板。贺彪马上得出结论：贺龙的健康体魄，不是精细食品养出来的，而是在战争环境里摔打锻炼出来的。对于这样的人，过多的限制可能适得其反。想到这里，贺彪对贺龙笑着说：“依我看，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活动，就去活动。”贺龙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却被贺彪察觉了的笑容。

贺彪离开贺龙的住处，带着史书翰去找保健局傅连璋同志。一见面就对傅说：“贺老总的血压与年龄比，并不算高；糖尿病只一个加号，多时两个，也不重。我了解老总的体质、性格与生活习惯，深知他的承受力，应该少限制他一些。”傅连璋面有难

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贺彪也理解他的难处，干脆主动承担责任，对傅连璋说：“我已经告诉了贺老总，他想吃什么，就吃什。此话我可收不回来了！”傅连璋双手一伸无奈地说：“你既然讲了，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后来，史书翰告诉贺彪，取消那些限制后，贺老总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他现在打台球、钓鱼、散步，增加了体育锻炼的力度，身体、精神都好起来了。贺老总的“病”又一次被贺彪治好了。

1945年4月23日，贺龙与贺彪作为八路军120师的代表，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他们代表数万指战员，选举出党的领导集体，领导全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半个世纪后的1997年，年近九十的贺彪，参加了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对第三代党的集体领导，投入了他神圣的一票。这一票不仅代表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胆忠诚，还代表着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贺龙及众多战友对建设强大祖国的心愿。

(胡立言：装甲兵办公室秘书)

我记忆中的贺伯伯

——《贺彪回忆录》编后记

孙阿冰

我认识不少像贺伯伯这样的父辈，但我从未想过要为他们中的谁出一本书，尽管编辑工作是我从事了快20年的职业。

这部书稿到我手上，很是偶然。那是2000年6月的一天，出奇的闷热。贺伯伯的老伴陈凯阿姨躺在床上对我说，“这是个——缘份”。

她的腰扭伤了不能动，斜靠在一张旧木板床上。由于病痛，她讲话缓慢，声音低沉。但“缘份”两个字像是猛地敲击在我的心上，泪水立时涌了上来。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幕又从心底里浮现出来。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的父母就都被打倒了，在几次抄家之后，我们搬到了鼓楼附近几间低矮的小房中。爸爸每日要自带写有三反分子的大牌子轮流被拖去一个个单位批斗，他终日沉默着。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了，但确是在这个小院中，一日贺伯伯突然出现了。依然是那个样子，一进院就大声叫着爸的名字。他的手里托着一个小瓦罐，里面盛着自己做的米酒。他的一个高大挺拔的儿子陪伴在身旁……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确定这一切是否真实。

此刻，我向阿姨讲了这件事。阿姨平静地听完，轻轻地笑着说：“没错，是你贺伯伯，我们家只有他会做米酒。而且那时，我们也被冲击搬了家，就在霞光街，离你家不远。”

贺伯伯与我爸很早就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爸是20多岁的延安记者，曾陪同外国记者到前线视察采访，去过贺伯伯的部队。那时贺伯伯30多岁，是部队的卫生部长。

我初次见到贺伯伯，是文革前在政协礼堂两周一次的电影晚会上。那是国管局组织的惟一可以带孩子参加的干部文化活动。也就是在那里，我见到了后来在文革中被一个个掀翻在地、名字打上黑叉的走资派们。在当时我眼中的他们，普通得如同街头的大爷大妈，衣着随意，拖儿带女，南腔北调地互相打着招呼，亲热地大声谈笑。我之所以对贺伯伯的印象最深，是他有别于他人的穿戴和鲜明的性格。每次见他都是上穿中式布衣，头顶一个手工缝制的小圆帽。我那不苟言笑的父亲见到他总是很高兴，远远地走上前去问候。而贺伯伯则是隔着人流大声呼叫爸的名字。他嗓门大，说话频率快，有着明显的南方口音，急起来还会结巴，那双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他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地开心，特别地富有感染力，这些都让还是中学生的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原来，大人们除了严肃紧张的工作，也有朋友和快乐。那时的干部，几乎没有什么私交和往来，人人都忙于工作无暇相互走动。更没有时下的三日一聚，五日一宴。两周一次的电影，对于他们已经是奢侈的享受，因而，这样的见面机会对于几十年的老朋友实在难得。很快，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个活动也取消了。

80年代初，我调到出版社工作后，编辑出版了一套上千万字的红军战史。这套起始于50年代末，历经磨难几上几下，直至80年代末才出齐的军史巨著，对于我是一次系统深入的军战史学习。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贺伯伯原来是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士，曾参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我一页页展开贺伯伯的回忆录文稿，当那一幅幅已经泛黄的老照片呈现在眼前，那个艰苦的年代，那场久远的战争，在贺伯伯的亲身经历和描述中，变得鲜明、形像、具体、生动起来。由于出身贫苦，贺伯伯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他，硬是凭着对革命的忠诚、对同志的挚爱，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刻苦自修成为一名军医，并创建了人民军队最早的医疗抢救机构。他不仅亲自主刀在战火中挽救了众多战友的生命，而且，为了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健康，呕心沥血，竭尽了毕生的精力。在对书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校订过程中，贺伯伯的身影，从遥远的青年时代，跨越千山万水，走过风风雨雨，清晰地一步步走到我的面前，最后定格在文革中那个手托瓦罐的模样上。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人与人互相揭发、残酷批斗的年代，在那种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的政治空气下，贺伯伯来了！这一强烈的印象，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以至于他和我爸怎样见的面，彼此谈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我想，正是由于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仍然有着这样的事实，有着这样的情意和支持，我们大家才一起走出了黑暗，走到了今天。

如今，贺伯伯走了。当年延水河畔我那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父亲母亲也已步入寂寞的晚年。他们这一代人早已成为了一段历史。然而，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奋斗，他们始终不灭的信念和追求，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个篇章。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抵抗外来侵略面对流血牺牲时，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前面。

我不知道贺伯伯去了哪里，但我想，无论在哪儿，他都会知道，陈凯阿姨已经将他的最后一部手稿出版了。希望他也能够知道，他的亲人、战友、同事、部下，还有我和许许多多的人在想

念他。

惟一使我不安的，是我最终无法得知，贺伯伯对我所做的究竟满意不满意。

在编辑加工这部书稿时，我记录下自己的一些想法，曾打算整理一下作为后记附于书末。陈凯阿姨也说，你也写些什么吧。可我一直犹豫不决。面对像贺伯伯这样一位前辈，我们自己实在是太渺小太苍白。后来听说要编一部纪念他的文集，终于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说出久埋在心底的话，和许许多多怀念他的人们，在这里一起回忆他、纪念他，表达我们永远的敬意。

(孙阿冰：解放军出版社编辑)

2001年2月

三让座骑的人

——记老红军贺彪

刘雁声

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在烽烟滚滚的战场上，千里迢迢的进军途中，跨下有良驹是多么重要。红军翻越雪山草地时，哪一匹牲口不是背驮尾牵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解放战争中，多少个不会水的山区战士拽着马尾巴过了滔滔黄河！从一定意义上讲，有马就有安全。然而，在我接触的老红军中却有一位三让座骑的人，他就是总后勤部原副部长、中顾委委员贺彪。

这位老同志是湖北江陵人，1928年初参加荆江地区年关暴动，是湘鄂西红军中的老资格。他让马的故事发生在“围剿”反“围剿”战火激烈的1934年10月，从湘赣出发转战五千余里的红六军团进入黔东，找到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时，部队被打成了三截，马匹全部失落。党代表任弼时患着重疟疾，拄根树棍，举步维艰。贺龙同六军团领导人会晤后第一件事就是指示贺彪为六军团领导人选马。贺彪在卫生队的马匹中挑来挑去，觉得没有几匹合适的，忽然想到自己那匹宝马，想到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重病缠身，没有一匹好马怎么行，断然把自己的马牵了过去。他的马外号“小钢炮”，浑身棕褐色，会泅水，通人性，谁见谁爱，那是段德昌送给他的纪念物。送走了“小钢炮”，贺彪改骑一匹灰骡子，随部队急行军开进了湘西北。

打开永顺城时，他突然发现六军团政委王震没有牲口，赤着脚徒步走在战士中间。“这怎么行！”他急忙走上前去说：“把我

的马骑去吧。”双手递过了缰绳。

部队诱敌深入，撤进深山了。四师一位团长骑马从后面上来，老远就望见军医处长背着行李，挎着药包，一晃一晃地走在队伍后面，他立刻叫马兵找了匹马送过来。可是，当贺彪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看到新任六师师长郭鹏骑着匹极不像样的小马，简直像头驴时，想到大仗就要打响，主力师的师长需要赶到前头去，就把自己的马又让了出来。三让座骑之后，贺处长一晃一晃地在山路上又迈开了大步。

五十多年过去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对这件事记忆犹新，说“小钢炮”驮着弼时走出了草地；王震也多次讲到，说那匹马他骑到了延安。而贺彪本人却从未提过让座骑的事。

莫忘密切联系群众

——访贺彪

张占辉

8月29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党的十五大特邀代表贺彪家里。89岁高龄的贺老拄着一根古铜色的拐杖迎上前来和我握手，精神、气色看上去很好。我真诚地祝他安康长寿，不料却引出这位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的无限感叹：“当年一起参加鄂西暴动的战友就剩我一个了！”

联系以往参加党代会的感受，贺老说，只要把党的代表大会开好，把指导我们前进的理论旗帜高举起来，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阔步走向新的胜利。党的十五大是在世纪之交召开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对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开拓进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就必须找到一个凝聚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理论基础；一个政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找到一面指引方向的旗帜。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富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根据。令我们这些老同志欣慰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高高举起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的光

荣传统。”贺老说，他近年来考虑较多的问题就是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能忘了联系群众。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一定不能淡忘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头脑里要有群众观念，说话办事不能脱离群众。他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千方百计替群众着想，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应该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时时提醒和约束各级干部经常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把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真正作为我们说话办事的出发点。

贺彪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谭小英

在我家的书架上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其中有一个8寸的红木镜框的照片，就是贺彪伯伯的照片。贺伯伯虽然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他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谆谆教导，我永远难忘。

1965年9月，我从武汉市高中毕业考入中国政法大学，一个星期天，我受母亲之托专程去看望贺彪伯伯和陈凯妈妈。当时伯伯正在看书，不时还吟诵一段，是那样全神贯注。我因考入大学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名，又是从外地考到北京的学生，不免有些飘飘然。我问伯伯：“您都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还读书？”伯伯放下手里的书，对我说：“孩子，学无止境哦！考上大学只是学习知识的开始，我们的国家需要知识，需要高科技去武装，祖国强大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伯伯尚且活到老，学到老，你可不能骄傲哦，将来你跟伯伯比赛，看谁读的书多。你父亲去世早，伯伯和你陈妈妈要严格管你，以后星期天就到家里来。”伯伯关爱我们这些革命后代，是因为他把我们看成是革命的接班人，他认为关心下一代是老一辈义不容辞的职责。后来星期天，我常去家里，那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家啊！哥哥们拉小提琴，妹妹弹奏钢琴，我和陈妈妈唱歌。

可惜这样温馨的生活在1966年被彻底破坏了。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所有的老干部全部被“打倒”了，被说成是“牛鬼蛇神”、“走资派”、“黑线人物”。我的母亲天天挨斗，父亲虽然

去世在“文革”前，但却说他是“贺龙黑线上的人”，把他安葬在烈士陵园的墓也砸坏了。我在学校被说成是“坏子女”而经常受到训斥歧视。特别是让我这个18岁的女孩子到首都钢铁厂去劳动改造，做苦力，我特别想不通。后来我知道贺伯伯和陈妈妈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不顾当时卫生部“造反派”的审问、阻拦，到家里去看望伯伯和陈妈妈。我满腹委屈，一个劲儿向伯伯诉苦。伯伯耐心地听完我们学校的情况和自己所受的委屈后说：“每个革命者都要经得起两种考验，一种是精神上受折磨的考验，一种是肉体上痛苦的考验。有时这两种考验会同时到来。但你要记住，无论受什么样的折磨和痛苦，自己都要坚定不移相信党，相信老百姓，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动摇。长征时，你父亲谭正品在一次战斗中左腿被子弹打进去1寸多，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我给他开刀把子弹取出来了。你父亲哼都不哼一声，打上绑腿继续往前走了。我看着他肿得像水桶似的腿，心里很难过。你现在和那么多的‘坏子女’一样受到冲击，精神不能倒下，要像你父亲那样坚定，那样的硬骨头。越是在这样乱糟糟的时候，你越要多看书学习，将来好为国家做贡献。要告诉妈妈，让她保重身体。”伯伯是那样的平静和充满信心，岂不知他当时受了多少折磨啊，却还在想着别人，想着我们这些下一代。伯伯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令人感动。

1978年10月，我作为优秀团委书记被选为全国第十次团代会的代表到北京开会，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全国的团代会。在会议期间，我去看望贺伯伯和陈妈妈。我是1969年大学毕业后作为“坏子女”被送到愚公移山的王屋山去“脱胎换骨”的。这次到京开会，伯伯见我晒得黑乎乎的，手掌因修水库打石头磨的都是厚茧子，心疼地说：“这个孩子真是磨练出来的。”然后又对我说：“这样好，百炼成钢，不磨练成不了有用的人。”

1990年，全国第一个五年普法工作结束时，我被评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到北京开会时，我去年看望伯伯和陈妈妈，伯伯高兴地送给我一首他填的词。伯伯还给我讲解词的含意，并教导我说：“当年我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打出一个新天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光有一个新天地还不行，要在党中央领导下，靠全国人民来建设。今天我们开展普法教育，就是提高人们素质的有力措施，只有用法治来管理国实，管理部门，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有序的国家，才能真正在经济发展上得到保障。我们党做出在全国普法的决定，是有长远的，重大的意义的，你要继续努力。”伯伯的高瞻远瞩令人信服。

伯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长征路上漫天大雪，他把惟一的毛毯送给别人，自己却冻得发抖；1959年我父亲病重，是伯伯把他接到北京住进中苏友谊医院，请外国专家会诊，伯伯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伯伯是当时红军中少有的高级医生，用他精湛的医术不知救过多少人的生命；无论伯伯的职务有多高，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衣领和袖口都是补了又补还在穿；伯伯一生功绩卓著，却始终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有好处总是让给别人；伯伯是位高级干部，却一生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连最后去世都不让开追悼会和举行告别仪式……。伯伯的高尚品质就是倾其江河之水也难以诉尽，伯伯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伯伯对我如慈父般的温暖，他每看到我有一点进步就由衷地高兴。伯伯，您的谆谆教导使我在不断进步，我多么想把现在的进步告诉您老人家，多么想向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工作情况啊，可是您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每每想到此都让我泪流满面。每当我看到伯伯的照片时，我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坚强地去迎接新的战斗。伯伯，您永远在敦促着我们前进！

我们永远怀念您——我的好伯伯！

(谭小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司长)

2001年12月9日

忆我的部长姑父

窦天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在此期间，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都不断地再现了我党八十年来光辉伟大的历程。这一切使我想起了老一代打江山的革命先辈，使我更加怀念我的姑父——贺彪。

我的姑父是位老红军，经历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任卫生部和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职务，1999年3月31日不幸因病去世。姑父离开我们已有两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新中国成立后，姑父由西安调入北京任卫生部副部长，因而我这个在天津住的亲戚开始与姑父有了频繁的交往，在与姑父多年的接触中使我对他由陌生到熟悉到终生难忘。

记得第一次去姑父家前，心里总有股紧张、畏惧的感觉，因为在我这个出生于平民百姓家里的孩子的眼里，认为姑父是部长，一定很难接近，有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可不知怎么一见到姑父的面，那种紧张畏惧之感一扫而光。姑父是那么的和善、可亲，是那么的熱情。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小学生，可姑父却把我当作一位远来的客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在饭桌上姑父问长问短，我家老少三代人的身体、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他一一问到。姑父听得是那么认真，神情是那么关注。短短的聊天中，我忘记了姑父是位部长，只觉得他是我可亲可敬的长辈。

姑父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晚上还要看文件，没有休假

日，可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他再忙也要抽出一点儿时间与我们聊聊天，给我们讲些战争时期的故事，教育我们要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有时怕我这个小客人寂寞还带我们散散步，做游戏，在与姑父相处的日子里，我从未感到我们之间身份、地位的悬殊，只感到了亲情，加深了我们与姑父之间的感情。

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姑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批斗，被隔离，最后下放到农村劳动，我们无法相见，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1976年京、津、唐一带发生了骤然的地震，我家的房子遭受毁坏无法居住，暂住在路边自搭的临建棚内，那时姑父刚刚恢复工作，他不顾工作的劳累和身体的不适，借来津办事之机，抽空来我们临建棚看望了我的家人，并问寒问暖，姑父不顾危险还查看了危楼，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动。一想起这些往事，真是感慨万分。我们姑父多年来就是这样关心照顾我们这个穷亲戚的，这令我们终生难忘。

在与姑父的交往中，有一件最使我难以忘怀而又使我最为之动心的小事。大约在八十年代初夏的一天，姑父去天津塘沽视察工作路经天津，因时间关系，姑父只在天津住一晚上，仅仅这么短的时间，姑父仍不忘见见我们这些天津的亲属，那晚姑父住在河东区富民路的军队大院招待所内，离我家较远，驻津部队负责人就派了一名小战士开车将我们送到姑父的住处与姑父相见。分手时天色已晚，姑父年事已高，大家都劝他老人家不要送我们下楼了，但姑父执意要下楼送行，他说这是礼貌。姑父下楼走出了大门径直向接我们的那辆汽车走去，走到汽车跟前，姑父主动与小战士打招呼并与小战士握手向他表示谢意。此举动，小战士呆了，过了一会儿，小战士才定了定神，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挺直身子，恭恭敬敬地向姑父行了个军礼，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此时此景我的眼睛湿润了，是啊，这是一件多么不起眼的小事，

可是我却从中感受到了姑父的高尚品质和他的为人。

我回忆姑父的这几件小事，看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而又极其平凡的小事，可我认为往往就是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中，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高尚和伟大之处。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有很多事情都早已忘记，而这些小事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姨父，我们全家怀念您

解 扬

我永远忘不了 1999 年 3 月 31 日那一天。

早晨 7 点 40 分，我正准备离家上班，突然接到二表哥贺争用电话传来的噩耗：姨父于凌晨在睡眠中无疾而终。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满怀悲痛，匆忙奔到姨父家。望着姨父的遗容，心中无比难过，一位戎马一生的老红军，一位慈祥的长者，就此永远地长眠了。大夫、护士们整理遗体后，把姨父抱上了担架车，我跟着担架车后面走着，差点喊出：“别抬走，让老人家在家里再多待一会儿，让我们再多守候他一阵……，我妈妈住在医院里，还没有和他告别呢！”但感情拗不过现实，9 点半左右，姨父由担架车转上救护车，离家远去了，永远离去了，我的心也随之而去。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永远也看不到我那革命军人风范的姨父了，但他那坚挺的身躯，他那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幼年时，姨父常用有力的双手把我高高地举起，还逗笑：“把丫头养得胖胖的，咱们吃她肉……”，那时我只会嘎嘎的乐，我上小学时，也就是自 1961 年起，每到寒暑假期间，我都住在姨父家。我感到姨父和爸爸不大一样。爸爸从事法学研究，是文人，带有浓厚的书生气，体质较弱。而姨父是军人，有着健康的体魄，透着干练，他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在工作和学习时，决不受任何外界干扰。

在人妖颠倒，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中，出身贫苦，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冒死救治过不少伤病员的姨父，不仅被停了职，还被轮番批斗，这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但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他克服了精神和肉体的伤痛，每晚坚持沿卫生部门前的后海快步行走，从未间断，我十分敬佩他面对逆境表现出的不屈精神。

1969年底，我随父亲到河南息县的学部五七干校劳动，那时，我父亲和姨父都已是60岁的人了。父亲因体弱，劳动强度太大，得了重病，1970年7月，我送父亲回京治病，又去看望我十分惦念的姨姨和姨父。不料他们家中空空荡荡的，像样的家俱全被造反派搬走了，房间当中只摆着两只大黄木箱及些零散衣物，很是凄惨。姨姨在表哥贺争、贺平的帮助下正在收拾行装，姨父也变得从未有的憔悴，瘦弱。他由于类风湿、长骨刺、受风寒，腰椎出了问题，疼痛难忍，当时他站起来就坐不下去，坐下去又站不起来，……那样子令人看后真是心痛。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部专案组还责令姨父老两口去江西永修的五七干校劳动，我们亲属都难以接受，而姨父却在逆境中处之坦然，他们老两口于1970年7月初带病毅然南下，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我和表妹窦敏与表哥贺争、贺平到北京东站为他们送行，看到姨父在两位表哥的搀扶下艰难上车的情景，一向自认为坚强的我忍不住失声痛哭，随着汽笛长鸣，火车慢慢地启动了，眼望着两位体弱多病，不能自理的老人被无情地带走了，不知他们何时才能回京，也不知道有何种命运和风险在等着他们……我们心被撕碎了。我们回到家中，一个个默默地坐在椅子上，相对无语，妈妈支撑着大手术后病弱的身体，走过来对我们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他们是好人不是坏人”，她有延安整风的经验。

1970年底，我从河南返京，正赶上大表哥贺斗在京，我妈妈让我和大表哥一同去江西干校看望姨姨、姨父。1971年春节前，我们到了江西干校，正是阴雨绵绵，天气寒冷而又潮湿，地上翻着泥浆。姨父身穿黑色棉衣棉裤，头戴一顶灰色的老头帽，腰间扎着一截草绳子，手拄一根棍子，和姨姨一起，一步一滑地艰难地走到长途车站，迎接我们的到来。这是我记忆中最心酸的一段，在永修的三天里，我们得知，姨父的任务是看护庄稼，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一听见动静，拿起铁锹就得追赶野猪之类的野兽。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高强度的劳动中，仍伴随着专案组监管和逼供“二月兵变”的同谋人的“罪行”。那个名曰“五七干校”的地方，实际上是摧残老干部身心，比监狱还残酷的地方。但姨父无怨无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姨父被平反，又恢复了工作。那时他已近70岁。一场浩劫，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痛惜失去的时光，珍惜每一天。他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姨父不仅有军人的性格和作风，同时兼具文人的聪慧与学识，他酷爱读书，并且藏书很多，他兴趣广泛，军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无不涉猎。他还经常吟诵，抄写古诗并整理自己以往的诗词，出了一本诗集及二本书。姨父打桥牌的水平也很高，常在桥牌比赛中获奖。所有这些，使我对姨父充满了崇敬和爱戴。

1998年9月，姨姨为他筹办了90岁生日，请了他的亲密战友廖汉生夫妇，还有他的义女谭小芳一家等，以及我们全家。大家欢聚、照像、祝贺……极为快乐。姨父没有多说话，但脸上显出幸福、怡然的神态，他默默地接受了子孙们熙熙攘攘，七嘴八舌各种举动的祝福。这是我们几家最愉快的一次大型聚会。总导

演是我的三表嫂毛毛姐姐。

愉悦的时刻，幸福的光阴永远成了历史。而铭记在我们心中的是姨父的革命意志和高风亮节。

姨父，我们全家怀念您！

2001年7月15日

爸爸的爱心

贺 斗

爸爸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少语，不解亲情。但是，当你接触他多了，会发现：他也是开朗大度，善于思考，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他的长子，我随他风雨同舟，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是深有体会的。

满腔热情对病人

作为一个医生，爸爸不仅努力钻研医术，同时对病人充满了感情，充满了责任。在我记忆中，特别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把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精力，都扑在防病治病抢救伤病员上。几十年中，经他亲手救治的人成千上万。这些病人中，不仅有老一辈的革命领导人和干部，更多的是普通战士和贫民百姓。他不仅重视治病，也重视防病。

他经常对我说起，以前在解放区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都把防病治病放在首位，预防传染病，讲究卫生。由于敌人严密封锁，解放区严重缺医少药，自己土法上马，筹建药厂，生产了各种药品，如防治疟疾，伤寒，痢疾，胃肠炎，结核，外伤感染等药品，还有输液药品和抗菌素。为防止疾病蔓延和战斗减员起了很大作用。

有一次，爸爸给我看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农村儿童，腹部皮肤裂开，小肠露在外面。咋一看，真

让我害怕。爸爸对我说：这是一个解放区的儿童，在敌人轰炸时形成腹壁开放性损伤，小肠露到外面。我亲自抢救这个孩子，为他做了手术，术后一连几天看护着他，直到痊愈，把他送回家。

爸爸保存着一些他和同志们抢救伤病员的照片。有的是在破庙里，有的是在老乡家，还有在野外帐篷里。伤病员们，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伤在头部，有的伤在腹部。爸爸带着医生护士抢救伤员。爸爸对我说：一场战斗下来，经常有几百上千的伤员。为了挽救战士们的生命，爸爸和他领导的医护人员，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把伤员从火线上抬下来，转运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有时一连几天几夜不能休息。由于爸爸组织有方，技术精湛，认真负责，使许多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我们熟悉的伯伯、叔叔们，如贺炳炎、廖汉生、杨秀山、王尚荣、谭友林等，经常向我们谈起我爸爸舍身救战友的事迹。还现身说法，讲我爸爸怎样救治了他们。

特别是贺炳炎叔叔，经常晃动着他那残缺的右上臂，向我们述说在长征途中我爸爸为了救他的命，不得已截去了他的右臂。爸爸是凭着对贺炳炎叔叔的深厚感情和救死失伤的责任感，挽救了贺叔叔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两人成了生死知交。

王尚荣叔叔常向我们说起，他在长征途中和敌人作战，子弹穿透胸部，形成血气胸，生命垂危。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我爸爸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和护理，终于使他伤愈，重上战场。直到几十年后，王叔叔病故前，他和他的家人还念念不忘我爸爸的“救命之恩”。

爸爸和妈妈曾对我说，我出生在战争环境，卫生条件很差，时有传染病发生。爸爸亲自主持了研制各种疫苗的工作。为了防止我得天花，他亲手为我接种牛痘疫苗。至今，我左上臂还有三个明显的疤痕，就是爸爸当年用水果刀划痕接种时留下的记号，

直到现在，每当我抚摸着臂上的疤痕，都会想到：在当年的艰苦岁月，敌人封锁，缺医少药，爸爸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领导医务人员研制疫苗，还亲手为人接种，真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一心为国出良策

解放后，他积极推动和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建设工作。如：北京生物制品所，兰州生物制品所等。他还带领我们全家到新建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去义务劳动。爸爸对我讲：“生物制品是卫生防疫工作的基础，我为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拨款建设现代化的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各种疫苗。你别小看这疫苗，有了他，可以预防很多传染病，每年可以挽救几十万，上百万人的生命。”当时，有的人不重视预防工作和生物技术。现在来看，爸爸很有远见，为国家的卫生工作做了重要贡献。

爸爸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和制定了许多可行的计划和政策。如各级医院和农村医疗系统的组建，特别是县医院和公社医院的组建，医院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确立，防疫机构和制度的组建和建设，药品和器械的研制和生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培养等。

爸爸经常对我说：“出将入相是英雄，诗人作家是传人，医生同样可以是伟人。如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他们不仅在当时医治了千万人，直到百年，千年后，他们的医术流传至今，每天都在挽救着成千上万的病人，其贡献是无法估量的。”爸爸正是心存一种悬壶济世，造福人类的理想，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卫生事业。在我心目中，爸爸是个不计名利，勤勤恳恳，实实在在的英雄。

忠诚正直不违心

爸爸是个爱憎分明，忠诚耿直，不说假话的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定会坚持，不论有多大的压力，即使是撤职，蹲监狱，杀头，他也义无反顾。这一点，给我教育极深。

爸爸自幼喜欢读书学习，特别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崇拜古代贤人。他经常教导我们学习古代历史文化，学习先贤的品德和作品。他说：“历史和先贤就是一面镜子，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是非功过，你会从中吸取教训，也就知道你自己该怎样做人做事。”他最崇拜的是屈原，司马迁，魏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等。爸爸对我说：两千多年前，人们最崇拜的诗人是屈原，他忠诚爱国，才气横溢。其“离骚”等流芳千古。他的品德高尚，坚贞不屈，楚亡时，他投汨罗江殉国，人民包粽子投入江中，纪念他，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我们湖北就是古楚国，作为楚国人，我们为有屈原这样的伟人感到骄傲。爸爸对我多次谈到刚正忠诚的魏征：为国家，魏征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不怕罢官和杀头，敢于直谏，批评皇帝的错误。爸爸要我们向古贤人学习，爸爸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红军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当权时，对爸爸和他的同志们进行残酷迫害，关押刑讯，逼迫爸爸“交代”和“揭发”其他“改组派”，爸爸冒着被处死的危险，他没有说一句假话。

在“反右倾”斗争中，他受到批判，指控他“思想右倾，包庇右派，不服从党的路线政策”，他很难过，但他没有趋炎附势。

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要他揭发检举“贺龙”，彭德怀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罪行，他既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更没有“揭发”其他同志的“罪行”。他从来没有为了解脱自己而

违心做人，更没有见风转舵和巴结权贵。他认为“阿谀奉承，虚伪巴结都是小人所为，可以得势一时，但会贻害长期。这种人，绝不可学，也不可交。”爸爸的忠诚正直品德真是难能可贵！

后来，爸爸和妈妈被发配到江西农村劳改，我去看他们，他对我说：“我没有罪，贺龙没有罪，很多老同志都没有罪，这是坏人在搞阴谋。做人要有骨气，决不能为了保全个人利益出卖同志，更不能陷害同志，是非早晚有公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几千年的公理。大不了他们开除我的党籍，撤消我的职务，还我一个老百姓，把我遣送回老家。你也是医生，咱们回老家开个诊所，为老百姓看病，自己再种些菜，一样可以生活。”当爸爸对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望着他那饱经沧桑和坚强不屈的脸，热泪盈眶。我心里在想：我爸爸是个多么正直坚强的人那！我真为我有这么一个爸爸感到骄傲。如果将来他们把我爸爸遣返到农村，我一定陪着他，父子开个诊所，为老百姓看病，闲下来读书学习，谈古念诗，别有一番情趣。爸爸为我去农村看望他，感慨万分，非常激动，填了一首词《江神子》：“明知会晤即分离，对凄凄，顾依依。纵使不言，难免被猜疑。父是囚楚儿逆旅，今别去，会难期。若能驾舟扬帆去，任风吹，泛东西。骇浪惊涛，万里总相随。倘遇湘君当拯我，离洪泛，浴朝曦。”

这首词写的太好啦！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父子当时的心情，既浪漫又豪迈。真有当年屈原国破家亡，报国无门的悲壮情景，又有典型的楚辞风格。

爸爸常教导我们：做人，第一要爱国爱民，第二要有本领。这就是现在说的“德才兼备”，而任用干部，“德”应该放在第一位，品德好就不会出大乱子，而本领是可以学习锻炼的。也正是因为他注重品德修养，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高尚正直的人。

危难时刻显真情

有人说，爸爸太过严肃，不通人情。可是在长期生活中我看到他的另一面：对亲人，同志充满了朴实的感情和爱心。平时，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生活非常简朴，从不奢华，也不浪费。他对金钱物质和名誉地位的要求极低。他常对我说：你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就不错了，千万不要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他还说：“一个国家讲求奢华铺张，离衰败就不远啦。一个人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离犯错误就不远啦。”

爸爸一条毛巾用了两年还不愿意换新的，他认为，只要能用就用，不该扔掉浪费。爸爸妈妈给了我一条旧军毯，他对我说：“这条毯子我们用了几十年（大概比我年龄还大）还好好的，可以挡寒防潮，还可以捆行李，扔掉太可惜。”吃饭时，总是让厨师把饭菜数量做到恰好，大家既要吃好，又不要浪费，谁要是浪费和挑食，他一定会提出批评。他一生中很爱清洁，但很少做新衣服，除了几套外事用的衣服，平日穿着十分朴素。

他去世后，我们清理他的遗物，没有发现一件贵重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遗产。但是却留下了大量文章诗词，读书笔记和手稿，这才是爸爸最珍贵的遗产。后来，在妈妈主持下出版了爸爸的回忆录，总算完成了爸爸的遗愿。每当我读爸爸的回忆录和诗词，都感慨万分。爸爸真是太不容易啦。多少艰难困苦，起伏跌宕，枪林弹雨，都坚强的活下来啦。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这样多的苦难，更加坚定了他的品德和意志，塑造了他的人格。

爸爸的生活那么简朴，可是对我们学习有必要的事，他又从不吝啬。为了让我们学习知识，他买了许多中外名著和历史书籍，还监督指导我们认真读书，读不好，背不下来，就要处罚。

我曾因为没有读好“出师表”被罚站。为了培养我们的艺术修养，给我买小提琴，给妹妹买钢琴。这在五十年代可都是大投资。

解放战争初期，谭友林叔叔和鲁芳阿姨的大女儿晓芳出生后才几个月，谭叔叔夫妇要上东北前线，无法抚养晓芳。我爸爸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在我们家，承担起抚养晓芳的责任（当时，条件很艰苦，我妈妈带着我和老二，肚子里又怀着老三，已经是很吃力了）。晓芳小时候得了软骨病，爸爸妈妈想尽办法，为她治疗，补充营养，终于把病治好。直到解放后，才把晓芳送还给谭家。至今晓芳还是在叫我父母“爸爸”“妈妈”，叫我们“哥哥”。

王尚荣叔叔和黄克阿姨的小儿子（王小七）身患先天心脏病“四联症”，爸爸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比他自己得病还着急。专门请阜外医院的郭加强主任为小七作手术，手术当天，我爸爸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外好几个钟头，直到手术平安结束，他才松了一口气。以后的日子里，爸爸总是最惦记小七，包括在“文革”最危险的时候，王叔叔被打成“反革命”，“贺龙黑干将”，关进了秦城监狱。爸爸说：“这都是造谣陷害！王叔叔和我生死之交几十年，我了解他，他是忠厚老实人，决不是反革命！”还让我偷偷的去看望黄克阿姨和小七，给他们送些东西。文革后，王叔叔恢复了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大家见面后真是感慨万分！至今小七把我爸爸妈妈当作亲生父母一样，他还经常说：“贺伯伯是我们家两代人的救命恩人！”我爸爸去世时，小七哭的是那样伤心，几乎昏过去。王叔叔去世后，我妈妈对王家的孩子们说：“你们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还在，我就是你们的妈妈，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已经有四个孩子，加上晓芳是五个，再加上你们七个，我现在有十二个孩子啦。”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说：现在咱们是

大家庭啦，兄弟姐妹十二人，要重新排号啦！

文革期间，爸爸很多老战友都被打成“反革命”，关监狱，送劳改。他们的孩子都成了“黑帮子女”，有的发配农村，有的全家被扫地出门，又没有生活依靠，非常可怜。我们家也这样，爸爸被审查，工资每月只给几十元，弟弟妹妹都被当作“反革命”关押。就在这样艰苦危难的时刻，爸爸妈妈还时常关心着老战友和他们子女的情况，经常叫我偷偷的去看望他们，尽我们的能力，给他们买些东西，送钱，送药。贺龙元帅和薛明姨姨被隔离审查，他们的儿子贺鹏飞，得了黄疸肝炎，爸爸妈妈求老中医为他开了几十副中药，偷偷地让贺晓明给她哥哥拿去。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受到冲击，在北京没法呆，大家让她暂到外地避风，我还独自一人到北京站为贺晓明送行。吕正操伯伯被抓起来，刘沙姨姨不知去向，他们的女儿吕彤岩和小妹无依无靠，我爸爸妈妈叫我带着小妹（那时她只有十多岁）几次去找刘沙姨姨，还给刘沙姨姨送东西。后来还陪吕彤岩一同在外地漂流。这样的例子很多，充分证明爸爸是个立场坚定，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的人，是一个对革命同志充满爱心的人。我们家庭每个成员都受到爸爸的影响，始终和爸爸妈妈同甘共苦，度过了文革的难关。

尊重知识爱专家

爸爸从小就喜欢读书，热爱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他自己没有正式读过大学，许多知识都是自学的。医学是他在战争环境中向其他老军医一点一滴学习的，他很刻苦也很钻研，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军时期就成为很内行的卫生部长。他很清楚：要想做好任何工作，必须有一批内行的专家。他很注重人才，在战争时期，每到一处发现好的医生，除了向人家学习

之外，还想方设法说服人家参加革命队伍。他还努力保护他们，团结他们，使他们很快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好医生。

有一个日本俘虏医生高桥，在爸爸的团结教育下，带着他的全套 X 光设备，投身到中国的解放事业。我对高桥印象较深，最初他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矮壮身材，穿着解放军军装，骑着日本大洋马，还有一匹驮东西的大洋马（都是爸爸特别批准配给他的）。当我知道他是个日本人，有些仇恨和害怕。接触多了，才发现他是个技术高超，工作认真的好医生。一次，我模仿战斗剧社欧阳山尊和严寄洲叔叔们排练的话剧“刘胡兰”中的角色，不慎从草垛上摔下来，跌断了腿。医务主任潘本善叔叔给我用夹板固定后，几个战士用担架把我送到野战医院。高桥亲自为我检查，并鼓励和安慰我，在 X 光透视下复位固定打石膏。在高桥的治疗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解放后，高桥返回日本。事隔四十年后，他从日本赶来北京，看望我们。我看着高桥和爸爸见面时的激动样子，心潮也在翻腾着。同时我也在想：我爸爸真伟大，他连自己的敌人都能团结，而且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解放后，医药卫生界很缺乏人才，爸爸亲自组建了第四军医大学和其他医学院。同时，到处打听和聘请医学专家，包括中医专家，有些专家还是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专家对新中国的医学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爸爸对他们非常尊重和爱护，这也是对中国卫生事业的爱护，为此，爸爸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承担了风险和受到了委屈。

反右斗争时，很多专家受到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爸爸为他们鸣不平，向中央写报告，认为这些专家多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卫生事业作了很多工作，对这些从旧社会过来或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应该尽量团结和教育，不应该批判和打击，不应该

拿对待共产党干部标准来要求他们。就因为爸爸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对他们的遭遇鸣不平，爸爸受到了党内批判，差一点被打成了“右倾分子”。许多事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著名外科专家张查理，是中国现代医学的老前辈，中国第一个“外科解剖学”的著作人，解放前就是国内著名的医学家。解放后，任国家医学科学的领头人，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受到了打击。文革中，当我爸爸刚从江西农村劳改回北京（大约是72年），得知张查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非常难过，让我打听他家住在哪里，要亲自去看望他的家人。当时形势还很紧张，我爸爸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为了慎重，我先去探路，确定了张家住在东四十一条后，爸爸才进到他们家。爸爸见到张查理的只有一条腿的小女儿张俊英和外孙女张一利，难过地流出了眼泪。爸爸说：他很内疚，没有能力保护好这些专家，让他们含冤而去。希望大家坚强的活下去，是非早晚会有定论。

传染病学专家钟惠澜，也是老“人民医院”的创始人，他研究和发现的“钟氏睾吸虫”就是国际上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他为中国防治血吸虫病和其他传染病，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反右时，钟惠兰受到批判，爸爸极力保护他，反对给他戴“右派”帽子。

外国医生马海德，抗日初期就从美国来到延安，投身革命，是著名的皮肤病专家，卫生部顾问，为中国的皮肤性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爸爸和马海德在长期的共同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文革中，我爸爸受到批判和隔离，马海德不怕被牵连，多次到我们家看望爸爸，相互鼓励和帮助，在当时的恐怖时期，实属难能可贵。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四大名医之一的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恭，协和医院副院长耳鼻喉专家张庆松，整形医院院长宋儒耀，

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吴蔚然等等，以及许多中青年知识分子，我爸爸都对他们非常关怀爱护，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同志，充满了深情。他从不好大喜功，不趋炎附势，不喜欢铺张奢华，不计较个人得失。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就像他临终前说的：“我的一生虽没有大建树，但我始终坚持了做人的根本：忠诚正真，勤恳廉洁，爱国爱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死了也安心！”

我爱我的爸爸，更崇敬他那片真诚的爱心！

祭 我 父

贺 争

自 序

雨过晴朗，送父亲大人走了。

父亲的灵、父亲的骨去了他想往已久的地方，那圣洁、宁静的地方。

惜别归来，伤感复起。父亲依然望着我微笑。几分疼爱，几分依恋。我忍不住伏地痛哭，父亲坎坷的一生幕幕在我眼中浮起。犹如人生重度。

父亲由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相伴度过了他九十年沉重的一生。一个贫苦的农民，受着儒学文化的薰染；忠实于农民革命，又不与强权政治苟且；向大众献尽心力，却厌恶世俗鄙风；企盼人间温暖，又尊崇传统道德。他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理想与现实、内在与外界、奉献与批判的矛盾之中，难以解脱，最终也只有怀着繁多疑惑的无奈去寻求安宁了。

在追忆和剖析中，我发现自己对父亲实在是无知、无情。他一生很少荣耀，很少财富，很少享受，很少欢乐，真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了。他的心似深渊之水，只有大胆深入去探索才会感觉到它的湿润和清透。

我深深领悟到一个平凡老人的伟大，我要明父亲的心，赎自己的罪，我供上香火，取来纸笔，跪在父亲的香案前，写下

“祭我父”三个字。“祭文”我从未写过，也不知该如何写，只想写一篇称作“祭文”的东西把我的理解献给父亲，用我的心纪念父亲。

父亲的影像如泉涌般流过的我的脑海，拨动着我的手、我的笔、收止不住。不到两千字的“祭文”简括了些，只是想透示父亲某些活的、真的内涵，令自己更多理解些人世间的道理。

我的文比父的心过于浅、过于淡，但若能显明父亲的几分，我也就有些安慰，敢于把它献给我父了。

1999年4月22日

于万寿路

贺彪首长二三事

吕清华

贺彪首长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过去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1990年夏天，我被组织上分配到贺彪副部长家中作公务员。当时，想都不敢想能到一位老首长家中工作，我既兴奋又紧张，心想首长是个大人物，住房一定很讲究，家里也很气派吧。到了之后，我才发现这里是一座简朴的两层小楼，不太鲜艳的墙壁显露出被粉刷的砖红。走进首长家中，只见一位身穿旧军装的老人，留着寸头，丝丝银发显得精神矍铄。他拿着一把芭蕉扇，正坐在沙发上看报。我们还没来得及向他问好，首长看见有人进来，便笑吟吟的站起来招呼我们，工作人员上前扶他坐下并向他介绍，得知我是新派来的公务员，首长埋怨道：“嘿，我还走得动，用不着这么多人照顾，你们工作那么忙，就别老为我操心。”看到我挺紧张的神情，和蔼地说：“在我这儿工作就像在家里一样，别拘束，快请坐，快请坐。”接着他询问了我的姓名和家庭的情况，看到老首长这么热情亲切，我那颗悬着的心略微平静下来。

以后的日子，我就在首长家中照顾他的生活。他一日三餐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极其节俭，还经常吃剩下的饭菜。一次，首长发现垃圾筐里有剩饭，就把我们叫到一起，耐心地说：“这些饭菜，倒掉多可惜啊，这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你们还记得那首诗

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贫困人口很多，我们一定要懂得节约粮食。哎！你们呀，没有经历过旧社会，无法想像战争年代的疾苦，我们长征的时候吃的是树皮，草根……”首长的一番话，深深地感染了我们，直到今天我仍记忆犹新。首长自己勤俭节约，可对灾区人民总是慷慨解囊。无论哪儿发生灾害，他总要给灾区人民捐钱捐物，每次都是拣新的衣物捐献，他说：“灾区人民受苦了，要让他们穿好的，旧的我们用。”他的心中始终充满了对遭受疾苦的人们的无限同情和保护。

首长经常给我们讲许多革命年代的故事和知识，鼓励我们要注意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要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有时我们探家回来带点土特产，他从不接受。首长对当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常说：“这些蛀虫，败坏了党的作风和形象，损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不严厉惩处，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有时候单位组织老干部出外旅游，他总说：“旅游一次得花多少钱啊，与其浪费这么多钱还不如用来救助一些贫困人口和失学儿童。”事实上，他连专车几乎都不用，在他病重期间，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不愿让国家为他花钱，他立下遗嘱：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悼念活动，骨灰洒入大海。敬爱的首长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我们。

在与首长共同度过的岁月里，他的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他的身上，我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什么样的精神才是高贵的精神。这几年，我的每一步足迹，都离不开他的鼓励和殷切期望，我深切地怀念我的老首长，我将怎样报答您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的祖国和人民，尽忠于党的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敬爱的首长走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吕清华：总后交通运输学院干部)

2001年11月

一位革命者的风范

——怀念贺彪首长

肖祥建

那是一个没有灿烂的阳光，没有与往常一样温馨的月亮，人们刚刚从梦中苏醒，清风萧瑟，一个让我悲痛而永远难忘的早晨——1999年3月31日，我刚走进我的工作厨房，一位战友跑过来告诉我一个震惊的悲讯：“首长不行了”！我的心好像刀绞一般，急忙跑到首长的卧室，看到我永远都不想看到的一刹那，公务员李全生流着眼泪静静站在那里，首长和往常一样的躺在那里，我轻轻地拉住首长的手喊：“首长，首长……”他没有回答我，回答我的是自己不住往下流的泪水。旁边满脸泪水的陈凯阿姨，看到风雨同舟一起生活60多年的老伴走了，差点晕了过去，医生护士们都赶到，首先安排将伤心过度而心脏病复发的阿姨，送到301医院康复楼。不到几时，就准备把首长送走，我和几位同志抬着担架往车上送，两眼泪汪汪，望着白布蒙住首长脸的身影，就这样走了。首长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首长永远告别了他的亲人们，告别了他多年一起奋战、一起工作的老战友们，告别了崇拜他、尊敬他、照顾他的晚辈们，他安详地走了。他留下了两袖清风、清正严廉、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高尚品格；他那种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这些我将永生难忘。

我是1997年从三十八军24团调到首长家做炊事工作的。记

得第一天到首长家的下午，杨宣春秘书带着我到首长休息的地方，他正在看报，得知我的到来，他转过身用那慈祥的目光看着我，我走过去，很郑重地行了个军礼，喊了声：“首长好”！他当时被我洪亮的声音震惊一下，没有生气，也没有责怪我，还笑着说：“好，这兵素质不错”！因当时我心情激动，从没有单独与这么高级领导行礼谈话，更别谈距离这么近了。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我是农村当兵的孩子，在野战部队的训练和钢铁纪律的约束下，就连见到连长，也不敢粗心大意，从来没有正面看见过团领导，更别谈师以上的领导人物的了，今后我在这么高级领导家做炊事员，还可以随时和他谈话，聊天，这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当时我就自我介绍了姓名和在单位的工作情况，他也把家里就餐情况和生活习惯简单地告诉了我，就叫公务员小李把我带到客厅交谈工作的事。走进客厅一看，两边并排着很陈旧的沙发，中间放了一个茶几，墙边放了一台很老式的电视，周围放几盘鲜花。我坐下仔细一看，沙发上的坐垫，都是洗了几百遍发白的普通灰布，我当时震惊了一下。我原先想，这么高级首长的家，摆设肯定很豪华、很气派的，结果亲眼见到是这样的简陋，这样的朴素，原先想的和我亲眼见到的，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变。谁也不会想到曾经沐血奋战，夺得江山，创建新中国的老前辈、老革命是那样的艰苦朴素，家中的布置是如此的简单，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真的不敢相信。这位老首长、老前辈不愧是一位老红军。下午我开始工作，给他们做晚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饭菜做好了，小李扶着首长，后面阿姨也跟着进餐厅吃饭，我的心七上八下地跳个不停，害怕不合口味，做菜技术太差。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吃完走了，只看见桌上的菜剩下一大半。我悄悄地尝了一口，立马吐了，因为太咸了。首长、阿姨居然没有说。等我把卫生搞完，小李告诉我，首长找我。我知道要挨训，

走过去，他叫我坐下，亲切地说“小肖，今天吃的菜不太理想，你知道吗？”我说刚才尝了一口，太咸了，他说，今后的菜少放盐，老年人吃盐多了对身体不好，也不放糖，因为阿姨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我低着头听他说，任何事情你都要勇敢的去面对，因为勇敢的本身比失败更重要，要昂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学会总结昨天，拥有今天，才会掌握未来。他没有责怪我，也没有批评我，是在鼓励我。我想只要踏实地去努力，就会把工作做好。今后一定多看书，多掌握烹调技能，让首长阿姨们吃得高兴、满意。

在老首长的正确指导教育下、关心和帮助下，我认真学习、勤奋工作，尽心尽责，任劳任怨，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and 技能，每逢过年过节，首长都让我做很多的饭菜，让我们几个小战士与他就餐，让我们吃饱吃好，别想家。平时也经常问我们衣食住行怎么样，叫我们在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就告诉他。这几句普通的话语，让我们几位离家千里的战士们，感激不尽。我们只能用实际行动，勤恳工作，来感谢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们就把他和阿姨当作自己的亲生爷爷、奶奶来照顾，由于老首长夫妇年高体弱多病，伙食的调节是很难的，有时首长不能起床吃饭，我就用勺一口一口地喂着吃，喝水时，我用杯子送到他嘴边。他露出笑容，经常慢吞吞地讲述他们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

首长、阿姨从未真正的过生日。每次都是我给他们做点面条让全家吃，告诉他们吃“长寿面”，他们才悟到今天是自己的生日。98年8月30日那天，廖汉生、谭友林等好多老战友、亲戚朋友们要给他过九十大寿。他开始不同意，最后经他们的劝说，才答应下来。当天我准备了很丰盛的午饭，大家举起手中的饮料当作酒，向首长祝福的时候，他两眼掉下了激动的泪珠说：“我

从未过过生日，今天感谢大家！”从他当时的言行举止看他感觉到了快乐和幸福。全家人的欢聚，老战友的祝福，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满意，大家都看到了首长的感动和谢意。吃完饭后，拍了好多的照片做纪念。他还亲自走到我身边说：“小肖，你辛苦了！”我当时的心情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动。我只想说：“首长，我为你服务是我的骄傲，也是今生无悔的选择”。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大家的团聚，欢笑和祝福，竟然是给这位革命前辈过最后的生日。死神为什么会降到他的身上呢？

我只能喊一声：首长，你走好。我们会永远想念您。

（肖祥建：总后管理局士官）

2001年8月

诗 词

怀念贺彪

——贺彪同志逝世三周年祭

张自宽

贺彪同志在国家卫生部工作期间，我经常陪同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跑路很多，特别辛劳。”正如他在病中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说：“你早年送给我的一本小诗集，病前又拿来看，躺稻草，好像是我昨天未做完的还乡梦。为了广大人民的健康，你我不计时间和艰辛，到太阳村，跑两湖、两广、陕晋和冀中，蹲点麻城，头是开得好，熟悉了农村，得知识与经验不少，苦中有乐。然而，狂风暴雨一到，前有红头剥皮，后而黄花吹散，唯独野草哀叹。”贺彪同志的这段话，概括了我随他工作十多年的经历，也道出了他对那段难忘经历的遐思和感叹。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也是浮想联翩，更加激起了我对贺彪同志的怀念与崇敬。

太阳村头始谋划^①，
湘鄂穷乡访病贫。
林店跳墙为逃宴^②，
安家夜泊卧草眠^③。
悬壶麻城万民益^④，
情暖苏区百姓心。

但至半途狂飙起^⑤，
鸿猷难酬心怆然^⑥。

①太阳村是全国卫生模范村，在山西省稷山县。1959年春，我随同贺彪同志在太阳村蹲点调研时，谋划了建设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培训农村卫生员、探索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方案。

②1965年秋在湖北麻城林店公社调研时在林店中学借宿，为逃避公社领导的招待，翌日天刚拂晓，校门未开，我俩就跳墙而去。

③同年在麻城安家畈调研并慰问武汉医学院何玉兰教授率领的驻村医疗小分队时，工作至深夜，我俩便睡在农家一间库房的稻草上，这就是贺彪同志信上所说的“睡稻草”。

④1965年9月至1966年8月贺彪同志遵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率领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在麻城蹲点一年，为全县八十万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为苏区老百姓送去了党的关怀与温暖。

⑤贺彪同志在麻城蹲点原计划为二年，刚满一年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中断。

⑥鸿猷，宏伟的计划之意。

2002年元月

贺彪老首长两周年祭

罗昆禾

新岁翘首星晨分，我友相聚。盼君魂归来兮，许思情畅满。

贺公先贤，别离匆；往事如星，岁月有情。君出寒门，少小出奔。心存大志，禀性忠贞。投身革命，洪流勇进。“八一”旗下，冠盖红星。雪山草地，万里长征。艰苦卓绝，壮哉其行。奋起抗日，赴血飞腾，战火烽烟，风虎云龙。转战南北，忘死舍生。驰骋西域，蹇旗先登。卫生战域，创业建功。救死扶伤，沥血呕心。窑洞办学，培育新人。为公萃工，不遗余生。方向坚定，旗帜鲜明。投效祖国，奋斗一生。十年浩劫，“四害”横行。面对迫害，铁骨铮铮。国贼即除，盛世幸逢。伏枥壮怀，扶摇鲲鹏。吟诗赋词，抒发豪情。

祭奠首长，恭敬铭心。郁郁松柏，像君之神。胸怀豁达，一片赤诚，品质高洁，孑然一身。清贫乐道，抱素守真。清风明月，永为典型。

(罗昆禾：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社长)

2001年1月

苍松与老人

王万水

你，
高大威严的身躯，
正气凛然
顶天立地
揣一颗实实在在的心
披一身庄庄重重的绿。

你，
大雪压在身上
任凭它多么厚重，
刚直的腰
从未见半点弯屈。

你，
狂风扑在身上
任凭它多么凶恶，
坚实的脚步
从未见丝毫挪移。
面对着你，
一位老人
走进了我的记忆，

我
思量了许久许久，
琢磨了多时多时。
惊喜地发现——
这老人是你的化身，
你是这老人的影子。
你知道吗？
这位老人
曾在
战火里经受过
多少锻打？
铲除了多少孽敌？
浪涛里经受过
多少重撞？
顶住了多少卑鄙？

我告诉你，
这位老人
留下的这多“？”
我是一个也没能拉直。
我问苍天、大地、山水
都答不全，也说不细。
直到按响了老一辈
“英烈馆”的门铃，
历史才向我
揭开谜底——
哇！光芒四射

原是一串淬火的金子。

我再告诉你，
这位老人
有着与常人
不同的“生理”，
他
只有“一个心眼”
只有“一根筋”。
正因如此
一种一直不变的风骨，
一个一直不变的站姿，
整整坚持了九十年，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第三次告诉你，
这位老人
虽已作古三载，
但是，
他那不朽的精神和名片上
堂堂正正的“贺彪”二字，
透着你苍松的气概，
已植入人心，
且深深的，
也会久久的……

2001年10月8日

怀 念

——追忆贺彪部长

刘进才

您匆忙中没有告别
只留下鞠躬尽瘁的丰功伟绩
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里

您远行了
匆忙中没有嘱托
只留下救死扶伤高尚品德
在科技卫生事业工程里

您远行了
匆忙中没有写就
只留下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在部下脑海里刻骨铭心

您远行了
匆忙中没能相聚
只留下音容笑貌在“军大”校院
我们继承您的遗志
以实际行动缅怀您

2000年8月于西安

注：“军大”，指第四军医大学

悼会祭起奇良

革命艰苦岁月跟

随良师共渡

建设祖国卫生事业

共同努力终岁

汪石坚

二〇〇六·七月

(汪石坚：解放军 301 医院原副院长)

辭世三年緬賀公
奇容笑貌遺雄
風旌旗招展飄湖
畔豫皖周旋定鄂
中萬里長征排困
境中原一突軍奇
功術生事業嘔心
血浩氣永存凝彩
虹。

紀念賀彪川志逝世三周年

江陵吳英手書



(黃年虎：賀彪家鄉湖北江陵縣人)

怀念我的舅父

——念 碑

葛 一 林

没有为您树碑，
没有为您立传，
更没有为您铸造铜像，
但您的光辉形像，
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
您的不朽业绩，
人民将永远传扬。
这是赞美的心声，
传遍了生您和战斗过的地方。
您在自己的身后，
建造了一座真正的纪念碑，
这比人为强百倍。
今天您的同事自发来集文，
赞您鞠躬尽瘁的好品质，
您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您的儿女为之自豪，
故乡亲人为您骄傲。

2001年6月14日

英雄永生

——《贺彪纪念文集》编后

郝秀兰

自2001年3月至2002年3月，受《贺彪纪念文集》编委会的委托，我荣幸地担任了《贺彪纪念文集》这部书的采访、编辑加工、校对及稿件的收集整理工作。为完成好这项工作，我认真阅读了《贺彪回忆录》、《贺彪词选》以及贺彪撰写的二部书《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西到陕北长征纪实》、《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以及贺彪的生平介绍材料，使我对贺彪这位革命前辈有了初步的了解，尤其是在采访了十几位曾经同贺彪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之后，他们对贺彪发自肺腑的感激、钦佩、比亲兄弟还亲的深情令我感慨万千。此外，在编辑加工出自八十余位全国各地的贺彪的老战友、老朋友、至爱亲朋之手的文稿的过程中，使我对贺彪这位老首长有了更深入的立体的了解，他的崇高精神，使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因此，我想说，编这部书，将使我终生受益。我想广大读者也会和我一样，万分感谢这部书的倡导发起和组织者张自宽、张冰浣等编委会的老同志，是他们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花费了很多心血，不顾年事已高，积极热心地组稿、撰稿、编辑

使其从无到有且臻于完善。这八十余篇文稿，篇篇充溢了对贺彪同志的眷眷深情，浓浓敬意，同时又十分真实、纯朴，读来仿佛把我们带回到贺彪生活和战斗的旅程中，栩栩如生地记叙了贺彪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尚的革命气节、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尤其令人感叹的是，这部书的部分作者曾是为解放全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我军高级将领和为我国卫生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他们如今已是年逾古稀，可以想见，他们在灯下浮想联翩，追忆往事，用发颤的手写下洋洋千言的不易，体现了他们对贺彪同志无限怀念的浓浓深情，和对于人世间真善美的热爱和追求。我感觉这部书像一首饱蘸深情的英雄的赞美诗，一曲由众人合唱的英雄的赞歌，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净化和升华，感人至深。我在夜深人静之时编校这部书稿，感人之处常使我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我的心灵因贺彪而深深地感动了！我虽与贺彪老首长未曾见过面，也没体验过他所经历的战斗生活，但通过这部书的编辑，使我走近了贺彪，走进了一位英雄的精神世界，感受了他的博大精神带给他所热爱的事业和他所领导、接触、救治过的人们的恩泽。他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温暖、照亮、救助、抚慰了无数人的躯体和心灵。他平凡而又伟大，他慈祥而又令人肃然起敬，他脚踏实地而又超然物外，高风亮节。

他首先是一位医德高尚的非凡的医生。他在艰苦的

战争年代，没有上过正规的医学院校，凭着他的勤奋钻研、勤学苦练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成为享誉军内外的“名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贺彪凭着他的坚毅、勇敢和灵活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凭着他作医生的使命感和仁爱之心，救活了无数命在垂危的官兵，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红军长征途中，他用土法治好了贺龙元帅的食物中毒症；为了保住红二军团五师贺炳炎师长的性命，他在手术器械不全，仅有少许麻药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大的手术，锯下了贺炳炎师长已被子弹打断了的右臂残肢。整个手术下来，贺彪已是精疲力竭，浑身湿透，他以自己做医生的奉献和果敢，保住了贺师长的性命。他还三次救治杨秀山将军，如今杨将军已是八旬老人，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写了这样的情节：他负伤被人抬在担架上，喉咙干燥得冒火，这时，只见前面的贺彪站在路边微笑着等着他走近后，把手里的一只梨送给他，让他解解渴。杨将军写道：这哪里是一只普通的梨，分明是一颗亲切的心！贺彪有一颗“亲切的心”，是贺彪救治过的所有伤病员的共同感受，这是一份无私的爱，是作为一名医生的崇高品德。贺彪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使战争中的官兵们视他为“救星”，从而更加英勇杀敌，不怕牺牲，去夺取胜利。

贺彪是一个无私无畏的高尚的人。在这部纪念文集中有一篇贺彪在枪林弹雨中一人独自划船过河，寻找与部队失散了的贺捷生母女，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安全救

回到部队中的故事。贺捷生母女一生都感激贺彪的救命之恩。像这样感人的故事在这部文集中多有体现。如陈云的妻妹于陆琳的回忆文章中就写了贺彪如何在深夜为难产的姐姐于若木接生，顺利生下一男孩的故事；谭友林将军回忆贺彪夫妇帮他抚养女儿晓芳整整四年，在缺吃少穿的战争年代，贺彪家里已有四个孩子，但却真诚无私地帮助战友，用谭友林的话说，他和贺彪的感情比亲兄弟还亲……。贺彪对同志对战友的深情厚谊，他高尚的人格，善良博大的胸怀，难以用文字述尽，他以自己平凡而崇高的言行，放大了他生命的光环。

贺彪是一个追求真理，超然物外的纯粹的人。诗言志，《贺彪词选》是他精神品格的真实写照，这部纪念文集中，很多作者引用贺彪的诗词，对他的诗情才华十分钦佩。他的浩然正气，刚直不阿，无怨无悔，宽容大度，确让人感佩。在“文革”中，贺彪身陷囹圄，遭受诬陷，但他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坚决维护贺龙元帅等革命功臣的形象，不怕受牵连，想尽办法关心照顾遭受迫害的革命功臣的家属、子女。

他一生勤奋好学，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为人清廉。在这部纪念文集中，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老医生、老专家深情地回忆贺彪对他们的谆谆教诲、殷殷关怀；他的一位秘书回忆他严拒人家送他的礼物；跟他一同去湖北麻城蹲点的张自宽同志回忆他们在麻城工作期间怕搅扰百姓，睡库房稻草上，为躲避公社领导的宴请拂晓

翻墙悄然离去的情景……

点点滴滴的记忆，朴朴实实的记述，真真切切的怀念，平凡里映出了崇高与伟大，正像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贺彪虽不是战场上持枪杀敌的勇士，但他却是医界哲人、时代的英雄，他用生命谱写了一首英雄的史诗，他的精神必将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建设我们亲爱的祖国，使之更加强大，我想这是我们编辑出版这本《贺彪纪念文集》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贺彪虽已仙逝，但他的精神不朽，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一位名人说过：一个人若活在人们的心里，他便获得了永生。

(郝秀兰：中国医院杂志社编审)